

马列主义 研究资料

2

1987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

MALIEZHUYI YANJIU ZILIAO

1987 年第 2 辑

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编辑部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75 印张 221,000 字

1987 年 6 月第 1 版 1987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991—4,059

书号 1/001-148 定价 1.70 元



497734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

1987年第2辑目录

(总第48辑)

约·布·菲尔《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一书摘要(续一)..... 马克思(1)
徐明译

关于卡尔·马克思的异化概念的内容和功能
..... 吴达琼译(17)
屏羽

异化概念在目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哲学中的作用和功能..... [民主德国]克·梅尔茨(17)

批判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异化观念的歪曲..... [苏]博·别索诺夫(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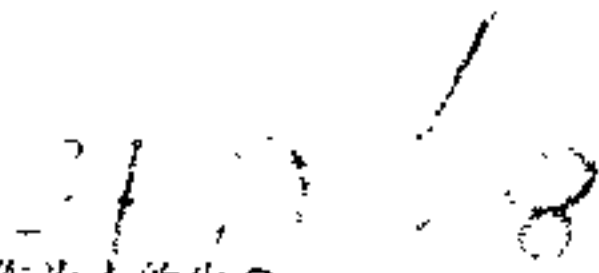
卡尔·马克思学说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异化问题以及我们目前存在的若干问题..... [苏]伊·谢·纳尔斯基(33)

异化是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化的表现..... [民主德国]哈·施里瓦(46)

通过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民主德国]汉·卢夫特(50)

政治经济学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问题”..... [民主德国]汉·瓦格纳(55)

论异化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地位..... [民主德国]罗·鲍威尔曼(60)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作为人的生命

表现的劳动和作为异化劳动的劳动……〔民主德国〕赫·东凯 (68)

从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谈对马克思异化

概念的一些看法……〔民主德国〕巴·罗特 (73)

列宁论异化的扬弃……〔苏〕弗·赫德勒 (79)

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的形成

(《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研究)……张钟朴 (86)

列宁关于国家机关的组织和活动的原则

……〔苏〕弗·伊·波波娃
王士云译 (100)

托马斯·卡莱尔与空想社会主义

……〔苏〕伊·尼·奥西诺夫斯基
李锁贵译 (119)

流亡者联盟中的早期无产阶级纲领

……〔民主德国〕沃·迈泽尔
高爱贺译 (137)

文献和资料

恩格斯1849年夏在瑞士的政治流亡

(史料综述)……〔联邦德国〕米·克尼里姆
朱霞译 (153)

燕妮·马克思(女儿)致路·库格曼的信……金嗣焜译 (162)

西方对马克思主义的探讨

《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评介……〔美〕劳·克拉德
马学林译 (175)

马克思的“新人道主义”、“民族学笔记”

和妇女解放……〔美〕拉·杜娜耶夫斯卡娅
都梁译 195)

关于“原生形态”概念的历史(马克思著作中

的原始社会概念)……〔苏〕H.B. 特尔-阿科皮扬
南山译 (213)

国外学术研究

- 马克思体系中的价值计算和价格计算(二)
..... [德]拉·冯·鲍尔特凯维茨 (228)
卢晓萍译
- 七十年代以来国外关于“转形问题”的研究
情况..... [日]高须贺义博 (217)
刘 焱摘编

简 讯

- 第一次全国“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学术
研讨会”在榕城召开 闻 文 (260)
- 轰动一时的发现..... 王栋华 (263)

书 刊 简 介

- 苏联发表列宁新文献一百余篇
——《列宁文集》第40卷简介 韩 江 (268)
- 苏联新著《马克思列宁主义史》开始出版..... 晓 戈 (270)
- 《〈资本论〉的第一个俄译者》..... 林 东 (271)
- 《国际共运史研究》出版..... (272)

马克思

约·布·菲尔《印度和锡兰的 雅利安人村社》一书摘要(续一)

编者按：马克思1881年8—9月所写的菲尔著作的摘要，本刊上辑已开始刊登，以下刊登的是该书摘要的第二部分，全文预计在下两辑刊登完毕。马克思在这一部分摘要中详细摘录了菲尔著作中有关印度农村的土地占有情况、农民财产状况和生活情况，并有自己的评语。本文印刷办法与上辑相同：马克思在所摘原书词句中划了着重号的一律排成黑体字，马克思自己的评语和他在作摘要时自己添加的词语，以黑体字加重点排印。方括弧和圆括弧都是马克思所加的。

农村犯罪

达凯特[达凯特是强盗集团的一分子]，或**结伙抢劫**（**英语：***dacoity*）。（**巴德马什** = 村社里的坏人；**皮塔拉**：一种形状特殊的柳编篮子或其他细条编成的盒子(102—105)。

警察的（**典型的！**）**行为**(105—107)。**法庭**(108—110)。**穆克塔尔** = 诉讼代理人。

为雷家耻（**与妇女有关**）**而仇杀**(111—115)。

纯粹因土地问题而行凶的事件比任何事件都更为常见。在印度同在其他地方一样，“**既得权利未受法律保护这种强烈的意识导致用暴力维护这种权利的努力**”(115)。**农民自己当中的纠纷**（**流血的**）(115—118)。**柴明达尔的人同曼德尔**(村社首领)的**殴斗**：一

个摩查^①被遵令出卖,为一个外来人所买;新的柴明达尔采取措施提高他的农民的地租;他已经从几个农民那里拿到了提高租金的卡布里雅特〔卡布里雅特=一份波塔或租约亦即佃户给地主立的租约的副本〕,但威信极高的村社曼德尔坚决不从,领头反抗。柴明达尔派他的家人去捉拿曼德尔(第118—119页)。结果是几个家人被打死,曼德尔取得胜利(119—120)。另外一次是农民起来反对曼德尔,因为曼德尔在一些事情中过份袒护柴明达尔;于是在“委员会”^②中就作出决定:曼德尔应受惩罚和警告,由几个“奉命者”去把他痛打一顿(结果他就死了)(120、121)。

不同的土地占有形式或各不相同的农民之间的集团争斗(第121—123页)。(击毙。)

唐格尔(*Jungle*)=丛林,任何一片或大或小的自然生长着树木、灌木和植物而未受干扰的地方。

巴特=米粥,比加是土地计量单位,在孟加拉≈近 $\frac{1}{3}$ 英亩;阿尔哈尔=一种豆类(*Cytisus cajan*),种作食用。

行政制度和地主

(这是此书前已在《加尔各答评论》上刊载过的那几章中的最后一章(四)。

被错误地同英国郡相比的印度锡拉赫区,其面积为2000—3000平方英里,人口为100—200万;而郡,例如萨福克郡,面积只有1454平方英里,人口约为360000。一个锡拉赫区里的所有欧洲官吏最多十几个人〔其中约 $\frac{1}{2}$ 的人在锡拉赫区里执行军事任务〕,这些官吏是:1名行政官兼税务官、3或4名行政官副手、助理和代表、1名区法官兼推事、1名小法庭法官或下级法官、1名警监、1名警监助理、1名医官(125)。

① 摩查,见本刊1987年第1辑第12页。——译者注

② 引号是非尔原著原有的。——编者注

〔“他们当中真正通晓当地语言的人”极为罕见(126)。〕

印度没有收税官(最近因征收执照税而设置的除外);全部税收就是土地税、印花税(在法庭或官署每办一事或在法庭官署立任何文书,或写文约或收据等等,都要使用印花)、关税、内地税(内地税使农民消费的陀利酒和盐涨了价)。不久以前税额增长了,因为规定了一项路捐,这是对每一个农民在地租之外按比例征收的一项小额附加税。地租交给各自的收租者,路捐则交给政府(128、129)。

每一个耕作者为自己地块所交的地租,其中一部分作为土地税落入政府手里;它每年上地税的收入约为2 050万镑(133)。在孟加拉1793年的规定之前,人们知道柴明达尔只不过是收税人,并不是地主。菲尔这个家伙说:“柴明达尔的领地范围包括一大片一大片的地区,领地不是按比加,而是按居民单位——摩查——计算的。”他的“进款”不“叫作地租,而叫作领地内各村的朱马(征收款)”;他的财产就“由转手土地征的朱马,以及各村的征收款构成”(135)。柴明达尔的村卡查理(在英国人以前就)是每一个摩查都设置的一个办事处,办事处有1名头目、1名管帐,还有1名外勤员。(他们执行今天柴明达尔的收税人等等所执行的前面讲过的那些职责。)每5个或6个摩查的办事处,视摩查的大小而定,由1名长官监督,这样的长官叫作泰西达尔,他又有自己的办事处,办事处又有自己的帐簿和文件,这些东西或是摩查办事处帐目文件的副本,或是内容与其相同。村办事处人员征收来的钱都交给他,他又交给下一位长官。最后,钱交到了柴明达尔自己的办事处。柴明达尔由这些征收款中拿出一部分向政府缴纳他的领地所应出的税款,余下的则归他自己所有(138)。由此可见,每一位中间人都是一个机构的最高主管人,他的机构在形式和结构上和主机构完全一样,只是规模小一些而已。稍以外力干扰就能使它分离出来独立存在,也能置它于附属地位(139)(可参看:汉特著《奥

③ 此括弧是菲尔原著原有的。——编者注

里萨》)。在英国人之前很久^④柴明达尔制度就早已不象初时那样简单；有柴明达尔领地，还有泰鲁克，泰鲁克又有几个等级和名称，直接向政府缴税；泰鲁克内部又有次一级的泰鲁克和占有地，这些是从同一税收系统内的组成部分转变而成的半独立单位，它们也就以这种资格把照章征收的征收款直接交到上级办事处，而不是把它们各自应交的征收款经过通常的程序交上去(141)。

(渐渐地)每个次一级的缴纳朱马的“玛哈尔”或占有地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小型的柴明达尔领地，在领地里{部分}征收款由一定数额的“朱马”代替，其余的征收款则由老的机构系统征收。荒地的授予或租让也是独立的以及不独立的泰鲁克之起源，因军役授予的扎吉尔也是如此(141,142)。

在村社以内，在土地的占用方面也发生同样的过程。柴明达尔领地里的主要人物阿木拉^⑤和农民的首领(曼德尔)^⑥或其他有影响有特权的人，例如婆罗门，往往被准许按固定的优惠条件占有比他们能够或实际耕种的要多的村社土地。这些土地……他们又转租出去，可能是全部转租，也可能是部分转租，这样就出现了很多种“焦特”^⑦和农民占有地(142)。在1793年立法以前，那时的中间占有地，是靠习俗以及占有者的个人势力和影响来维持的。农民占有地和焦特也是象上面说的那样，要服从于习俗，服从于村潘查亚特^⑧和柴明达尔的阿木拉的管理。一切都按惯例行事，根本谈不到个人所有权(142,143)。柴明达尔之变为财产私有者——这是英国的恶棍和蠢驴们造成的——就随之也(即使那些蠢驴们没有这样想)把所有中间人的利益变成了土地权利，享有任何此种利益的人就能够把土地抵押出去或让渡他人而不构成对权利的逾越。

④ 菲尔原书上是：在实行英国法律之前很久。——编者注

⑤ 阿木拉，见本刊1987年第1辑第14页。——译者注

⑥ 此括弧是菲尔原书原有的。——编者注

⑦ 焦特，见本刊1987年第1辑第18页。——译者注

⑧ 潘查亚特，见上刊第16页。——译者注

他的所有权本身又可以套上复杂的印度联合继承的形式(147、148)。

在纳税的柴明达尔以下的中间占有或中间利益实质上是这样一种权利：在向一个上级占有者缴纳过应缴数额的征收款之后，可以在一个明确划定的区域内向土地耕作者收取征收款，向次一级的占有者收取征收款(148)。因此每一级的中间占有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帐簿的事情，一份扎玛班迪^①清单就将其体现无遗。这种财产的所有者如果要想使一个孩子或亲属受益，他就可以把自己的一部分征收款份额以某种形式授予他，作为莫卡拉里(也就是固定的或规定的——永久性的)转让(149)。极为多见的是，授予者自己的占有地只能使他有权得到一个部分份额的地租之类的收益，而他的转让[授予他孩子等人的]就是部分的部分(149—150)。这样的土地占有者还可以向陌生人做出这种转让以取息得利。他这样做还可以是为了以存储在转让土地上的地租的形式，来保证自己有按期收进的款项，用以缴纳他自己应缴的征收款。他还可以暂时把在自己占有地内收取征收款的权利，按查尔-伊-佩什吉·蒂卡的条件，让给借钱给他的人，作为还债的保证。孟加拉的土地占有者、财产所有者、柴明达尔，不管还叫什么名称，在他们想要筹集钱款或者让渡一项利益的时候，他们就都得按照这些或者类似的办法处理他们的产业；如果说他们决不会把自己的产业全部出让——只要能够避免，他们是很少全部出让的——那么很清楚，他们的每次出让就要产生出一系列新的财产权(150)。

还有，关于中间土地占有或土地权利作为联合所有权的对象，例如一个村社(或不不论多少个村社)的征收款全份额=16安纳(=1卢比)；如果某人有一个部分份额，暂且算它是一个 $9\frac{1}{2}$ 安纳的份额；该份额可能以三四种不同形式存在。它可能表示(1)：这个土地占有者在村社土地上一个明确划出的地区里享有收取地租和捐税的莫卡拉里(永久性的)权利，该地区同其余部分有界标隔开，

^① 扎玛班迪，见上刊第15页。——译者注

其面积与全部土地的比例是 $9\frac{1}{2} : 16$ 。也可能表示(2)：在村社土地上属于转让给他的范围内的某些地方他独享收取地租的权利，而在别的地方则只享有该项权利的一部分，其总的结果是，他得到的占村社土地上16安纳的全部收益的 $9\frac{1}{2}$ ，如此等等。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可以从他自己办事处里派出他自己的职员去收取属于他名下的征收款；他也可能只是有权从一个算是几位份额占有者的联合办事处收得的征收款总额中提取他所占的那个部分份额（151、152）。但是，这项 $9\frac{1}{2}$ 安纳莫卡拉里占有地的财产的所有者通常是一个不分居家庭，或者是一群代表着一个过去不分居家庭的人；这样的群体的每一个成员都在占有地中有他自己的份额，他的这个份额，虽然没有同其余部分分开，但却可以单独出让给一个购买者。此外，很常见的是，这种群体的每一个成员都可以坚持要求同他的共同占有者实际划分占有地。此事一旦实现，他就自己单独占有有一部分譬如说这 $9\frac{1}{2}$ 安纳占有地的一部分了；假定这个部分是该占有地的 $\frac{1}{6}$ ；那么，在产生于该占有地的地租和收益中，他自己的那个份额就是 $9\frac{1}{2}$ 安纳的 $\frac{1}{6} = 1$ 安纳零7派，当然，他还必须向上级缴纳地租或朱马。这样，作为柴明达尔领地计量单位的摩查本身就被分成了若干小块；地租收受者，他对某一个农民说来处于柴明达尔的地位，而他本人却可能是、而且常常是一个很低微的人物。例如，农民可能必须把自己的全部地租付给那1安纳零7派份额占有者的帕特瓦尔^⑩，或者是把自己的16安纳地租中的1安纳零7派付给他，而把其余部分付给其他份额占有者，可能各个单独付给，也可能按群体付给；他也可能必须把他的全部地租付给联合办事处，每一个份额占有者将从联合办事处领取到自己所分得的那一份（153、154）。

这种联合权益再转授和再分割的制度及与之相伴而生的权利分散现象，在整个孟加拉到处盛行（151）。所以，土地权益之复杂无与伦比，因此也就没有人关心土地的改良了（同上页）。在这种

^⑩ 帕特瓦尔，见上刊第15页。——译者注

制度下，居住在当地的柴明达尔一般都是次级占有地的小份额占有者，他们的资财并没有大大超过小康水平的农民(155)。

一个村社的土地大致可分为两类：农民的土地(占村社土地的大部，即村社土地)，这是一类，另一类是柴明达尔[最后向政府纳税的柴明达尔]的土地——齐拉阿特、卡玛尔、尼焦特，也有叫老爷地的(还有其他种种名称)(155、156)。在孟加拉，前一类土地大都叫作农民的“焦特”(156)。如果农民又把地再转租出去，则承租人就从他那里接受了一切，在他失掉占有权的时候承租人也就失掉占有权，所以承租人所接受的只是一份转手土地，正确的叫法应该如此(157)。农民按法律规定实际占用同一块土地满12年，他(如果他占用这块地不是另有依据，譬如说依据惯例等等)^①就可以取得一项个人享有的权利，即在缴纳公平合理的地租的条件下占用该地。按统一数额付地租，占用土地20年一般都可以取得按该租额占用土地的权利。孟加拉很多很多的农民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取得了他们耕种的土地的永久占用权，但其余更多的农民只是占用，同时要为占用的土地缴纳地租和捐税，这些租税通常都是交到他们土地所属的柴明达尔办事处；数额大都比英国佃农所交的地租要少得多。柴明达尔在理论上说来，可以在每一年的开始随意向这类农民提出要求，如果农民不同意，就把他赶走，但这样做的时候极少(157—158)。在齐拉阿特、卡玛尔、尼焦特或老爷地上，柴明达尔可以自己出资耕种，也可以招进耕作者来，只要他们同意接受所提出的任何条件；按(欧洲人的)一般概念，他们是他的佃农，他们是他们的地主；在这里，柴明达尔享有绝对的土地所有权……在农民的土地上，使用权属于农民(158—159)。在孟加拉的一些地方，在相当大片的无主丛林地带或其他荒地上，有时可以获得焦特或取得农民权益，而且是永久性的，缴纳很少量的地租；这种土地以后又转租给耕作者。在这种情况下，焦特达尔^②和一

^① 此括弧是非尔原著原有的。——编者注

^② 焦特达尔，即焦特的占有者。——译者注

般的中间占有地的占有者之间就没有什么区别了(159)。

生活手段和资财

村与村之间，一个农业区内此地与彼地之间几乎没有交通联络手段(161)。在三角洲的土壤里一块石头或者任何比泥土硬一点的东西都找不到；雨季洪水泛滥，那些没有花很多钱也没有经过熟练的工程师之手修筑起来的道路，有时被冲得几乎连痕迹都没有了(161、162)。

这里使用的运货工具有船、男子和妇女的头顶，小公牛和很粗糙的竹制小车；小康水平的人们出门时乘小轿和肩舆，或者乘船。在旱季，男子们、小公牛和小车能够到任何地方去，而且实际上也是什么地方都去。每个地方的当地交通运输在数量上是很少的。达纳(=谷粒)或其他的种籽都是由公牛在卡利安上踏脱的，卡利安几乎就在种植这种谷物的那块地上。〔在某些地区，例如在焦达纳格布尔，使用简陋的连枷打谷脱粒〕；谷粒和秸秆全都由农民家庭各成员很容易地顶在头上运回家去。农民如果有剩余产品，要是不送到他的马赫金^⑬那里去的话，就一点一点地送到附近的哈特^⑭去，因而分散到周围的摩查，或者是送到更远一点较大的哈特去，只有马赫金和摩迪^⑮才在村子里有仓库。较大的哈特，或者叫作地方农产品贸易中心，通常都设在大路上或喀尔^⑯边。这里的商贩叫人把东一点西一点收购的货物收拢起来，用车或船运走；这样，货物的外运从容顺畅(163、164)。

发生匮乏或饥馑时，人们常常说，在需要的时候河水是不会倒流的(164)。但问题是：只要农民付得起所定的零售价，村社的马赫

^⑬ 马赫金，见本刊1987年第1辑第7页。——译者注

^⑭ 哈特，见上刊第8页。——译者注

^⑮ 摩迪，见上刊第7页。——译者注

^⑯ 喀尔，见上刊第2页。——译者注

金和摩迪就能够保持店里有货，不论当地物资多么匮乏（164、165）。可是当匮乏之季临近时，马赫金和摩迪都“不活跃”了。他们深知他们的顾客和买主的财力有多大。马赫金在他的顾客们已经在他那里积债难清的时候，自然拒绝由自己付出很高的代价来增加他的存货了。村里的摩迪也因同样的原因不会以高价进货来零售给那些买货付不起钱的人了。如果马赫金或村里的杂货商都觉得无需怀疑农民是否付得起有利可得的价钱购买外来货的话，这种情况就会完全改变（165）。食品价格达到了一定程度，农民陷入了贫困，那就会使这架常规的机器停止正常运转（166）。

至于说到在发生灾荒时政府的活动等等〔它在很大程度上就自动瘫痪了，这一点是菲尔“废话”的涵义，但这是很正确的〕。在这样的紧急时刻政府干些什么呢？它兴办“大规模的救济性的工程，把大批的人从家里吸引出来，聚集在面积有限的小地方；大批的粮食从外地运到本地的某些集中点，用来供养做工者，并在实际可行的范围内由当地的委员会分发给人们（166）。政府为这项非常工程进行的准备工作本身就大大妨碍了平时乡村交通线上的运输；船、车等等被从各地调集来，甚至是强征来，锁着停放在那里，经过多少天多少个星期才真正用得着，这样做是为了确保需要时使用。这样不只是在政府运进物资的过程中，而且是在它开始以前很久私家商贩就没有一件运输工具可用了（166、167）。政府的做法的直接趋势是使村社马赫金和摩迪免于受到压力，把由他们供应的市场弄得更加不可靠，因为政府让尽可能多的人，而且多是健壮者而非病残者，离开了家，而用的就是供给粮食的办法。——只要政府一宣布它预料会发生饥荒，将采取非常措施加以防止，整个体系的村社那一端的一切自然的努力也就立即停止（168）。庇恩（代替庇亚达的叫法）= 仆役（柴明达尔或土地占有者的小听差）；散杜克或辛杜克 = 木箱子；

莱特 = 莱亚特，原指臣民，现指农民。

拉比或鲁比：一年中三月或四月那一段时期；在上一年九月或

十月季风雨停止后播种或栽种的作物的收获季节。

泰鲁克 = 附属地；泰西达尔或塔西达尔，收地租或捐税的人。

托波或透波或托普——一片果树林。

要指出一点，陀利或者塔迪，俗称托迪，是经过发酵或未发酵的棕榈树汁液，另外还指由其他原料酿造的酒。

关于东孟加拉的农民家庭的资财：这里有一份达卡的巴布·拉姆·孙达尔·巴萨克交给菲尔的材料。菲尔把它放在“附录”里，作为注A。

查尔波伊 = 一木框，中间穿有带子或绳子编成网状，四角有四条矮腿做支柱。^①

刀，指钩刀或劈刀。

第一类农民：耕种 15 比加以上的土地，家中有 1 或 2 个兄弟和 4 或 5 个成年的儿子。这一类为数很少。

第二类农民：耕种 8 或 10 比加土地，家中有大约 3 或 4 个成年男子。这一类数量上与第一类同。一个农民，常常家里没有其他成年男子帮他干活，但是有足够的钱雇工，这样的农民属第一类或第二类。

第三类农民：4 或 5 比加土地，有 1 个儿子或兄弟，也可能根本没有人帮他干活（因此只能种 4 或 5 比加的地）。占大多数。

第四类：数量很多。有地 1 或 2 比加，主要靠受雇于人糊口养家。更确切地说，他们是雇工，不是一般的耕作者。

第一类一般都有四排整齐的茅草房围成一个四方形宅院，另外有 3 或 4 间小屋，用作旦基房（旦基就是杵和白，主要用来舂米）、牛棚和粮仓。围成宅院的四排房屋中的主屋一般价值 30 或 40 卢比，由他们自己动手建成。其他的屋子一般价值约 20 或 25 卢比。这样，这种家庭一所住房的造价就是 150 或 175 卢比。

第二类在宅院周围四排房屋之外，只有 1 或 2 间小屋；全部房屋价值 100—125 卢比。

^① 印度的一种床铺。——译者注

各类农民财产价值表(第284页)

农民类别	第一类			第二类			第三类			末类		
	卢比	安纳	派	卢比	安纳	派	卢比	安纳	派	卢比	安纳	派
房屋	162	8	0	112	8	0	35	0	0
家用物件	22	0	0	15	8	0	10	0	0
木箱	12	4	0	3	8	0	0	12	0
查尔波伊	1	0	0	1	0	0	1	0	0
衣、被、枕	18	8	0	10	8	0	5	8	0
装饰物	45	0	0	30	0	0	11	0	0
厨房用具	3	0	0	3	0	0	3	0	0
粮仓用具	95	0	0	45	0	0	25	0	0
牲畜	80	0	0	40	0	0	20	0	0
犁具	8	0	0	5	0	0	3	0	0
刀具类	5	0	0	3	0	0	2	0	0
船只	25	0	0	15	0	0
总计	477	4	0	283	0	0	116	4	0	25	0	0

第三类有1或2排房子加一个牛棚，或1—2个单间茅草屋，用作厨房或且基房等等。这种房屋价值30—40卢比。

这里所说的价值是按造价估算的；出售时如果整齐完好，一般所得房价要比这少一些，但(售价)也依房屋状况、地点、需求等等而变化。

第一类农民一般都有一个铜的卡尔西(卡尔西 = 大水罐)、3或4个罗达(罗达或帕利 = 大酒杯)、4或5个塔拉(盘子)、1或2个巴蒂(巴蒂 = 杯)、1个包纳(铜锅)或2个铁锅。制造这些器具用的铜的数量大约有12或15西尔^⑮；买时每西尔价值1卢比8安纳至2卢比；卖时每西尔价12安纳至1卢比4安纳不等。这些器具的总值 = 20卢比。——如果是伊斯兰教徒，就得有几个铁盆，1或2个瓷盘，还有几个乡村陶制的盆子和盘子，估计价值一两个卢比。

筐子和其他竹或藤编成的器具，如扎基、达利、库拉、达拉、卡达和达玛，或容积量具，价值估计为1卢比。

第二类农民家里全部铜器的量约为8或10西尔 = 8卢比12或15安纳。别类用具估计为2卢比。

一个**第三类**的农民一般有1或2个铜罗达(大酒杯)1或2个塔拉，有时有1个包纳；数量 = 5西尔，约 = 8卢比。陶制和竹制的器具与第二类农民同，缺少铜器具就以陶、竹器具代替。

第一类农民当中只有少数人有木箱这类东西，总是村中经商的人家才有。价值 = 15—20卢比。在这一类农民家里，代替真正家用木箱的多是一个用芒果木或其他次木料做的小箱子，还有1或2个派塔拉(或皮塔拉，见前^⑯)，由藤条编成。价值2—4卢比(皮塔拉价钱也是这样)。

此外，大多数农民或他们的妻子都有1或2个木的或铁的匣子，用来装钱、首饰或其他贵重物品。此物价值 $1\frac{1}{2}$ 卢比。这些箱子、匣子之类的东西 = 6—8卢比。

^⑮ 西尔——印度的重量单位，等于2.057磅。——译者注

^⑯ 即本辑第1页。——译者注

第二类家庭一般都有1个派塔拉和1或2个小匣子，约=3或4卢比。

第三类农民最多有几个扎埃尔或在有些情况下有几个小的派塔拉，价值=约 $1\frac{1}{2}$ 卢比。

普遍有把贵重物品藏在陶器里埋在地下的习惯，或者放在外面。

农民除极少数外，都没有卓基或查尔波伊等物，而是夜里用各种不同的东西铺在地上作为床铺。各类农民每家的铺垫物平均值1卢比。所有的农民都用契哈拉或麻袋当坐垫，在需要的时候也用它来装谷物。

各种各样的坐具，有用竹条、藤条做的，有用槟榔树的碎木条和小木板做的，这些坐具叫作皮拉或矮凳，很小，每个只能坐1个人。

每个农民，不论男的或女的，都有2件用曼彻斯特粗布做的社蒂，在不干活的时候家常穿用，尺寸大约是12英尺长，3英尺宽。除此之外在小康水平的家庭里，特别是妇女，都有乡村莎丽和内宅袍，男子则有查达尔，有时还有皮兰。在冬季年长的男子和妇女穿厚布查达尔，干活的时候他们穿很瘦很短的加姆查，或改小了的破旧衣服。在各类农民中，每个家庭拥有的衣着没有什么差别，只是依每个家庭人数之不同而有所不同。每一个人，不论是男的或女的，其衣着价值平均约为2卢比。

社蒂：一块曼彻斯特布，在市场叫作长布或美国咔叽；**莎丽**，妇女披在身上的一块布，有不同颜色的边；**查达尔**或单于布——一块美国咔叽或长布，长度约为9英尺；**皮兰**或汗衫，是新时兴起来的用美国咔叽或长布做的上衣。**加姆查**或巾，一块长度和宽度都比较短的布。**坎达**，用碎布填充的被褥。

在**第一类**（农民）家庭里，如果有12个人，可以把其中4个人不计算在内，因为有不同的人穿同一些衣服的情况，衣服的价值=15或16卢比；**第二类**如果有7个人左右，3个人可以因同样理由

不计算在内,衣着平均价值 = 8 或 9 卢比;在有 2 或 3 个人的第三类家庭里,衣着价值 = 4 或 5 卢比。

除此之外,一、二、三类农民家庭里的**累普**(被子)、**坎达**、**枕头**,其价值平均可分别估计为 3 卢比、2 卢比、1 卢比。

装饰物:成年男子不戴;男孩子有时候手上戴铜的或银的**镯子**,脖子上挂**曼杜利**或**帕达**;妇女们戴各种各样的装饰物,有金的或银的,有时也有铜的,这些东西是:

纳特,即环,戴在鼻子上;**贝萨尔**,鼻子上戴的一种装饰物;**达纳**,印度教徒戴在脖子上的串珠,但是很稀少。**卡尔兹**,胳膊上戴的装饰物;**巴拉** = 手镯;**穆尔**或**卡鲁**——脚镯;**丘力**,伊斯兰教徒戴的手镯;**哈斯力**,大项圈。——总起来说,一个第一类家庭的装饰物的价值 = 40—50 卢比。(妇女在丈夫活着的时候,如果是伊斯兰教徒,就戴银制的或树脂制的**丘力**,如果是印度教徒,就戴一副贝壳手镯。)第二类家庭的这些东西约为 30 卢比,第三类家庭约为 10 或 15 卢比。

厨房里,除一些铜制和陶制的锅以外,再有就是**派达**(一块平的石头)和**普达**(一个石杵),用来捣碎调味品,此外就几乎什么也没有了。可以看到的是:**高蒂**,铜制或陶制的水罐;**拉应**,陶锅,用来煮米饭;**帕蒂尔**,陶盆,用来煮咖喱;**沙拉**,陶制锅盖;**扎吉利**,一种陶器,淘米时用来滤水等等;**哈达**,铁制或木制的勺或匙,做饭时使用;**包力**,铁制夹剪,用来夹取热锅;**塔加利**,木碗,用来盛饭菜。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再加上**旦基**、**乌特基**和**摩萨尔**(一副大的木制杵和臼),在每个家庭里总值约为 3 卢比。

农民一般都依不同情况,存有一定数量的米、芥末等等的东西,供一年的消费,此外还有来年播种用的种籽。在第一类家庭值 90—100 卢比,在第二类家庭值 40—50 卢比,在第三类家庭值 25 卢比。

牲畜:第一类家庭有 8 或 10 头母牛和小公牛,有时有一两只山羊或绵羊;如果是伊斯兰教徒,还养一些家禽;第二类家庭有 4

或5头母牛；第三类家庭有2或3头母牛；第一类家庭的牲畜价值70卢比，第二类40卢比，第三类20卢比。

工具：第一类家庭有大约8—10张犁和3或4具耙，价值约为8卢比；第二类和第三类家庭里的犁具价值分别为5卢比和3卢比。

第一类家庭一般都有3把钩刀、4或5把喀其、2把考达力或铍、1把孔蒂（锄头）、1把斧子；共值5卢比；第二类和第三类这些东西少一些，其价值分别为3卢比和2卢比。

船只：住在每年都遭水淹的低地或田地等处和河边的农民，一般都有1只丁奇（小船），价值10—30卢比。这种高级“工具”只是第一类和第二类农民才有，第三类很少见。

人数众多的第四类一般有1处孤零的住屋，1只铜酒杯或塔拉即石质的或木质的盘子和1只藤或竹编的篮子等等，没有象木箱或查尔波伊之类的东西；1或2张席子、被、枕和一两件杜蒂；1张犁、1具耙、1把钩刀、1把铍、1把喀其，有时也有1或2头母牛；所有这些家什的价值，平均估计为25卢比。

考达尔或考达力 = 锄，可兼作铍、铲、锄三用。

卡塔克 = 职业说书人；背诵传统诗文者，等等。

拉提 = 细的或粗的棍棒，一般是竹制的，外面裹着厚厚的金属；莫尔哈，凳子。

毛拉或毛拉纳：村清真寺的负责人，伊斯兰教小学校长。

卡查查 = 生、粗、不成熟、不完全；帕卡 = 熟、成熟、完全。

尼尔克，标准的或习惯的征收率，如征收地租等等。

帕拉，轮（轮到某人），如祭祀或占有财产。

多提 = 腰间围的布。巴特，米粥。

迦特 = 从河边或池边上岸时走过的斜坡或梯级；出口或山脊，有时就指山体本身。

扎吉尔，因服军役而享有的土地或税收的占有权；扎尔卡瓦拉，有权捕鱼者。

以下是菲尔这本书的第二部分，讲的是锡兰。此人在加尔各答住了10年，1877—1879年生活在锡兰。第三篇论文（印度雅利安社会土地制度的演化）1872年由本人在加尔各答贝修恩学会宣读。

（徐明译）

关于卡尔·马克思的异化概念的 内容和功能^①

异化概念在目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 哲学中的作用和功能

〔民主德国〕克·梅尔茨^②

异化概念，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许多其他范畴一样，是当代思想争论的中心。它的重要性一方面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危机和精神危机渗透到帝国主义制度下的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在这种制度下越来越多的人力图作出抉择，同时另一方面在于，尽管国际形势非常复杂，社会主义社会为了劳动人民的利益继续成功地贯彻执行自己的社会纲领。

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反映危机这一实际现象的各种各样资产阶级哲学观念中，千差万别的社会现象是同异化联系在一起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及其在普遍危机中——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文化、科学和技术中——呈现出来的东西，都被描述成异化的过程和异化的结果（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发展问题，也类似这样被纳入这种表述形式）。此外，特别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性质，

① 这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所属社会科学院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研究所组织的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研究领域跨学科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会议报告已在本刊1987年第1辑上译载。报告和发言原文均载于民主德国社会科学院《专题情报资料》1985年柏林版第2类（会议）第50辑。——译者注

② 克·梅尔茨是哲学博士，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社会科学院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研究所工作。——译者注

即马克思曾分析过的真正的异化过程，则被忽视了，异化被描述为“人类世俗化的平行过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即使在目前，劳动过程也是人的个性被歪曲的一个根源，尽管有关于“生活的质量”、“劳动环境的人道化”或很快就要来临的“自由时间社会”等这一切口号，也是改变不了的。

正是围绕异化进行的哲学争论的历史表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产生哪些影响，即没有一个资产阶级哲学家或思想家能回避马克思的异化论点。这一历史同时说明，资产阶级哲学和意识形态不断试图使自己的异化观念挤入马克思列宁主义，从而“充实”、“扩充”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应用异化概念时，要在整个资产阶级哲学和意识形态的广度上，把相对独立于意识形态流派和哲学体系之外而存在的两种基本形式区别开来。在这两种形式之间有纷繁多样的关系点，即相互关联的地方。他们不是相互排斥，而是彼此补充的。

一、异化是所谓人本学意义上的人的本质特征， 从而是“人类精神危机”的一个原因

米夏尔·朗德曼的出发点是：人由于自己特有的能力和创造力，在自己的历史进程中总是把自己的环境变得更合乎理性、更合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这种环境毕竟是和人敌对的。于是朗德曼得出结论说：“异化的一切表现方式……都是成就的反面”，而“一切异化归根结底都不外是理性的作品”。这样，“理性是解放的工具，同样也是异化的工具”^③。朗德曼在自己的异化学说中援引了马克思，并且强调说，马克思虽然在“工业的和经济的部分领域中”正确地分析了异化，不过他描述这种异化“仅仅是针对着非经济的异化范围内的偶然情况”。此外，“异化的东西”存在于人的

^③ 米·朗德曼：《异化了的理性》，1975年斯图加特版第187—190、211、221、227—228页。

理性本身中,它是“不可战胜的东西”,并且不是简单地通过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就可以消灭的。“因此,异化并不是一旦历史地形成,从而明天又可以克服的东西,而是一种在人本学意义上确定下来的东西”。^④

对于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哲学中占统治地位的对人的考察研究说来,这种以人本学为依据来说明的异化,带有示范意义。这种生物主义的、非历史的描述为资产阶级思想提供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危机状况和所谓资本主义的永恒存在:

——按照朗德曼的看法,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被归结为“设施的危机”,因为人们根据自己的“异化经验”,怀疑它们的效果和适用性。他提出一种资产阶级异化理论作为解决的办法,这种理论要“阐明人本身的本质”,而且必须指出,面对异化,只有采取“现实主义的逆来顺受”^⑤的态度才行。但是,朗德曼没有进一步解释他是怎样理解这个概念的。

——在对异化作出这种人本学解释的基础上,资产阶级思想家有可能采取反对整个社会进步的观点,认为进步同理性相似,只会带来新的异化。所以,在今天,保守的态度是痛惜不可复得的财富的损失即进步付出的代价,同时也保护不可放弃的东西,防止它在目前和可以预见的将来遭到危险。海尔曼·吕贝发挥了这一观点并用它瞄准社会主义,把保守政策称为“预防灾难的措施”,而同“实现各种空想”的、以“设想未知的幸福”为目标的“实践”^⑥对立起来。保守的哲学家君特·罗尔莫塞尔也持鲜明的态度,他以尼采的“平衡的永恒复归”为出发点,表述如下:“同解放相符合的,不是现实,而仅仅是假象。人总是一切照旧,世界自身归根结底一成不变。”^⑦

④ 同上书,第47页。

⑤ 同上书,第225页。

⑥ 海·吕贝:《进步是目标问题》1975年布莱斯高的夫翰堡版第62—63页。

⑦ 君·罗尔莫塞尔:《报时信号——一个时代的总结》1977年斯图加特版第93页。

这些悲观主义观念——鉴于当代的种种社会变迁，它们本来就是与时代不合的观念——的作用充其量在于，它们同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看到的现象是一致的，它们“在解释”这个世界。它们“解释”说，要克服资本主义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异化，作为属于人的本质的东西，会设置不可逾越的界限。

但是，这并没有使保守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对状况作这样的悲观主义的描述。因此，从人本学意义上确定的异化中就有一种世界观的和政治上的能动主义被构想出来。如果说，异化是不能够扬弃的，因为人不断地重新生产异化，那么，人就必须真正懂得，“要生活，就要意识到冲突是不可解决的”^⑤，然后，必须使生活在危机中“坚持下去”——吕贝就是这样表述保守政策的信条的。

随着这样运用——借助保守的思想内容来说明——异化概念，就会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总体系中创造出前提和条件，它们能够非历史地解释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从而把它说成是永恒的存在，同时，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异化的真正原因，却被忽视了，异化被转变到个人身上。因此，资本主义制度的目前状况的一切社会原因也可以被描述成是属于个人的。整个社会进步和人们贯彻社会客观规律的行为被归结为人本学意义上的人的局限性，这样一来，社会状况的量的变化就被排除于考察之外了。

他们以同样的世界观前提和结论把异化概念用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现实的社会主义。

二、从人本学意义上确定的异化是对 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的中心范畴

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的批判是层出不穷和纷繁多样的。目前，在保守思想的影响下，出现了特别好战的反共产主义的批判和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恶毒透顶的解释。在对马克思主义的

^⑤ 同上书，第80页。

异化和马克思主义中的异化进行的广泛抨击中，反复论述的主要是下列论证路线：

——保守的思想家孔拉德·勒韦认为，马克思“本人”是一个“高度异化的人”^⑨，勒韦在所有的著作中都塞满了这样的例证：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的“恶魔般的权力意志”形成的。因为马克思——就勒韦提供的例证而言——早在五岁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可怕的暴君了”。^⑩勒韦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中的思想观点断章取义，以此补充自己的冗长论述，为的是诋毁马克思的人格，并且用马克思来诋毁工人阶级的世界观。马克思证实，人是生物学意义上确定的和社会地确定的，勒韦对此进行抨击，说什么社会决定体将经受道德的评价，因而对总体系产生疑问：“不懂得关心人的本性，不懂得承认我们的本性的纷繁多样的谜底和秘密至少是目前现实，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错误”^⑪。但是，马克思正是以自己对劳动的资本主义性质所作的分析揭穿了人的异化的谜底；而资产阶级思想家妄图抹杀、掩盖这一点，而且还不惜——如勒韦——借助于辱骂和疯狂的攻讦。

——说马克思主义要求把“作为异化的历史”消灭掉，确切地说，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异化理论”。如果从这种假设出发，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真是其说不一：什么马克思主义是“空想”，马克思主义是“救世说”等等，不一而足，因为异化是不可消灭的。^⑫在这些纷繁多样的论证中，突出的是这样一种看法：任何生产过程同时也就是异化（按照黑格尔的

⑨ 孔·勒韦：《共产主义为什么令人神往？》1980年科隆版第45页。

⑩ 孔·勒韦：《卡尔·马克思的学说》1982年科隆版第229页。

⑪ 同上书，第245页。

⑫ 罗尔莫塞尔写道：“大家知道，马克思所分析的异化劳动的结构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是不可克服的。这些结构所以根本不可能被克服，是因为它们是由现代生产的技术性质和分工性质引起的，完全不依赖于财产制度。”（君特·罗尔莫塞尔：《报时信号——一个时代的总结》第138、233页）

意思来理解就是对象化)。例如,在伊林·费切尔的著作中就认为对象化,确切地说,异化是人的存在的“永恒的循环”。如果说,在这里,论证不外是用了前面提到的形式,那么,它最后还是重新归结为这样的思想观点:异化属于人的本质,即使是社会主义制度也不能消灭异化。

相反,说社会主义产生异化,是因为“在大肆扼杀我们的整个特性、我们的自身存在时,经济剥夺只是第一步。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就包括个体的社会化,即个体的消除”^⑬。这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新质的主要抨击,因为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是消灭异化和发展人们丰富的关系——既有社会的也有个人的关系——的重要前提。在人们明确地形成新的社会关系的过程中,是有那么一些表面上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现象相似的现象,例如,劳动的单一、利己主义或者不协作,但不能就此有理由得出形形色色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的人所做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造就新人。新社会的形成是一个多层次的和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尚未全面地明确地形成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完全会再生产那些在形式上同资本主义的现象相同、然而就其质的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来说又有区别的现象。

这里介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哲学对异化的论证路线,具体说来,特别是就其政治-意识形态的明确形成说来,差别是很大的,以致不能说明关于“战胜危机”、“转折点”等能动主义观念,同时也不能说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现实的社会主义的抨击。资产阶级异化观念的世界观基础,主要有两种形式,现在概述如下:

——歪曲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个人异化的分析:异化表现为人的普遍范畴。这种范畴的世界观基础是人的本质的人本主义化和个人主义化。

——从这些前提出发,非历史地和抽象地对人们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鉴于自己在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

^⑬ 米·朗德曼,《对理性的控诉》1976年斯图加特版第58页。

中的经济局限性而具有根本不同的质——进行相互比较，并在这个基础上诽谤社会主义，否定它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新质。同时，资本主义表现为人的本质力量的永恒的再生产形式。

因此，在研究分析资产阶级关于异化的哲学观念时，主要是揭露资产阶级观点的意识形态功能和意识形态性质，指出这些观点在运用认识能力方面的方法论上的狭隘性和局限性，并且从马克思的异化概念的创造性的效用出发，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明显的质的差别区分开来。

批判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对 马克思主义异化观念的歪曲

〔苏〕博·别索诺夫^①

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理论家以及一切叛徒和修正主义者，在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现实的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多年来已经从异化这个问题上得到好处。他们把反映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的特征的人在事实上的异化，看作包括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制度在内的一切社会制度的普遍的本质特征；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制度不仅不能消灭异化，而且甚至还会加强异化。此外，有些“扼杀马克思的人”提供“证明”说，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马克思所理解的那种含义的异化。例如米洛凡·吉拉斯，这个人长期以来就以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诽谤社会主义国家为专业，他大言不惭地声明，历史的发展完全克服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吉拉斯声称，异化是有的，然而绝没有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含义的异化。更确切地说，整个人类生活本来就是持续的、不间断的异化和自我异化。科学和技术的进步，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的创立，都是异化和自我异化的成果。^②

吉拉斯在这里实际上是采用黑格尔的观点，把异化同对象化、同人的对象性改造活动等同起来。然而马克思驳斥了黑格尔的这个观点。马克思强调指出，人决不把自己的生成归因于自己的本性，而是相反，人的本性是其社会发展的产物，而且主要是物质生产的产物。马克思还以同样的根据否定了一切妄想让所谓个人的本性对异化负责的企图。

^① 博·别索诺夫是哲学博士、教授，在苏共中央科学部工作。——译者注

^② 见米·吉拉斯：《不完美的社会。新阶级的彼岸》1969年维也纳—慕尼黑—苏黎世版第62页。

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经反对把异化过程错误地解释成自我异化，他在《手稿》中指明，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经济关系是人的异化的原因：“这种物质的、直接感性的私有财产，是异化了的、人的生命的物质的、感性的表现”^③。这就是“人的异化”的“根据”、“原因”和“手段”。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异化的前提和条件，因为工人是通过自己的生存而同自己劳动的对象和手段分离开来的。由异化的这一基本形式又产生了异化的另一些形式：劳动产品对产品生产者的统治、人的相互异化、人的自我异化，等等。

马克思的结论是：异化是私有制的统治的结果，是对人进行剥削的结果。正是这一结论，无论是资产阶级理论家还是修正主义者都感到不合口味。他们的企图是：不遗余力地赋予异化以一般人的特征，并且无论如何也不愿把异化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关系联系在一起。吉拉斯声称：剥削和压迫是由于分工才开始的，而分工产生于人的需要，并且在目前条件下日益增多。因此，并不是改变了社会条件和消除私有制就能够消除异化，就能够取消暴力和非正义行为。

分工实际上是以人的需要为基础的。历史地看，劳动职能的分工和专业化完全不是“坏事”，而是会给才能的发挥创造客观前提，会带来生产力的增长，从而扩大人的工作能力。如果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以及日益增多的分工具具有灾难性的社会效果，伴随而来的是破坏和人的异化，那么，原因首先就在于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关系。其实，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目前的科学技术革命和生产本身的日益自动化，有助于把工人从他作为机器的附属品的地位中解救出来，当然这只是技术意义上的而不是经济意义上的解放。因为一个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工人始终要保证资本的积累；此外，人只是一种工具。工人的劳动总是带有异化的印记：不是为自己本身而是为资本家劳动。

正如马克思强调指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是这种社会制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1页。

度的一切领域所固有的，因为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意识形态关系，是作为各种与人相异的并统治着人的力量存在着和起作用的。在这个意义上，不仅劳动者，而且剥削阶级本身也遭到异化。当然，统治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的和被巩固的，它把这种异化看作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工人阶级“在这种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④

由于所有这些理由，马克思把异化的扬弃同消除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社会联系起来：“因此，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向自己的人的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⑤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成为最高的价值，社会的最大财富，社会生产的自我目的；而一切物质价值，一切物的财富不过是达到这种目的的前提、根据。卡尔·马克思写道：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⑥。共产主义意味着实践的人道主义的生成。

自然，这种极其深刻的科学结论是同资产阶级理论家和修正主义理论家的意识形态目标相矛盾的。因此，他们声称，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异化的扬弃无非是关于“人间的天堂”的思想，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非异化的状况是一种“古老的宗教理想”。然而实际上，马克思坚决驳斥了任何空想的理想和社会幻觉。在《共产党宣言》中就这样写道：“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⑦列宁曾强调指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4页。

⑤ 同上书，第42卷第121页。

⑥ 同上书，第120页。

⑦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4页。

出：“马克思丝毫不想制造乌托邦，不想凭空猜测无法知道的事情。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的问题，正象一个自然科学家已经知道某一新的生物变种是怎样产生以及朝着哪个方向演变才提出该生物变种的发展问题一样。”^⑧

对于无产阶级来说，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是最精确地反映其科学状况和社会状况的思想，是清楚地表述工人阶级固有的阶级利益和需要的思想。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现实的运动。”^⑨

正如历史的经验令人信服地证实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克服消灭了人们异化的主要的、决定性的原因。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中，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异化的“次要的”、派生的形式——宗教的、道德的、文化的形式等等——也将逐渐被克服。

这一切自然不可能在社会主义革命或者生产资料社会化以后很快地、一下子就达到。尤里·安德罗波夫曾经指出：“人们在谈到由‘我的’变成‘我们的’时候，不能忘记，这是一个长期的和多层次的过程，不应该把这个过程简单化。即使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完全建立起来的时候，某些人还会保留甚至再产生靠占别人便宜、占社会的便宜来发财的个人主义习惯和企图。所有这些，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是劳动异化的结果，而且这些结果不会自动地和突然地从人们的意识中消失，虽然异化本身已经被消灭。”^⑩“但是，我们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我们已经结束了对资本主义来说是天经地义的状况，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产品作为异己的、甚至作为敌对的本质同生产者相对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消耗的体力和脑力越多，就使自己的压迫者越强大。社会主义取得

^⑧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81页。

^⑨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页。

^⑩ 《安德罗波夫言论选集》1983年柏林版第266—267页。

的最重大的和无可争辩的成果就在于创造了保证每一个人获得劳动权利的条件。正是自觉的、认真的和主动的劳动、为社会谋福利的劳动，在我们这里成为衡量一个人的尊严和社会声望的最高尺度。”^①

许多资产阶级的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的理论家，归根到底就是把劳动和从事劳动的必要性视为“永恒的灾难”。他们从这一点出发，指责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和现实的社会主义过分地以劳动、高度的劳动生产率为目标。他们认为，这是把以自我克制和纪律为依据的禁欲主义道德强加于劳动者，是使个人利益因社会而受到压制，等等；他们还宣称，只要不取消“经济优先”，高踞于人之上的、奴役人或者在任何情况下都限制着人的发展的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就会继续存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扬弃异化。

阿·高尔茨和厄·曼德尔甚至还宣称，由于在苏联和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政治经济学的规律还起着支配作用，商品货币关系还被利用着，在这些国家就不存在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主要的事情是消灭市场和货币，采用简单的商品交换，等等。按照厄·曼德尔的观点，无偿地分配基本食品是能唤起“心理革命”并因而为发展人的人本学意义上的主要特性如博爱、团结、仁爱等等创立前提的决定性因素，这将有助于消除异化、形成和巩固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

事实上，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的困难和弊病——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理论家们的看法相反——并不是由于过分重视所谓会引起异化的劳动、物质生产的发展、效益，即过分重视政治经济学等等的范畴。确切地说，这些困难和弊病正是由于从资本主义制度接受过来的社会生产力尚未充分发展的状况造成的（例如，人同一定的活动方式保持一定的联系，资本主义分工的消极后

^① 《安德罗波夫言论选集》，1983年柏林版第269—270页。

^② 见《社会主义和过渡社会的问题》，1973年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版第35—36页和阿·高尔茨：《告别无产阶级》，1980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56页。

果还没有得到克服,等等)。

马克思和列宁坚决批判了小资产阶级空想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看法,按照这些看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必须立即推行工业商品和生活资料的平均分配。马克思和列宁指出,社会主义不是靠良好的愿望来“推行的”,而是由劳动者在相应的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所关心的),不在于诉诸人的“人本学意义上的基本特性”,而在于使劳动完善化和使物质生产得到发展。

社会主义社会按照所完成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分配社会生产的产品(因为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能创造充裕的物质财富)。1983年6月15日苏共中央全会着重指出:“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是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之中。这个社会的发展应当由社会主义的各项基本原则,其中当然还包括按劳分配原则,加以调节。我们大家在社会面前都有同样的权利和同样的义务。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可有同等享用物质福利意义上的完全平等。而在这之前还要走很长的路。这要求经济和人们的觉悟都达到比现在要高得多的水平。可是今天,如果把一定部分的社会消费基金除开不算,我们每个公民只有享受与他的社会有益劳动的数量和质量相适应的物质财富。”^③

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对企业职工的物质刺激是经济管理的一项准则,这项准则将通过逐步提高工资、通过无偿地满足许多个人和社会的需要而得到实现。这也有助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日益清楚地认识到,在认真的、有成效的劳动同保证每一个公民在各方面——不仅在物质方面而且在文化方面——过上更好的、与社会主义原则相适应的生活这二者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

资产阶级思想家曲解由于社会主义改造而形成的人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性质,歪曲社会主义社会中人对劳动、对自己的活

^③ 《安德罗波夫言论选集》第326—327页。

动所采取的新的、自觉的和富有创造精神的态度的性质。他们故意片面地把新社会建设者的英雄气概描述成他们被迫接受的自我克制和自我约束的道德的结果，而且完全忽视劳动人民自觉承担这种自我约束时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其实，他们视之为弊病的恰恰是真正构成社会主义制度巨大优越性的东西：忘我精神和英雄气概、劳动纪律、对公共事务抱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态度，都是社会主义各国劳动人民的自由抉择，它们体现出群众的独创精神。这些特性证明群众的“变化”，正如列宁所说的，它们是共产主义的萌芽，是共产主义的真正的开端。

资产阶级思想家和修正主义者还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会有异化这种“结论”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活动和其他政治机构联系起来，认为这些会控制和操纵个人的全部生活领域，夺走个人的自由和自我实现的可能性，等等。科学共产主义的敌人把关于个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地位的歪曲形象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第一，他们否认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本质，把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和职能等同起来；第二，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下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的辩证关系作出歪曲的描述；第三，他们把集中制，特别是其中的民主集中制，同官僚主义等同起来。^①

科学共产主义的敌人在列宁关于在完全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高级阶段以前国家的必要性的论点和他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不再是本来意义上的国家，而是“半国家”、“逐渐消亡的国家”的论点之间寻找“矛盾”。他们把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是个“逐渐消亡的国家”这一结论解释成这样，似乎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以后，在巩固了革命的成就以后，国家的作用就一定会减少，随之而来的就一定是国家职能受到限制。与此相对立，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始终主张这样的观点，即只有随着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建成，国家才会消亡，共产主义社会自治的体系才得以形成。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经历以下辩证发展过程：国家机构和设施工作中的民主

^① 见《今天的右倾修正主义》1983年莫斯科版第199页。

成份得到发展，劳动人民积极参与管理工作并领导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国家机关的完善化，人民对国家机关活动的监督日益加强。这需要一个漫长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得到发展，并且在它开始消亡以前经历成熟的阶段。无论如何，历史的经验教导我们，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作用和权力被削弱的地方，无政府状态和自发性的因素就必然滋长起来，社会主义的成就最终受到威胁。

随着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完善化，社会主义民主的内容将不断充实。尤里·安德罗波夫强调指出，“苏维埃的民主制度过去和现在都有过前进中的困难，估计将来仍然会有这种困难。这是社会的物质条件、群众觉悟水平和政治素养所决定的。再说，我们的社会不是在温室里，不是在与敌对世界隔绝的情况下发展的，而是在帝国主义煽起的‘心理战’的冷风中发展的。”“完善我们的民主制度，就必须摆脱官僚主义的‘束缚’，摆脱形式主义，即必须根除一切压制和挫伤群众积极性的东西，根除一切禁锢劳动人民富有首创精神的想法和积极主动行为的东西。我们过去同这些现象作过斗争，今后还将更坚定地、更顽强地同这些现象作斗争。”^⑬

资产阶级思想家和修正主义者的想象总是同事实发生矛盾，按照他们的想法，共产党人高度重视社会的发展、公有制、中央的国家经济计划等等会贬低个人利益，妨碍人的个性的发挥和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非常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必须把全部生产资料集中在国家手中，只有在这个基础上，生产力的总和才能够迅速地增长，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才能够有保障。

科学技术革命目前在整个世界上导致这样的结果：社会的分工扩大和深化，生产社会化的水平显著提高，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彼此紧密相联。所有这一切要求在为社会制定的综合性远景规划的基础上，精确地组织集体的活动。唯有在生产资料公有

^⑬ 尤·安德罗波夫：《卡尔·马克思的学说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问题》，第275页。

制的基础上,在民主集中制和国家总体规划的基础上,人们才能够真正实现共同利益,对生产和社会发展执行实际的社会监督,防止一切本位主义思想和地方利己主义倾向,发扬主动性和自由的首创精神,吸收劳动人民广泛地参加生产和社会事务的领导工作,照顾每一个人的需要,就是说,归根结底能关心真正的社会经济的进步并且使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目标变为现实。

任何不持偏见的科学工作者都确认,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个性化的经济的和社会的阶级根源将被根除。社会主义制度消除了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并且创立了表达人民的利益并且仅仅为这些利益服务的新的国家机构和其他政治机构。社会主义国家和执政的共产党及工人党第一次开始解决建设新的公正的社会这一艰巨的任务,它们正付出极大的努力,开拓新的广泛的条件,使人得到发展,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发挥人们在体力和脑力上的创造力。

社会主义的敌人闭眼不看具有决定意义的事实,即社会主义国家在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生活水平方面已经取得长足的进步。社会主义各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以及其他社会关系和法规所采取的措施,开辟了日益广泛的条件来发挥人们的政治积极性和社会积极性、提高人们的教育文化水平、使人得到多方面并在以后得到全面的发展。无论如何,个性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生活的客观规律,是社会主义社会逐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客观规律。

卡尔·马克思学说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异化问题以及我们目前存在的若干问题

〔苏〕伊·谢·纳尔斯基^①

当前，特别是鉴于意识形态的斗争的尖锐化，人们又一次给予“异化”范畴以更多的关注。尤里·安德罗波夫强调指出：劳动异化是一个范畴，它对资本主义来说是天经地义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产品作为异己的、甚至作为敌对的本质同生产者对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消耗的体力和脑力越多，就使自己的压迫者越强大。社会主义取得的最重大的和无可争辩的成果就在于创造了保证每一个人获得劳动权利的条件。”^②

因此，社会主义建设消除了异化的根源。然而异化不仅有根，而且还包含着从这个根中产生的东西。尤里·安德罗波夫强调指出：在苏维埃社会研究探讨由“我的”变成“我们的”这一伟大的社会主义过程即共产主义劳动观的形成过程时，“不能忘记，这是一个长期的和多层次的过程，不应该把这个过程简单化。即使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完全建立起来的时候，某些人还会保留甚至再产生靠占别人便宜、占社会的便宜来发财的个人主义习惯和企图。所有这些，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是劳动异化的结果，而且这些结果不会自动地和突然地从人们的意识中消失，虽然异化本身已经被消灭。”^③因此，即使在发达的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必须根据个别的、派生的形式，特别是根据异化的结果提出问题。

马克思关于劳动异化的观点，应该从劳动异化的起源及其本

① 伊·谢·纳尔斯基是哲学科学博士、教授，在苏共中央社会科学学院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教研室工作。——译者注

② 《安德罗波夫言论选集》1983年柏林版第270页。

③ 同上书，第266—267页。

质内容来考察。在黑格尔那里，还没有劳动异化的概念。他把异化理解为绝对观念向自然界的异化、主体精神向社会过程和社会设施的异化、人的精神向自己的劳动和活动的产物的异化。他使用的是“精神向劳动的异化”这个概念。在黑格尔看来，异化是本体论意识的过程，这种过程的不同阶段是逻辑“观念”向自然界即向自己物质的“异在”“下降”的具体化。

马克思在自己的早期著作中开始对黑格尔的异化观念重新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并加以克服。^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供了“异化”的一般定义，这个定义十分明确地表明异化的唯物主义起源：异化是“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⑤。

因此，异化来源于人的生产活动的社会过程。它是被创造者对创造者的反作用的特殊形式，在这种形式下，生产的主体作为原初活动的源泉遇到的是他自己的活动所产生的那些使他失望、同他相矛盾并和他敌对的、彻底对立的结果。

马克思早在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前就开始具体说明异化这个一般概念。此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的论述也很多。确切地说，《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异化的一般概念是以青年马克思先前对“劳动异化”（或者“异化劳动”）这个概念的研究为基础的。马克思在区分社会异化的不同种类、阐明它们的本质时采用的方法，不是从“异化本身”的抽象概念而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异化的现实过程入手的。这在方法论上是十分重要的。

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劳动异化来反对黑格尔关于精神向自然界和向劳动异化这一唯心主义的虚幻结构（这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1807）中已经可以看到）。虽然青年马克思

^④ 详见伊·谢·纳尔斯基：《劳动和异化、卡尔·马克思著作释义》，1983年莫斯科版第1、2章。

^⑤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8页。

在 1844 年的手稿中没有放弃对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批判的过高评价，他在这篇预示着新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形成过程中的转折点的著作中，实际上还是针对费尔巴哈的异化观提出了自己的异化观点，按照费尔巴哈的观点，异化是人的本性在宗教的和哲学唯心主义的幻想中的实现。首先，马克思由于当时还没有阐发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他把异化劳动看作处于从属的和被压迫地位的劳动人民本身的劳动的不断加深的异化。然而，这种异化观丝毫不违背他的关于消除工人阶级的异化是整个人类解放的钥匙的论点，而是更加强调这个论点，似乎还把这个论点解释得更清楚了。从严格的经济学意义上看来是不确切的东西，在世界历史的意义上来说已经是正确的东西了。

马克思在 1844 年的手稿中区别了雇佣劳动者的劳动异化的四个环节^①，并且把它们同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有机地联系起来。这四个环节就是：**第一**，工人的劳动过程和劳动内容的异化；**第二**，工人的劳动成果即劳动产品同工人相异化，劳动产品借助资本家的权力采取商品形式；**第三**，无产者的精神内容（以及这个意义上劳动者的“本质”）的异化；最后，**第四**，人们相互隔绝直至相互敌视的异化。劳动异化的所有这些环节——其中第四个环节是它的最直接的结果——成为马克思进一步进行研究的对象。一般说来，人们不仅可以把《经济学哲学手稿》当作一部不完全成熟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的作品来看待，而且还应该认为它在一定程度上是马克思随后从事理论创作的纲领，随同这个纲领（即使是还没有详细阐明的纲领）提出的问题，马克思后来已经作了解答。这个纲领还具有临时纲领的性质，然而它的主要方向是完全正确的，虽然还不能够说，我们在这里把它当作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提纲。

在 1844 年的手稿中，劳动异化概念同压迫和剥削概念是非常紧密地（以至人们不能把它们分开）联系在一起的：“……占有表现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2 卷第 93—98 页。

为异化、外化，而外化表现为占有……”^⑦ 这些现象和过程彼此在客观上是什么样的关系呢？马克思提出了重要的论点：私有财产使资本主义的“占有”成为可能。而工人要摆脱劳动异化及其后果，则要求废除私有财产——一项由革命无产阶级本身来解决的任务。此外，也必须搞清楚异化同占有他人劳动以及异化的派生形式之间的因果关系。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说明私有财产本身的形成的机制以及它在异化劳动的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同时，联系这一点指出异化对私有财产有什么样的反作用。这个任务的解决已经导致这样的结论：在原初的异化劳动形式和后来的异化劳动形式之间，必须有所区别，前者产生出私有财产^⑧，后者是已经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私有财产不断造成的结果。但是，这种因果螺旋线的内在机制是必须弄清楚的。按照因果推动力来看，这是**雇佣劳动受剥削**的主要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1844年手稿中，劳动异化问题的提出以及对这个问题的初步解决，归根结底构成了剩余价值理论的萌芽形式，当然，是模糊的萌芽形式！J. G. 舍尔沙可夫的博士论文《卡尔·马克思在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形成初期的劳动异化概念》（1982）令人信服地证实了这一点，这篇博士论文的主要论点的依据是A. I. 马雷什（1966）、B. II. 什克列多夫（1973）、Г. А. 巴加图里亚和B. C. 维戈茨基（1976）的专题研究。马克思在1844年的手稿中深信不疑地指出：无产阶级必须使自己本身并使整个社会从异化和压迫下解放出来；然而他还没有得出这个结论：反对异化的斗争只能是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斗争的**从属因素**。异化是以劳动异化为基础的这一事实预示了这个结论；从预示直到持之有据的证明，毕竟要走完一段艰难的路程。

正是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经大略勾勒出从革命无产阶级的观点出发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辩证法进行经济研究的课题的范

⑦ 同上书，第102页。

⑧ 见上书，第100页。

围。这种研究必须既从本质上对劳动异化、私有财产和剥削加以区别,又要把三者相互联系起来。分工构成最深刻的原因,早在对抗性的阶级社会的初期,分工已经形成,然后,它又以改变了的形式得到发展,这种发展导致日益增多的、人对人的剥削的再生产。马克思把他面临的分析课题概括为下述观点:“分工是关于异化范围的**劳动社会性**的国民经济学用语。”^⑨“考察**分工和交换**是很有意思的,……”^⑩十五年以后,马克思解释说,分工本身是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辩证的矛盾统一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分工不再仅仅是异化的**条件**,而异化只是私有财产基础上的现实。青年马克思面临的问题是:“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在人类发展中具有什么意义?”^⑪

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不是以一个虽有理论爱好却又不抱偏见的理论家身份,而是作为一名为被压迫者谋利益和幸福的战士,作为工人阶级的思想家、有坚定信仰的共产主义者和满怀热情的人道主义者提出异化问题的。科学共产主义的伟大奠基者对劳动异化和人的本性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考察表述了极深刻的人道主义的基本观点,这一观点丝毫不违背无产阶级的党性,而且是以无产阶级的党性为基础的,是从无产阶级的党性中产生的,并且因此创立了马克思的“实在的人道主义”思想。

有时也有人指出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的手稿中还没有完全克服费尔巴哈学说的影响。他在这篇著作中使费尔巴哈的异化模式又跃然纸上。按照这种模式,人(在费尔巴哈那里:任何人,“人本身”)是这样异化的(在费尔巴哈那里:只是人的意识在宗教和哲学意义上的异化),即人的精神本质、整个精神内容被扭曲、歪曲和损坏。异化的克服(在费尔巴哈那里:通过科学的解释活动)意味着向人的原初本质的复归,人的原初本质的恢复。因此,人似乎得

⑨ 同上书,第114页。

⑩ 同上书,第148页。

⑪ 同上书,第56页。

以重新回到自身，切实地把否定的否定的圆圈闭合起来，使运动的末端和开端吻合一致。在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中确实可以发现某种所谓相似的东西的模式。然而这种相似性同时又包含着差别。

青年马克思写道，私有财产的克服会使以前一切受束缚和被歪曲的人的感觉和特性得到解放，^⑫因此，共产主义就是“……否定的否定……对人的本质的占有”，^⑬这就是说，共产主义就是向这种东西的复归，这种东西以前失去过，现在又重新得到了。可是，马克思自己很快就突破了这个模式，他指出，这决不是人的一成不变的本质，不是不可改变的人类本性。这种本质在共产主义条件下一定要广泛地和全面地发展，因为人——大写的人——的这种本质及其理想确实是值得尊敬的。

“……无神论、共产主义决不是人所创造的对象世界的即人的采取对象形式的本质力量的消逝、舍弃和丧失，**决不是返回到非自然的、不发达的简单状态去的贫困。**恰恰相反，它们是……现实的生成……”^⑭尽管青年马克思又继续使用了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一些用语，然而最重要的思想是清楚的：共产主义决不意味着向本质的“原始的”和“真实的”标准尺度复归；它也不会是这样的，即人的整个本质在今天是“非真实的”，只有在未来才是“真实的”。马克思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废除，为**发展最好的、今天已经部分地在人们中存在着而且是人本身内部具有的、但长期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的条件，开辟了广阔的场所。**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根本没有关于人有两个“分离的”本质（其中一个现实存在的，另一个要期待于未来）这种想法；然而他有这样的思想，即人作为社会存在物，他的统一的但并非形而上学地僵化的本性具有辩证的矛盾的形成过程和发展过程。不言而喻，未来的人，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人，本质上是日益完善的。这个思想同主张人向自身完

⑫ 同上书，第121页。

⑬ 同上书，第139页。

⑭ 参看上书，第175页（黑体是引者标的）。

全“复归”的费尔巴哈模式是完全对立的。因此，如果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个别段落里还出现这种模式，那也仅仅是大部分已经得到克服的自然主义观点的残余。难道还必须专门为此提供证明，说明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着重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使命的论点已经同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吗？

《资本论》的所有三篇准备著作中以及《资本论》这本著作中提到的异化问题和对它进行的考察要比《经济学哲学手稿》少些，尽管在这三篇准备著作的第一篇即《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还多次提到异化。在这方面，可以举出不少根据。显然，马克思认为这个问题的哲学方面已经基本上弄清楚，因而集中考察它的经济方面。同时，这个课题的哲学因素需要以后再专门进行考察。特别是关于“异化”，马克思从那时起就讲得很清楚：揭示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的最重要线索不在于这个范畴，而在于科学的剩余价值理论，这个理论同时还说明异化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关系体系中的真正地位，即说明异化在这些关系的范围内所起的尽管重要却是次要的作用。马克思的根据是：不是劳动，而是无产阶级的劳动力^⑩受剥削，虽然这是劳动的异化而不仅仅是劳动力的异化。在异化的这种基本形式上，有异化的派生的“上层建筑形式”的多级“楼层”。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劳动异化的消失并不意味着异化的次要的和异化的整个派生形式的立即消失，这些异化形式的特色是有一定的情性，所以必须为反对这些异化形式进行长期的坚持不懈的斗争。

在《资本论》中，异化问题出现的次数很多，但是完全不是只以商品拜物教、“机器”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这些直接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关的虚幻的经济意识形式出现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辩护思想是同商品拜物教有关联的。在《资本论》的所有三篇准备著作中，都可以注意到马克思对这些现象所进行的分析，而且他

^⑩ 这里要说明的是，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已经把劳动力和劳动区别开来。

还不同程度地作了详细的分析。与此同时，马克思也利用了他基本上在早期，其中包括他在《神圣家族》和《共产党宣言》中表述过的思想，并进一步发挥了这些思想。因此，马克思特别强调，异化的派生的意识形态形式——直至宗教意识形态形式——的等级矗立在工人的劳动异化之上，而且“工人在这里所以从一开始就站得比资本家高，是因为资本家的根就扎在这个异化过程中，并且他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绝对满足，但是工人作为这个过程的牺牲品却从一开始就处于反抗的关系中，并且感到它是奴役过程”。^⑩

如果分析马克思的代表作《资本论》，同时也分析一下他为准备《资本论》而写的手稿——这是今天对《资本论》进行科学分析所不可缺少的前提——那么，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下述异化过程的结构同这个过程中那些非异化的相似现象的关系就很清楚了：在任何生产实践中都有好些对立的过程在起作用。一方面，产生了活动的以及活动结果的对象化，在许多情况下产生了完全的物化（同时也是“物质化”），从而产生了人的打算和愿望的客体化。另一方面，自然物质（原料）成为中间产品，以后成为现成的“第二自然”。因此，对象化的主体似乎是“从自身外化”；主体的活动使物质自然失去对象，因为主体的活动从属于人——人不是“对象”（客体），而是主体——的愿望和目的，首先从属于最近的愿望和目的。

可是，按照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的分析，这些过程经历了非常深刻的变化：一些新的、对人来说是毁灭性的现象补充了这些过程。劳动的主体的活动结果的对象化和物化（以及外化）变成敌视人的闭锁状态，而外化则令人感到是劳动人民内在生活的实际的（社会的）空虚。^⑪

此外，还有两个过程：第一，主体感到自己本身由于落在资本家以及用资本家名义来对付工人的那些人手中而成了对象，成了

^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第49页。

^⑪ 见上书，第16卷上册第486—487页。

物(指在劳动人民意识中的异化了的对象化);第二,和工人敌对的经济力量增加,并在最后人格化。经济关系采取“物的权力的形式”,而且似乎一开始就具有“极其强大的物”的形象。^⑮

商品拜物教就是这种颠倒状况的典型表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同工人对立的物“现在都变成真正的共同体,工人力图吞食它,但它却吞食着工人”。^⑯物化的(对象化的)劳动条件同活劳动力的分离以及它们对劳动力的统治导致异化的“多层次”结构的一切组成部分积极地发挥作用。上面提到的它们的全部要素是共同起作用的,这种共同作用连同它的要素只有通过对社会进行革命的社会主义改造才能被破坏。

异化问题在今天有哪些意义?

与异化问题有关的一系列问题使我们有可能分析从而有效地全面地批判当前的垄断资本主义。我们都记得,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以多么巨大的说服力揭示了资产阶级社会内部在上一世纪中叶就已存在的异化的上层建筑形式。这是对经济本身的异化形式(利润、地租、利息)的批判,并且,在它的基础上,对政治、法、道德、家庭、哲学等等进行的批判。《资本论》继续进行了这种批判并进一步加以发挥。

今天,在帝国主义条件下,由于帝国主义的政治领导人在普遍的核灾难的边缘搞平衡,他们不仅无力解决所谓当代的全球性问题,而且甚至还使问题进一步尖锐化,实际上,“……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褻渎了”^⑰。帝国主义者蔑视荣誉、尊严,甚至蔑视人民的生命,恶意侵犯人的权力和无耻地剥削在地球绝大部分土地上生存的亿万人民。

社会心理学意义上的异化,在帝国主义制度下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它把工人阶级牢牢地拴在资本主义的车子上,为此目的,

^⑮ 同上书,下册第161页。

^⑯ 同上书,上册第497页。

^⑰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页。

或者消磨工人阶级的反抗意志，或者用迷惑手段驱使工人阶级走上错误的、反共产主义的道路。人的意识在人们工余时间的影响，就是说，“自由时间的异化”，今天在反共宣传的总体系内部是有重大意义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强词夺理，硬把它同劳动异化对立起来，宣称劳动异化会被业余时间的异化排挤掉并被消灭。这是完全错误的。然而，无可争辩的是，资产阶级的舆论家目前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于这一点上：通过损害和蹂躏个性的假先锋派“大众文化”的种种形式，并借助于“新马克思主义的”和保守的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来控制人的意识。帝国主义政治家最关心的是通过异化的派生形式麻痹劳动人民的理智，瓦解他们的意志，使他们俯首贴耳、麻木冷漠、在政治上消极无为。在当前进行意识形态争论的条件下，切切不可忽视这一点。

在社会主义国家（涉及个别社会主义国家的具体发展史）还可能出现起源于私有财产的异化的原初形式的后果，即残余，甚至出现异化的派生形式的回复。列宁在他的《国家与革命》的提纲中特别指出资产阶级社会中那种国家政治型的异化。^①因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原则上是没有政治异化的，更没有劳动异化，因为社会主义是在自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可是某些个别领导人如果犯了重大错误，那么，“党同人民……失去联系，在这个真空地带，就会出现冒充劳动人民利益的代表者的候选人”。^②波兰过去几年中发生的事情是这方面的直接例证。我们都记得，列宁在1922年初《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提纲初稿》中谈到过渡型的无产阶级国家中罢工的可能性问题，他写道：事物的这种状况只能解释成“无产阶级国家中还存在着官僚主义弊病，在它的机构中还存在着各种资本主义旧残余，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由于劳动群众政治上不开展和文化上落后。”^③

①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1页第223—224页。

② 《安德罗波夫言论选集》第334页。

③ 《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3卷第158页。

因此,异化不是来源于社会主义关系的本质,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产生的,因为社会主义制度已经不再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尽管在生产组织、流通和分配等领域中还会遇到许多不完善的环节,这些环节都具有把异化的残余、回复和后果“集合在一起”的倾向。(人们自然不应当把个人错误中那些只在表面上同异化相似的表现形式同这些环节混为一谈,在个人犯错误的情况下,人的行为结果是针对着人本身的。人们生活中出现这些同社会结构没有直接联系的现象,在今天是个别的;虽然这是不多见的现象,今后还是可能发生的。)

从以上所说的看来,我们绝不能赞同波兰哲学家亚当·沙夫的看法,他在《异化是社会现象》一书中,在《此时此地》周刊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在另一个推荐这本书的机关刊物中以及在他的新书《面临抉择的共产主义运动》(该书使他的这些思想进一步同列宁主义彻底决裂)中固执己见,力图把情况说成这样,好象社会主义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共产党为反对异化现象而进行的斗争,或者原则上注定要失败,或者根本就没进行而且也不可能进行,因为在这些共产党的领导层中,没有人开始进行这种斗争并期待获得成功。^②其实,沙夫是盲目地照搬考茨基、托洛茨基和吉拉斯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必定“退化”的思想:沙夫的主要论点是个空泛的命题,似乎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会发生“革命的异化——人们把魔鬼从瓶子里放出来了,那就控制不住魔鬼以后的所作所为”^③。作者企图用提示事实的办法掩饰这个命题的空洞无物,对1980年波兰发生的事件的歪曲解释竟成了“事实”,他认为,波兰统一工人党以前进行的全部活动要在这件事上负绝对责任。

沙夫宣称,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原则上每一个国家都是

^② 见亚·沙夫:《异化是社会现象》1977年维也纳版;《今日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的意义》,载于《哲学研究》1983年华沙版第3期第3-13页;《面临抉择的共产主义运动》1982年维也纳版。

^③ 亚·沙夫:《今日马克思主义》第10页。

“异化的产物”^②；完全充满着异化的所谓民众社会，今天不管其社会制度如何，在一切发达的国家中都会存在，俄国1917年10月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及在其他国家和大陆上相继进行的革命的社会主义变革，全都“过早地”发生了。总之，“人们不必拿起武器”，只需等待资本主义在大多数国家有了高度的发展，等待西欧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同时，沙夫着重提出关于为反对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所谓异化而进行“持久革命”的必要性这一模糊的口号。^③他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地方看到了当前为反对异化而进行斗争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天主教教会的领导。沙夫断言，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著名通谕《Redemptor hominis》和《Laborem exercens》宣告了劳动对资本的优先权。他在《协作——行动中的对话》这篇文章中继续写道，人，一般说来，需要宗教感情（难道他又从中看到了同异化作斗争的“手段”？）。同时，他总是一再积极地发表论“欧洲共产主义”的意见。

沙夫论异化问题的错误观点，有一部分他试图直接归因于马克思，一部分则推及《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所有这些错误观点目前在人民波兰的党报和政论著作中都遭到批判。A·马林诺夫斯基在自己的一篇文章《论亚当·沙夫的著作〈面临抉择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完全正确地指出，“革命的异化这个概念证明，它同托洛茨基主义者和二十世纪下半叶西欧极左派代表们宣称的关于‘没有希望的’革命的论点有相似之处，顺便提一下，卡尔·科尔什是他们的重要代表人物，他指责布尔什维克‘背叛’革命和具有反革命倾向。”^④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理论政治机关报《新路》用M·奥尔泽肖夫斯基《有关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争论》^⑤这篇论文令

^② 见上书，第8页。

^③ 见上书，第9页。

^④ 《思想和政治》1983年华沙版第7—8期第142页。

^⑤ 《新路》1983年华沙版第8期第5—28页。

人信服地指出,沙夫已经大大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因而得到现代修正主义者——“欧洲共产主义”的变种,得到资产阶级的马克思学者以及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本身的敌人的赞扬和欣赏。在沙夫的错误理论结论的整个框架中,理解异化现象在当前意识形态斗争中的作用和地位问题,占有重要地位,在沙夫看来,这个问题同否认共产党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时的领导作用有密切联系。这又一次证明,这个问题具有多么现实的和迫切的意义,而且表明,我们迫切需要对在理解和解决这个问题上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歪曲进行批判。

今天,在苏联共产党为有计划地和全面地完善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进行斗争的条件下,不仅要消除异化的残余,而且也要消除异化的回复。为此,必须继续造就新人,这“不仅是共产主义建设的最重要的目标,而且也是共产主义建设的绝对必要的前提”。此外,这样的新人“绝不是理想,而已经是当代的现实”^⑧;我们周围就有具有共产主义品格的人。这就可以保证使异化的残余,或者更确切地说,异化的后果最终地永远消失。

^⑧ 康·契尔年科,《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群众政治工作的现实问题》,载于1983年6月15日《新德意志报》第5页。

异化是不占统治地位的 社会化的表现

[民主德国]哈·施里瓦^①

会议报告已经阐述了马克思异化观点发展中具有实质性的理论中心问题。我同意会议报告的基本思想：马克思在自己的成熟著作中辩证地扬弃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合理的思想，他通过描述劳动中的异化现象进而认识这些现象的社会经济本质，认识它们的深刻原因，并且从对历史过程的分析中获得非异化劳动的规定。

这就是我先要讲的。我还想提个问题：会议报告把异化现象只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价值增殖过程联系起来考察，是否太专一？这是否会造成概念的偏狭？这样做的结果是否把异化的重要表现方式，或更确切地说，异化的存在方式排除在外？要确定各种不同的异化现象的来源和出发点，这样做完全正确。但是我认为，马克思的观点不限于这一点。他把历史的事实情况的结果也纳入异化概念，即人们基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长期以来不能以自己的影响控制和支配他们用自己的劳动和最广义的社会活动所推动的社会原因。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把通过分工而扩大了的生产力称为“社会力量”，这种社会力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是作为人们“自身的联合力量”来使用的，而是作为某种异己的、在人们的支配能力之外的强制力量起作用的。^②或者说，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所持的根据是：劳动资料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生

① 哈·施里瓦是哲学博士、教授，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社会科学院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研究所工作。——译者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页。

产力本身，确切地说，社会劳动生产力，从而日趋生效的社会原因——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所起的作用是对生产者个人的活力、自由和独立的有组织的压制。^③可见，马克思在这里所理解的异化是指**社会劳动**的生产力不再被驾驭，它们是资本掌握的统治手段，在生产者的社会协作下形成的社会力量不再给予生产者，它们被资本篡夺，并且用来作为某种压制力量对付生产者。生产者不能获得所愿望的、自己在劳动过程中推动的原因产生的任何效果，因为这种推动的社会条件不允许它发挥影响。这种事实情况是资本主义形态发展中通过许多表现形式存在的**基本情况**。这种情况将不仅用**自发性概念**而且用**异化概念**科学地反映出来。自发性概念概括的是活动的目标和目的同活动的结果的不一致，甚至对抗。异化概念概括的是在社会劳动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力量向统治生产者的力量、向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手段的转化。

从这里，我们也就容易理解所谓的**工艺异化**了。工艺分工在生产力的发展中有自己的原因。因此，它首先是不依赖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它是劳动社会化的一个历史地形成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它又是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合乎规律的结果而存在的。

但是，工艺分工，就其本身而言，即作为生产力的组成部分，不是异化的表现，而是通过资本主义所有权关系形成的。它会成为异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因为资本最初使**总体工人的联合职能**独立化，因为资本不容许生产者对**劳动的总体联系**施加影响。这种总体联系成为资本家的统治工具。它表现为资本的特性、功效。马克思写道：“生产上的智力在一个方面扩大了它的规模，正是因为它在许多方面消失了。局部工人所失去的东西，都集中在和他们对立的资本上面了。”^④**形成为指导、监督、计划的生产上的智力**，就是说，“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52页。

^④ 同上书，第400页。

一般职能”^⑤的指挥部门的生产职能，科学同劳动的分离，成了资本的统治工具，并压迫雇佣劳动者。

因此，工艺分工并没有产生社会中立的、独立的异化形式，而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获得了异化的特征。这就是说，人们可以不把分工造成的妨碍个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得到发展的各种结果称为异化，确切地说，称为工艺异化。凡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使工艺分工成为异化的东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都可以通过社会计划、指导和监督，通过民主集中制，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特有的、物质生产中政治和经济的辩证法加以扬弃。所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艺分工的消极结果不应该从理论上用异化概念来反映，而是需要另一种理论工具，但这是另一个课题。

马克思用异化概念概括的不仅是经济领域中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化转变为对生产者的阶级压迫，而且还概括了政治领域中的类似过程。这在阐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权和公民权之间的区别和关系时可以清楚地看到。公民权是单个人的政治权利。履行公民权，就是单个人参加共同体、参加社会，就是说，参加这个社会的正式表现，即资产阶级国家。但是，这种国家，从表面上看，只是某种共同体的政治形式。就其本质而言，它是对抗性的阶级统治，从而只是共同体性质的代替物。因此，它并不是控制社会化过程的政治工具，而是手段，以便在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和资本主义的危机重重的发展占支配地位的范围内，借助国家垄断措施考虑社会化的要求，同时也阻止历史地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以人们的政治协作方式存在的社会权力，通过资本主义国家成为一种政治力量，这种政治力量转而反对社会财富的生产者。可见，这种国家不是控制社会化过程的政治工具。因而，单个人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权也不是他参加社会事务、分享政治权力的手段，而是使他同社会隔离的手段，是保护资产阶级私人领域的手段，对于生产资料所有者来说，是保护他们的剥削职能，是他们的剥削职能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67页。

的政治要求,对于雇佣工人来说,则是保护一种经济上贫乏无力的从而令人疑惑的个人主义。“citoyen〔公民〕就成了利己主义的homme〔人〕的奴仆;人作为社会存在物所处的领域还要低于他作为私人个体所处的领域;最后,不是身为citoyen〔公民〕的人,而是身为bourgeois〔市民社会的一分子〕的人,才是**本来的人,真正的人**”^⑥。按照这种方式,人的社会本质的政治发展不仅会同自己的个性分离,而且反而形成为共同体性质的代替物,并且形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力量即对一无所有的群众成员实行阶级统治的工具。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的社会化所产生的不只是生产资料所有权社会化的历史要求,而且还有创立某种**政治势力范围、国家和政治组织**的要求,它们代表并贯彻生产者的社会利益,通过创造同别人共同行使的权利和共同创造的权利消除人权和公民权的分离,并且使经济上的社会化成为在政治上是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组织使这些条件付诸实施。因此,它是历史地克服异化的表现,而不是象修正主义者和其他反共产主义的思想家所说的那样,是人的重新异化的体现者。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表述的无产阶级的任务:必须认识到在社会行动中起作用的社会力量并把这些力量组织起来——还要在政治上把它们组织起来——,而不是使它们以资本主义国家的形式同这种行动分离开来。

我想把我的论点概述如下: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化的经济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思想效果也属于马克思主义异化概念的内容,在这一点上,这些效果是作为阶级压迫的工具起作用的。

^⑥ 同上书,第1卷第440页。

通过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克服异化和隐蔽性

〔民主德国〕汉·卢夫特^①

我同意会议报告的论述,我还想着重指出一点:不能把异化同分工等同起来,马克思也从来没有把异化看作分工的结果。马克思在自己的代表作《资本论》中指出了把人的劳动力同生产资料从而同客观劳动条件分离开来的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劳动异化之间的因果联系。他论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因为在他(工人——译者注)进入过程以前,他自己的劳动就同他相异化而为资本家所占有,并入资本中了,所以在过程中这种劳动不断物化在别人产品中。”^②

因此,异化是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一种十分特殊的形式相联系的,确切地说是同资本主义所有制联系在一起。用属于自己的生产资料从事劳动的简单商品生产者,是按照分工、为了交换才进行生产的,但是,他的劳动不是以别人的产品而是以属于自己的产品显示出来的,他打算通过交换把这种产品变卖为货币,以便能够购买其他产品。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者和所有者的这种等同性甚至被置于更高的阶段,同已经达到的生产力发展状况相适应^③,这时每一个劳动者都用属于他这个社会所有者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没有人被排除在生产资料之外,正象谁也不能个人独占生产资料一样。私有制具有的使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非所有者分离的现象已被消

① 汉·卢夫特是经济科学博士、教授,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社会科学院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工作。——译者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26页。

③ 今天,每一个人固然可以独自为自己生产西红柿或草莓,却既不能生产钢和乙内酰胺,也不能生产微电子建筑构件。

除。谁也不再为了能够活下去而被迫为另外一个生产资料所有者去劳动。人的劳动力已经不再是商品，即买卖的对象。人对人的剥削被消除了。作为人的自我实现、作为人的个性的主要活动范围的劳动，已成为从剥削中解放出来的活动。

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异化已被消除，尽管旧的社会分工还继续存在着。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统治地位，劳动异化所具有的社会对立已经被消除，但是，还继续存在着简单活动和复杂活动、脑力活动和体力活动以及工业活动和农业活动之间的本质差别，而克服这些差别是一个通过改变各种不同劳动的内容使它们逐步接近起来的复杂的、纷繁多样的漫长过程。

这些差别是否会在某个时候完全消失，今天谁也无法估计。列宁已经注意到，“农业中的大机器生产永远也不会具备工业中的大机器生产的全部特点”。^④农业生产始终具备的一个特点是直接与自然界相联系的特点。同样地，也不能够使专业分工消失。马克思强调说，“……如果没有限制，在任何地方都作不出重要的事情。因此，产品和生产者由于分工而得到改善。”^⑤人们总是具有各种各样的才干和志趣，不仅如此，科学和技术的进步经常对天赋和才能提出千差万别的要求，这就更加导致这样的结果，即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学会每一种职业，历来就不是每一个孩子都会成为小提琴演奏能手的，而且在今天，也不是每一个弱电技术的工学士都掌握了设计新的完整的配电电路的才能。

但是，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有高度分工的、组织起来的劳动，具有直接的社会性质。简单商品生产者同资本家一样，是同其他生产者、同社会相脱离的；二者只能在为反对其他人而进行的竞争斗争中保持自己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这往往使得为人们的幸福而作出总的社会抉择成为不可能的事。劳动消耗是不以生产额即不以当时生产者的私人劳动为转移的。相反，

④ 《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5卷第119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04页。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切企业和部门在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基础上联合为统一的国民经济复合体。因此，劳动的消耗是在整个社会范围内，由整个社会负责来实现的，这还意味着，任何为制造非必需的产品所使用的劳动，必然不仅造成企业损失，而且还造成国民经济的损失，这些损失归根结蒂都得由整个社会来承担。

此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向货币的转化，不再是私人劳动向直接社会劳动的转化这种对抗性矛盾运动，而是具有不可比较的形式的直接社会劳动向相互比较的直接社会劳动的转化。因而，企业个人的劳动支出和社会必要劳动支出之间的矛盾不是存在于直接社会劳动之外，而是存在于直接社会劳动之中。^⑥

由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的这种直接的社会性质，随着异化的消除——与简单商品生产者不同——，商品和货币的拜物教特性，从而经济关系的隐蔽性也被消除了。作为计划的客体，商品货币关系对人们来说也就一目了然了。供给和需求在作为现实的经济范畴出现于市场以前，已经能够通过生产确定、货币收入和价格在计划中得到平衡。这就是说，市场上交换过程的运动形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的商品货币关系是按照计划形成的、直接社会关系的一种形式。国家计划代替了资本围绕着投资领域进行的竞争斗争的隐蔽机制。社会总劳动对经济的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部门和各个领域的分配是按计划进行的，它以居民、经济以及对外贸易的需要同可动用的资源协调一致为出发点。因此，市场竞争的隐蔽机制的消除，其结果绝不是为生产而生产，不如说是有计划地考虑整个社会范围内的需要。

此外，把对居民、经济和对外贸易的需要等同看待作为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计划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出发点，这只不过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本规律所决定的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生产和消费关系的另一种表现：生产先于消费，而消费，即越来越好地满足人

^⑥ 见《经济学问题》1978年莫斯科版第9期第8页。

们日益增长的需要,则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与此相应,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所决定的社会主义生产的一般目的产生企业和合作社的经济活动的目的功能,即保证符合需要的生产,从而完成与顾客的订货相适应的计划,社会利益就是以这些方式用尽可能低的社会必要支出物质化了。

因此,商品生产和商品货币关系不能就事论事地加以考察,而是必须在既有的、历史地确定了的生产方式的生产关系体系中加以考察。随着社会主义社会日臻成熟,它的新的内容表现得越来越完善,它的有计划利用成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经济机制完善化所不可缺少的属性。此外,由于进行商品生产的劳动具有二重性以及因此在发达的商品生产中造成商品二重化为商品和货币^⑦,从而合乎逻辑地产生出物质计划和金融计划的统一,在计划中运用使用价值指数和价值指数。

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建立在各种不同的甚至对立的计划生产基础上,也不是建立在一种自发的市场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生产资料公有制使国民经济再生产过程的计划得以实现,它需要这种计划,同时,它还改变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商品货币关系的特性,因此,商品生产和商品货币关系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固定的组成部分,它们的一般规律并入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体系。众所周知,商品生产的对立面是自然经济,计划性的对立面是无政府状态。第一对概念涉及的是人的劳动的某种产品的特性,第二对概念涉及的是当时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类型所决定的、把物质财富的生产者吸收到国民经济再生产过程中去的方式方法。

这些结论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从这些结论中合乎逻辑地得出这种观点:人们不能把商品货币关系看作必须尽快加以克服的、异己的、退化的旧残余。更确切地说,它们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体系的内在要素,人们必须通过每一个人都可以感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12—113页。

觉到的确立利益协调一致的办法利用这些要素来巩固商品货币关系。这包括用低成本生产尽可能多的商品，因为畅销的高质量工业消费品供应得越多，效益原则即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就越起作用。^⑧因此，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不理解，在一般情况下都同对效益原则、对必须关心居民估计不足有联系，这并不是偶然的事情。

^⑧ 见1982年11月25—26日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为了人民的幸福，精力充沛地、满怀信心地胜利完成我们面临的任務。选自艾利希·昂纳克同志的闭幕词，1982年柏林版第21页。

政治经济学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问题”

〔民主德国〕汉·瓦格纳^①

使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再成为值得讨论的对象的实际问题是什么呢？肯定不仅仅在于这一事实，即社会主义的敌人滥用异化概念攻击社会主义。我认为，更确切地说是关于社会关系的表现的现象学观点，即认为社会关系作为物质形式呈现在当今世界的个人面前，被各个人“内在化”，转化为主体行为的现象学观点，促使我们对《手稿》给予认真的评价；通过同那些滥用《手稿》的人进行争论并以此作为推动我们自己的思考力发展的动力，不言而喻，我们这样做是以《资本论》的全部财富而不是仅仅以它的理论预备阶段为依据的。对于政治经济学（也许不只是对于政治经济学）来说，今天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没有涉及到的一个问题作出答复是有重要意义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协调一致的条件下，行为关系在今天是怎样表现的，而又有哪些经济矛盾是以异化行为的特殊的发展了的形式、以政治思想斗争为基础的呢？不过，这也涉及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形式，涉及在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中“非异化的”动机和行为方式的完全实现。这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为如何产生的问题。

如果说，我们的意识形态对手滥用马克思主义形成时期的概念，那么，过错不在于这些概念，而在于使用这些概念的人的世界观立场。他们使用这些概念时所持的立场是否承认从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经济运动规律中得出的革命结论，所以，在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之间，或者说，在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描绘”和社会

^① 汉·瓦格纳是经济学博士、教授，在柏林洪堡大学经济科学教研室工作。——译者注

主义现实之间虚构一个“断裂”是不太困难的。然而真理不仅仅是成果(《德意志意识形态》或《资本论》),而且也是导致这种成果的通途!

马克思思想的形成过程可以由他的思想成果来表明,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涉及的是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手稿》中涉及的是资产阶级社会本身以及(雇佣)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基本生产关系,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涉及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是历史过程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基本辩证法,这种辩证法说明任何一个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是自行再生产。《资本论》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天才假说的实现。

我完全同意会议报告的观点:认为《手稿》中的“异化”在《资本论》理论的经济概念中被扬弃和具体化了(雇佣劳动、商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等等),异化的位置放到有关资本主义生产的表现的现象学观点的论述中,即具有异化形式的资本主义生产被生产当事人内在化,而且作为动机和行为表现出来。

马克思在《手稿》中的异化概念,就其来源而言,毫无疑问打上了人本主义的人的概念的烙印,即抽象人道主义的烙印。但是,马克思利用这个沿袭下来的概念——他从哪儿能找到别的概念呢——是为了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提出具有世界观意义的批判;揭示(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及其共产主义的否定!一项连资产阶级经济学都无法试图取得的成就。在我看来,如果对政治经济学进行哲学批判的出发点是要求揭示世界变革的社会力量和动机,那么《手稿》就是这种批判所能提供的富有教益的范例。

马克思就是这样承前启后,以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方式把抽象的异化概念具体化并且加以发展,即把异化概念理解为私有财产的属性;理解为劳动和资本分离、资本和土地分离的结果;在这里,私有财产实际上被理解为三个基本阶级的生产关系,它们在生产关系中是彼此独立的阶级主体。^②但是,马克思又继续迈出了具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89—90页。

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对这一概念的分析表明，与其说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原因，还不如说它是外化劳动的结果……后来，这种关系就变成相互作用的关系。”^③

把资本主义制度下“作为财产之排除的”（雇佣）劳动理解为“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把“作为劳动之排除的”资本理解为“客体化的劳动”，^④这种观点是认识基本生产关系的本质的十分重要的一步：它不是扎根于财产，而是扎根于劳动！这里，财产的核心被理解为对象性地活动着的财产，理解为生产过程，而不是理解为对象性活动之外的固定不变的关系。与此相反，国民经济学把异化，就是说把资本的真正本质掩盖起来，因为它“不考察工人（即劳动）同产品的直接关系”。劳动同产品的直接关系是“工人同他的生产的对象的关系”^⑤，也就是说，工人同生产资料的关系，但是，为了理解私有财产，不应当把这种关系作为状况，而应当作为过程，作为活动着的关系来进行分析。

把私有财产看作生产本身中（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的结果，就是说看作生产出来的东西，这是理解《资本论》的钥匙：雇佣劳动如何生产资本，而不是相反！通过劳动进行的对象的生产即资本的生产如何产生异化现象，这是政治经济学的十分重要的方法论原则，我们在对帝国主义进行分析时经常忘记这个原则。

我认为，对问题的这种天才提法中的抽象的东西，不在于把叙述从属于异化概念，而是在于：阐明异化劳动的问题还没有被提出来。令人感到惊奇的是：这个问题在许多方面本来是很明显的，但是本身没有被理解：《手稿》的读者不禁会一再想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只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才被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辩证法加以阐明。

塞夫认为，从《手稿》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进步——他称之

③ 同上书，第100页。

④ 同上书，第117页。

⑤ 同上书，第93页。

为“断裂”——就在于从异化劳动概念向分工概念的过渡^⑥。分工这个术语以及把它制定成概念，实际上是个重大的进步，它使人看到生产关系的物质性。但是在扬弃《手稿》中还包含的抽象的东西时，主要的东西是揭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随着这一发现，历史规律性作为具有物质的规定的辩证发展过程是可以理解的，当人们改变自己的对象性生产条件时，他们自己就在实行这个过程。因此，通过雇佣劳动进行的私有财产的生产正好表现为扬弃这种财产的生产，异化的生产同时表现为扬弃这种异化的生产，以此类推。历史的发展、社会力量的历史行动是可以被理解的，而共产主义则从一个仍然是抽象的概念变为一门科学。不过，我无法看出在《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间有“断裂”。

《手稿》中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批判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个人及其异化同共产主义制度下被扬弃了私有财产的社会个人作了对比。而《资本论》中论述的是这些个人的关系，就是说，涉及的是他们的“异化”行为的经济基础和所产生的结果。这并不是对立的。然而今天再来论述这些关系本身已经不够了。否定意义上的帝国主义也好，肯定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也好，都不是生产力得以同生产关系相适合的“经典的”生产方式。因此，以《资本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丰富的范畴体系为依据，有助于意识到《手稿》是通往更深刻地理解当前世界上社会进程的现实表现的途程中的一个阶段。

至于共产主义的“抽象描绘”、“社会的个人”、“旧的分工的扬弃”、具有这种对象性条件的生产——“……物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从而人能够按人的方式而不是异化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⑦以及类似的意见，在一些主张务实的人看来，可能就是对未来世界的无益的空想。但是，从历史过程的观点来看，它们是今天

^⑥ 见吕·塞夫：《对异化的马克思主义分析》1978年美国河畔的法兰克福版第35—36页。

^⑦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4页及以下各页。

在起作用的矛盾的必然结果，因而是这些矛盾的作用的客观历史倾向。由此可见，它们必定是从这些矛盾中产生的，并且具有在今天从总体上解决这些矛盾的条件。

由于它们不是作为人本身的抽象理想，而是作为今天正在进行的历史过程的内在倾向，它们是构成当前实践和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成份的理论观点的不可或缺的要害。这涉及到完成从资本主义生产的异化经济观向社会主义生产的经济观的思想转变，在前一种观点中，经济学表现的只是个人的外在有效性联系，在后一种观点中，社会的人本身的社会本质变为现实。在解放同社会所有制相适应的千百万个人行为的动力和动机这一问题中，首先表现出社会主义以及个人生存条件的全部构成的方向必须是和资本主义不同的劳动效率的目的动机。这不仅可以通过分配原则来实现，而且还必须包括对象性劳动条件本身的发展。

对于从内容上扬弃分工过程的理解，即把这个过程理解为劳动的社会形式和对象性内容统一的过程（就是说，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统一的过程），是理解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过程的性质的基础。

王业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⑧。

⑧ 同上书，第127页。

论异化概念在马克思列宁主义 理论中的地位

[民主德国]罗·鲍威尔曼^①

自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三十年代初发表以来，关于“异化”概念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把这个概念解释成为马克思理论的中心范畴，并且企图证明，马克思用这个概念所说明的事实也适用于现实的社会主义，异化实际上是无法消除的。与此相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从七十年代以来首先相当全面而详尽地研究了异化概念的内容，并且以令人信服的方式批判分析了资产阶级的曲解，特别是批判分析了在社会主义社会有新的异化的论断。在这里，也出现了一些过头的观点，就是想把异化概念局限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并且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批评意见就是根本拒绝使用异化概念。相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如奥伊则尔曼、纳尔斯基、塞夫等人却证明，马克思在成熟著作中也使用了异化概念。

由此出发，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异化”概念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内是否具有合法的地位，它是不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个范畴。对于这个问题，不进行理论史的反思是不可能作出回答的。我认为，这种反思导致如下的结论：

第一、异化概念在马克思理论的形成过程中起着中心的作用。在一个特定的阶段（不过，这个阶段只是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为止），这个概念具有指导认识的功能。异化概念同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和他关于把人从一切奴役人的力量下面解放出来的人道主义要求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对于处于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之中

^① 罗·鲍威尔曼是民主德国教授、哲学博士，现在哈雷-维滕贝格的马丁·路德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教研室工作。——译者注

的马克思来说,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这个主体从自身之中生产了社会现实的一切领域,总之,人是他自身的创造者(库列拉)。由于黑格尔哲学和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的影响,起初马克思把人的主体的能动性只局限于创造性的意识。由于他自己认识到了这种唯心主义观点是错误的,首先由于费尔巴哈对黑格尔进行了原则性的、唯物主义的批判,马克思转到唯物主义立场上来。但是,他通过1844年夏天从事经济学研究而获得的推动,对于关于人和历史的最初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里,他阐发了一种构想性的思想,认为人——被理解为类——通过劳动改造着外部自然界,使之适合于自己的目的,并且在这个过程中生产出社会关系。人所创造的产品是他的肉体的和智能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人在他所生产的现实中就象在镜子中一样直观他自己。

但是,这种观点还没有完全成熟,因为马克思把劳动同道德评价联系起来,还没有摆脱关于存在人的“真正本质”,因而也存在“真正的社会”的观点。他认为,人同人在彼此为了对方而进行的生产的基础上的共同联合就是这种“真正的社会”,在那里,自由的自觉的劳动是人的生活的第一需要。从这种哲学立场出发,马克思满怀激情地批判了对雇佣工人的剥削,并且竭力发现雇佣劳动和资本、私有制的本质和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克服私有制之间的合乎规律的联系。众所周知,他从这时起发现的他的根本要求就在于此,这就是,无产阶级是根据其在社会中的地位有能力完成全人类解放事业的唯一的社会力量。因为马克思由于他所获得的共产主义的阶级立场无论如何不可能接受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关于私有制具有事实上的永恒性、关于雇佣劳动和资本的见解,但是他对经济联系的认识和他的政治经济学知识又还不够,所以他就从他的人道主义哲学观点出发去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因此,他认为,私有制无论如何绝不是一种永恒的现象,因为它使人同他的现实本质相异化。因为私有制使工人同自然的生产条件和他的劳动产品相分离,促使工人在主观上得出一个反应,就是他在自己

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感到不自在。因此,私有财产按其本质来说是雇佣工人的异化劳动,它作为一种异己的、压迫他的力量同他相对立,他生产得越多,这种力量就越大。因此,异化对马克思来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定阶段,它是主体和客体的颠倒,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人被他生产的现实所统治。它是同资本主义生产、同资本主义私有制相联系的,是以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对立为基础的,并且只有通过由雇佣工人推翻资本权力的办法才可能重新被消除。

异化劳动这个观点使马克思有可能超过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而大大向前迈进一步,因为它使他有可能把资本理解为雇佣工人的肉体的和精神的本质力量的异化了的对象化,从而理解为两个对立阶级之间的社会关系。就这一点而言,异化概念由于被运用来分析雇佣工人的劳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起了一种重要的指导认识的作用。在“穆勒”手稿^②中也表现了同样的东西,在那里,马克思利用异化概念去分析货币,从而获得了一个重要的认识:为人同人之间的关系充当媒介的货币,按其本质来说是具有物的形式的社会关系,因为在货币中,人自己的本质作为异己的、统治他的力量同人相对立;货币是人的异化的本质。这样就证明,为了在分析一些经济范畴如商品、货币或资本时把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区别开来,异化概念在理论上是有成果的。

但是,这个概念的有成效的功能也就到此为止了,因为为了能够理解这种区分,就必须对生产方式的两个方面有更深刻的认识,必须制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两个范畴。借助于“异化”概念做不到这一点,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克服异化概念,因为它提出了抽象地区分异化社会和非异化社会的思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更详细地考察异化关系的视线。这是同马克思当时还没有克服的他关于人的观念中的人本主义因素直接相联系的。因此,不能

^② 指马克思:《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5—42页。——译者注

不看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概念仍然是同道德因素联系在一起的。同时，异化劳动概念也包含着对资本主义剥削的尖锐的道德批判。我们不能忽视这个概念的多层次性，我们应该避免对它作出片面的评价。

毫无疑问，异化劳动，从而对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的最初尝试，在《手稿》中占居中心地位。但是，不能忘记，与此相联系，马克思提出了关于异化劳动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意义的问题。即使他还不能探讨异化劳动以及私有财产的起源的问题，但是他发挥了一个有成效的思想，即认为异化是人类发展中的一个必然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会创造出使一切个人能够为了他们的全面发展而占有社会财富的前提。显然，马克思在他进行经济研究的过程中通过揭示物质的对象性的劳动的作用，成功地揭开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这个观念的合理内核。但是，这样一来他所想到的并不是一些大的历史阶段即原始社会——阶级社会——共产主义，本来他当时还不可能把这些阶段加以区分，他所想到的是资本主义生产阶段及其对人类进一步发展的历史意义。换句话说，在《手稿》中并没有把异化概念运用于整个人类历史。异化始终是同异化劳动相联系的，而异化劳动说明的始终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特点。

因此，在《手稿》中，异化对马克思来说是一个中心范畴，这个范畴具有下列几个方面：

一、马克思用这个范畴来说明人类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在于，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与此相联系的社会分工，劳动的产品从生产者手中被夺走，并且作为异己的力量、作为资本压迫生产者。社会过程的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颠倒了。

二、马克思用“异化劳动”概念来概括资本对雇佣工人的剥削，并且大体上把这种东西理解为社会关系，从而他就非常接近于发现生产关系了。

三、异化概念被马克思用来谴责资本主义剥削以及整个资本

主义社会的非人道性。在这里关节点是人，人被理解为集体的存在物，对这种存在物来说，劳动是生活的第一需要。“真正的”人的社会的概念是与此相联系的，那种社会被理解为人的共同体，在那里一切人彼此为了对方而生产，并且通过这种相互间的生产来满足他们的需要。异化劳动在雇佣工人方面造成了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的颠倒，因为对他说来劳动成为某种外在的、异己的、他要逃避的东西，在劳动中，他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在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商品生产者方面，异化劳动（作为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造成了个人同他的集体的本质相异化，这表现为利己主义和人与人之间的残酷无情的竞争，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直接关系以物即货币作为中介，在这种物中，人的社会性外化了，同人相异化了。借助于货币的力量，一切都可以买到，甚至荣誉和爱情也是如此，一切人的价值都被头足倒置了。当无产者由于异化劳动而感到自己被非人化和备受屈辱时，在资产阶级方面却恰好相反，它在这种人的异化中感到幸福，自己得到确证。对于马克思来说，异化的主体从来不是人类的个体，对他来说，异化是一种由阶级的活动所造成的社会过程，异化的主体决不是单个的个人，虽然个人也遭到严重的异化。换句话说，对于马克思来说，分析异化劳动的出发点不是人类的个体，而是雇佣工人阶级。即使他谈到雇佣工人，他所指的也始终是整个阶级。从马克思在《手稿》中的言论无论如何是推引不出主观主义的、存在主义的异化理论来的。

第二，随着《德意志意识形态》，异化概念失去了它在马克思思想中的中心地位。它不再象以前那样是一个范畴了。在制定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共同克服了关于人及其本质的相对非历史的观点，并且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社会关系的具体历史的总和。从而，《手稿》中的对劳动的抽象评价和“社会的”人同“非社会的”人之间的区分以及关于人同他的本质相异化的抽象词句也消失了。从此以后，对资本主义剥削及其非人化的影响的道义批判再也不是从人的“真正本质”的立场出发，而是从工人

阶级和一切受资本压迫和剥削的人的立场出发所产生的了。

前面所概述的、同关于人的本质和非历史观点相联系的异化概念的第三个方面也随着《德意志意识形态》而被克服了。异化概念的其他两个方面则在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些特定的作了固定描述的概念中被扬弃了或者汇入这些概念中去了。经过进一步的经济研究和历史研究，马克思从他用来大体上概括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关系的异化劳动过渡到生产关系范畴。异化劳动在意识中的主观反映即异化的意识，进入了意识形态概念。社会关系对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独立化事实，以前马克思也同样是用异化概念来概括的，现在则用自然形成这个概念来说明，并且是从分工和私有制中推引出来的。但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一点也是不应该忽视的，就是这种自然形成是同资本主义的社会分工的产生相联系的，而同所有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无关。

因此，“异化”概念随着《德意志意识形态》而失去了它原来的中心地位，在那部著作中，制定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工作达到了相对完成的阶段。作为这个过程继续，马克思又进一步研究政治经济学。在《大纲》中，马克思仍然是在分析流通领域的现象时运用了异化概念，与此相联系又用商品和货币拜物教概念来取代它。

第三，但是，“异化”这个术语并没有完全溶化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的其他概念中，它也决没有从马克思的词汇表中消失。在这里应该完全而充分地强调指出会议报告中所阐述的观点。马克思也继续使用异化概念，但是后来从《德意志意识形态》起就不再把它作为范畴来使用，而是为了把握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主体和客体的颠倒的一定方面而使用它。这里存在着从《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的辩证的连续性。

在《手稿》中，马克思运用他新获得的关于人类主体在其劳动中对象化的有成效的哲学观点，从而也运用人的自我产生来分析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在这里，他得出了一个论断，认为不仅工人劳动的产品，而且工人的劳动本身都同工人相异化。而且这仍然

同关于人的“真正本质”的非历史观点，因而也同对资本主义的道德化批判相联系。但是，人们不应该忽视，在对异化劳动的这种分析中包含着一些十分中肯的、正确的论断，因此，即使在后来马克思也没有把这些论断同人的“真正本质”一起取消掉。只有由此而产生的抽象评价是过分的。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不再谈论“人的本质的异化”，并且同恩格斯一起共同嘲笑这个术语，但是由此不能得出结论说，他已经放弃了异化概念本身。后来他仍然使用这个概念，以便概括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对工人主观上和客观上的影响并使这种影响变得明显。工人作为生产过程的真正主体，作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同他的这种主体作用相异化，因为生产条件不属于工人，而属于资本家。因此，变成了资本的劳动条件和工人自己的产品作为异己的力量统治并且奴役工人，也使他的劳动失去精神力量、内容结果他在劳动中感到不自在，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

为了指出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这种非人化的影响，马克思在以后也继续使用异化概念。这一点在《雇佣劳动与资本》（在那里有些段落使人直接想起《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分析）中，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最全面地是在《资本论》本身中表现得非常清楚。因此，即使在今天，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中仍然在这种意义上使用异化概念是完全合法的。但是，这样一来这个概念是不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个范畴呢？

从简要的理论史概述中可以得出结论说，异化概念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地位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它失去了原来作为一个指导认识的范畴的作用，因此可以完全正当地得出结论说，马克思并不把它看作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根本概念。

正因为马克思在制定唯物主义历史观、政治经济学以及科学共产主义的过程中用比多层次的和模棱两可的异化概念更确切得多地概括当时事实的其他概念来代替异化概念，所以，也没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应该把这个概念重新引进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范

畴体系。作为对社会过程进行理论分析的工具，它显然是不再适用了，因为连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不再使用它来达到这个目的了。

至于为了强调指出和清楚地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特定过程的核心是主体和客体的颠倒，各个阶级、级层以及个人被他们自己的社会行为的结果所统治和压迫，在今天仍然使用“异化”这个术语是否合法的问题，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

因为“异化”概念只是揭露了同**唯一**的一个社会形态即资本主义相联系的事实，因为异化随着这个形态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被革命地克服而消失，因而无论如何不可能运用于社会主义，所以，这个概念也不可能成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个**范畴**，因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范畴至少对于多种社会形态都是有效的，而不是只适用于一个**唯一**的社会形态的。为了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概念体系的明确性和纯洁性，不应该把被马克思作为**范畴**已经克服的“异化”概念重新提高到这个级别上来。我认为，从理论史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倒退。

为了避免误解，我想强调指出，这样一来决不是要把对这个术语的运用当作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从理论和宣传著作中排除出去。这里涉及的只是要否定关于这个概念是否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基本理论概念的问题。联系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具体范畴如自发性、自然形成、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的一些范畴如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以及为了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做的那样，说明生产者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地位，使用异化概念是完全合法的。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 作为人的生命表现的劳动和 作为异化劳动的劳动

[民主德国]赫·东凯^①

《经济学哲学手稿》产生于马克思批判分析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早期阶段。这时，马克思对各种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对这些理论的世界观的基本立场作了最初的概述。

马克思断定，英国的国民经济学把劳动提高到作为它的唯一原则的地位，但是它掩盖“劳动本质的异化”^②。它把私有财产看作一个事实，但是它没有说明这个事实。它总是把资本家的利益当作最后的根据。^③因此，它也就想不到要考察“工人（即劳动）同产品的直接关系”。^④国民经济学是“在承认人、人的独立性、自我活动等等的假象下”开始它的历史发展进程的。它越是明确而彻底地发挥关于“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本质”的论点，它就越清楚地证明自己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⑤

马克思认识到，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的矛盾性不仅表现了它的理论上的缺陷，而且也表现了资本主义现实所固有的矛盾。他企图通过把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归入历史过程并且把它作为人的自我产生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作为具有异化形式的劳动来加以分析的办法，更加确切地把握这个矛盾。

从《手稿》的行文不能直接看出1844年进行的这种分析的理论

① 赫·东凯是哲学学士，现在民主德国柏林洪堡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教研室工作。——译者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3页。

③ 见上书，第89页。

④ 同上书，第93页。

⑤ 同上书，第113页。

内容。但是，如果把这一手稿归入马克思理论的形成过程，是可以推论出这种理论内容来的。下面首先应探讨的问题是，为了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性质，马克思在这时使用的是什么样的理论工具。

大家知道，彻底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决定性的基本特征只是在后来才得到阐述。过了还不到两年，马克思通过研究历史在深入探索社会生活结构方面就已经大大地向前迈进，以致他已经以概念的形式在理论上制定了区分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标准。这特别牵涉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阐述的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联系的规定。当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试图分析社会生产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矛盾性时，这个概念工具还没有出现。在这里，他所依据的仍然是可以看作旨在批判费尔巴哈而对黑格尔的哲学辩证法进行清理的临时结果的那种哲学立场。这种立场表现了在批判地克服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方面到那时为止所达到的水平。

跟费尔巴哈不同，马克思通过对辩证法的抽象而思辨的形式的批判想要达到的目的是，使辩证法的积极因素即辩证方法摆脱唯心主义的外壳。最初，他着手修正理论上的出发点，正如赫尔曼·莱伊中肯地指出的那样，^⑥用贯串一切的对象性去反对黑格尔观念的精神性。黑格尔把能动的人同自然界分离开来，从而把人看作非对象性的、抽象的、思维着的存在物。同黑格尔相反，马克思的出发点是，人是靠自然界为生的。“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⑦对他说来，人是一种自然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就是说，人是具有自然的本质力量的、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种自然的本质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存在于人身上。而且人在自身之外有自然界，这个自然界是为了确证他的本质力量的对象，是他的生命表现的对象。这样说来，自然界是人的活动

⑥ 见赫·莱伊，《论〈精神现象学〉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行为理论》，《论当代对黑格尔的理解》1972年柏林版第273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5页。

的前提，而不仅仅是其结果。^⑧这种理论上的出发点是直接同黑格尔的观点相对立的，它是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唯物主义地倒转过来的“序幕”。

马克思不是只限于用费尔巴哈关于人同自然的统一的同样抽象的命题去反对黑格尔关于人的抽象概念。他想具体地理解这种统一，即把它理解为能动的关系，并且以人的实践的生活过程作为研究目标，在这种实践的生活过程中人实现着他同自然的统一。从而就基本上制定了以后理论工作的方向。

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从两个方面分析了人的实践的生活过程：

第一、从纯粹形式的可能性的角度出发，这里涉及的是一般人的生命活动的特点；

第二、从现实的角度出发，这里涉及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下这种生命活动的历史规定性。

马克思就人和动物同自然界的能动关系把人和动物加以比较，并且得出了关于人的生命活动的特点的值得注意的观点。这些观点的核心包含如下的看法：

人和动物一样靠自然界生活。他们两者只有在同自然界不断进行物质交换的过程中才能维持其肉体的生存。但是，把人同动物区分开来的是他实现同自然界的联系方式。动物按其所属的物种的尺度，通过对一定的有限的领域的直接占有来实现它同自然界的物质交换。这始终是一种片面的占有。相反，人对自然对象的占有则表现为一个间接的过程；因为这种占有是作为劳动过程发生的。正因为人必须加工、按自己的需要改变自然对象，所以他同自然界的联系既不限于一定的地区，也不同一定范围相联系。这种关系可能发展成为普遍性，以致自然界从全面的意义上说会成为人的生活的一个部分。人的生命活动的特点就在于，人

^⑧ 参看上书，第167—168页。

不仅生产出他自己，而且除此以外还再生产出整个自然界^⑨。随着人生产出一个对象性的世界，而这个对象性世界又取代原来的自然的外部世界，人也形成了自己的主观力量，发展了自己的能力和需要，并且把他的生命表现的多样性作为他自己的普遍性生产出来。这样，人同自然界的统一就表现为一个历史过程，表现为人由他的劳动所产生，表现为自然界为人而生成。^⑩

这些关于人的生命活动的普遍性质的观点从方法的角度来看也是值得重视的。它们为对人的本质的传统哲学问题作出唯物主义的回答开辟了道路。从此以后，在人同自然界的现实的实践的联系之外，在人的物质生活的生产之外对人的本质的任何探索都是多余的。

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马克思的一个发现，即否定性的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是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这种辩证法对于历史运动，即被黑格尔看作人的自我产生的历史过程的那种运动来说，是一种抽象的、思辨的表现。因此，在这个时候，因为马克思还没有制定他自己的概念工具，他利用黑格尔的一般思维形式来概括自我产生的运动——把对象化理解为外化和异化，把外化和异化的扬弃理解为占有，这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但是，这种思维形式在马克思那里从一开始就包含着发生了本质变化的内容。这是从对理论上的出发点的修正所得出来的结论。

马克思认识到，黑格尔关于对象化作为外化和异化的观点是同他的唯心主义见解相联系的。既然人被看作仅仅是自我意识——因为只有精神才被认为是人的真正本质——，那么对象性本身就不属于人的本质，它对于人的本质是一种异己的东西。于是，人的本质赖于对象化的行动也不被看作人的本质的表现、实现，而被看作自我外化和自我异化。因为这不是自我意识的行动，这不是根据作为抽象思维的他的本质，而是与此相反而设定为对

^⑨ 参看上书，第96—97页。

^⑩ 参看上书，第94—97页。

象的。自我意识作为对象是在自身之外，是同他的本质相异化的。对象是他的异化的、对象性的本质。

与黑格尔相反，马克思把劳动看作是人的现实的对象化：“对象性的存在物客观地活动着”，而“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①

当马克思把劳动的普遍本性看作人的生命表现时，异化这个环节是不包括在内的。当他说明劳动在私有制条件下的特殊性时，这是另一种情况。

在黑格尔关于自我产生过程的理论结构中，对象化的行动同时也被看作是它自己的对立面，被看作是外化和异化的行动。因此，马克思能够利用这种思维形式来表现劳动的对象性的性质，表现劳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特殊的社会规定性。后来，这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看法被发展的经济理论所证实。对基本生产关系的阐述提供了理论上的证据，证明劳动确实是同劳动实现的对象性条件相对立的，因为这些条件是作为资本同劳动相对立的。

^① 同上书，第167页。

从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角度 谈对马克思异化概念的一些看法

〔民主德国〕巴·罗特^①

有两个理由使我认为，从哲学史的角度来探讨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所阐述的异化问题具有现实的意义：

第一，关于对象化和异化的抽象同一性的思想始终是资产阶级历史观的理论基石之一，根据这种历史观，对异化的扬弃也总是使人产生关于扬弃对象性的东西的思想。相反，承认社会分工、工业化、技术工艺进步具有促进文明发展的作用，被认为是同异化的所谓不可消除性相联系的。这样把异化归结为生产力进步本身，异化也就成为与一切社会发展相伴随的现象，成为人类在其自身进步中的属性了。^②因此，资产阶级哲学和哲学修正主义对异化概念的滥用，应该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日益严重的破坏性影响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从哲学史的角度探讨马克思对异化概念和状态的批判的**第二个**理由在于，这样一来也可能首先理解马克思在创立新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社会观时所采用的方法，对于这种历史观和社会观的科学内容始终应该同它们的实践有效性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这两者——这一点在会议报告中已经说得很清楚——都是以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对现实社会过程的分析的统一，以及理论发展、对资本主义关系的批判与其理论反思的统一为基础的。无论是在对资产阶级观点和修正主义观点的分析批判中，还是在创立科学的历

^① 巴·罗特为哲学博士，现在民主德国柏林洪堡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研室工作。——译者注

^② 尽管始终没有把意识形态背景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但是要弄清这种背景并不困难，根据这种观点，社会主义就面临一种选择：放弃科学技术进步或者保留异化。

史观的时候，中心问题都是要有彻底唯物主义的方法。无论是从理论史角度还是从方法论角度来看，研究马克思在1843年的读书笔记中开始而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继续加以发展的他对异化的理解和批判，都能够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作出贡献。

大家知道，从1841年起，异化概念越来越成为马克思著作的中心。这个时候，马克思正在实现从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向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转变。^③使马克思主义社会观根本不同于其他社会观的革命实践同革命理论的联系，在理解马克思对异化的分析时也就成了重要的方法论前提。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哲学和经济学的批判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为对他那个时代的新的自我理解而斗争。不应该把他对以前的社会观的批判同他对现实社会过程的越来越深入的探索和活跃的政治行动分离开来。

因此，马克思把异化看作社会现象，看作一个概念。因为他把异化理解为应该加以扬弃的社会状态，所以他同时也批判了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后者虽然描绘了这种状态，但是对这种状态产生的原因及其克服的可能性却不闻不问。

马克思在申明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的**前提如私有财产的存在，劳动、资本、土地的互相分离，工资、资本利润、地租的互相分离，分工，竞争，交换价值概念以及它的语言和规律都被采用以后，断定国民经济学发生了一个决定性的错误：“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但是，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又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也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④马克思把国民经济学同现实加以对照，指出国民经济学没有说明私有财产的必然性和历史形成过程，而是仅仅局限于描述资本主义运动的“机制”。他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没有能力认清私有财产和异化的

^③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2—467页。

^④ 同上书，第42卷第89页。

运动中本质的东西、合乎规律的东西、必然会发展的联系，并且把这种批判同下述结论联系起来：“现在我们必须探讨被描述了了的财产的物质运动的本质。”^⑤

因此，从物质关系先于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和思想的关系出发的唯物主义立场，是批判异化的社会状态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异化观的前提。在这以前的批判黑格尔国家观和法律观的著作中，这一步骤已经完成了。但是，把这种状态理解为历史地形成的、因此也可以历史地加以克服的社会现象，这也是前提。马克思再也不是以黑格尔的思辨形式来理解关于异化状态形成、发展和消亡的思想，异化被定义为物质的、社会经济的过程，它的本质在于人类劳动的一个具体历史的（因而是可以克服的）发展阶段。^⑥

继费尔巴哈批判唯心主义及其宗教的自我异化之后，马克思恰好发展了那种关于必须研究（资本主义）财产的物质运动的本质的思想。这使他把对象化和异化区别开来并得出关于异化本质的规定：“人的异化，一般地说人同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同其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因而，在异化劳动的条件下，每个人都按照他本身作为工人所处的那种关系和尺度来观察他人。”^⑦

“异化”作为在马克思以前的历史哲学中所创立，并且为了描绘资本主义生产的状态和机制而由资产阶级经济学所采用的一个范畴，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构成一个重要的认识阶段，越过这个阶段，马克思终于由辩证唯心主义的和人本主义的或者说机械唯物

⑤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补卷第1册第511页注1。

⑥ 这里吸收了黑格尔关于劳动是人自我产生的过程的思想，但是已经是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吸收的，对于唯物主义来说，既不能把人的自然的定在（费尔巴哈）同他的物质的、对象性的活动，他对自然界的生产性占有分离开来，也不能把这种定在同在普遍占有过程中他同其他人的关系分离开来。在早期著作中——尽管有时在术语上还仿照费尔巴哈——马克思就已经把人看作既是社会进步的主要生产力，又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8页。

主义的社会观达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马克思从关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具体历史观点出发，从**支持工人的立场**出发研究了社会、类生活的现实的物质运动，得出了如下一些认识：

第一、“异化”概念描绘的不完全是一个既有的社会状态，而是劳动的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人同自身和自然界的任何自我异化，都表现在他使自身和自然界跟另一个与他不同的人发生的关系上”^⑧。工人在他的劳动产品中的对象化^⑨表现为这种产品的异化，表现为他的产品，他的活动，从而他的类本质的丧失。马克思通过把这种“事实”归结为一定的社会关系即工人同非工人的一定的关系，终于打破了使国民经济学受骗的关于异化劳动不可消除、永恒不灭的假象。如果把异化归结为它的政治经济学的内容，那么它是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形式规定性，这种规定性起源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在资本的条件下经历了其全面的发展。^⑩

第二、虽然(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是必须把异化的社会现象归因于它的那种根本的社会关系，但是，这不是异化的“最后的”原因。因为表现为社会的推动因素的私有制本身无非是异化劳动的产物。这表现为：“与其说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还不如说它是外化劳动的结果……后来，这种关系就变为相互

⑧ 同上书，第99页(黑体是引者标的)。

⑨ “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稳固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因而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这对于马克思说来是不需要进一步说明的事实(见上书，第167页)。不应该把作为一切社会进步的基础的生产力进步同对象化、对象性的实践活动分离开来。因此，马克思后来从劳动生产力的角度也使用了“对象化”这个术语。

⑩ 由于对异化进行了政治经济学的分析，马克思接近于得出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的定义，后来这一定义在“生产关系”这个概念中具体化了(见上书，第98—100页)。

作用的关系。”^① 马克思用这个论断彻底地研究了历史过程的物质动力——社会的劳动生产力,并且指出,私有财产归根到底也是来源于这种动力的。但是,在这里他同时也接受了异化(雇佣)劳动和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辩证的相互制约性。

马克思在论战中批驳了国民经济学及其关于劳动是社会财富的源泉的非历史的因而是抽象的观点,他说:“国民经济学虽然从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这一点出发,但是它没有给劳动提供任何东西,而是给私有财产提供了一切。”^② 因此,国民经济学只是表述了异化劳动的规律、抽象公式,它既没有说明扬弃异化状态的原因,也没有能够认识扬弃异化状态的规律和动力。

马克思从批判异化劳动和以前对“异化”概念的各种看法中引伸出来的第三个结论是,异化劳动的扬弃,从而私有财产的扬弃,“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表现出来的”,而“整个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这里面了。^③

历史哲学和国民经济学把物质运动描述为“异化”,而马克思却从对物质运动的本质的彻底唯物主义分析中得出一种认识,即物质运动在社会经济方面是由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矛盾所决定的,而且工人的政治解放是扬弃异化的决定性的历史行动。^④

^① 同上书,第100页。马克思在后面的行文中提到了异化劳动产生并不断再生产出私有财产而又依赖于私有财产这个方面。正是对立面相互制约性的这个方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社会观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因为马克思在紧接着进行的分析现实的物质运动及其结构、规律性、趋势和动力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恰好转而探讨根本的矛盾关系的再生产,并且要求揭示这一再生产的客观辩证法,唯物主义历史观就成为变革性实践的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还可参看《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见上书,第49卷第1、33页。)

^② 同上书,第42卷第100页。

^③ 同上书,第101页。

^④ 因此,异化的理论或者范畴仍然停留在前科学的历史哲学的领域中,借助于这一理论,马克思迈出了从辩证唯心主义历史观走向彻底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一步伐。这一理论在哲学史上的意义以及它对精神史上把握资本主义现象的意义仍然是无可置疑的。但是,不能把它看作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因为它虽然在舆论史上导致了对物质的历史运动的本质的认识,不过,这种认识只

根据这种理论认识，应该把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所持的观点的方法论加以考察：马克思从批判唯心主义历史哲学出发，从把社会的观念动力归结为它的物质的、最终是经济的原因这一点出发，终于认识了一种社会力量，这种社会力量在经济上的生存条件是客观地、合乎规律地同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规律相一致的，这种生存条件迫使它从异化的、奴役性的社会关系下解放出来。但是，这样一来，尽管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术语还尚未成熟，不过其中已经为它所包含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社会观提供了出发点，这种历史观和社会观的影响力是从对社会发展规律性的合理的、唯物主义的分析，科学的革命理论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统一中产生出来的。

有在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上才能得出来。一种具有科学基础的历史观和社会观的内容，在于对历史过程的存在和发展条件及其规律性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并且为历史主体的行动得出结论来，这个事实在理论史上仍然是重要的。相反，我们对于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异化观点的批判所作的分析证明，一种停留于现象的对历史的解释既不能科学地、准确地把握历史的进程，也不可能正确地提出关于扬弃异化的看法。

列宁论异化的扬弃

〔苏〕弗·赫德勒^①

И·С·纳尔斯基指出,列宁使用过异化概念,这个概念既包括异化劳动,也包括由此派生出来的一切表现形式。^②这个“一般的异化概念”出现在列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一书摘要》中。^③此外,纳尔斯基指出,列宁在撰写《国家与革命》时使用了“异化”概念。^④在这个地方就应该作一点补充,列宁在对《神圣家族》一书的摘要中摘录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异化的批判和以此为基础的对建立新的国民经济学体系的必要性的论证(这种批判和论证是从《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接受下来,写入《神圣家族》一书中去的),而且在1895年以后出版的所有理论著作中都采用了。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文中,列宁强调指出,《神圣家族》包含着革命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基础和主要思想,它是“为了现实的人,即为了受统治阶级和国家践踏的工人”而写的。^⑤

其次,异化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扬弃的问题,在对彼·司徒卢威的论战中也起过作用。在尼·布哈林撰写《司徒卢威先生的魔术》一文时,列宁曾经向布哈林提过意见。在那篇文章中,布哈林还反驳了司徒卢威认为商品拜物教是一切经济形式所固有的论断。布哈林在《食利者的政治经济学》和《过渡时期的经济》(对这本书,列宁作了详细的评注)这两本书中进一步系统地对司徒卢威

① 弗·赫德勒是哲学学士,现在苏联苏共中央社会科学学院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教研室工作。——译者注

② 见И·С·纳尔斯基:《异化和劳动》1983年莫斯科版第109页。

③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8卷第9—11、12—13、25、35页。

④ 见И·С·纳尔斯基:《异化和劳动》第118页。

⑤ 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90页。

进行了论战。^⑥

从列宁知道并且使用过“异化”概念这个事实出发，应该考察一下，在说明哪些事实时他使用了这个概念，是否《马克思主义和国家》中所有围绕这个概念而作的说明，在《国家与革命》这部著作中都加以采用了。其次，应该研究一下，这些说明在以后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因此，关于俄共（布）党纲的争论、计划中要撰写的后面一篇文章《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的准备著作和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注，是我们注意的中心。

在《马克思主义和国家》中，在一段简短的导言之后，列宁紧接着就从恩格斯为他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四版所写的序言中引用了一段话，^⑦ 其中把资产阶级国家称为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⑧ 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对这段引文作了如下的解释：“既然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既然它是站在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那么很明显，被压迫阶级要求得解放，不仅非进行暴力革命不可，而且非消灭统治阶级所建立的、体现这种‘异化’的国家政权机构不可。”^⑨

列宁摘录了这个概念并且致力于分析这种政权机构的职能。在《马克思主义和国家》中，他以“武装的人、监狱和各种强制机关”为例子考察了这一点，而在《国家与革命》的《特殊的武装队伍，监狱等等》这一节中又继续进行这种考察。^⑩ 列宁同西欧和俄国的庸人们进行了论战，遵照恩格斯的观点，他把“日益背离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变成一个大地主、交易所经纪人和大工业家的集团来剥

⑥ 尼·布哈林的著作《司徒卢威先生的魔术》和《食利者的政治经济学》，载于《布哈林文选》1983年人民出版社版下册，另一著作《过渡时期的经济》也有1981年三联书店出版的中译本，书名译为《过渡时期经济学》。——译者注

⑦ 这一句话与事实有出入，应改为：“在《国家与革命》中，在一段简短的导言之后，列宁紧接着就从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六版中引用了一段话”。——译者注为

⑧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193—194页。

⑨ 同上书，第7页。

⑩ 见上书，第194、7页。

削人民”的资产阶级国家^①同无产阶级专政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对立起来。在作了这些论述之后，紧接着列宁又研究了国家消亡的问题。在同反权威主义的左派和考茨基分子进行论战时，他感兴趣的首先是公共权力怎样失去其政治性质的问题。^②因此，“异化”概念已经不再使用，异化的表现形式为相应的概念所取代。

顺便指出，《马克思主义和国家》和《国家与革命》中的观点来源于列宁在他对黑格尔《逻辑学》一书的摘要中作为“哲学的任务”^③着重加以强调的提法。列宁从黑格尔《小逻辑》以《度》为标题的那一节中摘录了论述质和量的关系、渐进性的中断和飞跃、规律和度的几乎所有段落。

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列宁就研究革命理论在上述问题上的转变。他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要求把包括过渡形式在内的从旧社会诞生新社会的过程“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来研究。^④同时，他从一开始就不得不反对无政府主义者所宣扬的立即废除国家的论点。因此，可以指出在《马克思主义和国家》中提到的同布哈林的论战：“但是，反权威主义者却要求在那些产生政治国家的社会关系废除以前，一举把政治国家……废除。”^⑤《马克思主义和国家》中的边注“不清楚”^⑥在《国家与革命》中变成了如下的看法：“在这些论述中涉及了在考察国家消亡时期的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时应该考察的问题。那就是关于社会职能由政治职能变为简单管理职能的问题和关于‘政治国家’的问题。后面这个说法（它特别容易引起误会）指出了国家消亡有一个过程：正在

① 见上书，第171、22—24页。

② 见上书，第170、21—22页。

③ 同上书，中文第1版第38卷第119页。

④ 见上书，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5页。

⑤ 同上书，第59、200—201页。

⑥ 同上书，第201页。

消亡的国家在它消亡的一定阶段，可以叫作非政治国家。”^① 这些论述几乎逐字逐句同《青年国际》那篇短评^②相一致。布哈林在他的文章《帝国主义强盗国家》中^③把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说成是社会主义者的观点，列宁在他同布哈林的通信中已经指出这种立场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因而加以拒绝。^④

在《国家与革命》第二版出版的时候，即在1919年，新的理论问题提上了日程。新版增加了《1852年马克思对问题的提法》这一节。中心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民主制、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新形式。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列宁详细地探讨了这个问题。列宁提出了“积极地建设共产主义、创造新的经济关系、建立新社会这一更重要的任务”^⑤。从此以后，建立新的纪律，创造为此所需要的物质条件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生活方式就成为列宁的理论著作的中心。

1919年10月30日，列宁就《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这个题目的最重要的思想作了简短的、提要式的阐述。原计划要写的续篇没有写成，但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题目有五个草稿。^⑥ 这些草稿都是在讨论党的纲领的时候产生的；读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的经济》是同写最后一个草稿相关联的。

在指出俄国社会经济的五种基本形式^⑦以后，紧接着列宁写道：“说劳动在俄国已按共产主义原则联合起来了，第一是因为生产资料私有制已经废除；第二是因为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在国有土地上和国营企业中组织着大生产，把劳动力分配给

① 同上书，第59页。

② 这篇文章见上书中文第1版第23卷第163页及以下各页。

③ 见《布哈林文选》下册第245—250页。

④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5卷第217—218页。

⑤ 《列宁选集》第4卷第9页。

⑥ 见《列宁文稿》第3卷第178—186页。

⑦ 这种说法有误，列宁指出当时俄国社会经济有三种基本形式，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85页。——译者注

不同的经济部门和企业,把属于国家的大量消费品分配给劳动者。我们是说俄国共产主义的‘最初步骤’(1919年3月所通过的我党党纲也是这样说的),因为这些条件在我国还只实现了一部分,换句话说,这些条件的实现还处在开始的阶段。”^⑳他认为,必须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解为破坏资产阶级民主和建立无产阶级民主。“党的任务就是坚持不懈地工作,使这种最高类型的民主制在实践中到处都得以完全实现,但是只有当群众的文化水平、组织程度和自我活动得到不断地提高的时候,这种民主制才能够正确地发挥其功能。”^㉑

党纲中包含的这个要求是在草稿中加以论证的那些论点的基础。当列宁谈到这些已经讨论清楚的问题时,他请人们参阅《国家与革命》;对国家的必然性的偏见已经过时了。现在注意的中心是一个新问题:新的民主制,机构的选定的发展不是“退一步”吗?^㉒

机构应该为群众的总的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的有计划的和自觉的形成服务。对群众的系统教育取代了正在瓦解的资本主义劳动组织。棍棒的纪律必须让位于自觉的纪律。列宁针对资产阶级专家、富农和工厂主谈到了资产阶级的观点和习惯。围绕经济建设的核心问题即建立新的劳动纪律而进行的斗争的结果,是必须对社会生活进行全面的改造。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按工效的分配继续存在并且起作用。列宁在《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中特别着重指出了这些事实。^㉓威纳尔·施奈德写道,当时布尔什维克所面临的任务是要检验一下,“上述社会现象如商品货币关系和阶级是不是旧社会的痕迹,因而对新的社会形态来说外表上是不是异己的,或者说,它们是否会使共产主义形态的一般

^⑳ 《列宁选集》第4卷第85—86页。

^㉑ 《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纲领》,见《工人运动史论丛》1972年德文版第6期第943页。

^㉒ 见《列宁文稿》第3卷第186页。

^㉓ 见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197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3,11—12,52—53页。

规律得到实现。”^②

列宁在他的草稿中用新制度的一些成就如苏维埃、民族问题和妇女问题的解决以及反宗教宣传去反对过时的行为方式和现象如议会、欺骗、贿赂、习惯、官僚习气和投机活动。在宣传党纲时，对纲领中所包含的在社会救济、人民健康和劳动保护方面的措施的解释占了很大的篇幅。

在对《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中，由于摘录了有关阶级的发展、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存在和社会化过程的发展等题目的论述，列宁探讨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国际资本对建设的破坏活动；二、在小商品生产的基础上资本主义能够从内部再产生出来或保存下来的可能性；三、从对经济进行的组织改造中即从社会主义本身的发展中产生出来的问题。列宁认为，阶级斗争在俄国的一般倾向的特点，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趋势和农民的商品资本主义趋势之间的斗争^③；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这一著作中，列宁把与此相联系的划分称为“社会主义的**全部实质**”。^④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作为社会主义社会中重新产生异化的前提的那种社会关系，不会再生产出来。异化只能以比较明显或比较不明显的程度继续发生作用。在列宁对布哈林上述那本书的《过渡时期“超经济的”强制》一章的评注中和在克拉拉·蔡特金的——同列宁商量过的——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景》中，可以看到对于群众在苏维埃政权最初年代中的心理变化的有意思的提示。从中可以看出列宁是怎样理解俄国无产阶级由“自在的阶级”发展成为“自为的阶级”的，以及他是怎样确定共产主义的人的形成道路的。

^② 威·施奈德：《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简史》1982年柏林版第226页。

^③ 见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第24、26—27、44—45页。

^④ 《列宁选集》第1卷第90页。

布哈林探讨了俄国无产阶级采取敌对态度的九种集团^①；他以对知识分子采取的强制措施为例子证明，旧的心理状态怎样消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怎样不可能再生产出来，而新的社会关系又怎样形成。对于这种发展，不仅应该以同盟者为例子，而且也应以无产阶级本身为例子来加以研究。布哈林说明了无产阶级的八个下层接近先锋队的过程。^②对此，列宁在页边上批注说：“非常好”、“对”。在自己队伍中实行的纪律是同阶级的利益相一致的。“它不是靠别的力量规定的，而是表现了每一个人都必须遵守的全体的集体意志。”^③

克拉拉·蔡特金抓住这一思想，在她于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解释说：“即使在过渡时期结束的时候，即使在我们已经有了纯粹共产主义的时候，社会在其经济中也将生产剩余价值，也必须为其更高的经济和文化发展而进行积累。这会产生什么结果呢？工人国家有些地方可能暂时同单个工人和工人团体的要求和利益发生冲突，对于单个工人和工人团体来说，工人国家应该代表作为阶级的整个无产阶级的现在和将来的利益。不言而喻，这种冲突必须不是根据无产阶级中的单个人、单个团体、单个经济部门的暂时利益、眼前利益来决定。不，这些冲突迟早都必须根据作为阶级、作为整体的无产阶级的利益来决定。”^④

（吴达琮 屏羽译）

① 见尼·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1981年三联书店版第53—55、124—127页，也可见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第52—54页。

② 见尼·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第124—125页，也可见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第55上—56页。

③ 尼·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第125页。

④ 克·蔡特金：《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景》，见她的《保卫苏维埃政权。论文、讲演和书信集（1917—1933年）》1977年柏林版第287页。

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的形成

(《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研究)

张 钟 朴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资本的积累过程》是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论述了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资本积累对工人阶级命运的影响以及无产阶级贫困化等问题。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这一理论可以说在1857—1858年手稿中已经制定了一些要素,在1861—1863年手稿中则第一次系统地形成了。本文打算初步探讨一下在1861—1863年手稿中这一理论是怎样形成的,并顺便把1857—1858年手稿中制定的一些要素提一下。

(一)1857—1858年手稿中制定了 资本积累理论的某些要素

在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对资本积累问题的研究是结合考察再生产问题进行的。在《资本章》第一篇《资本的生产过程》转入第二篇《资本的流通过程》时,马克思先初步研究了生产出来的商品如何实现的问题。他把社会生产分为五类生产部门,前三类部门生产原料和机器,第四类部门生产剩余产品,第五类部门生产工人必需的生活资料。然后考察这五类部门如何互相交换,才能维持社会的再生产过程正常进行。如果第四类部门生产的剩余价值不是被资本家阶级全部消费掉,而是用一半重新投入生产,那

就是资本积累。接着，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再生产和积累的比例关系，他指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上……产品分割为与原料、机器、必要劳动、剩余劳动相应的各个部分时，以及最后剩余劳动本身分割为一个用于消费的部分和另一个重新变为资本的部分时，都有固定的比例”。^① 马克思这段话中所说的剩余劳动本身除分割为用于消费的部分，还有重新变为资本的部分，就是指资本积累。马克思说，如果没有积累，资本就不可能成为生产的基础，“因为那样资本就会处于停滞状态，就不会有进步的因素”。^②

可见，资本积累就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而如果没有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生产就不能前进。从剩余价值再变成资本来看，即从剩余资本或者说追加资本进入第二次生产过程来看，可以看出几个新特点：（一）当原有的资本第一次出现时，它的前提条件好象是从外部流通中来的。而在这种剩余资本身上，上述假象消失了，现在资本表现为劳动的产品。^③（二）“通过一种奇异的结果，所有权在资本方面就辩证地转化为对他人的产品的权利”^④，这样，商品生产的所有权就转变为对他人劳动的占有权。（三）“生产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结果，首先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本身的，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本身的再生产和新生产。这种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实际上是这个过程的比其物质结果更为重要的结果”。^⑤ 马克思在这里得出的这几条结论，是资本积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马克思在这个手稿中还探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工人状况的影响。在这个手稿的《资本章》第一篇《资本的生产过程》的最后，马克思分析完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以及它们的结合之后，他得出了资本的两种基本趋势。一种是“资本要尽量多地创造劳动的趋势”，另一种是“资本要把必要劳动减少到最低限度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七册第437页。

② 同上书，第139页。

③ 见上书，第150页。

④ 同上书，第455页。

⑤ 同上。

的趋势”。这并不奇怪，因为资本的目的在于榨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这就决定了它一方面要尽量多的剥削工人，另一方面又要把工人的必要劳动减到最低限度。由于这两种趋势，资本就要“既增加劳动人口，又把劳动人口的一部分不断地变成过剩人口，即在资本能够利用他们之前先把他们变成无用的人口”。^⑥

这两种趋势表现出了资本主义人口规律的本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还结合资本的积累过程论述了产业后备军的问题。他指出，通过追加资本的形成和重新投入使用，这两种趋势不断重复，而过剩人口越来越多。由于马克思在这个手稿中区分了生产过程中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马克思就能够证明，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资本的价值构成不断提高，而资本的不变部分比可变部分增长得更快。

依据这种认识，马克思在1857—1858年手稿的《资本章》第二篇中分析和批判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指出马尔萨斯的理论是抄袭和杜撰出来的，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在批判的同时，马克思初步指出了“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有不同的人口增长规律和过剩人口增长规律”。^⑦ 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人口规律同历史上以前的各种生产方式作了对比，指出人口过剩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特有的现象，工人阶级中的一大部分变成产业后备军是资本主义本身造成的，也是资本扩大再生产所必不可少的条件。^⑧ 这些理论要素可以说为在1861—1863年手稿中制定资本积累理论打下初步基础。

(二) 在批判中进一步制定 资本积累理论

马克思在写作1861—1863年手稿的过程中，使自己的资本积

^⑥ 同上书，第378页。

^⑦ 同上书，下册第104页。

^⑧ 见上书，第104—111页。

累理论的一些要素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且使这个理论得到初步系统化。可以说，在1861—1863年手稿中资本积累理论第一次形成了。1861—1863年手稿的写作总的说来可以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从第Ⅰ笔记本至第Ⅴ笔记本，主要是论述货币转化为资本、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当叙述到机器生产时，马克思就转到第二阶段，即剩余价值理论的研究上来。马克思在这个手稿的《剩余价值理论》这一部分（主要是第Ⅵ—XⅤ笔记本）中，通过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的批判，使自己的许多理论，包括资本积累的要素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第三阶段（第XⅤⅠ—XⅩⅢ笔记本）即《剩余价值理论》以后的阶段，资本积累理论才得到系统化。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这一部分手稿中，批判了李嘉图的资本积累理论，在这种批判中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马克思指出，斯密和李嘉图的错误论点就在于他们分析再生产时忽视了不变资本，他们认为资本积累就是收入转化为工资，就是可变资本的积累。这种见解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和片面的，“这样，对整个积累问题就得出了错误的解释”。^⑨马克思详细分析了简单再生产条件下不变资本的补偿问题，进一步又分析了资本积累条件下的扩大再生产问题。在考察剩余价值不断转化为追加资本的时候，马克思指出，人口增长是积累这个不断进行的过程的基础。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再生产发展不平衡，对劳动力的需要也不稳定，因此需要有产业后备军。“为了应付突然情况，资本主义生产已作了准备：它迫使一部分工人人口进行过度劳动，又使另一部分工人人口陷于赤贫或半赤贫状态，作为后备军储备起来”。^⑩

由于李嘉图把总产品只归结为各种收入，即工资、利润和地租，而把不变资本的补偿撇开不谈，他对资本主义积累的分析就犯了一系列错误。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绝不是生产商品，而是生产剩余价值或利润，不是产品，而是剩余产品。这个

^⑨ 同上书，第26卷第2册第537页。

^⑩ 同上书，第545页。

目的是通过加强对工人的剥削来达到的。马克思写道：“资本主义生产的始终不变的目的，是用最小限度的预付资本生产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在这种结果不是靠工人的过度劳动取得的情况下，这是资本的这样一种趋势：力图用尽可能少的花费——节约人力和费用——来生产一定的产品，也就是说，资本有一种节约的趋势。”^①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只不过是生产资料，而不是生产的目的。这显然是1857—1858年手稿的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李嘉图第一次提出了机器排挤工人的猜测，但李嘉图关于这个问题的见解是很片面的。他认为这只是“一时的不便”，被游离出来的资本最终会重新雇用被排挤的工人。马克思指出这种主张是荒唐的。实际上，机器不断地造成相对的过剩人口，造成产业后备军。马克思还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有两种不断交错的趋势：一方面，极力使用尽量少的劳动来生产同样多的或更多的商品，从而生产尽量多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使用的劳动量增加，从而使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增加。“一种趋势把工人抛向街头，造成过剩的人口；另一种趋势又把他们吸收掉，并绝对地扩大雇佣劳动奴隶制”。^②雇佣工人阶级的这种命运，又是和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约翰·巴顿的功劳在于，他第一次指出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并不是随着资本的积累以相同的程度增长，相反，随着资本积累的增进和生产力的发展，转化为工资的那部分资本会相对减少。不过，巴顿只是从流通过程来考察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形式，马克思则指出，这种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对活劳动的关系是从直接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产品中构成工人的基金的那部分越来越小。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对于拉姆赛、舍尔比利埃、琼斯

① 同上书，第625页。

② 同上书，第653页。

这样一些经济学家给予了特别的注意，因为他们多少比李嘉图又前进了一步，他们以历史的态度来解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他们能够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系列对抗性的矛盾。拉姆赛在对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相互关系所作的研究中，得出了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以及再生产规模和资本积累的扩大，工人阶级的状况相对恶化的结论。马克思指出了这个结论的价值，它截然不同于亚当·斯密的观点，因为斯密认为，资本的积累和对劳动需要的增加是一致的。斯密的这种理论正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出发点。马克思在这里指出了资本积累对工人阶级的状况有三方面的影响。首先，“劳动条件作为不属于工人的财产，作为资本的永恒化，使工人作为工人的地位永恒化”。第二，“资本的积累通过使资本家及其同伙的相对财富增多而使工人的状况相对恶化”，通过“使总产品中归结为工资的份额减少的办法使工人的状况恶化”，结果是“使得靠工人的剩余劳动为生的阶级的数量和人数增多”。第三，“由于劳动条件以愈来愈庞大的形式，愈来愈作为社会力量出现在单个工人面前，所以，对工人来说，象过去在小生产中那样，自己占有劳动条件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了”。^⑬显然，马克思在这里论述的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贫困化的理论。

理查·琼斯对资本主义的看法也在很多方面持有历史观点。马克思以他为例写道：“在这里我们看到，政治经济学这门实际科学是怎样结束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被看作仅仅是历史的关系，它们将导致更高级的关系，在那里，那种成为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基础的对抗就会消失”。^⑭

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过程中得出的这些理论要素，为他在本手稿写作的下一阶段以及后来在《资本论》中系统地论述资本积累的理论进一步打下了基础。

^⑬ 同上书，第3册第389页。

^⑭ 同上书，第472—473页。

(三) 资本积累理论的第一次系统性论述

马克思在写到《剩余价值理论》的最后，在1863年1月的第XVⅡ笔记本上，拟定了第一篇《资本的生产过程》的各点计划。这个计划分为以下各点：

- (1) 导言：商品，货币。
- (2) 货币转化为资本。
- (3) 绝对剩余价值。
- (4) 相对剩余价值。
- (5) 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结合。
- (6) 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原始积累。威克菲尔德的殖民学说。
- (7) 生产过程的结果。
- (8) 剩余价值理论。
- (9) 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⑬

这个计划吸收了《剩余价值理论》写作阶段所取得的理论成果。它的前六项已经很接近于现在我们所见到的《资本论》第一卷的结构了。马克思写完《剩余价值理论》之后，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计划往下写的。从第XXⅡ笔记本的第1353页起，马克思开始系统地论述自己的资本积累理论。

马克思从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分析起。他明确指出，剩余价值转化资本的详细条件应当在分析社会资本再生产的部分加以考察，在这里只确定纯形式上的要素。剩余价值要转化为资本，除了某个价值额最初转化为资本所必需的条件以外，不需要任何其他条件。剩余价值的占有者要使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他就必须在市场上一方面找到劳动的客观条件（生产资料等），另一方面找到劳动的主观条件（劳动力）。在这里先假定，象货币转化为资本

^⑬ 见上书，第1册第116页。

时一样，这些条件在市场上都存在。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比例，是由当时的技术条件决定的。假定这些都没有问题，那么就可以进行再生产了。而从生产过程的单纯重复来看，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和货币最初转化为资本时没有什么不同。区别不在于过程本身，过程是相同的，都是货币转化为资本。但是从这种生产过程的单纯重复中已经可以看出资本的一些新特点了：

(1) 资本是由剩余价值转化来的，工人本身的无酬劳动的产品现在成为资本，成为他人的财产而同工人本身相对立。

(2) 所有资本的价值，经过一定的期间之后，都只代表资本化了的剩余价值。因为经过若干年后，资本的原有价值已被资本家吃光了。

(3) 剩余价值最初的形成过程，即不付等价而对他人劳动的占有，现在表现为占有更多剩余价值，即不付等价而占有更多他人劳动的手段。

但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特点并不是简单再生产，而是扩大再生产。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时我们可以看到：(1) 在生产水平已定的情况下，只有或者加强劳动强度，或者延长工作日，才能增加剩余价值，或者说，如果劳动强度和长度已定，那么只有增加雇佣工人人数才能增加剩余价值。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都必须增加资本量的支出，这是绝对剩余价值。(2) 相对剩余价值则要靠发展劳动生产力，通过协作、分工和机器生产来增加，这又要求增加资本量的支出。这种资本量的增加就要靠资本积累，靠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扩大剩余价值的形成条件——剩余劳动，反过来，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或资本积累是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是生产的规模，是被剥削的劳动量的增长的规模，以及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的物质条件的规模”。^⑩

资本积累就是资本生产出资本，也就是资本主义关系以扩大

^⑩ 同上书，第48卷第74页。

的规模创造出资本主义关系。随着资本的增长，导致下列各种结果：

(1)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展到还没有从属于它的那些生产领域；换句话说，资本越来越占领全部生产领域。

(2)资本创造出新的生产领域，也就是说，生产出新的使用价值，使新的生产部门营业。

(3)如果追加资本投在同一生产部门中，由同一些资本家使用，一方面用来发展劳动生产方式，另一方面扩大生产规模，这样，资本的积累就表现为资本积聚，因为同一资本指挥更多的工人和更多的生产资料，而社会财富则以更大的规模联合在同一些人的手中。

(4)马克思还指出了伴随资本积累还发生着资本集中的过程。资本积累是在社会表面的不同点上同时进行的。由于资本积累在各个资本家手中，独立资本的数目就增加起来，这是资本的互相排斥，是资本的分散化。与此同时又发生着资本的相互吸引。马克思当时还没有用“资本集中”这样的术语来概括这种现象，而是把它称为“作为特殊过程的资本积聚”，也就是和本来意义的资本积聚不同的过程，实际上是指“资本集中”。后来，这种资本积聚和集中的理论，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大大发展了。

马克思叙述了资本的各个组成部分随着资本积累会发生变化。他首先依据劳动二重性，论述了旧价值的保存和新价值的创造。不变资本的价值在劳动过程中得到保存，这部分价值再现在产品中并不是因为工人为保存它而进行了什么特殊的劳动，而是因为工人在劳动过程中使用了这些生产条件。由于工人把新劳动加在物化劳动上，并且加进的劳动多于工人的工资所包含的劳动，工人也就同时保存了不变资本的价值，即已物化在劳动生产条件中的价值。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越高，由既定量的工人加工的原料数量也就越多，工人所保存或再现在产品中的不变资本部分的价值也就越大；另一方面，工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取决于一般生产资

料和生产条件的大小或规模。一般地说,不变资本所占比重越大,劳动生产率越高。不变资本作为生产资料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手段,它是全部加入劳动过程,但只是部分地、在较长的时期内逐步地加入价值形成过程。因此,它不是按增加产品总量的同一程度来增加单位产品的价值。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随着资本的积累,不变资本的量 and 它加入价值形成过程的那部分价值之间的差额越来越大。不变资本的总价值完全和自然力如水力、风力等等一样,提供无偿的服务。上述差额越大,提供的这种无偿服务也就越多,劳动生产率也就越高。“因此,大规模地使用物化在生产资料中的过去劳动使活劳动的生产率提高。另一方面,这样逐步加入产品的价值量绝对地说是增加的,不过它不是和不变资本的这一价值组成部分一道并按同一程度增加”。^①

另一方面,可变资本转化成的活劳动则不同,它不管劳动生产率的程度如何,在工作日的大小和强度已定的条件下,同一活劳动量新创造的价值是相同的。尽管同一活劳动量加到不变资本中的是同一价值,但由于不变资本的大小不同,劳动条件的丰富程度不同,同一劳动量生产出来的总产品的价值却不相同。其原因就在于同一活劳动量推动的物化劳动即不变资本的大小不同。在活劳动相同的情况下,物化劳动随着生产条件的规模和丰富程度而增加。随着资本积累,同一活劳动量推动的不变资本量越来越大。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国家,它的产品中包含的不变资本的价值所占比例也较大,它的一个工作日生产出来的总产品中包含的价值,大大多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国家,但是由于劳动生产率较高,总产品的数量非常多,所以单位产品便宜得多。

随着资本积累,劳动的物质条件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丰富。但是,这种物质条件同时又是剥削活劳动的手段。因此,随着资本积累,剥削活劳动的手段不断增大,过去劳动支配活劳动的权力不断增大。“劳动的物质条件的增长不是表现为劳动的不断增长

^① 同上书,第77页。

的力量，反而表现为这些物质条件的不断增长的支配劳动和反对劳动的权力”。^⑨这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特征，“在这种生产过程中，物化的劳动条件作为异化的和独立化的条件，是与劳动相对立的特殊力量。另一方面，过去的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范围内第一次以这样的规模得到发展”。^⑩

还在1861—1863年手稿的开始部分，马克思考察绝对剩余价值时就初步谈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对工人人口的影响，并表示这个问题应在讨论资本积累时来考察。还在考察简单再生产时已经指出，财产同劳动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而从生产过程出来时，这种分离又被再生产出来，因为劳动的全部结果，都表现为资本，表现为他人的财产。劳动力离开生产过程时不仅没有比它进入时更富，而且更穷了。这是因为劳动力仅把客观劳动条件作为资本创造出来，而且把自己身上的价值增殖的可能性作为追加资本生产出来。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分割成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比例也发生变化，不变资本部分相对地越来越大，可变资本部分相对地越来越小。如果总资本的量增长，可变资本部分也会绝对增长，但它却会相对减小。这样，增大的资本所推动的劳动量虽会绝对增多，但同资本量相比，却会相对减少。

当然，如果生产方式保持不变，生产力的发展不变，可变资本的量就会随着总资本量的增长而按同一程度增长，大一倍的资本所使用的工人将增加一倍。而当追加资本投入资本有机构成更低的部门时，即投入与物化劳动相比需要较多活劳动的部门时，还会有较大的追加资本部分转化为可变资本。在这种情况下会雇用更多的劳动。这些情况在某个生产领域中是可能发生的，在生产过程的某个一定时期也会有资本量单纯扩大的情况。不过，随着资本的不断增长，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劳动生产率会不断

^⑨ 同上书，第85页。

^⑩ 同上。

提高，一定量物质资料和运用这些资料的活劳动之间的技术比例会不断提高。马克思指出，在前面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时候就已经看到：生产的发展，通过协作、分工、机器生产，使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物质资料不断扩大，结果，同一劳动所能推动的物质资料越来越多。

随着资本积累，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比例提高了，同量劳动会推动更多的不变资本，或者说，较少量的劳动会推动同一不变资本，或推动较多的不变资本。也就是说，总资本中转化为可变资本的部分同转化为不变资本的部分相比不断减少。这样，使用的劳动量虽然一方面随着总资本的增长而增长，但另一方面，增长的比例与总资本相比却不断减少。新追加的资本当然可能不间断地吸收过剩人口，但这个追加资本的可变部分的相对量与总资本相比仍会不断减少。例如，如果不变资本同可变资本之比是3：1，追加资本也必须按此比例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如果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比是5：1，追加资本也必须按此比例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而随着资本的积累，这种比例越来越小，如从3：1变为1：1、5：1……10：1等等。这样，追加资本中转化为可变资本的份额也越来越少。不仅如此，追加资本加入原有资本，还会使原有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因为追加资本加入原有资本，劳动过程的物质条件有可能更丰富，从而使劳动生产率提高。这样，可变资本相对地越来越少，工人不断地被排斥，又被吸收，但经常有过剩人口。

马克思总结说：“这样，可变资本，即花在工资上的资本部分，随着资本积累而增长，因为这是生产绝对剩余价值的唯一手段；但是，这个资本部分同总资本的增长相比相对地减少，或者说，以日益递减的比例增长，就是说，无酬劳动越来越多地转化为资本，即积累，是使这一比例日益减小的手段和必然的制造者，这不仅表现在追加资本的划分上，而且反映在总资本上。”

任何积累都是更多积累的手段，也就是剥削更多活劳动量的

手段，但它同时又是使活劳动量同总资本相比使用得越来越少的
手段。

如果说过剩人口通过追加资本得到使用和吸收，那么，正如我们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时所看到的，这个同化过程或物化劳动吸收活劳动的过程，由此会引起并伴随有——随着机器的改进等等以及在原先没有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地方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样的现象：工人被不断地[从生产过程中]驱逐出来，游离出来，排除出来，以致被资本吸收的工人数量的不断增长是由被排斥被游离的工人数量的不断增长引起的，——这种情况使积累除自然的人口增长以外，还经常储备有和制造出供它支配的过剩人口，这是更多地积累资本的活材料”。^⑩ 马克思的这些结论，已经接近于得出《资本论》第一卷中论述的资本主义特有的人口规律了。

最后，作为结尾，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谬论，他们认为可变资本的量同不断增长的生活资料的量是一回事，似乎不断增长的生活资料必定会转化为可变资本，使工人就业。这纯粹是无稽之谈。实际上，生产越发展，可变资本相对地越小，工人就业的机会越小，成为产业后备军的命运一直在等待着工人阶级，这就是资本主义的不可克服的矛盾。

（四）《资本论》中对资本积累理论的 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我们可以看到，资本积累理论的基本原理在1861—1863年手稿中已经制定出来。当然，这个理论还没有充分展开。在后来的《资本论》中，这个理论得到了充分的阐述，大大向前发展和完善了，补充了许多重要的理论要素，在这里我们无需详细论述，只简略地提一下就可以了。

^⑩ 同上书，第96—97页。

1、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转变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问题，得到了较详细的论述。

2、对资本有机构成作了全面论述，详细考察了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对工人阶级命运的影响。

3、对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作了详细论述。

4、增加了关于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周期变化的阐述，指出现代工业特有的生活过程由危机、停滞、中等活跃、高涨等几个阶段组成，其中并加杂着一些小波动，确定了这种周期变化的原因，预见经济周期将会缩短，这也是经济危机理论的组成部分。

5、详细论证了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的累进生产，以及工人阶级时而吸收时而排斥的可悲命运，指出这种产业后备军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条件。

6、详细考察了相对过剩人口的各种存在形式。这就是：流动的过剩人口、潜在的过剩人口、停滞的过剩人口、需要救济的贫民等。

7、科学地表述了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同资本的膨胀力一样，是由同一些原因发展起来的。因此，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①

8、结合一些理论论述，深入地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错误理论。

9、补充了大量现实材料，作为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的例证，对于资本积累给劳动人民带来的灾祸作了活生生的描述。

^① 同上书，第23卷第707页。

列宁关于国家机关的组织和活动的原则

〔苏〕弗·伊·波波娃^①

国家机关的列宁式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

列宁作为人民委员会的主席，为苏维埃政府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工作作出了榜样。他把科学的工作方法运用于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的活动，力求把优秀典型推广到一切机关中去。他要求领导人员建立制度和纪律，具有忠诚态度和求实精神，节约时间和资金。他同官僚主义、拖拉作风以及苏维埃组织工作中的其他缺点进行了斗争。列宁写道，“我们所缺少的主要的东西就是文化，就是管理的本领”^②。这种文化落后状况使官僚制度复活^③。

列宁以人民委员会的活动作为例子教导我们，应当怎样文明地管理机关和机关工作人员，应当怎样正确地选拔和分配干部，怎样信任他们和考验他们，怎样组织机关的工作，怎样规定机关各个环节的权限，怎样在工作人员之间分配任务，并且要求他们完成这些任务。

列宁认为，对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规范管理具有重大的意义。他亲自拟定了人民委员会会议条例^④、苏维埃机关管理条例、劳动国防委员会给地方苏维埃机关的指令、关于副主席（人民委员会和

① 本文作者是法学副博士，在全苏苏维埃法制科学研究所工作。

② 《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3卷第220页。

③ 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784页。

④ 见《列宁文集》1933年莫斯科版第21卷第95页。

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工作的决定^⑤等等。

人民委员会会议是学习国家管理的真正学校。

阿·莫·阿尼克斯特在回忆列宁的文章中写道：“如果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秘书处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各种意见、建议、插话记录下来，我们就会得到一份极其丰富的资料，说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具有统辖一切机关工作的惊人才能。遗憾的是，记录下来东西很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本人要求只是把决议、作了明确表述的决定准确记录下来。……在这方面以及在及时把决定的抄本分送给有关的部门和个人方面，他对自己机关的要求是特别严格的。”^⑥

弗·伊·列宁非常珍惜时间，他建立了人民委员会会议制度，防止把时间白白花费在空谈和等候等等上面。1921年10月13日，列宁在给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哥尔布诺夫同志的信中谈到，必须改变召唤汇报人来人民委员会的制度，让每一个汇报人自己在一定的时刻出席会议^⑦。

1922年8月10日人民委员会的法令规定了向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汇报的制度和各部门代表参加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的制度。^⑧

如果各部门的专家和代表作为汇报人参加讨论人民委员会会议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上所要研究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就应当成为首先讨论的问题，以免这些代表长时间等候。

当弗·伊·列宁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时，他能使所提出来的问题得到全面的讨论，但思想阐述得简单明了，不浪费时间。

人民委员会会议规程规定汇报人汇报时间为十分钟，发言者

⑤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第329—332页；第32卷366—390页；第33卷第298—305页。

⑥ 阿·莫·阿尼克斯特：《为精简国家机关而斗争》，载《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1960年第3卷第219页。

⑦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5卷第525页。

⑧ 见《俄罗斯联邦法令汇编》1922年版第51期第649页。

第一次发言时间为五分钟，第二次为三分钟，发言不得多于两次。^⑨

据尼·亚·谢马什柯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自己象时针一样准确，他要求我们大家也这样准确”。^⑩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不准时出席会议的处理办法》的法令中对迟到者规定了下列处罚办法：载入会议记录的警告处分、扣除一天的工资、在报刊上给予公开警告处分，节日期间进行强制劳动。^⑪

弗·伊·列宁不止一次地谈到国家机关各个环节的工作必须做到精确、有条不紊。列宁在给中央苏维埃机关的信中（1921年12月）写道：“苏维埃行政机构要工作得有条不紊、精确而迅速。由于松懈混乱，不仅使某些人的个人利益受到损失，而且使整个管理工作空有其名、形同虚设。”^⑫在1921年12月26日人民委员会《关于人民委员有义务及时答复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处的质询》的法令中，责成办公厅以及各人民委员部和中央机关的责任书记（他们的姓名和电话应告知人民委员会办公厅）有义务亲自及时地答复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大人民委员会、小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处的各项质询。对紧急质询的答复不得迟于二十四小时，对其他质询的答复不得迟于三天。^⑬小人民委员会被授权对不执行本规定者给予纪律处分。^⑭

⑨ 人民委员会议事规程是由弗·伊·列宁在致德·伊·库尔斯基的便条中提出来的（《列宁文集》1933年莫斯科版第24卷第331页）。1919年4月5日，人民委员会根据德·伊·库尔斯基的报告批准了这一议事规程；1922年7月6日批准了《大人民委员会议事规程》（叶·伊·科列涅夫斯卡娅：《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工作的组织法律形式》（1917—1922年），载《苏维埃国家和法》1968年版第7期第96页）。

⑩ 引自米·帕·伊罗什尼科夫：《苏维埃中央国家机构的建立》1966年版第101页。

⑪ 见《俄罗斯联邦法令汇编》1920年版第32期第156页。

⑫ 见《列宁文稿》197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9卷第783页。

⑬ 见《俄罗斯联邦法令汇编》1922年版第1期第19页。

⑭ 给予纪律处分的制度是1921年1月2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法令规定的（见上书，1921年版第8期第58页）。

1922年7月21日人民委员会《关于省执行委员会和省经济会议有义务及时答复办公厅以及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处的质询》^⑮的法令也作出了类似的规定，只是对紧急质询答复的时间规定为四十八小时以内，而对其他质询的答复为收到后的五天以内。如果不能按时作出答复，则必须告知。还规定如违反法令要负纪律责任，如果再次违反必须对省执行委员会或省经济会议主席给予处分。

列宁要求各机关的领导人毫不延误地完成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一切事务，对向他们提出的质询作出详尽答复。他写道：“如仅限于作一些空洞的敷衍了事的复文，或转给其他机关，也同样是助长拖拉作风和浪费纸张。

现在我警告你们，如果再继续以这种方式办事，人民委员会接待室有权向失职人员追究责任，不管他是什么‘级别’。”^⑯

列宁尖锐地提出了对任何负责人员包括人民委员会的机关工作人员追究责任的问题。1921年9月13日列宁在给哥尔布诺夫的信中谈到发送紧急文件的拖拉作风：“这样做办公室工作是不行的，如果再发现即使是一次这种典型的拖拉和贻误工作的现象，我将给予严厉的处分并撤换工作人员”。^⑰接着，列宁对文件发送制度和监督文件按规定送达的问题作了详细指示。

早在1918年列宁签署的工农国防委员会的决定中就指出：“过度增长的公文报表和办公室的有害的拖拉作风既败坏各苏维埃机关的风气，又有使生动活泼的工作淹没在浩如烟海的公文之中的危险。

所有这一切阻碍着完善苏维埃政权机构的事业……”。在决定的决议部分提出要“根除中央和地方急剧增长的公文报表和妨碍工作的办公室拖拉作风。迅速地、毫不拖延地执行中央当局的命

^⑮ 见上书，1922年版第45期第555页。

^⑯ 《列宁文稿》197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9卷第783页。

^⑰ 同上书，第398—399页。

令,用电话交谈代替公文来往,用电话记录代替公文,必须检查每一个指示、每一个命令的执行情况”。^⑱

为了在劳动国防委员会进行讨论,列宁拟定了《苏维埃机关管理条例草案》并寄给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和约·维·斯大林,征求他们的意见。列宁在他的短信中要求他们阅读这个草案,交同志们传阅和讨论,在12月14日即星期六(显然是1918年)以前把对草案的修改意见以书面形式寄来。在这些条例中,列宁以其他问题的形式详细指出,谁应当怎么样,在什么期限内和以什么方式发出公文,汇报指示执行情况,写出调查询问经过,注明访问者等等。列宁认为,这样详细制定苏维埃机关工作条例是保证国家机关工作有条不紊的办法,可以防止公民的权利免遭不负责任的领导人的侵犯。列宁尖锐地批评了那些把作出详细指示看作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根源的人们。他们要求对机关工作制定最明确的条例,坚持不懈地履行法律规范中所规定的程序。

在关于副主席(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工作的决定中,列宁制定了人民委员会领导人、人民委员在领导国家机关方面的活动纲领。列宁认为,副主席工作中主要的东西是检查法令、法律和决定的实际执行情况,缩减苏维埃机关的编制,监督各机关整顿并简化公文事务,同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作斗争。^⑲在列宁看来,其他一切工作都是这一主要任务的具体化或者是对这个任务的部分补充。决定对干部工作,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挑选和考查工作,建立各委员会委员和其他苏维埃工作人员对受委托的事务的个人责任制,同不负责任和指示含糊不清的现象作无情斗争等问题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

列宁严厉批评了上级机关对下属的地方机关以及企业、设施的工作的直接安排不够重视,不检查它们的工作,也不给予必要的帮助这样一种工作作风。列宁要求减少“文牍主义和拖拉作

^⑱ 见《俄罗斯联邦法令汇编》1918年版第93期第929页。

^⑲ 《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3卷第298页。

风……”“人民委员们考虑问题更加周密，责任心加强，不再乱发匆匆拟就的指示，而是慎重、长期、认真地检查执行情况和检查经验，建立个人负责制……”^{②③}列宁对这样的工作人员最不能容忍，他们表面上办事认真，提出大量质询，把公文送到各级机关去不必要地征求同意，而事业的利益却要求立即解决问题或者采取必要的措施。

1922年3月27日，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列宁谈到，应当把重心移到挑选人才，检查实际执行情况上来^④。在此以前，在1922年3月6日全俄五金工人代表大会共产党员代表会议上，列宁指出：“我们需要的不是新的法令、新的机关和新的斗争方式。我们需要的是审查工作人员的使用是否适当，检查实际执行情况。……现在全部工作、全部政策的关键就在于此，再说一次，就在于此，仅在于此。这不是几个月的事情，不是一年的事情，而是好几年的事情。”^⑤

列宁本人在任命新的工作人员担任负责职务时总是注意他的品质：从（一）办事是否认真，（二）政治方面，（三）业务知识，（四）行政管理才能进行考虑。^⑥列宁说：“任何管理工作都需要有特殊的本领。有的人可以当一个最有能力的革命家和鼓动家，但完全不适合作一个管理人员。凡是熟悉实际生活、阅历丰富的人都知道：要管理就要内行，就要精通生产的一切条件，就要懂得现代高度的生产技术，就要有一定的科学修养。”^⑦列宁一再强调：“要管理，就必须熟悉业务，作一个出色的管理人。”^⑧

列宁谈到挑选和正确使用干部特别是共产党员时指出，“资本主义扼杀了、压制了、摧残了工人和劳动农民中的大批人才。这些

^② 同上书，第35卷第538页。

^③ 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854页。

^④ 《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3卷第197页。

^⑤ 参看《列宁文稿》197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9卷第264页。

^⑥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0卷第394页。

^⑦ 同上书，第36卷第545页。

人才在贫穷困苦、人格遭到侮辱的压迫之下毁灭了。现在我们的职责就是要善于找出这些人才，让他们担任工作。”^{②⑥}同时列宁警告共产党员说，如果他们不学习管理工作，如果他们把自己封闭在领导者的狭隘圈子里，不敢或不善于吸收党外人员参加工作，如果他们脱离群众，那就有可能变成官僚，甚至变成高官显贵。^{②⑦}

谈到人民委员会要按新的方式工作时，列宁写道，首先必须每天抽出一小时或两小时亲自检查工作，同时“寻根究底，或者对他们严加训练和教导，或者就狠狠地把他们鞭笞一顿。要研究人，要寻找能干的干部。”^{②⑧}

列宁以自己的榜样表明，应当怎样善于听取人们的意见，善于同人们交谈，讥笑游手好闲者，表扬认真负责、有创造性的工作人员，善于把能干的、有经验的人们提拔到负责的工作岗位上来，除非万不得已，不要去干预他们主管的工作。

列宁特别不能容忍国家机关的某些环节在工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他提出，官僚主义就是使事业的利益服从于升官的利益，就是特别注意官职而忽视工作，^{②⑨}脱离群众，主张保住职位而又不受监督。

列宁在说明苏维埃国家机关工作中所产生的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的原因时写道：“我们知道，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主要是同俄国的文化水平低、战争所造成的严重经济破坏和贫困等后果有关的。这种毛病只有经过多年的顽强斗争才能克服。因此，决不能灰心丧气，必须不怕失败，再接再厉，恢复中断的工作，试行能达到目的的各种办法。”^{③⑩}同官僚主义斗争的办法应当“有系统地、坚持

^{②⑥} 《列宁选集》第4卷第81页。

^{②⑦}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2卷第378页。

^{②⑧} 同上书，第35卷第541—542页。

^{②⑨} 见上书，第7卷第357页。

^{③⑩} 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271页。

^{③⑪} 《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2卷第379—380页。

不懈地、反复地加以试验、比较和研究”。^②其中之一是颁布苏维埃法律，这些法律是“很好的，因为这些法律使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同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进行斗争，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里，都没有给工人和农民这种可能。”^③

列宁指出，如果在苏维埃管理工作中存在着官僚主义弊病，那么我们不会隐瞒这种祸害，而是要揭露它，同它作斗争。但是，“谁要是由于同新制度中的弊病作斗争而忘记了新制度的内容，忘记了工人阶级建立了并领导着苏维埃类型的国家，那他简直就是不会思索，信口胡说”。^④1919年3月19日，列宁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党纲的报告中说：“我们在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做到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做到的事情。”^⑤

“只有当全体居民都参加管理工作时，才能彻底进行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才能完全战胜官僚主义。”^⑥

列宁提出了制定关于对犯有官僚主义、拖拉作风、不尽职、疏忽大意过错的人追究责任的法律草案的思想。^⑦因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了一系列建立这种责任制的法令。在列宁起草并经1921年12月28日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经济工作问题的指令》中指出，法院要更加注意对官僚主义、拖拉作风和经济方面的失职事件给予法律制裁。^⑧

列宁严厉批评了国家机关中的升官发财思想、阿谀奉承、粗暴作风等恶习，要求惩处那些以自己的行为来培植这些恶习的人，列宁早在《国家与革命》这部著作中就引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升官发财思想，反对使公职人员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

② 同上书，第380页。

③ 同上书，第33卷第56页。

④ 《列宁选集》第4卷第538页。

⑤ 同上书，第3卷第788页。

⑥ 同上。

⑦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3卷第303页。

⑧ 见上书，第152页。

主人的正确措施(彻底实行选举制度,撤换公职人员,把薪金降低到工人平均工资水平,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的职能等等)的论述。^⑳

列宁珍惜人民的资财,不允许不加节约地随意浪费,特别是国家机关的经费^㉑。早在1918年初就由他签署颁发了《关于建立削减国家开支的特别委员会》的法令^㉒。该委员会受权审查按预算拨给各部门的贷款以及有权支配贷款的各部门、一切人员和机关的权限,预先审核预算、开支、国家收支表草案,各部门关于超预算拨款的呈文等等。

列宁在1918年4月17日签署的人民委员会《关于利用邮电部门的电报通讯网的制度》的决定,规定了签署有关非紧急事务的电报或要求对超过机关对紧急情况电报联系的实际需要的电报费用提供拨款的请求书的负责人员的责任制。^㉓

列宁十分重视缩减国家机关编制的问题。在《关于苏维埃机关管理工作的规定草案》^㉔中,列宁要求一切苏维埃机关的每个部门按照他制定的报表提交关于工作内容的材料,而且要求地方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它们所成立的有关委员会制定合并同类部门和节省劳动力的措施,每周向人民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报告有关的情况。

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苏维埃建设》的决定中写道:“加速实行人民委员会开始采取的关于精简苏维埃机关和确定各机关编制的措施,以便把职员调去从事生产劳动……”^㉕

为了缩减管理机关的编制和消除管理机关工作中的平行重复现象,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决定不允许省执行委员会在省

^⑳ 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266、271页。

^㉑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5卷第329页。

^㉒ 见《俄罗斯联邦法令汇编》1918年版第27期第349页。

^㉓ 见上书,第33期第433页。

^㉔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第329页。

^㉕ 《俄罗斯联邦法令汇编》1921年版第1期第1页。

国民经济委员会以外再设立经济机构(除公用事业局外),也不允许通过特殊平行机关来执行某种生产任务。禁止各地方在省国民经济委员会以外再设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特殊机构。^④

根据1921年10月2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法令,成立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重新核定俄罗斯联邦各机关的委员会。^⑤该委员会的任务是尽可能缩减使用由国家及其机关支付报酬的非生产劳动的部门,以此来增加工业劳动资源。该委员会有权对改变各机关的职能或把不同的机关加以合并以及修改各机关章程条例等问题作出结论。该委员会的决定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批准后生效。在省执行委员会之下也设立了类似的委员会。

在1921年12月—1922年1月经过调查研究之后,该委员会拟定了关于重新核定各机关的决定,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了各部门职员的定额和编制。

列宁认为,“还要经过好多年,我们才能使我们的国家机构得到改善,把它提高到——不是就个别人,而是就整个机构来说——高度的文化水平。我相信,如果我们今后在这个工作上继续努力,我们就一定会收到最好的效果。”^⑥

列宁认为:“现在,在最近的几年内,最重要的迫切任务就是通过缩减苏维埃机关,改进组织,消灭拖拉作风、官僚主义和减少非生产开支,来不断地精简苏维埃机关和减少其开支。”^⑦党和政府的决议不止一次地着重指出这一点。苏共纲领写道:“苏维埃机关

^④ 见上书,第3页。根据1921年3月25日俄罗斯联邦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决定《关于各州的经济机构》(暂行条例),为了减少官僚主义,为了在各地更迅速地采取能够和应当通过地方的决定来加以实行的措施,同时也为了协调和加强各地方经济机构和省经济会议的活动,成立了各州经济委员会(见上书,1921年版第27期第153页)。

^⑤ 见上书,第72期第581页。

^⑥ 《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3卷第356页。

^⑦ 同上书,第402页。

应该是简朴的、工作熟练的、开支少而效率高的机关，没有任何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拖拉的表现。”^④

完善国家管理机关的系统 和调节它们活动的法制

列宁认为，完善国家机关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一工作必须从几个方面进行。

第一，列宁始终不渝地力求改善国家机关的系统和结构本身，正确地确定和划分它们之间的权限，而且用法律来调节它们的活动。

第二，列宁要求完善国家机关活动的政治组织原则和法律形式以及国家机关的工作方式和方法。前面所述已经表明，列宁的这些要求是怎样实现的。因此，这里我们只想谈谈完善进行国家管理的中央机关的系统和调节它们活动的法制的问题。

列宁在谈到建设国家机关的系统中的困难和错误时指出，资产阶级取得政权的时候，它们得到了“试验过的车辆、事先修好的道路和早已试用过的器械”，而工人阶级夺得政权以后“既没有车辆，也没有道路，什么也没有，根本没有什么预先试用过的东西！”^⑤“无论哪个谈到未来远景的有卓见的社会主义者也从来不曾想到，说我们能够根据某种预定的指示一下子就制定出新社会的组织形式。”^⑥

列宁认为，有可能不止一次地改组国家管理机关，特别是经济机关。他指出，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必须完全按照新的方法来组织数亿人生活的最深刻的基础。“我们要在工作进程中考查这

^④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1961年人民出版社版，下册第1462页。

^⑤ 《列宁选集》第4卷第595页。

^⑥ 同上书，第3卷第570页。

种或那种机关,在实际工作中观察它们,用劳动者集体的、共同的经验,而主要是工作结果的经验来审查它们,我们要在工作进程本身中,而且要在剥削者进行剧烈斗争和疯狂反抗的情况下……来建造我们的经济大厦。”^②

列宁关于完善苏维埃国家机关的思想体现在一系列规范性文件中。特别是1918年12月8日由列宁签署的决定《关于准确而迅速地执行中央当局的命令和消除办公室的拖拉作风》谈到,必须极其严格地集中行动,迅速而又准确地执行任务并且使苏维埃政权机器达到完善的程度。^③

完善苏维埃国家的机制,改善它的管理机构的系统,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受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制约,受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和文化的性质和发展水平、苏维埃国家及其机关的任务和职能、苏联的联邦制度、各加盟共和国的行政区域划分的制约。

由这些因素所决定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国家管理机关系统在实践中受到检验,得到完善。

行政区域原则是成立具有一般权限的管理机关的基础。这些机关的全体工作人员的活动不是建立在职能原则基础上,就是建立在生产区域原则基础上的。具有部门权限的机关系统通常是建立在生产区域原则基础上的。而把什么样的领导方法——集体领导制或者一长制——作为具体机关活动的基础,这个问题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最后,苏维埃国家的联邦制在建立国家管理机构的系统方面具有最重大的意义。

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的法制在各个不同时期加强了上述建立国家管理机关活动的这些或那些原则。

在个别时期由于加强了经济建设管理方面的集中制原则,结果全苏人民委员部和专门部门的数目增加了。而由于各加盟共和

^② 同上书,第569页。

^③ 见《俄罗斯联邦法令汇编》1918年版第93期第929页。

国权力的扩大,某些经济和文化部门转归它们领导,结果就在各共和国建立了相应的人民委员部和机构,而在苏联的机关系统中则把各全苏人民委员部改组为各加盟共和国人民委员部。

法制调节着国家管理的新部门和领域以及其机构建立和发展的过程。1936年的苏联宪法和以它为基础颁布的各加盟共和国宪法加强了列宁关于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国家管理机关的组织 and 活动的原则。

为了使国家管理机关的系统能有效地履行它们担负的职能,就必须使这个系统各个环节之间的纵向和横向联系不致遭到破坏,不致不必要地加以扩大和延长,就必须正确地划分它们之间的权限,不能让它们担负与它们的权限不相容的职能,不能把按其内容来说是统一的职能在不同类的下属机关之间加以分配。

列宁虽然认为有可能改组国家管理机关的系统,但同时又教导说:“……不应当推翻一切……而要善于充分利用现有的东西。应该尽量少来些全盘推翻的作法,而尽量多提供些切实可行的、经过实践检验证明行之有效的办法、方法、方式和意见来达到我们的主要目的……”^④

因此,改组机关不是目的本身,而是改善机关工作,使它能最有效地完成苏维埃国家的任务和职能的手段。

列宁认为:进行试验,在一定的地方对工作做典型示范并把好的经验推广到国家机关的一切环节——这是改善国家机关的结构和活动的根本办法。遵照列宁的指示,例如按照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根据在北高加索和乌拉尔进行的试验的材料,实行了国家区域化。^⑤

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列宁所作的俄共(布)中央工作的报告的决议中指出:“衡量每个组织是否适宜,应当以该组织中各

^④ 《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0卷第371页。

^⑤ 见《俄罗斯联邦法令汇编》1926年版第90期第657页;1927年版第19期第131页。

种义务、职权和责任的划分是否明确为标准。”^{⑤⑥}列宁在关于向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大纲的信中阐明了政权代表机关和人民委员会之间、党组织和国家机关之间划分权限的原则。^{⑤⑦}

列宁在给亚·德·瞿鲁巴的一些书信和其他文件中提出了必须明确地确定和划分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小人民委员会和各人民委员部之间的权限问题。^{⑤⑧}

第八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决定确定了由列宁领导的劳动国防委员会的权限。^{⑤⑨}俄罗斯联邦劳动国防委员会承担了协调和加强各部门在保障国家防务和经济建设方面的活动的职能。

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和小人民委员会的法律地位和权限是由有关这些机关的专门文件确定的。^{⑥⑩}小人民委员会是为了审理“不会引起原则性争论”的细小事务，为了预先研究应由人民委员会负责解决的问题，为了监督各人民委员部对人民委员会决定的执行情况而成立的。^{⑥⑪}

^{⑤⑥}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10页。

^{⑤⑦}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3卷第221页。

^{⑤⑧} 见上书，第35卷第537—545页。

^{⑤⑨} 见《俄罗斯联邦法令汇编》1921年版第1期第2页。也可参看关于把工农国防委员会改组为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决定（同上书，1918年版第91—92期第924页）。

^{⑥⑩} 同上书，1922年版第12期第117页；第29期第340页；第75期第927页；《列宁文集》第35卷第18页；《苏维埃法》1922年版第1期第64—65页。早在1917年11月20和30日，人民委员会就研究了关于通过人民委员会章程的可能性的问题，但是在所有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内部安排的问题中只解决了一个问题，即关于将要讨论的问题所涉及的那些单位（各人民委员部）的代表出席人民委员会会议的问题。（叶·恩·哥罗杰茨基，《苏维埃国家的诞生》1965年版第157—158页。）

^{⑥⑪} 小人民委员会以简单多数通过而无人提出异议的决定在送呈人民委员会主席并经他签字后作为人民委员会的决定在法律上生效。如果人民委员会主席不同意经小人民委员会通过的决定，这个问题就提交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审议。对小人民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决定提出异议的程序由1932年8月3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法令作了规定。根

在关于劳动国防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以及小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指示草案中，列宁指出：“小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应该尽一切力量把自己从杂乱烦琐的事务中解放出来，使各人民委员部习惯于自己解决琐碎的事情并更严格地对这些事情负责。”^⑫在关于副主席工作的决定中，列宁指出，必须尽量要求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摆脱对各种琐碎问题的负担。^⑬列宁要求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各位副主席切实加以监督，使“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工作布置会，特别是小人民委员会，不要把自己的工作扩大得超出绝对必要的范围，不要使自己的工作和所担负的任务复杂化，不要官僚主义地过分扩大自己的职权，要求每个人民委员部和每个机关在工作中表现出更多的独立自主精神和责任心。”^⑭

列宁在关于给小人民委员会的指示草案的一点建议中写道：“以特别的补充决议指出：小人民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应该是进行严格的监督，保证各人民委员部（1）遵守各项法律；（2）不逃避责任，不把许多不必要的问题无故推给小人民委员会解决，而是自己解决问题，自己负责或者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民委员部协同解决；（3）检查各人民委员部的各种命令和行动是否合法、恰当、迅速；通过这种检查和不断缩减官员人数的办法与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作

据该法令，人民委员、劳动国防委员会成员以及在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中有发言权的那些机关领导人有权对上述决定提出异议。对小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决定有异议可以向人民委员会提出，对人民委员会的决定有异议可以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提出，对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决议有异议可以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对决定提出异议并不能停止对该决定的执行，除非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就人民委员会的决定通过了专门决议，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停止执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决定的专门决议。

⑫ 《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5卷第544页。

⑬ 见上书，第33卷第298页。

⑭ 同上书，第298—299页。

斗争”。^⑥

列宁的这些要求已在人民委员会的各项法令中得到确认。例如，在关于划分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和小人民委员会活动范围的指示中列举了应由人民委员会审理的问题，应提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的问题以及应由人民委员会独立解决的问题。^⑦

列宁要求制定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提出合乎规范的文件草案的严格制度，对这些文件进行协商并提上人民委员会会议议事日程的制度。因此，他在给亚·德·瞿鲁巴的信中写道，必须“拟定一个关于提出和处理各项问题的成文的条例，并且每月至少检查一次，您亲自检查，看这个条例是否大家都遵守了，是否达到了目的……”^⑧

早在1917年12月，列宁就拟定了把问题列入议事日程的制度，^⑨制定了筹备人民委员会会议的条例。这些条例规定了有权把问题提交人民委员会的人员和机关的范围，还制定了把这些问题列入议事日程的制度。^⑩为了使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团在进行行政管理工作和立法工作方面不致发生平行重复现象和不协调现象，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规定，各人民委员部通常应当在人民委员会预先对法令进行讨论之后才能把法令提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个别问题只有经过人民委员会的允许才能作为例外情况处理。人民委员如果不同意人民委员会的决定，有权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提出申诉。

1923年11月12日通过的关于苏联人民委员会的条例，虽然很简要，但对于安排委员会的活动起了积极的作用。

该条例确定了人民委员会作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执行机

^⑥ 同上书，第35卷第543页。

^⑦ 见《俄罗斯联邦法令汇编》1922年版第12期第117页。

^⑧ 《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5卷第538页。

^⑨ 《列宁文集》1933年莫斯科版第21卷第96页。

^⑩ 见《俄罗斯联邦法令汇编》1922年版第29期第340页。

关和管理机关的法律性质。条例中指出了如下内容：谁可以参加人民委员会，它管理的对象是怎么样的；谁有权把问题提交人民委员会审理；经过什么程序，有多少人数可以通过法律文件；谁可以对这些文件提出异议，向哪里提出；对这些文件提出异议的后果怎样等等。^⑩除了关于苏联人民委员会的条例外，人民委员会和苏联劳动国防委员会还颁发了特别文件，规定了把问题提交人民委员会和苏联劳动国防委员会审理的程序。^⑪

后来，苏联政府颁布了几项决定，这些决定规定了部长会议及其机关的结构，各职能部门（各委员会，总务处等等）的相互关系，这些职能部门的活动程序，把问题提交苏联政府审理的程序等。

近来国家建设的实践是朝着扩大苏联各部部长，各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地方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权力的方向发展的。

列宁认为，确定各人民委员部的权限，妥善地安排各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具有重大的意义。在列宁的直接领导下制定并颁布了规定俄罗斯联邦和苏联许多部门的法律地位的规范性文件。^⑫

1923年11月第一届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批准了关于苏联各人民委员部的总条例。^⑬该条例确定了各人民委员部的任务，它们颁布的文件的种类（决定、指示、指令、通告、命令等等），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它的主席团或人民委员会停止实行或撤销这些文件的程序。^⑭还通过了关于苏联各人民委员部的具体

^⑩ 见上书，1923年版第107期第1032页。

^⑪ 见《苏联法令汇编》1926年版第47期第343页；第59期第444页；1929年版第74期第711页。

^⑫ 见《俄罗斯联邦法令汇编》1918年版第44期第332页；第55期，第611页；第58期第644页；第36期第171页；1920年版第88期，第447页；1921年版第12期第78页；1922年版第31期第378页；第31期第380、381页；第37期第432页、414页；第32期第383、384、385页；第33期第386页；第47期第600页；第76期第955页；1923年版第10期第120页；第83期第809页；第91期第901页。

^⑬ 见上书，1923年版第106期第1031页。

^⑭ 人民委员会主席只能停止执行人民委员部的指示，随后要向苏联人民委员会

条例。^⑤

由于按照部门原则对工业管理进行改组和实行经济改革，就要求改变行政管理法。随着全苏各个部和各加盟共和国各个部的成立，就产生了颁布一个关于苏联各个部的总条例的问题。1967年7月10日苏联部长会议的决定批准了这种总条例。^⑥关于苏联各个部的总条例是从体现在法律中，首先是体现在早在1923年就通过的关于苏联各人民委员部的总条例和关于苏联各人民委员部的具体条例中的列宁的管理原则出发的。

这里包括劳动人民参加管理的原则、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制和一长制、遵守法律以及列宁关于国家机关活动的其他原则。总条例确定了苏联各个部的性质以及它们在管理机关系统中的地位。总条例把苏联的部列为对国民经济的相应部门进行领导的中央国家管理机关。总条例详细规定了部的主要任务和职能。

颁布关于苏联各个部的总条例，对于把关于中央国家管理机关的法律系统化和法令编纂工作具有重大的意义。根据这个总条例通过了关于苏联各个部的具体条例。通过关于各个部的条例确定了各个部的法律地位，这就为这些机关以及它们所属的企业和组织的工作奠定了法律基础。在苏联部长会议和各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下面设立的各个国家委员会及其他部门也需要有同样的法律基础。

列宁指出，任何机关的组织的性质自然地而且必然地是由该机关活动的内容来决定的。党在设立国家机关时，在制定关于这

报告。在苏联人民委员部的指示明显违反苏联宪法、苏联及各加盟共和国法律的情况下，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各加盟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也可以停止执行这种指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各加盟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立即把关于停止执行苏联人民委员部指示的事通知苏联人民委员会或苏联相应的人民委员部。

^⑤ 见《关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条例》（《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公报》1923年版第10期第300页）。

^⑥ 见《苏联政府法令汇编》1967年版第17期第116页。

些机关的总条例、标准条例和专门条例时始终遵循列宁的这些指示。

原载《列宁在建立和发展苏维埃法律中的作用》

1969年莫斯科版第166—185页

(王士云译)

托马斯·卡莱尔与空想社会主义

[苏]伊·尼·奥西诺夫斯基

托马斯·卡莱尔是一个复杂而矛盾的人物。他的社会政治观点经历了由一种革命的反资产阶级情绪向着反动的、保守的信仰的转变。马克思和恩格斯饶有兴趣地阅读了青年卡莱尔的一些著作。恩格斯还详论了他的《过去和现在》，并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多次引用了他的著作。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对卡莱尔关于英国统治阶级政策的批评性论述给予了很高评价。

国外学者注意研究卡莱尔的著作。西方有的学者把卡莱尔当作圣西门主义继承者来加以研究。苏联许多学者过去曾把卡莱尔的社会政治观点看成是封建社会主义的。本文作者认为，卡莱尔的政治思想是在圣西门和圣西门主义影响下形成的，圣西门主义是他对社会的分析和未来的预测的基础。卡莱尔提出未来社会是由杰出的人、生产的组织者——工业巨头管理的内部有等级的工业社会。因此，就卡莱尔的社会观点来看，他“更接近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卡莱尔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留下了明显的足迹，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影响。因此，探讨他的思想和观点，不仅对于深入了解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而且对于研究在同欧洲社会思想里的各种空想主义派别的相互紧密关系和思想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都是有意义的。

卡莱尔第一次认识圣西门主义者是在1827年4月或5月。

1829年6月，卡莱尔在《爱丁堡评论》上匿名发表的《时代的象征》一文，在英法两国获得了好评。特别是圣西门的继承者们公开赞同卡莱尔对当代社会种种弊端的批评。同月，圣西门主义者的领导人之一古·爱赫塔尔在致卡莱尔的一封信中，建议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继续交换意见。从此他们建立了学术交往关系，卡莱尔不断收到圣西门主义者寄来的书刊。1830—1831年卡莱尔阅读了至少七本圣西门及其继承者的重要著作，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卡莱尔称赞圣西门主义者对未来社会的描述，1832年5月17日在给古·爱赫塔尔的复函中写道：“‘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是一切公平社会的目标……衷心同意每个人的责任是用全部可行手段促使公正和完美社会的实现”。

卡莱尔对圣西门和圣西门主义者的学说的哲学—伦理观点和政治观点的兴趣，在他于1831年至1841年写的许多著作中都有反映。正如夏因公正地指出的，在卡莱尔这个时期的著作中，他本人的见解同圣西门主义关于人类历史学说的基本要素综合、融化在一起了。这里指的是卡莱尔的下述著作，如《旧衣新裁》、《特点》、《法国革命史》、《论英雄和英雄崇拜》，还有《过去和现在》。虽然这最后一部著作是在1843年写的，但是研究卡莱尔著作的学者们发现，该书中不仅有关于历史过程的圣西门主义概念的影响，而且还有观点上的重大变化。这一时期，卡莱尔不仅对过去的历史越来越感兴趣，而且对当前的社会问题，甚至对未来的预测也产生了兴趣。然而，卡莱尔的社会观的理论基础仍然是他对历史过程的看法，这些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圣西门主义那里因袭来的，圣西门主义把历史看作批判时代和有机时代的渐进的交替。

卡莱尔把圣西门主义历史哲学同歌德关于社会生活中信教时期和不信教时期的交替的观点，以及他自己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性评述结合起来。按照卡莱尔的思想，人类社会就象一个人，在他的生活中有活力的健康时期是同患病的时期互相交替的。成长的时代过去后衰落的时代就来到了。代替旧社会的瓦解的，

是新社会的诞生。卡莱尔所说的社会生活中有活力的时代，相当于圣西门的有机时代。在卡莱尔看来，任何社会，任何政治都不过是某种思想的带有实验性质的、较为充分或较不充分的体现。这种思想始终是一种信仰，有时包含着最崇高的、无限的宗教含义，“老实说，它是国家的灵魂，是国家生活中的灵魂。”

上述论断的理论基础是浪漫派哲学，特别是费希特的学说，卡莱尔在1840年5月讲授文学史时经常援引他的学说。尽管卡莱尔欣赏圣西门主义关于宗教是社会的基础和在未来的完善社会里还会保留某种共同的宗教的思想，但他还是表示怀疑，这会不会是圣西门的“新基督教”。在卡莱尔那里，关于历史过程的含有进步思想的圣西门主义观点，同卡莱尔本人信奉的神的世界秩序必胜的加尔文教观点结合起来了。

从《旧衣新裁》起，关于历史过程的圣西门主义观点就成了卡莱尔分析当代社会和预测未来的理论基础。卡莱尔认为，法国革命标志着一个巨大的历史时期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全部政治思想制度的终结（批判时代）。未来的时代必须制定一些对社会产生团结作用的制度，就象基督教和封建主义在中世纪所起的那种作用一样。卡莱尔在四十至五十年代的著作（《过去和现在》、《当代杂文》等）中，力图用准确的资料来分析英国社会的现状，以便更有把握地预测未来。卡莱尔在试图总结欧洲，特别是英国革命运动的经验时，坚决揭露民主制度。他在预测未来时，竭力强调指出，未来社会的实证性质将是对民主制的否定。尽管如此，卡莱尔还是象圣西门主义者那样承认，在通向未来的完善的社会的道路上民主制作为一种过渡形式是不可避免的。不仅如此，卡莱尔还认为，“胜利的美国革命，在升起星条旗之后”，已向人们宣告，民主制“将象旋风一样，席卷全世界”。尽管我们提出卡莱尔的历史观点接近圣西门主义的观点，但是，应该看到，这种观点上的相似之处，在这位思想家同巴黎“圣西门主义者协会”建立直接联系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值得注意的是，卡莱尔在1829年8月5日完成的《时代的

象征》一书中就已阐述了自己对历史过程的想法。卡莱尔写道：正是“思想赋予实践以形式，不论是十字军东征、宗教改革，还是英法革命——一切都以思想为先导”。有趣的是，正是在这个时候，即1829年，在欧洲的另一端恰达耶夫发挥了类似思想。在我看来，这个相同之处的答案应该到德国古典哲学中去寻找，因为这两位思想家的观点都是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下形成的。

然而，卡莱尔的在许多方面决定了他的社会观点的历史观，还是在圣西门主义的直接影响下最终形成的。只要引证一下卡莱尔对历史过程所持的观点就够了。在他看来，历史过程似乎是通过“肯定时代或统一的建设时代与分裂的怀疑时代的交替”来实现的。最初时代，也就是建设时代，是宗教和信仰获得胜利的时代。随着旧社会的衰亡，新社会就诞生了。这个过程在历史上是周而复始的。用卡莱尔关于历史过程的周期性理论观点看，历史上的一切社会变革总是痛苦的，但又是必然的。按照卡莱尔的观点，怀疑论的历史作用归结为否定、消灭腐朽的东西，结果使得“信仰的胜利的到来”成为可能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卡莱尔在《特点》中阐明了自己对历史发展的看法，他认为，肯定时代和否定时代的交替是一个相互联系的过程。过去的东西将来还会不可避免地出现。

卡莱尔同圣西门主义者的首领们的思想分歧——尤其是因安凡丹就宗教和性问题发表的格调低下的演说而产生的分歧，离开伦敦去苏格兰，歌德去世引起的震动，最后，同“圣西门主义者协会”的决裂：这一切导致卡莱尔在三十年代初期同圣西门主义者中断了联系。但是，他对古·爱赫塔尔一直抱有好感并对圣西门学说持尊敬态度。

尽管卡莱尔赞同圣西门主义者关于历史过程的一般思想，但他还是对世界历史的解释提供了某些新东西。例如，卡莱尔在描述历史上时代的交替过程、上升和衰落的过程时，把人民生活中发展和繁荣的时代看作是宗教的胜利，而把衰落和危机归结为怀疑

论和不信教的传播。

卡莱尔与圣西门主义者在对欧洲中世纪历史的看法上有一定的共同之处(虽然在某些细节上存在分歧)。与启蒙时代的传统不同,无论是圣西门主义者,还是卡莱尔都没有把欧洲中世纪看作人类历史上“黑暗和不文明”的时期。相反,在卡莱尔看来,“这是一个伟大而又硕果累累的历史时期”。^①卡莱尔还把信仰的胜利看作中世纪欧洲生活向上发展和精神和谐的创造性泉源。“当时整个欧洲在信仰上是坚定的和不可动摇的”。^②卡莱尔认为新教这种与和谐和统一的创造精神相反的现象的产生,是衰落的开始。作为标志着衰落开始的历史界标,卡莱尔指出了路德的言行。谈到英国本身,卡莱尔把这个国家的“封建主义和天主教的衰亡”同文艺复兴联系起来。

可见,卡莱尔在把中世纪说成是世界上一个肯定的和创造的时代时,他的思想和圣西门主义者是一致的,并且是他们的追随者。卡莱尔承认历史进步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他同圣西门主义者的共同之处。卡莱尔关于进步是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政治体系的周期性改变的思想包含在他 1838 年的文学史讲义里。

卡莱尔历史观点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所谓“凤凰”^③理论,这一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来自圣西门主义者的观点。卡莱尔在文学史讲义中,在小说《旧衣新裁》中,以及在《法国革命史》中,都利用了凤凰的形象。为了阐明“破坏—复兴”的概念,他在哲理小说中还使用了另一个术语“再生”。正象研究者们所指出的,凤凰的形象生动地表达了关于历史进步和一个时代转向另一个时代的独特概念,这一概念是卡莱尔和圣西门主义者共同具有的。卡莱尔同圣西门主义者的共同点不仅表现在对过去的解释上,而且更重要的

① 托马斯·卡莱尔:《文学史讲义》1892 年伦敦版第 64、138 页。

② 同上书,第 64 页。

③ 又作“不死鸟”,是某些古代神话中自焚而又能从灰烬中再生的鸟,常当作复活的象征。——译者注

是表现在对未来人类的设想上。尤其是，正如已经指出的，卡莱尔和圣西门主义者一样，认为民主制之所以是合乎理想的，只是因为它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先于肯定的、完善的社会管理形式而存在。在承认民主制是不可避免的同时，卡莱尔始终极力揭露它，这不是偶然的，这一点研究者们早就指出来了。卡莱尔把英雄崇拜同民主制对立起来，他认为英雄在人类历史上起重要作用。关于英雄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概念是他的未来完善社会这一理想的基础。卡莱尔以这一理想为依据，评价了当代资产阶级社会，并且坚决地否定了这个社会。这样，这位思想家的历史观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决定了他对过去、而且也决定了他对现在和将来的态度。和圣西门主义者一样，卡莱尔认为未来的社会，按其结构来说，是工业发达和等级制的社会，将由杰出的个人、生产的组织者——“工业首长”来管理。总而言之，未来的“有机时代”是工业世纪。改造资产阶级社会的主要问题是建立公正的劳动组织。

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对他们遭受的苦难的真诚的怜悯、对资产阶级的剥削道德和唯利是图的贪婪的批判，这一切激发了卡莱尔在三十至四十年代创作《特点》（1831年）、《宪章运动》（1838年）、《过去和现在》（1843年）、《当代杂文》（1850年）等著作的热情。在卡莱尔看来，劳动是每一个人的神圣使命。社会对劳动的态度是检验真正信教和社会道德水平的标准，因为按照卡莱尔的观点，道德和信教二者是不可分割的。一切真正合乎道德的东西，与宗教是分不开的，实质上是神圣的。不信宗教就会使不道德的行为占上风，这就是卡莱尔的哲学信条。因此，公正的社会制度的最重要任务——劳动问题，对卡莱尔来说，首先也就是伦理和宗教的问题。恩格斯在他的一篇著名的评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一书的书评中对卡莱尔的宗教世界观作了深刻的分析。恩格斯写道：“他（指卡莱尔——作者注）的整个思想方式实质上是泛神论的。”恩格斯一下子就看出了《过去和现在》一书作者的世界观：“对于我们这些了解卡莱尔观点的前提的德国人来说，问题是一清二楚的。一方

面是托利党浪漫派的残余和从歌德那里剽窃来的人道主义观点，另一方面是怀疑论、经验论的英国；根据这些因素就足以看出卡莱尔的整个世界观。”^④

恩格斯不但是确定了《过去和现在》一书作者的世界观的宗教性质，而且还批判了他的世界观，恩格斯指出，“卡莱尔和所有的泛神论者一样，还没有摆脱矛盾，而且他的二元论越来越深，因为他虽然了解德国文学，但他不了解德国文学的必然补充——德国哲学，因此他的全部观点都是直接的、直观的，其中谢林的成分要重于黑格尔的成分。卡莱尔和谢林（早期的谢林，不是‘启示’时期的谢林）有很多共同点；在‘英雄崇拜’或‘天才崇拜’方面，他和施特劳斯是一致的；后者的观点也是泛神论的。”

恩格斯建议卡莱尔读一下批判泛神论的费尔巴哈和布·鲍威尔的著作，^⑤ 以便《过去和现在》一书的作者能够明白“毒化我们一切关系的不道德现象”是如何产生的。卡莱尔认为，当代资产阶级社会精神空虚和伪善的根源在于不信宗教。“据说应当创立一种新的宗教，即泛神论的英雄崇拜、劳动崇拜，至少也要等待将来产生这样一种宗教。”^⑥ 如果说卡莱尔认为资产阶级社会人的道德空虚的原因是不信宗教，那么，恩格斯则相反，认为“宗教就是人的自我空虚的行为”。^⑦ 恩格斯在批判卡莱尔时断言，在当代社会，即十九世纪社会中“宗教产生的可能性一点也没有；继基督教，继绝对宗教即抽象宗教之后，继‘名副其实的宗教’之后，不可能再出现任何其他形式的宗教……。”泛神论作为对付资产阶级社会的道德空虚的一种法宝同样也是不可能的，而卡莱尔正是对这个法宝寄予希望。^⑧ 来源于基督教的宗教激情、泛神论贯穿着卡莱尔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16、647页。

⑤ 同上书，第647页。

⑥ 同上书，第649页。

⑦ 同上。

⑧ 同上书，第648页。

⑨ 恩格斯解释说：“泛神论本身就是基督教的产物，它与自己的前提是分不开的，

的整个世界观。因此，这不能不遭到恩格斯的严肃批评。然而，恩格斯也不能不重视卡莱尔反对由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产生的“当代不稳定性、内在空虚、精神萎靡”等现象的真诚和强烈的愿望。^⑩至于谈到宗教的作用问题，那么在这里引起人们注意的，首先是这位空想主义思想家在这方面进行的思想探索的社会内容。在托马斯·卡莱尔那里非常突出的是对资产阶级制度的社会批判，这种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穷苦的劳动者的利益，而在十九世纪的宗教作家中没有别的哪一个人做到了这一点。这个情况是一个很重要的根据，使得我们可以认为卡莱尔在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所写的政论文章，以及五十年代所写的一部分政论文章是空想社会主义的遗产。空想社会主义无论同这位作家的世界观的某些方面的小资产阶级性质，还是同他关于中世纪的概念的封建贵族式的浪漫主义，都丝毫不矛盾。众所周知，十九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在阶级内容和形式的相当广泛的多样性方面，与批判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前的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有很大的不同。^⑪

卡莱尔的一些著作，如《过去和现在》，是对资本主义剥削社会，对它的精神空虚、不道德和对受剥削的劳动群众残酷不仁的猛烈抨击。卡莱尔用对劳动的真正颂扬来同资产阶级剥削者的道德相对立。卡莱尔把劳动描绘成人的真正高尚精神的真正体现。“任何劳动都是……高尚的，这一点在这里将表明并且得到证实……劳动中包含着永恒的高尚精神，甚至某种神圣的东西。当代最新的福音是‘认识劳动和进行劳动’，人在劳动时就在使自己不断完善”。卡莱尔把劳动看作人生的目的，看作在地球上人的美好使命的实现。用卡莱尔的话来说，人没有比确定自己的使命，找到

至少现代斯宾诺莎、谢林、黑格尔以及卡莱尔的泛神论是这样。费尔巴哈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我没有必要再来加以证明。”（见上书，第649页）

^⑩ 同上。

^⑪ 见上书，第4卷第491—495页。

自己的劳动更大的幸福。“谁找到工作，那就不要去寻找别的福祉。他有工作这个生活的任务”。^⑫然而，这位思想家的劳动观点的依据是从宗教里找来的。卡莱尔把生活本身想象为表现人的美好使命的劳动。“从劳动者的心灵深处产生出一种上帝赐予的力量、生活的神圣实质，这是全能的上帝注入他的体内的”。在卡莱尔看来，正是这种内在的力量促使人们去“从事一切崇高的事业，认识一切事物和做许多其他的事情”。劳动就其本性来说是宗教的、勇敢的，因此，正象《过去和现在》的作者所认为的那样，只有通过劳动，一切宗教的真正目的才能实现。卡莱尔认为这个目的是获得勇敢。“成为一个勇敢的人是一切宗教的目的。”^⑬

反过来说，这位思想家又借助于劳动这样的概念形成自己的宗教观点。宗教对于卡莱尔来说，不是一种抽象概念，也不是一种玄妙的、有魔力的活动，更不是某种使人摆脱尘世的忧虑进入太虚幻境的神秘仪式。相反，卡莱尔把用来解决人世的各种问题、用来改善人和整个社会的尘世生活的一切真正的劳动，同宗教联系起来。在他看来，任何对社会有益的劳动都是宗教。^⑭“让不是劳动的一切宗教远离我们吧，让它在婆罗门教徒、唯信仰论者、云游四方的苦行僧那里，或随便它喜欢的什么地方去繁荣昌盛吧；我与它没有任何关系”。卡莱尔认为福音书的最古老和最重要的要求是号召人们劳动。“劳动能使人获得益处”。卡莱尔非常欣赏中世纪僧侣的一句古老的格言——“劳动就是祈祷”。^⑮他把这句格言广泛地用来解释当代的一切社会问题。“从各种意义上讲……劳动都是祈祷。每一个劳动的人，不论他干什么工作，都使无形事物的形象具体化；每一个劳动者就是一个小小的诗人”。^⑯

^⑫ 托马斯·卡莱尔：《过去和现在》，1897年伦敦—纽约版第112、169页。

^⑬ 同上书，第273页。

^⑭ “任何一种真正的劳动都是神圣的，在每一种真正的劳动中，哪怕只是一种真正的手工劳动，都有某些神圣的东西。劳动宛如地球宽广无边，它的顶峰在天空中”。（见上书，第276页）

^⑮ 同上书，第275页。

^⑯ 同上书，第280页。

可见，在卡莱尔看来，劳动就是信教的标志，同时也是人的道德修养的标准。一个社会劳动的组织如何，对待劳动的态度又如何，卡莱尔就是根据这一点来评价该社会的道德水平的。卡莱尔认为，从这个观点来看，资产阶级社会是经不起批判的：构成英国人民精华的劳动人民的大多数，不论在闲暇时，还是在工作场所，都遭受着贫困和死亡的威胁。卡莱尔和宪章运动一样，认为不公正的劳动组织和对工人的残酷剥削是产生这些现象的根源。卡莱尔说，英国工人的状况经常处于灾难的边缘。英国的五十万纺织工人，尽管每天劳动十五个小时，仍然得不到温饱。工人的生活是地狱，从这个地狱中就产生了象宪章运动这样的现象。“老实说，宪章运动意味着有吃、有住和对劳动的交换有适当的指导。宪章运动的表现越荒诞，这些表现的意义就越明显：你看，在没有得到您的任何指导之前，我们达到了多么疯狂的地步。”卡莱尔警告说：“如果不把这两千四百万人的事情办好，他们就会烧毁工厂和仓库，那将会把他们自己、我们和整个世界化为灰烬和废墟。”

卡莱尔在谴责统治阶级没有能力领导国家，没有能力解决造成工人贫困状况的刻不容缓的社会问题的同时，还满怀激情地抨击了政府当时执行的经济政策（自由主义、放任主义）的基本原则。在卡莱尔看来，忽视工人的需求，推行“自由主义”政策，恰恰是宪章运动产生的原因。统治阶级已暴露出它们将要彻底垮台，完全没有能力管理下等阶级。结果，英国政府、英国统治阶级不是去合理解决、保证满足成百万劳动者和失业者切身需要的迫切的社会问题，而是从渴望大发横财的自私自利的企图出发，为供求规律的自发作用创造一切条件。冷酷无情的、利己主义的盘算，对劳动的贪得无厌的剥削，在纯然不顾工人命运的情况下雇主和工人之间的关系上买卖原则的统治，——这一切，在卡莱尔看来，是孕育着社会大动乱的腐败社会制度的确凿无疑的证明。

卡莱尔以某种理想的、全人类的道德观念为指南，无情地揭露了他那个时代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揭露了统治阶级在政治上

的虚伪，愤怒地谴责和诅咒了资产阶级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下“按照人的创造者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人，生活得象两条腿的役畜一样”。他果断地和不容反驳地对现存的资产阶级社会作了判决：“在这个丑恶的世界里，一切役畜得到了人们的精心喂养，而大多数劳动者濒临饿死。如果这个世界面临着灭亡，面临着彻底完蛋、并且回到原始社会，那就再好不过了。”^{①⑦}

卡莱尔在表明自己对当代的阶级动乱——宪章运动、被政府军队残酷镇压下去的曼彻斯特工人起义——的态度时，没有掩饰他对工人的同情。曼彻斯特纺织工人的起义激起了卡莱尔真诚的、强烈的同情，他试图在自己的读者中也唤起这种同情。^{①⑧}在卡莱尔看来，工人是受剥削、受压迫、受苦受难的阶级，他们需要真诚的同情和有产者的政权的帮助。卡莱尔真诚地相信某种超阶级的、全人类的正义，相信会有诚实善良、意识到自己对工人承担的社会义务的企业家存在。卡莱尔怀抱的这些希望同他的伟大的同时代人——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幻想毫无二致。除了这些类似的幻想之外，卡莱尔还深信，工人的阶级要求是正当的，他代表工人向当时英国的统治阶级呼吁：“我们大家真诚地希望工作并且能够做到这一点，而在这个地球上大量工作要做，付出的报酬要多百万倍。我们要问：你们是否打算带领我们走新辟的道路？……或者，你们宣布，你们没有能力领导我们，你们希望我们心安理得地失去领导，希望我们安安静静地饿死？你们还希望从我们这儿得到什么？你们想拿我们怎么办？我说，这个问题曾向整个不列颠大声疾呼过，而且还要提出，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直到获得某种回答为止。”^{①⑨}

在《过去和现在》的作者看来，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是需要刻不容缓地予以解决的、极其重要的时代问题。然而，在指出这个

^{①⑦} 同上书，第31页。

^{①⑧} 同上书，第23、24页。

^{①⑨} 参看上书，第25页。

问题的紧迫性时，卡莱尔倾向于把它归结为伦理问题，归结为应给劳动以公正的报酬。他试图使当权者感到羞愧，唤起他们的正义感，最后，使他们对别人产生怜悯心。“当代英国的不幸的工人，更不幸的寄生虫，不幸的男人和女人。我们还远远没有答案，而如果我们找不到答案，那么我们就不能生存。”“干一天公平的劳动应得到一天公平的报酬。这就是被统治者向统治者提出的请求……这是象福音书、加法表一样无可争议的人的永恒权利。这个权利应该实现并且将会实现。但是，在我们当今时代几乎不可能实现，无论付出多大的气力！”^⑳

虽然卡莱尔号召在雇工与雇主之间建立公正的关系，但是他远远没有要求二者在生活福利的享受方面有权利平等的思想。他从关于对每个人论功行赏的基督教伦理准则出发，运用这个真理来解决资产阶级社会阶级矛盾条件下的社会公正问题。卡莱尔毫不怀疑，在现存社会制度的条件下实现公正是可能的，哪怕非常困难。卡莱尔所欣赏的公正不单是指劳动应得到恰当的报偿，而且，也是指人（不管他的社会地位如何）的道德品质也应得到报偿。不仅工人，而且当权者的代表（哪怕他是一个寄生虫和坏蛋）都应按照功绩和贡献领取报酬。不过，卡莱尔还是把按劳取酬的原则作为解决社会公正问题的基础：“一天的劳动获得一天的工资！……须知，人类社会的进步正是使报酬与劳动越来越相称。做到这一点，你们给了我一切。每一个人干多少活儿，就请付给他多少钱，付给他挣得的，完成的，应得的；对这种人给予广泛的占有权和荣誉，对另一种人则给予高耸的绞首架和苦役。我还希望什么呢？我们每天求祈的天国已经降临；上帝的意志在地上已经实现，正象在天上已经实现了一样！这就是上天的正义的光辉……”。^㉑卡莱尔警告当权者说，如果迟迟不解决公正的劳动报酬问题，整个国家就会遭到无法防止的灾难。“如果千百万人不能继续生活下去，那么，极

^⑳ 同上书，第26页。

^㉑ 同上书，第28页。

少数人怎么能够生存？很明显，那样国家本身就会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①

从卡莱尔的宗教伦理观点来看，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受到的屈辱和压迫也激起了他的愤怒和不满。《过去和现在》的作者把中世纪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状况加以对比。他认为，在对待普通劳动者的态度上，中世纪比十九世纪文明的资产阶级要人道得多。卡莱尔感叹道：“曾经有过这样的时代，普通手工业工人无需借助于曼彻斯特的罢工向全世界宣告自己的要求：拥有‘大量人口’、需要、供给等等的世界，最近对劳动和报酬这个问题漠不关心到极点！”^②显然，这些话是在同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道德、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激烈辩论时讲的。不过，卡莱尔实际上是倾向于把中世纪理想化，这是历史学家和浪漫派作家所具有的特点。毫无疑问，这种观点使他接近封建社会主义。在卡莱尔看来，中世纪人民的生活比当代人民的生活幸福，其原因在于中世纪有虔诚的宗教，它的封建道德长于资产阶级的虚伪与精神空虚。卡莱尔的封建浪漫主义源泉是他的宗教道德哲学，而这种宗教道德哲学又来源于宗教改革、加尔文教、清教徒主张和早期资产阶级宗教伦理。当早期资产阶级宗教伦理也象卡莱尔那样真诚地意识到自己在道德上的正确时，曾经起来反对过时的、声名狼藉的、虚伪的封建—天主教道德。卡莱尔的世界观与他把封建时代理想化的做法是大相乖谬的。这种乖谬就在于，这位思想家的宗教—伦理的和泛神论的世界观，几乎完全根源于十六世纪的新教。几个世纪之后，他遵循着真诚的宗教和道德的那些同样的精神原则，企图赞扬封建世界及其道德，而卡莱尔听取忏悔的神父们——路德、廷得尔、加尔文——则狂热地、激烈地反对封建世界，他们几乎使用了同样的语言来揭露伪善者、虚情假意和自私自利。

尽管对卡莱尔赞扬劳动和赞扬忠实地履行自己在人间的使命

^① 同上书，第29页。

^② 同上。

的劳动者的、热情洋溢的言辞应给予适当的评价,但必须指出,这位思想家和科学社会主义奠基人,在对劳动的阐述上有原则的差别。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阐述他们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学说时,曾梦想这样一个完善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劳动将不仅是每一个人的义务,而且将不再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在科学社会主义奠基人所梦想的社会里,劳动最终将成为人类的快乐和享受的源泉,而这样的源泉不仅可能是摆脱了剥削的劳动,而且还可能是作为人类使命的劳动。虽然,卡莱尔对劳动采取了非常尊重,甚至热情赞颂的态度,虽然在他看来劳动是一种医治资产阶级社会的疯狂、精神空虚和道德堕落的良药,然而,这毕竟是一剂苦药。卡莱尔对劳动的神秘主义态度,带有加尔文教徒和清教徒的严格的禁欲主义的特点。在卡莱尔看来,劳动是一种幸福和义务,但也是一种苦难,是对个人的好恶的抑制。卡莱尔号召人们进行忘我的劳动,这种号召要求每个人对自己的任何劳动采取热心的、宗教式的虔诚态度,而这就使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十六世纪加尔文教徒的世俗使命的思想。卡莱尔在阐述劳动问题时,首先强调注意这个问题的宗教—伦理方面。卡莱尔认为“一切劳动都是高尚的”,任何职务,如果人们诚心实意地去履行它的话,都“充满着劳动”。卡莱尔不承认有轻松的生活——“无论对于人还是对于神来说都没有轻松的生活”。因此,“我们的最高宗教,就叫作崇拜苦难”。^②换句话说,卡莱尔在尊崇劳动时,不是把劳动当作一种快乐和幸福来颂扬,而是把劳动当作一种苦难,当作一种无法推卸的负担。幸福是根本谈不上的。追求“幸福”,在我们这位严厉的思想家看来,是由无神论造成的卑贱行为。卡莱尔几乎把无神论和“追求幸福的生活哲学”看作是一回事儿。^③当然,在卡莱尔批判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幸福观的义愤填膺的演讲中,包含着一种深刻的、基本上是公正的思想:“人不单是靠面包生活”,如果把生活的目的看作追

^② 同上书,第212页。

^③ 同上。

求享受珍馐美味这样的幸福，那是极端有损人的尊严的。当这位思想家嘲笑资产阶级的、庸俗的幸福观——“灵魂”=“肚子”——时，他无疑是正确的。一切把幸福看作人生最终目的的论断，都引起卡莱尔的毫不掩饰的鄙视和极大的不满。用卡莱尔的话来说，这种论断“在这个世界上的出现还不到两个世纪。男子汉大丈夫应竭力追求的唯一幸福，是完成自己劳动的幸福”。^②由此可见，尽管这位思想家非常关心劳动者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状况，尽管他真诚地、强烈地同情穷人遭受的苦难并满怀深情地憧憬着一个公正的社会，在那个社会中劳动将享有荣誉、将得到应有的奖励，但是卡莱尔的劳动观本身是禁欲主义的，充满了中世纪晚期刻板的新教的精神。社会不公正的主要原因在于当权者的虚伪和缺乏道德。卡莱尔把这个原因同无神论和庸俗实用主义这些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上的唯理论和功利主义的产物联系起来。由于当权者贪得无厌，已经丧失了对上帝的责任感，因此，他们不能成为下等阶级的真正领袖。

卡莱尔从道德的角度进行的批判，有意忽视各种试图解决社会问题的科学方法。卡莱尔认为，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法律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都不过是以科学为幌子的烦琐哲学。卡莱尔对所有这些可憎的和迷惑不解的“理论和公式”丝毫不感兴趣。卡莱尔确信，任何社会改革方案、任何社会设施和法律，在人的精神面貌没有改变之前，是没有能力把某项事情朝着好的方面改变的。卡莱尔指出十八世纪是作为这种企图改造社会的可悲的先例。“拯救世界的狂想带有无谓的伤感情绪的十八世纪的特点。这个世纪不值得我们效仿……我满怀希望地把拯救世界的使命寄托给世界的创造者。除此之外，最好稍许关心一下自己个人的拯救”，卡莱尔这样总结了自己的思想。卡莱尔认为，十八世纪启蒙时代产生的无神论和怀疑论、伪善和贪婪就是当代社会的各种罪恶的主要根源。“怀疑论世界是不诚实的世界，怀疑论是世界上不信神的谬

^② 同上书，第215—216页。

论！从怀疑论中产生了许多社会祸害——法国革命、宪章运动，如此等等，不胜枚举……所有这一切都要改变，而到那时之前，任何实际的改善都是不可能的”。卡莱尔在揭露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精神空虚和缺乏道德的表现的金钱权力时，竭力号召人们限制这种权力。卡莱尔的慷慨激昂的号召就象诅咒一样。“金钱确实能做许多事，但不是什么事都能做。我们应该知道金钱的势力范围，并把它禁锢在这个范围内，一旦它想超出这个范围，就抛弃它”。卡莱尔从撰写圣西门主义者十分感兴趣的《特点》时起，二十年来不断号召恢复社会公平。“财富正在巨大的规模上积累起来，但是，由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将之与财富划分开来的贫穷也在不断增长。财富和贫穷两者处于经常的矛盾之中，没有任何联系，就象两股处在对立两极上的力量……多么令人悲伤的景象！在文化发展的最高阶段，人类的十分之九都在和饥饿进行不懈的斗争，他们所使用的手段，不仅有野蛮人使用的手段，甚至有野生动物使用的手段。国家是富饶的，它们拥有各种各样的财富，然而，这些国家的居民生活贫困，他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外在的和内在的满足，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信念、知识、钱和食物。”^①在《关于英雄的讲演》中我们也读到同样的词句：“当代欧洲每一个国家的广大群众不能在现存条件下继续生活下去了，如果千百万人竭尽全力都已不能为自己挣得更多的食物……那么这意味着他们所处的生活条件已根本无法忍受了，必须改变它。”卡莱尔在《过去和现在》一书中评论当代英国时也谈到了同样的情况：“英国的状况……老实说是世界有史以来最危险也是最特别的状况之一。英国有各种各样的财富，但它还是要饿死。”^②

卡莱尔认为，当代对劳动的管理和领导，完全不能令人满意。以“不干涉”原则为基础的经济政策、谷物法、习艺所、劳动者的饥饿和贫困，这一切都是“不加管理”的结果，或者是“管理不当”——

^① 托马斯·卡莱尔：《评论和杂文集》，1899年伦敦版第3卷第21页。

^②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31页。

这丝毫也不比前者好——的结果。占有土地的人是英国贵族，他们担负着“领导和管理英国”的任务，但他们不能保证进行“真正的管理”，他们只能执行“不干涉”政策，也就是说，实际上实行“不加管理”的政策。因此，无所事事的英国贵族，尽管门第高贵，但不能自以为可以管理低等阶级。不仅如此，卡莱尔断言：“在这个世界上，谁不能够劳动，谁就不能生存。”“啊，不幸的人，回家去吧，至少，别吵啦，让我们安静一下吧！”^②这就是卡莱尔对不能胜任管理低等阶级的无所事事的英国贵族的判决。

但是，还有另一种贵族，即工业贵族，或者如《过去和现在》的作者所称呼的“劳动贵族”。这种贵族是否能胜任其管理社会的使命呢？“唉！这些能干的人把他们的聪明才智都用到追求剩余价值和攒钱上去了”。

总之，同圣西门主义历史观相似的历史观，对拥有能够保证劳动者利益的、完善的劳动组织系统的公平社会的空想，对资本主义社会剥削制度的尖锐批判，对劳动人民的深刻同情，——这一切就是卡莱尔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政论作品的最重要特点。卡莱尔在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中不是孤立的：与宪章派无产者一起批判资产阶级制度的弊端的，还有资产阶级激进党人、议会议员亨得利厂主和菲尔登厂主，另一方面，还有托利党人慈善家，他们组织了一个带有浪漫的封建主义色彩的团体“青年英国”。尽管恩格斯对封建的空想进行了嘲笑，然而，他还是怀着敬意评论了这些怀着善良的心愿起来反对现存制度的人：“他们有勇气承认现存制度下的一切卑鄙行为，这毕竟是难能可贵的。”^③在这些人中间特别提到了托马斯·卡莱尔的名字，他开始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时也是一个托利党人。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卡莱尔在这一阶段比上述资产阶级反对派的代表要“进步得多”。“他比所有的英国资产者都更深刻地了解社会混乱的原因并且要求把劳动组织起来”，恩

^② 《过去和现在》第23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83页。

格斯希望“已经摸索到正确道路的卡莱尔还能够沿着这条道路走去。”^①很遗憾，恩格斯的希望落空了。一个不久前还激烈批判资本主义的批评家，由于害怕人民群众起来革命，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动分子”。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用批判的眼光评价卡莱尔的反动观点时还是对这位作家的实际功绩作了应有的估计。“托马斯·卡莱尔的功绩在于：当资产阶级的观念、趣味和思想在整个英国正统文学中居于绝对统治地位的时候，他在文学方面反对了资产阶级，而且他的言论有时甚至具有革命性。”^②尽管在卡莱尔的世界观中存在着种种矛盾，尽管在他的晚期作品中存在着阶级局限性和反动性，但是，从这位思想家的《宪章运动》、《过去和现在》等著作中表现出来的对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态度来看，我们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卡莱尔在其早期的文学活动中是一个揭露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热情、有才华的政论家。毫无疑问，卡莱尔著作中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值得我们单独进行研究，否则就不能满意地解决这位思想家在空想社会主义史上的地位问题。单凭初步研究，是没有充分根据来给卡莱尔这样一个复杂而又矛盾的作家的思想遗产下一个硬性定义的。尤其是，单凭卡莱尔的世界观中明显地反映出来的资产阶级新教的特征和他对十九世纪堕落的、怀有毫无根据的社会—政治野心的封建贵族所持的毫不含糊的敌视态度，是没有充分根据把他看作一个封建社会主义的代表。我们认为，卡莱尔的社会观点相当接近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然而，只有对卡莱尔的社会观点进行专门分析，才能证实或者确定这个假设。

原载《社会主义学说史(论文集)》

1984年莫斯科版 第118—141页

(李锁贵译 李俊聪校)

^① 同上。

^② 同上书，第7卷第300页。

流亡者联盟中的早期 无产阶级纲领

〔民主德国〕沃·迈泽尔^①

根据我们对待传统和遗产的原则立场，1834年在巴黎建立的流亡者联盟，应该在德国工人运动的早期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其理由是，德国早期无产阶级中最先进的力量通过它取得了政治和思想上的独立，这个独立过程在两年后随着德国工人第一个独立的政治组织即正义者同盟的建立而臻于完成。

恩格斯在他的《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一文中就从上述的角度评价了流亡者联盟：“1836年，从德国流亡者于1834年在巴黎建立的民主共和主义的秘密同盟‘流亡者联盟’中分出了最激进的、大部分是无产阶级的分子，他们组成了一个新的秘密同盟——**正义者同盟**。”^②恩格斯本人没能有机会整理一下“收集的关于国际工人运动这一光辉青春时期的历史的丰富材料”^③。这项任务由弗兰茨·梅林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一书中完成了。在这本书中，他指出了导致流亡者联盟最终解体 and 正义者同盟建立的思想意识方面的种种分歧^④。应当感谢威纳尔·柯瓦耳斯基，是他根据历史资料第一次对流亡者联盟作了概括性的阐述，把它列为正义者同盟前史和产生的组成部分，他的阐述对我们总的历史观至今

① 沃·迈泽尔博士是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科学共产主义系工作人员。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87页。

③ 同上书，第186—187页。

④ 见弗·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1部分，1980年柏林版第94页及以下各页。

仍有影响。^⑤然而直到今天，无论是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还是按资产阶级的观点，都还没有对流亡者联盟的历史作出全面的阐述。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作个总的阐述不但有可能，而且也有必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在阐述这个联盟的特征时作出的各种不同的解释——“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的”（威·柯瓦耳斯基）、“德国共和主义社会主义的”（H·克勒纳尔）、“革命民主主义的”（W·赛德尔-赫普纳），——就说明了这一点。^⑥当前，在无产阶级理论和运动的早期历史领域里也展开着思想意识上的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进行这场斗争的目的在于，从历史的角度把保守的或社会改良主义的政策合法化，篡改和歪曲科学共产主义和革命工人运动的理论来源和阶级实质，这就更加需要对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尚未结合的那个时期作出有科学依据而且合乎历史的阐述。德国工人和转向他们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知识分子，早在流亡者联盟中就曾提出并讨论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年后着手科学解答的那些问题。早期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代言人之间的思想斗争——它导致正义者同盟的建立，而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则试图不顾事实否认或至少贬低这些斗争——标志着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德国无产阶级开始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形成为阶级并开始建党。

虽然流亡者联盟是1834年在巴黎建立的，它形成的历史却可以追溯到1830年七月革命的年代。^⑦这个时期，大约有七千名德国人，首先是流亡者和手工工匠居住在巴黎。他们不仅经历了革命，一部分人还非常积极地参加了革命。他们中间政治上最活跃的分

⑤ 见威·柯瓦耳斯基：《正义者同盟的前史和产生》（以下简称《前史》）。——译者注，1962年柏林版。

⑥ 同上书，第70页。H·克勒纳尔：《早期工人运动中的人权宣言》（以下简称《人权宣言》。——译者注），载于《国家和权力》1981年第6期第533页。W·赛德尔-赫普纳：《在争取一个更美好未来的斗争中》，载于《统一》1983年第9期第862页。

⑦ 魏特林后来甚至说：“流亡者联盟早在1830年就建立了……”（《工人共和国》1853年第9期）。

子同共和派协会如人民之友社和人权社保持着联系。他们很可能是在革命后不久建立的德意志歌咏协会的基础上，在巴黎的德国人中间开展政治工作的。由于这些努力，1832年二、三月份建立了支援自由报刊德意志祖国协会的巴黎分支。同莱茵普法尔茨的主要以自由立宪主义为目标的最初组织不同，该协会主要代表了共和民主主义的倾向，在组织形式上也把法国共和主义的协会作为榜样。领导委员会的成员有：店员海尔曼·沃尔夫鲁姆和格奥尔格·莱普海莫尔、工人纳翰·卡尔格、记者约瑟夫·加尔涅、酒店老板克勒格尔（他的酒店是德国手工业者聚会的地方），还有作家路德维希·白尔尼和亨利希·海涅。这种发展也由于七月革命在德国各邦引起的阶级斗争（亚琛、莱比锡和开姆尼茨的工人骚动，不伦瑞克革命，哥廷根、柏林、维也纳和黑森的革命骚动）以及1831年11月里昂织工起义而受到极大的推动。早期无产阶级力量的代言人开始自觉地把自已理解为“工人”，以此表明他们开始克服行会思想，阶级觉悟日益增长，并且散发宣传小册子《致巴黎的德国工人》。

1832年6月5—6日巴黎爆发了共和派起义，起义的失败使人民之友社被捣毁；1832年6月颁布联邦决议，在德国完全禁止了反对派报刊。这些情况构成了报刊联盟转变为德意志人民联盟的历史背景。这样一来，联盟不仅具有了更加严密的组织结构，而且还严格效仿人权社有了更加坚定的民主方向。如果说巴黎报刊联盟中成员们的政治立场还摇摆于自由立宪主义和民主共和主义之间，领导成员是具有雅各宾派倾向的共和主义者，那么，在德意志人民联盟中，由于占多数的早期无产阶级的压力，不久就继续出现向左转的趋势。在宣传小册子里提出了建立政治组织和民主的民族国家的要求，从而越来越多地反映了被剥削者的社会利益和需要。

早期无产阶级力量在德意志人民联盟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可以从1833年下半年领导集团多半由手工工匠组成这一事实中看出来。领导联盟的五人委员会，除法学家泰奥多尔·舒斯泰尔博士

外，由裁缝工约翰·舒马赫、机械师康拉德·诺伊贝尔、平版印刷工乌尔班·穆沙尼和排字工尤利乌斯·戈德施米特组成。每一季度改选一次主席，全都由工人担任（除舒马赫和穆沙尼外还有排字工A·N·古门）。专门负责出版宣传小册子的编辑委员会，自1833年秋起全部由工人构成。在1833年秋巴黎工人罢工浪潮的影响下，同法国阶级兄弟建立国际团结的思想活跃起来。早期无产阶级的代表沃尔弗冈·施特尔和尤利乌斯·戈德施米特在理论上受到了带有巴贝夫主义倾向的法国宣传小册子的影响，在实践中受到了巴黎裁缝们致力于建立联合会的影响。他们撰写宣传小册子致自己的《兄弟和朋友》，小册子第一次反映了无产阶级要求从政治平等走向社会平等的彻底性^⑧。正如施特尔后来的手稿表明的那样，他们主张的社会平等具有多半是平均主义的内容，尽管如此，它同时和联合的思想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带上了社会主义的倾向。虽然从平民的平均主义向早期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过渡，既不是直线条的也不是必然的，但它却表明了一种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随后几年在流亡者联盟中变为了现实。因此，宣传小册子《兄弟和朋友》标志着早期无产阶级思想的发展水平，德国工人共产主义就是以这种思想开始早期历史的。

1833和1834年之交，社会问题的讨论借助这些宣传小册子而具有纲领性。同时，在由早期无产阶级力量构成的广大成员中，进行着一场政治上的激进过程。在1834年12月8日的联盟全会上，经过热烈的讨论摒弃了君主立宪制，大多数人要求把共和国作为未来德国的国家形式，这证明了联盟的坚决民主的基本立场^⑨。

要实现宣传小册子中阐明的政治和社会纲领，除了宣传纲领外还需要在德国有一个组织基础。1834年1月起在维也纳举行的德意志联邦大臣会议，决定加紧镇压和迫害反对封建势力的反对派，尤其是反对派的左翼。因此，1834年初在巴黎匿名发表的一篇《一

^⑧ 见威·柯瓦耳斯基，《前史》第177—183页。

^⑨ 见上书，第47—48页。

个流亡者告德国人民之友书》，针对德国各邦的现状，要求建立一个秘密团体，其目的和方法规定如下：“为把德国从苦难的奴役桎梏下解放出来而采取共同行动是主要目的。散发具有启蒙作用的印刷品，为此目的征集自愿投递的稿件，使人民之友中间的通讯安全简便，用言行为伟大的解放之日作准备是近期目的。当前可以通过某种协会的形式达到近期目的。”^⑩这篇呼吁书的矛头不仅指向封建势力，而且已经指向资本主义，因为它不光严厉批判了诸侯，而且也严厉批判了“那些优裕的等级，如商人、工厂主、富豪和大地主”；同时为“无数贫苦农民、中等手工业者、短工和工人”进行辩护，指出“个别人手中财富愈多”，这些人的处境就愈难以忍受。^⑪可能是从1833年4月法兰克福袭击岗哨事件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它警告不要采取仓促的和孤立的武装行动。

呼吁书无疑为流亡者联盟的创立做了准备，它根据邦纳罗蒂的秘密协会阐述的组织原则也决定了不久后产生的家族社的结构建设。在这篇呼吁书发表的同时，还有两本宣传小册子在散发：一本是《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另一本是《一个流亡者的信条》。《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是邦纳罗蒂的亲密战友之一沙·A·戴斯特撰写的《草案》中《协会基本原则宣言》的德译文，它是在邦纳罗蒂的合作下写成的。《基本原则宣言》的条款是以罗伯斯庇尔提出的草案并部分地以1793年通过的宪法为基础的，但又被鲜明的巴贝夫主义思想所补充或修改。《公民权宣言》中最激进的基本原则是第十条（它要求经济权力隶属人民主权）和第四十九条（它规定，如果政府损害公民权，所有的人都有权举行武装起义来反对它）。同时，《宣言》也证明了空想共产主义从摩莱里经巴贝夫到共产主义者同盟创始者们这条平民和早期无产阶级路线的连续性。由于这种连续性，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推动力量所积累的经验传播到了德国。

然而，不仅《宣言》，而且作为它的评论而发表的《一个流亡者

^⑩ H·J·鲁克黑贝尔勒：《早期无产阶级文献》第122页。

^⑪ 见上书，第112页。

的信条》也与戴斯特的《草案》有联系。新巴贝夫主义倾向首先表现在要求实行累进税、强调劳动义务、要求社会生存和生存权优先于财产权诸方面。^②个别章节与邦纳罗蒂的著作有很多类似之处，尽管《信条》中某些地方是按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思想解释的，然而，从无产阶级的角度去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同时从中作出更加广泛的结论。尽管具有不可否认的巴贝夫主义的影响，但仍然不能说这些纲领性文件具有共产主义的性质。应当更多地把它们视为这样一种纲领，在这个纲领的基础上小资产阶级分子和早期无产阶级分子有可能为争取社会民主而在组织上联合起来。它们证明：日益明确自身利益的早期无产阶级，对反对封建势力的反对派运动左翼的纲领起着日益增长的影响；它同着眼于纯政治目的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划清了界限，同时也与社会上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纲领的日益加剧的推崇分道扬镳。

1833年2月底，法国政府通过了更加严厉的结社法，并宣布从4月10日起生效，人权社即法国共和主义反对派的中心感到自身的存在受到了威胁。里昂织工援用1793年颁布的公民权宣言，于4月9日举行起义捍卫自己的结社权。只是当他们经过英勇战斗被击败后，巴黎的共和派才于4月13日跟了上来。然而，他们的领袖被逮捕，起义被淹没在血泊之中，他们的报刊和组织均被禁止。在巴黎的德意志人民联盟领导人清楚地知道，反动浪潮在他们面前不会停息下来。在他们的主席穆沙尼的领导下，联盟领导人于5月2日召开会议，决定在地下继续开展工作。他们为此准备的章程草案表明，早期无产阶级力量力图建立一个符合本身利益的自己的组织。因此，关于预想的社会构成在这一点中做了这样的规定：“只有属于手工业者或艺术家阶级的人才能被吸收。”^③显而易见，这个条款是由于考虑到与资产阶级的阶级力量对比而

^② 见上书，第43、49页以及H·克勒纳尔，《人权宣言》第533页。

^③ 威·柯瓦耳斯基，《前史》第53页。由裁缝工舒马赫提议的那项条款没有写进流亡者联盟的章程之中。

提出来的，人们从这种对比中感觉到或已经把它看成利益冲突。刚刚通过里昂和巴黎四月起义得到验证的巴贝夫主义关于“富人对穷人的战争”的经验，对于条款的提出或许起了决定性的意义。

1834年5月11日，联盟召开最后一次公开全会，决定解散联盟并把它转变为一个秘密团体。与会者几乎一致强调：“无论在任何条件下，我们都是联盟的成员。”^⑭领导成员诺伊贝尔后来也证实说，流亡者联盟“开始时确实完全由人民联盟的成员构成”^⑮。因此，正如联盟法兰克福中央机关提出的“黑名单”表明的那样，联盟的社会基础在很大程度上由早期无产阶级分子组成。在记录下来的293名成员中，就职业来讲213名是无产阶级手工业者，53名属于资产阶级，27名未加以注明。^⑯不过上述说明的价值也是有限的，因为从职业中看不出到底是师傅还是学徒，而学徒仍然可能处于不同的剥削条件中。一半以上的无产阶级手工业者是以裁缝、木匠和鞋匠为职业的，而恰好来自这些职业类别的德国人在巴黎属于无产阶级阶层。

说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确保了自己在联盟中的领导地位，^⑰这只是部分地正确，因为即使在参与联盟创立和领导集团的“流亡者”中，早期无产阶级力量也占多数。除法律学讲师泰奥多尔·舒斯泰尔、作家雅科布·费奈迭和书商格尔哈德·帕佩尔外，曾在德意志人民联盟中担任过领导的无产阶级手工工匠或工场工人戈德施米特、古门、穆希尼、诺伊贝尔、舒马赫和施特尔，

^⑭ 同上书，第59页。柯瓦耳斯基把流亡者联盟的成立说成是在1834年4—5月至夏天这段时间里。但是为建立一个秘密同盟而做出的努力要追溯到1833年。1833年春，加尔涅根据马志尼的建议成立了“和解同盟”，穆沙尼、戈德施米特和诺伊贝尔也属于这个同盟，但它存在的时间不长（参看H·J·鲁克黑贝尔：《早期无产阶级文献》第17页）。同年制定了一个建立家族社的计划，计划被没收，存于巴尔贝斯的文件中。舒斯泰尔从这时起既同邦纳罗蒂也同马志尼保持着联系。

^⑮ 同上。

^⑯ 见《工人运动史论丛》1982年第8期第896页

^⑰ 见威·柯瓦耳斯基：《前史》第59、70页。

也在流亡者联盟中居领导地位。^⑮但是，如果想根据联盟的社会构成及其领导状况来推断它的政治性，那就把问题简单化了。对于这个问题的判断，章程和纲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流亡者联盟的结构建设，从组织和术语上看是以邦纳罗蒂、戴斯特和沃尔耶·达尔让松创立的“世界民主烧炭党人联盟”为样板的。它分为一个预备性等级，叫“种植与试验学校”，由三到十名成员组成的所谓“茅舍”构成，和一个更高的等级，这个等级起着“联盟长远目标的维护者”的作用，它下面再分若干“山头”，由“最高法院”来领导。正如各个“茅舍”（或帐篷）和“山头”（营地）之间为安全起见必须互不了解一样，对领导联盟的“民族茅舍”（或主要营地）更是严加保密。与这种阶梯式结构相适应的是分开的章程即《一般章程》和《山头章程》。^⑯

《一般章程》把“解放和复兴德国”^⑰这种非常一般的要求规定为联盟的目的，而《营地章程》则对联盟的纲领性目标作了比较详细的说明：“德国流亡者联盟的目的是把德国从可恶的奴役枷锁下解放出来，建立一种制度，让人类有足够的慎重来避免重蹈受奴役受贫穷的覆辙。只有首先在操德语和流行德国风俗的地区，然后也在世界其他各民族那里建立并维护社会和政治平等、自由、公民道德和民族统一，才有可能达到这个主要目的。”^⑱在这里，除了限于政治法律方面的资产阶级平等要求外，第一次以纲领的形式提出了扩展到社会领域的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尽管社会平等的要求充满矛盾，而且不是必然地或仅仅可以解释为共产主义财产公有制，它也可解释为财产的平均分配。但正是由于这一点，无

^⑮ 见《从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联盟中央机关1838至1842年关于德国革命运动的主要报告》（以下简称《主要报告》。——译者注）1978年柏林版第145页及以下各页、第219及以下各页。

^⑯ 见《德国流亡者联盟的营地章程和一般章程》，载于《共产主义者同盟。文件和资料》1970年柏林版第1卷第975—985页。

^⑰ 同上书，第982页。

^⑱ 同上书，第975页。

论无产阶级力量还是小资产阶级力量在开始时才有可能表明自己有志于此。这个纲领要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契约条件下”实现《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和《一个流亡者的信条》中提出的基本原则，这完全是矛盾的，^②即使这样的想法在各种各样的雅各宾主义和巴贝夫主义式的卢梭思想中也可以看到。

由于对待社会问题上的这种矛盾提法直接引起了以澄清问题为目的的讨论。随着里昂起义后阶级对立越来越明朗化，早期无产阶级群众在思想上的自觉程度也不断提高，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间也出现分野。这些过程也反映在从1834年7月起由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费奈迭在巴黎出版的杂志《流亡者》上面。费奈迭以讨论德国在推翻封建统治后的前途将会分裂民主运动为借口，设法阻止对社会纲领作任何进一步的特征描绘。他认为，纲领应当局限在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原则的范围内。至于工人们关于预言的“最大可能平等”的未来是个什么样子以及如何才能实现这种平等的问题，费奈迭不想给予回答，他认为探讨这个问题是“目光短浅或居心不良。”^③

相反，泰·舒斯泰尔在《流亡者》第二期上表达了联盟中无产阶级多数派的意见。在同费奈迭的论战中，他把自己充满巴贝夫主义思想的基本原则归纳为三点。他强调指出，他认为“只有一种社会真理：人类平等的真理，……只有一种实现这种美好愿望的手段：革命的手段”，只有一种能够而且关心进行革命的力量：“劳动者阶级”。^④他是这样衡量以往革命成果的：尽管它们带来许多进步但最终却加深了人民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痛苦。他警告不要拿革命作实验，认为必须通过使人民认清革命的目标来为革命做准备。他坚决反对把美国和瑞士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理想化，认为它们即使有一部民主宪法，但阶级斗争并没有停息。“为了商販

^② 同上。

^③ 《流亡者》第1卷第4册第147页。

^④ 泰·舒斯泰尔：《为争取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而斗争》，同上书，第5册第202页。

的利益而砸碎国王的枷锁”^②还不够，重要的是“通过社会革命而彻底消灭特权阶级”^③。舒斯泰尔提出的社会革命的要求（同时期家族社中也提出过这种要求），虽然还不完全明确，但却有助于新巴贝夫主义者以及后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划清无产阶级纲领同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的界限^④。舒斯泰尔这些基本观点足以驳斥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说法，即他与费奈迭之间没有过“思想原则上的分歧”^⑤。

虽然费奈迭在回答舒斯泰尔时首先把启蒙和革命行动的关系看作他们意见分歧的焦点并且置自发性于自觉性之上，但同时仍然可以看出，他所设想的目标没有超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范围^⑥。至于费奈迭不愿在辩论中加以澄清的这些“分歧”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联盟一个领导成员、裁缝恩克说道：“……共和国是联盟的最终目标。我记得，舒斯泰尔博士有一次说应把财产公有制加进去，对此费奈迭明确表示反对，说他在自己的观点中还没有走得那么远。”^⑦

在关于“为争取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而斗争”的讨论中，无产阶级分子是推动力，因为问题是要弄清他们应当为什么而战。他们的代表之一沃·施特尔在他1835年的《来信》中也对这次讨论阐明了立场。虽然他认为“要使革命取得成功，最重要的是事先对革命取得一致的看法”，^⑧但却对舒斯泰尔呼吁在理论上认清革命的目标产生了误解，把它看作是向他认为应给予肯定的费奈迭的小

② 同上书，第217页。

③ 同上书，第212页。

④ 见J·赫普纳和W·赛德尔-赫普纳合著：《从巴贝夫到布朗基》1975年莱比锡版第1卷第239页；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83、614页。

⑤ W·席德尔：《德国工人运动的开端》1963年斯图加特版第191页。

⑥ 见《流亡者》第1卷第6册第245页。

⑦ 《主要报告》第125页。

⑧ 沃·施特尔：《一个瑞士人从巴黎的来信》，收于J·格朗若和M·维尔纳合著：《沃·施特尔的〈一个瑞士人从巴黎的来信〉（1853）》第42页。再见第38页和注释173。

资产阶级革命主义后面倒退,尽管他对舒斯泰尔本人非常推崇。但更为重要的是:施特尔的《来信》证明了1835年前后在流亡者联盟中就平等的纲领展开过一场广泛而深刻的讨论。施特尔甚至把平等区分为四种形式:“法律面前的平等”、“权利平等,平等地履行权利”、“财产平等”和“财产公有制”。虽然他本人赞成带有左翼雅各宾派特征的平民平均主义的财产平等,但他同时又把财产公有制本身理解为“平等地履行权利、法律面前的平等和财产平等”。^②除了对圣西门观点和拉梅耐“信仰口号”的了解外,施特尔的《来信》表明他直接采纳了邦纳罗蒂的“为巴贝夫的平等而密谋”。^③施特尔自己没能完成向工人共产主义的迈进,但是,他为早期无产阶级转向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提出一条途径,这条途径以其不同的平等观念和对财产公有制的积极评价为走向共产主义观点创造了可能性,这一点是他应有的功绩。

1835年春,法国政府应普鲁士的要求把费奈迭逐出巴黎,这以后《流亡者》报编辑部实际上转入舒斯泰尔手中。从此,他可以利用这份报纸阐述他的“一个共和主义者的思想”。这些思想表明,联盟在纲领上继续向左转,转向带有新巴贝夫主义倾向的观点。有人说舒斯泰尔与邦纳罗蒂有联系,所以,费奈迭在自传体回忆录中发出的抱怨,可能也把舒斯泰尔包括在内。费奈迭抱怨说,1835年,他曾无济于事地设法“阻止邦纳罗蒂的学生们企图向德国工人宣扬的那种共产主义渗入到德国各协会,并设法使这些协会保持纯粹政治宣传的性质。但是当他第一次被流放到勒阿弗尔时,共产主义学说的信仰者在联盟中已经取得如此影响,以致于只好对他们听之任之,财产公有派及其反对派之间的公开决裂瓦解了联盟”。^④

^② 同上书,第36—37页、注释172。

^③ 同上书,第22、35页、注释171。

^④ II·费奈迭:《雅科布·费奈迭》1930年斯托卡赫版第76页。见雅·费奈迭:《约翰·汉普登》1813年康斯坦茨附近贝尔维尔版第142页。

舒斯泰尔的《一个共和主义者的思想》是向后来正义者同盟提出财产公有制的纲领性要求迈出的又一步。他不期望靠富人支持通过自由主义改革或靠一场政治革命改变国家形式来解决社会问题，而是期望靠无产阶级即“创造一切而又缺少一切的穷人阶级”的阶级斗争来解决社会问题。阶级斗争在巴贝夫主义的意义上被理解为富人同穷人的战争，并被圣西门主义阶级概念的理论内容加以充实；它通过雷诺的学说流传下来^⑤并为四十年代工人共产主义者所接受。舒斯泰尔用里昂织工的战斗口号号召德国工人：“劳动不得生，毋宁战而死；消灭少数人的巨富借以消灭大众的贫困；这就是从此以后流亡者的格言，无产者的战斗口号。”他向资产阶级宣战：“你们不是无心过问社会改革吗？那好，你们就在社会革命面前俯首称臣吧。”^⑥

舒斯泰尔从社会后果的角度对资本主义工厂制度进行了批判，在这点上同西斯蒙第相一致，但这却不能成为足够的理由称他是西斯蒙第式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⑦特别是因为后来的工人共产主义者也有这种一致性。同他们一样，他赞成加速工业发展，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日益富裕的潜在可能性，并在“机器不再为少数资本家致富谋利”和“工人在工厂中具有根本不同地位”的前提下，减轻劳动负担，缩短劳动时间。“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和最重要的手段无疑是社会化。”^⑧他把社会化理解为靠国家贷款创办数以千计的国家工场（他认为，同小规模经营相比，国家工场的优点在于能“集中和调配力量”）、在农业和商业中建立联合体以及

^⑤ 见H·J·鲁克黑贝尔勒：《早期无产阶级文献》第172页；J·赫普纳和W·赛德尔-赫普纳合著：《从巴贝夫到布朗基》第1卷第130—131页。

^⑥ 泰·舒斯泰尔：《一个共和主义者的思想》第176—177页。

^⑦ 见威·柯瓦什斯基：《前史》第78页。《国际工人运动。历史和理论问题》1980年莫斯科版第1卷第327页。舒斯泰尔的文章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7页）并不是针对他们。

^⑧ 泰·舒斯泰尔：《一个共和主义者的思想》第160页。

修建“大型国家设施（铁路、运河、国家工厂、医院、学校、公共纪念碑等）”。同时他也想通过国家发放贷款向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展示一幅远景，但他显然认为国家发放贷款只是一个过渡性解决办法，因为在他看来只有“联合”即“社会化”才体现着未来。^⑳

总之，舒斯泰尔的纲领显然不能算是共产主义的。从许多方面来看，他的社会主义观点是路易·勃朗社会主义观点的预先阐述。但重要的是，他们在一些问题上有所区别，这些问题使勃朗带上小资产阶级的性质，因为舒斯泰尔相信无产阶级的力量，不相信有产者的自愿舍弃。他宣布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有义务举行起义以反对暴力统治，要求把统治者的经济权力作为其政治权力工具（警察、常备军、法庭）的基础加以剥夺（因为他知道，没有社会自由就不可能有政治自由），从而为德国早期无产阶级规定了一个具有巴贝夫主义倾向的方针。一方面，舒斯泰尔的纲领同纯政治民主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划清了界限，同时又以其社会革命和社会化的要求承认了财产公有制。最先进的无产者也是这样解释这个纲领的。魏特林视“国家工场……为财产公有制的前奏”，多年后他仍然高度评价舒斯泰尔的纲领，认为它同费奈迭、莫伊勒等人的观点相比“最为先进并且最明确地表达了运动的目的”。^㉑舒斯泰尔宣传的国家工场的思想是与法国工人中普遍存在的建立联合体的努力联系着的，这些努力早在人民联盟中就引起过热情的关注。他不象后来的勃朗那样，认为这是使资本主义和平转变为一个社会平等的社会的一种可行办法。

无产阶级的纲领把争取建立民主共和国作为斗争方向，这个共和国不被看作革命的最终目标，而被看作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和阶级对立的社会的手段，在这个社会中，劳动是所有人的义务，生产和交换将要社会化，并且在这个基础上，科学和技术成果将用来

^⑳ 见上书，第174—175页。

^㉑ 威·魏特林：《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1838），收于威·柯瓦耳斯基：《前史》第218页。威·魏特林：《自由与和谐的保证》，1955年柏林版第290页。

为劳动者的利益服务。纲领的这些目标按历史发展水平来看是可能的。与手工业、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和经销制占优势的状况相适应，德国无产阶级大都是由无产阶级化了的手工匠、家庭手工业工人和手工工场工人组成，但他们以直接受资本主义剥削的雇佣工人的身分属于正在形成的统一的无产阶级。^①此外，大批小生产者也正刚刚开始向无产阶级过渡。由于在一个纲领中试图顾及到各种不同的利益，所以在舒斯泰尔的《一个共和主义者的思想》中既有小资产阶级的要求又有早期无产阶级的要求。它不是一个专门的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无产阶级的纲领，但总算是推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反资本主义的一个早期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行动计划。舒斯泰尔所宣传的不少思想——把信贷和运输集中在国家手中、累进税、建立国家工场、创立民主共和国——还作为无产阶级为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进行阶级斗争的行动口号写进1848年《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中。^②

早在德国人民联盟中就曾为把德国三月革命前期反对派影响下的德国早期无产阶级从政治上组织起来采取了步骤。流亡者联盟把这些步骤继续下去，它在秘密斗争中经受锻炼、在遭受政治迫害的条件下从事鼓动和宣传工作。随着工人们掌握文化，他们越来越能够在宣传小册子中表达自己的利益。由于民主运动和自发工人运动的最初形式相互接触的结果，早期无产阶级参与了争取建立一个共和主义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斗争，同时要求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同自由派划清界限，要求它在纲领中大力强调社会内容。他们中的一些人，如舒斯泰尔，开始认为无产阶级独立的社会目标就是他们自己政治斗争的目的。政治上的和思想上的阶级斗争的经验擦亮了工人们的眼睛，以认识自身的状况，作出面临的抉择。

① 见W·施密特：《关于三月革命前和1848—1849年革命时期社会结构和政治思想的几个问题》，《工人运动史论丛》1965年第4期第645页及以下各页。H·茨瓦尔：《德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1980年科伦版第81页。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3—5页。

1835年开始的对财产公有制的讨论，表明了起初人数尚少的早期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思想成熟过程已达到声明要求组织形式也跟上来地步。

三十年代中期，很能反映巴黎最先进的德国工人的特征的那些观点，是把对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认识同自身的斗争经验溶合在一起，并同阶级觉悟的水平相适应，这种水平虽然还不具有科学地认识阶级状况和解放条件的能力，但从本质上说却不低于法国和英国工人。1835年左右，流亡者联盟在一些纲领性问题上强化了它的有利于工人利益的方针，然而，组织结构却阻碍了联盟中的民主讨论和卓有成效的宣传。使惯于生活在被压迫和被剥削状态下的工人们懂得一致行动的力量和建立一个联系牢固的组织的必要性，帮助他们发现和发展自己的道德才能和智力才能，训练他们的政治判断力并相信他们有能力建设一个新社会，所有这些都要求在组织的内部生活中实行民主化，而做到这一点在非法条件下当然是困难的。

一些失败的行动，如法兰克福袭击岗哨事件和萨瓦进军，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如费奈迭拒绝将要建立的新社会的面貌加以讨论，在《一般章程》中没有提出符合工人利益的目标，这一切不仅使早期无产阶级群众大失所望，而且促使他们起来直接反对无条件服从的要求。两个事件可能对加剧这个过程起了促进作用：秘密协会“青年德意志”的成员1836年被驱逐出瑞士，他们当中的卡·沙佩尔、格·魏森巴赫和C·F·霍夫曼去了巴黎并在那里的流亡者联盟中为建设独立的工人组织继续做出自己的努力。其二，由于奸细告密，一个生产炸药和子弹的工场被破获，此后家族社也被发现并被整垮，这也加重了怕被卷入与自身利益不相关的事件中去的恐惧情绪。^③因此，就在章程问题上必然地展开了争论（结果产生正义者同盟），这件事突出地并且不容置疑地表明作为早期无

^③ 见《共产主义者同盟。文件和材料》第1卷第91页上关于被捕同盟盟员陈述的报道。

产阶级建党来理解的这个过程的阶级性，而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却一再否认这种阶级性。

对于德国工人运动史来说，流亡者联盟的意义无疑首先在于直接为共产主义的正义者同盟作了准备，但其意义还不仅限于此。由无产阶级特使在德国建立的流亡者联盟分支，从社会构成和纲领上看从一开始就比在巴黎的更具有无产阶级倾向。在瑞士建立的“帐篷”至少间接地为魏特林在四十年代初的鼓动打下了基础。

流亡者联盟中理论的和纲领的发展，为组织原则展开的争论以及群众与领导的社会构成，真实地反映了与此同时在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进行的无产阶级化和阶级形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法国较先进的状况、法国工人的政治社会经验、雅各宾主义和巴贝夫主义的观点起了催化剂的作用。因此，流亡者联盟表明自己不再是纯粹小资产阶级的组织，但也还不是纯粹无产阶级的组织，尽管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从根本上失去了地盘，而且通过平民平等的和早期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观点为工人共产主义敞开道路。

如同姊妹组织家族社在法国无产阶级运动中占有重要地位一样，流亡者联盟在德国工人运动的早期历史中也同样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它的纲领的发展反映了德国工人共产主义的形成过程，这种过程以魏特林的《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而告结束，同时也帮助开辟了通向《共产党宣言》的道路。

原载《工人运动史论丛》1984年第2期

（高爱贺译 李成毅校）

恩格斯 1849 年夏在 瑞士的政治流亡

(史料综述)

[联邦德国]米·克尼里姆^①

“你从苏黎世的出版社那里可以知道,最近我扎扎实实地做了些工作,并且利用机会重温了 1818—1819 年美妙的青年时代所写的一些东西。这显得非常必要,因为年青一代已经忘记了或者从来就不知道这一切,他们现在希望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事,鉴于存在着大量捏造的材料和报道,所以必须使他们尽可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②

革命的失败使它的参加者被迫流亡,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流亡状态造成大部分流亡者联系中断,与世隔绝。然而,由孤独产生的作用也是巨大的。恰恰是这种隔绝状态使恩格斯由对过去革命组织的军事方面的缺陷的思索转向对革命的士兵因素的研究。一系列事件改变了恩格斯的看法:民主派资产者和后备军成员并不是共产主义者恩格斯所说的工人营。他认为,在 1849 年,社会矛盾还没有成熟到进行一场社会革命的程度。

因此,瑞士仅为其中一站的流亡道路,也需要进行详尽的描述。这里有意不去从思想史的角度作出说明,更何况史料考证是一切说明的前提。

对巴登革命的经过,特别是维利希志愿部队中各个成员的表现,在其他地方,甚至通过恩格斯自己,已经或多或少地作过准确、

^① 作者是联邦德国乌培塔尔“恩格斯故居”负责人。——译者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第 391 页。

详细、充分的描述和评价。本文的目的和意图在于根据保存的文件按时间顺序对恩格斯所经历的事件加以描述。但是，我们打算也不可能叙述得十分完整。

恩格斯在此之前曾经两次在瑞士的广大地区作过旅行。因此，他对一些州的状况是比较熟悉的。此外，他在这个国家还与熟人和朋友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这些人中不仅有运动的参加者，也有资产阶级阵营的人。

恩格斯第一次到瑞士是在1841年5月和6月，那是和他的父亲一同去的。他在《漫游伦巴第》^③这篇文章中曾对这次旅行作过描述。此行的动机是纯商业性的，他的父亲要到莱科和米兰办事。对恩格斯这个刚刚在不来梅满师的年轻商人来说，这次旅行对开阔他的精神境界也许大有好处。

第二次在瑞士逗留出于政治方面的原因。1848年3月30日，法国政府为他签发了一张有效期为一年的旅行护照。他带着这张通行证，于10月20日从巴黎启程前往伯尔尼，途经日内瓦、洛桑和纽沙特尔。他从11月23日起便呆在伯尔尼，并于1848年12月9日得到了在这个州逗留到1849年4月1日的准许。然而，1849年1月18日，在避难约九周之后，他就离开了这个城市，为的是重返科伦担任编辑职务。

第三次逗留从1849年7月12日开始，与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失败有直接联系。这一天，恩格斯和巴登罗特什泰顿的维利希志愿部队的余部一起越过了埃格里绍的瑞士边界，他在致燕妮·马克思的信中说，他“发现，备受赞扬的冲锋陷阵的勇敢是人们能够具备的最平常的品质。子弹飞鸣简直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情；在整个战役中，虽然发现不少胆怯的行为，但我并没有看到多少人在战斗中畏缩不前，而‘蛮勇举动’却不知有多少！”^④

根据现存资料，当时维利希的志愿部队约有二百八十名军官、

^③ 同上书，第41卷第184—196页。

^④ 同上书，第27卷第525页。

军士和士兵。瑞士当局竭力把这批逃亡者尽快地引向别处。恩格斯所在部队被安置在窝州。7月14日深夜，恩格斯住在苏黎世的“席夫”旅馆，维利希也下榻在同一所房子里，恩格斯很可能与“伯桑松”连的一个普通士兵克利斯蒂安·劳合住一个房间：

[……]在本城旅店中留宿的外国人：巴登上校维利希先生、巴登的流亡者劳先生和恩格斯先生。

威廉·沃尔弗在8月28日写给洛桑的恩格斯的信中也证实了恩格斯曾到过苏黎世。他写道：“你和维利希途经此地，并到过黑费莱。我第二天便听说了此事，仅仅晚了一小时。”

沃尔弗的信绝不是恩格斯7月或8月在苏黎世逗留的唯一证明。此外，沃尔弗大概听错了，不是“黑费莱”而是“黑尔费赖”，这个苏黎世济贫机构在基尔希街十一号。

下一站为伯尔尼。维利希志愿部队的人于7月20日从那里出发，向穆尔顿行进。在伯尔尼流亡者档案中，此时仍列有二百零八名志愿部队的成员：

编号	军衔	姓名	籍贯	职业
1	上校	维利希，奥古斯特	普鲁士	军官
2	副官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	普鲁士	作家

[……]

恩格斯于7月24日到达斐维，这说明了他每日行程约二十五公里。在上面引用的1849年7月25日给燕妮·马克思的信中，他写道：“[……]于昨天到达了斐维这里。在战役中以及在进入瑞士的行军途中，我根本无法写信，即使只写一行也不行。”^⑤

恩格斯和其他军官极可能是住在“勒茫湖旅馆”。他自己在1882年9月20日从伦敦写给劳拉·拉法格的信中提到了这一点：“[……]我熟悉斐维吗？要知道，1849年9月我在那里驻扎过两星期左右，我熟悉从维耳纳夫到日内瓦的瑞士沿湖一带的地方，熟

^⑤ 同上书，第526页。

悉米迪峰和勃朗峰等地。如果我没搞错的话，我们军官们就驻扎在你们住的岸边的旅馆里。当时维利希常在湖边树荫下的空地上训练他的两匹马。”^⑥

恩格斯在事隔三十多年后除了弄错了月份，其基本陈述是不容置疑的，这一点还有少数保存下来的资料为证。我们从8月3日的一个名单中得知，恩格斯实际上在斐维驻扎了仅十天。罗尔夫·德鲁贝克第一个指出，恩格斯不久便去了莫尔日。7月18日，被称为“巴登人”的第一批德国政治流亡者曾在莫尔日被人提到过。7月21日已经有三百名志愿部队的士兵聚集在那里一个旧的制盐场。显然，恩格斯也免不了要住在这个存在至今的破旧的房屋里。

1849年8月3日送到莫尔日的一份维利希志愿部队“伯桑松”连的名单中写着：

“[……]维利希上校参谋部：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28岁，巴门，比利时人，文学家，副官。”

出于某些至今尚不明了的原因，恩格斯在这里出示的是比利时护照。

在并非每日都保存下来的少量关于在莫尔日的流亡者分队的“兵员报告”里，虽然也一再提到恩格斯，但是，直接的关联却不甚明了：“[……]1849年8月10日

参谋部的恩格斯，8月10日休假
[……]

1849年8月11日

参谋部的恩格斯，8月10日—11日
归队。”

恩格斯也许利用这一天乘便去了日内瓦。不管怎样，他在约十四天后写给约瑟夫·魏德迈的信中说：“最近我在日内瓦看到了你们的红色贝克尔，他非常愉快，在乡下同德孚众望的埃塞伦和其他

^⑥ 同上书，第35卷第357—358页。

和蕩可亲的*diis minorum gentium*一起喝酒。”^⑦

恩格斯此时手头很拮据，他母亲在8月13日信中提到的、已由巴塞尔拉罗舍银行办理的那笔钱最早也要在8月10日左右才能收到。恩格斯有可能在日内瓦拿到了这笔钱。在母亲信上写着地址的那面，他记下了四个洛桑的住宅广告。从邮戳来看，这封信是8月19日发到莫尔日的，因此，他最早要在19日之后才可能考虑搬到洛桑的具体步骤。信封上除了其他地址，还记着他后来的地址：

“拉帕吕德广场8号带有漂亮家具的房间，三楼。”

这是一个咖啡馆，主人是某个叫让-鲁道夫·科埃陶克斯的人，这里二、三层的房间有时也出租。

如莫尔日军队兵员报告记录所证实的那样，恩格斯从8月22日起便住在洛桑的上述地址：“[……]1849年8月22日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副官，
8月22日到洛桑休假。”

到达洛桑的第二天，他在上面提到的那封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约瑟夫·魏德迈的信中写道：“[……]经过了同流亡者队伍一起在窝州度过的一个月枯燥的宿营生活，我终于来到洛桑这里，开始了独立生活。”

恩格斯仍然正式住在莫尔日宿营地，他到洛桑被看作获准离队休假，甚至1849年9月17日莫尔日的一份记录中还这样写道：“[……]参谋部，恩格斯，弗里德里希，副官，9月17日休假。”

除了作家的的工作，恩格斯还必须设法搞到一张旅行护照。他也果真搞到了一张9月11日签发的护照：

旅行护照 [……]210，1849年9月11日星期二

在场人：国务参事布里阿特先生；洛桑市长受命将护照交付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3.恩格斯，萨克森地区巴门人

^⑦ 同上书，第27卷第535页。*diis minorum gentium*，直译：小神；转义：二流人物。

[!],政治流亡者在莫,尔日宿营,欲经皮蒙特和西班牙前往英国。[……]

旅行护照内容如下:

编号 1279

姓:	恩格斯,作家
名:	弗里德里希
籍贯:	普鲁士,巴门
年龄:	28岁
身高:	5.98英尺或1.79米
头发:	栗褐色
前额:	高
眉毛:	栗褐色
眼睛:	棕色
鼻子:	小
嘴:	不大不小
胡须:	栗褐色
下颚:	圆
脸:	椭圆
皮肤:	浅色
特征:	/

有效期从1849年9月11日开始,为期一年,以便经皮蒙特和西班牙去英国,并在那里停留。司法和警务部签发1849年9月11日

持有人签字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在护照登记簿上写着: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28岁,洛桑,英国

1849年9月11日交付持有人

1849年9月11日[……]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流亡者,

护照 210—3[……]

填发护照的当天，国务参事乔治·弗朗索瓦·布里阿特就为在联邦议院签证一事写信给在伯尔尼的副主席昂利·德律埃，恩格斯甚至曾称他为“路易·勃朗型的社会主义民主主义者”。^⑧

[……]恩格斯先生，爱北斐特人[1]，流亡者，欲经热那亚、西班牙去英国，本部已为他签发护照，您若认为给恩格斯先生办理护照合适的话，请接洽此事。我特意代恩格斯先生向您问候。[……]

昂利·德律埃一定立即办理了此事，因为撒丁王国驻伯尔尼公使9月14日作出了答复：

[……]按照您的愿望，我将抓紧为赫林格尔(海因岑?)先生和司徒卢威先生的护照办理去热那亚的签证手续。至于第三张护照(恩格斯先生的)，我在信封里没有找到，我想也许是它漏装了；或许您改变了为他签证的主意。

[……]

在这期间，恩格斯曾亲自到过伯尔尼，以加速办理此事。日内瓦州、日内瓦市的护照登记簿表明，恩格斯在伯尔尼“正式”逗留到9月17日。实际上，9月15日他便已在那里和威廉·沃尔弗会晤过。

摘自日内瓦州护照登记簿：

文件： 1849年9月11日洛桑护照

姓名：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

年龄： 28岁

职业： 作家

籍贯： 普鲁士

住址： ——

护照上次签证记录：伯尔尼，1849年9月17日

交还护照日期：1849年9月28日

^⑧ 同上书，第6卷第73页。

目的地：热那亚

依此推断，9月18日到9月28日期间恩格斯在日内瓦。在那里，他碰到了波克罕、席利，并再次与李卜克内西相逢。他也许有时还郊游，去“皇家咖啡馆”。

随着去撒丁—皮蒙特的过境迁证的发放，那里的各官署开始忙碌起来：

[……] 当事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我紧急通知您，本部已批准穿过我们王国的过境签证，正在瑞士的上述普鲁士人恩格斯将从这里乘船前往热那亚。对他的限制和约束与对司徒卢威先生和海因岑先生所通告的相同，二者皆为巴登革命的领导人，恩格斯也是。

我必须告诉您，至于他们的护送问题，尽可能让那些军官去办理。何时何地调换哪个或哪些宪兵，由他们来决定；这些宪兵的酬金必须由被护送的人来支付。他们可以使用自己的车辆，也可以使用公共的交通工具，如：一节车厢或一辆轿车，但是，他们必须租下所有的座位，以便和那个或那些宪兵单独在一起。[……]

[……] 编号 540

致 遵照您本月18日（政务86号）函件的委托，
舍伐利埃 我已就三个政治流亡者海因岑、司徒卢威和
法里纳 恩格斯向内务部作了报告。这几个人将穿过
1849年9月27日 王国的诸公国前往美国或英国，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将对莎姆伯里和阿讷西的地方行政长官作出必要的指示。[……]

海因岑
司徒卢威
和
恩格斯

由此才得知,为什么恩格斯在10月5日,即乘船前往伦敦的前一天,写信给在热那亚的乔·朱·哈尼:“能够这样快地找到好机会,摆脱这种可诅咒的警察气氛,我感到非常庆幸。我确实从来没有看到过象皮蒙特这里组织得这样好的警察。”^①恩格斯在从瑞士边境到热那亚途中不得被皮蒙特的宪兵们跟在后面强行护送。

旅客登记簿和到达证明文件表明,恩格斯于11月12日到达伦敦港。

编号2557		伦敦港		到达证件	
到达日期	姓名和国籍		来自何港	备注	
1849年11月12日	弗里德里克·恩格斯[!] 职业:作家 生于普鲁士		康沃耳钻石号自热那亚	1847年离开(英国)持有政府的护照	
持有人签字: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军港监督签字: 法比安		

旅客登记簿摘录:

[……] 我, 签名者“康沃耳钻石号”船长, 于热那亚至伦敦港途中[……]
船长姓名: G·P·斯蒂文斯

编号	姓名	职业	国籍
1	弗里德里克·恩格斯[!]	文学家	普鲁士

G·P·斯蒂文斯填于
1849年11月12日[……]

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研究院年鉴 6》1983年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367—375页

(朱 霞译 籍维立校)

^① 同上书,第27卷第536—537页。

燕妮·马克思(女儿)致路·库格曼^①

—

1870年11月19日

亲爱的朋友们：

自从接到你们亲切的来信以来，我曾很多次要给你们回信，但每次都被这个人或那个人的到来所打断。我们家简直象个蜂窝，供法国流亡者使用，有个青年在我家住了六天，尽管他一直都在法国生活，而且他连一句德国话都不会说，可他却接到了在48小时内离开法国的命令，就因为他的父亲是普鲁士人，可他父亲死时他还是个婴儿呢。国王和大臣们终于得以煽起野蛮的民族情绪并为此兴高采烈。

我从你们的来信中得知你们对我们的挂念，甚感抱歉，我对因我未能复信而引起的这种挂念，深感不安。如果我告诉你们：从海外¹回来后的二个月内我生了一场大病，我一生中从未这样病过，那么，我亲爱的“医生”和您·特鲁特亨，或许你们对我的抱怨会比我的自我抱怨要少些。一场肋膜炎发作，使我的身体衰弱得至今才勉强得以写信。几个星期来，我的体力在缓慢地、正常地恢复，但愿不久可以完全康复。然而，照我目前的健康状况，我不可能到汉诺威旅行（即使没有早晨的那些杂务缠身也是一样），因而也就不能接受你们的热情的邀请。不过我还是为此而衷心地感谢你们，虽然我不能同你们在一起，但是我的心同你们在一起，这就象我往

^① 法国《思想》杂志1957年9、10月号总第75期发表了燕妮·马克思(女儿)致路·库格曼的十四封信。本刊选译的七封信反映了燕妮·马克思对当时的国际工人运动和法、英、德等国发生的政治事件的关注和态度。——译者注

返于伦敦与汉诺威之间一样。

至于摩尔明显的懒惰，我不想为他辩护。他应当对自己的现状负责，隔一两天他会给你们去信。同时，我能有幸地告诉你们，他的沉默并非原于疾病。现在他的健康状况比每年这个时期都要好，毫无疑问，这要归功于我们能干的恩格斯博士所采取的有力措施。恩格斯（或者象我们现在称他为“总参谋”：总参谋的头衔来自他在《派尔-麦尔新闻》专栏上发表的伟大军事论述²；参谋的头衔得自《费加罗报》的喜剧性的失误，该报在谈到“总参谋”时暴露出它的愚昧无知，因为它还以为确有其人呢。）如今住得离我家很近³，他偕同摩尔进行长距离散步，这比任何药物治疗都见效。我们天天见到“将军”，并且和他一起度过很愉快的晚上。几天前的一个晚上，我们在家里举行了庄重的爱国主义演出。其间摩尔和“参谋”伴着“酒歌”的曲调演出了**莱茵河上的守卫**。

亲爱的特鲁特亨，对你们最近的来信，我唯有再次向你们致谢和告诉你们已经安收无误。你们在信中殷切地向我打听劳拉和拉法格的消息。他们在色当会战之前离开了巴黎，这次会战是“帝国丑剧”的转折点。打那时起，他们居住在波尔多⁴。保尔力图使波尔多人从麻木的状态中振作起来，费了很大气力，他为此办了一种名为《国防报》的报纸。然而他枉费心血，报纸也寿终正寝了。波尔多人，这些个典型的资产者，把他们的全部热情用于挣钱和吃喝，对于他们来说，究竟用普鲁士人的后膛枪还是用法国人的狙击炮来维持社会秩序无关紧要。他们所怕的只是日夜出现的幽灵，即**赤色幽灵**。总而言之，在全法国，统治阶级对消灭“赤色分子”比对消灭“普鲁士人”似乎更加关心，“国际”的一位成员写信披露，甘必大这个“花言巧语的骗子手”，千方百计地阻挠无产阶级武装起来。但是他再也办不到了：他被迫批准全民入伍。关于这一措施，拉法格在给我们的来信中这样写道：“全民入伍正好将整个工人阶级组织和武装起来，于是，在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对立的军队的情况下，工人们至少可以在制订新宪法时大声疾呼，甚至迫使政府接受他们

的条件。我认为这次给予资产阶级国家机构的打击如此沉重，以致从这一天起它将更快地在法国崩溃。”我同意。但是，唉！法国农民的形象使这光辉的场面黯然失色。

对俄国人的所作所为你们意见如何，莫斯科人十分狡猾，对俾斯麦来说亦如此。可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对俄宣战的可能性在伦敦引起了极大的不安。——致以全家的崇高敬意，热烈地吻弗兰契斯卡，我亲爱的朋友们，请相信我永远忠实于你们

燕妮·马克思

请代我向 F·克劳泽问好。

得悉你们对在卡尔斯巴德度过的日子感到满意，而且你们每个人都有很大收益，这使我很高兴。

附言：爸爸收到了豪斯曼先生的漂亮的礼品，为此爸爸将给他写信表示感谢。

几个星期前，我收到了狄慈根老师的一封亲切娱人的信。

注 释

- 1 马克思一家在兰兹格特作短暂逗留后于 8 月 31 日返回伦敦。
- 2 恩格斯在《派尔—麦尔新闻》上发表了关于战争的文章，在论文里他预见到色当投降的日子。
- 3 9 月间，恩格斯离开曼彻斯特，然后定居伦敦，与马克思家相距一刻钟的路程。
- 4 拉法格一家在色当投降前夕离开巴黎，9 月 2 日抵达波尔多。

二

1871 年 1 月 27 日

亲爱的“医生”：

内附的《旁观者》¹（伦敦一家最受尊敬和最有“威望”的报纸）的奇妙的供认，使我快活无比，我不多说了；我敢肯定这也同样会使您高兴，如同亲爱的特鲁特亨看到《旁观者》的七君子站在被告席上认罪一样。几个月前，正是这家报纸俨然以一家有地位的大报的身份对《马赛曲报》不断地进行抨击，因为《马赛曲报》竟敢认为“对罗萨的判决超过了通常的惩处”。而现在它又声称，“这个判决，使人遭受到不亚于野蛮的夹足刑具的痛苦，而这种痛苦在赤道这一边是空前的。”《旁观者》至少还敢登委员会所披露的事实，而卑鄙无耻的《每日电讯》和伪善的《每日新闻》，过去津津乐道对名噪一时的作家们的“无耻虚构”及对“荒诞小说”的指控；现在，却一言不发，以期掩饰它们自己的谎言，掩饰伪君子格莱斯顿及其走狗布鲁斯，官僚、狱卒和狱医们的谎言。——但是目前这些受贿的、投机的报纸表态与否无关大局。它改变不了罗萨及其大多数朋友已经结案和已经登程的这一基本事实，他们被流放到美国。呜啦！英国政府害怕火一般的爱尔兰人举行轰轰烈烈的示威游行，欢迎释放归来的同胞。因而尽可能审慎地将芬尼亚社社员打发走，简直不许他们踏上爱尔兰的土地。但是虽然如此谨慎，高尚的“苦役犯们”仍然受到了——用这位爱尔兰人的话说——他难以形容的热烈欢迎。各种大小轮船、小艇和小船整日停泊于科克港附近。当“古巴”号驶近时，人们看到囚犯们站在甲板上，欢呼声洋溢着激情直冲霄汉。由于“古巴”号停泊得比其它船稍远一些，罗萨嫌系缆和放梯迟缓，于是他就从自己的船上跳到一只小船上，和他的朋友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他们在分手时罗萨说：“呜啦，为了事业！”由此您可以看出英国政府的野蛮行径并未把这些人的热情压抑下去，在美国他们将以更顽强的毅力去工作。几天前，第二批九名结案的芬尼亚社社员启程赴美国。爱尔兰人民给他们每人一件外套、一条毯子和十本书。在纽约，仅仅在一次群众大会上，爱尔兰人就为囚犯们捐赠了五千本书。如果说爱尔兰人民是最贫穷的人民，那么他们又是最慷慨的人民。德国人民假如能为他们的政治犯提

供上面数字的四分之一也好啊！想到德国人为因不伦瑞克宣言²而下狱的起草者的家属，以及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³的妻子几乎没有做什么事情，真感到羞耻。

亲爱的朋友，获悉您患重病，使我深感痛苦，我希望不久能获悉您的近况，您未提及特鲁特亨和弗兰契斯卡，想必他们都很健康吧。在这悲伤的日子里，我们全家也还健康。来自法国的最新消息，给我们全家带来了深重的打击。巴黎城里的布列塔尼暴徒和城外的普鲁士匪帮竟联合起来镇压蒙马尔特、伯利维尔和维耶特的革命者⁴。据可靠的消息获悉，特罗胥这个奥尔良派的伪君子，不愿坚决地采取攻势，因为他害怕他不在时巴黎会落到“赤色分子”的手中。他喜欢俾斯麦甚于白党。特罗胥是个禽兽不如的小人；五十万人竟向二十二万人投降，这将是他的罪孽。

向您全家致以竭诚问候，永远忠实于您的

燕妮

摩尔明天写信给您。他寄给您的《每日新闻》，一直也没有到您手里。

这里的人们非常欣赏特鲁特亨的美丽的刺绣。

注 释

- 1 《旁观者》，英国周报，刊登了格莱斯顿组织的调查委员会撰写的关于政治犯待遇的报告。委员会不得不承认燕妮在《马赛曲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所揭露的事实确凿无疑。
- 2 1870年9月5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不伦瑞克委员会发表了一篇抗议兼并亚尔萨斯—洛林的宣言，要求同法兰西共和国实现光荣和平。9月9日该委员会成员被监禁。
- 3 1870年11月26日，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在北德意志联邦国会上抗议继续战争，拒绝军费拨款的投票。1870年12月7日他们与赫普纳一同被捕。

- 4 1871年1月22日，国民自卫军在利伏利大街举行反对策划战争的示威游行，遭到由特罗胥继承者维努亚将军领导的镇压。

三

1871年4月3日

亲爱的库格曼医生：

我承认您的来信使我感到有点意外，要不是我知道这信完全出自您对摩尔的真挚友谊，我会生气的。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我应得到您对我的唠唠叨叨的教训。如果说我曾经拿神圣的医学开过玩笑，甚至亲手触犯过这个自称神圣的职业，那么我可以肯定地对您说（难以理解的是，您需要这种肯定），当事情关系到我父亲的健康时，这就不再是“玩笑”的问题了。您批评我一定要看着摩尔完成他的巨著和使命。请放心，我亲爱的朋友，我不需要这样的督促：我父亲的一个小指头在我看来比他正在写的或将要写的全部著作还要宝贵。说实在的，就是这部著作妨碍了全面彻底的治疗。考虑到摩尔服用的所有药物对他毫无益处，我常常要求他带杜西和我到比利牛斯山去，但他总是不愿中断他的工作！我们的亡命，长年的孤居，等等，等等，无不是为无产阶级的崇高事业而作出的牺牲，我对此并不返悔。虽然如此，不过我还是承认我仍然具有人的某些弱点，我认为我父亲的健康对我说来比《资本论》第二卷的完成更加珍贵。顺便说说，“伟大的”德国民族向来不屑去读第一卷。

请向亲爱的特鲁特亨转达我的问候。我感谢她的来信，但要今天给她复信，我觉得精神欠佳。还请以弗兰契斯卡转达我的问候，请相信我对您的真诚。

燕妮·马克思

四

[18]71年4月18日

亲爱的朋友们：

请原谅我未能及时复信。我早该答复你们亲切的来信，特别是答复我亲爱的医生您的已经很久久的来信！但是我承认我没有足以写一封信的力量；我缺乏勇气。当最勇敢的和最优秀的人根据梯也尔这个凶残的小丑的命令遭到屠杀时，我不能处之泰然。梯也尔仅靠他的训练有素的雇佣兵是绝对镇压不了巴黎起义公民的。他离不开他的普鲁士盟友的援助，而后者似乎以扮演警察角色而感到自豪。过去曾巧妙地执行过诽谤巴黎无产阶级的光荣任务的一家伦敦报纸，现在也被迫承认从未有人为捍卫一项原则进行过更勇敢的或更大胆的斗争。

我亲爱的特鲁特亨，昨天我接到了我妹妹的一封信，它引起我们极度不安。您也许知道，¹保尔到巴黎去计划从公社得到“全权”，以便在波尔多组织革命军队。大约一个星期前，他给我们的来信说，他呆在家里，我们以为他已安然回到波尔多。结果我们昨天从劳拉信里获悉，自从她丈夫动身以后她就不知道他的情况了。如果保尔给他写过信，那么他的信显然都被凡尔赛政府截获了，其目的在于封锁公社对“农民”或者按目前我们对他们的称呼“庄稼汉”所采取的措施，不让一切报纸和书信从巴黎发出。另外还有一个忧虑，就是劳拉的婴儿正患重病²。一接到她的信，我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当即动身去波尔多，我不耻于向您承认在我父母反对的情况下，我毅然决定偷偷地动身，这话只在我们之间说说。后来我知道奥尔良的铁路线被切断，皮卡尔实行戒严，没有护照不得通行，等等。根据摩尔和参谋³的计划，我只好等着改乘汽船进行这缓慢但更可靠的旅行。参谋于9月在伦敦安置了寓所。我相信已经告诉您

很久了吧。只要健康状况允许，摩尔就和他一起长时间地散步。他的咳嗽略有好转，但他过于暴躁，他总的情况远非令人满意。我们的医生按时来看他。时局使我们亲爱的摩尔极度悲伤，毫无疑问，这是他的病根。

我们的许多朋友都参加了公社。其中有一些已遭凡尔赛刽子手屠杀。古斯达夫·弗路朗斯实际上是被谋杀的。如一家报纸所说，他不是倒在战场上，而是由于侦探向宪兵队告发，他的司令部所在的那所房子被包围，他惨遭杀害。想想一年前我们还和他一起在汉普斯泰特散步讨论如何帮助爱尔兰囚犯！我没有翻译奥顿诺凡-罗萨的信，是弗路朗斯译的。我似乎又听到他的声音，他说：“我向你们保证，我为奥顿诺凡-罗萨将贡献一切”。那时他已准备为了芬尼社社员的释放，牺牲他的生命。

亲爱的医生，您的来信证明，您以为我在同您进行斗争，我为此感到难过。请相信我，我亲爱的朋友，“我不怀恨在心”⁴。我很遗憾我的上一封信给您留下这样的印象。我写那封信时，刚刚得到很多令人难过的消息，我觉得自己正处在同全世界作战之中。我热烈地亲吻弗兰契斯卡。

亲爱的朋友们，请相信我永远忠实于你们。

燕妮·马克思

注 释

- 1 参看1871年4月12日马克思致库格曼的信。
- 2 劳拉于1870年9月到达波尔多后不久就生了第二个儿子。
- 3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 4 暗示海涅名诗《诗之书》。

五

[18]71年10月16日星期一

亲爱的朋友，

我们刚接到第三组照片。为了使我们能如此迅速地收到照片，您一定费了很大劲，对此我们向您深表谢意。有一些是出色的。我特别喜欢有椭圆外边装饰的那几张。法国版和英国版的照片一发行，我就给您寄去。我刚把一份关于摩尔社会生活（他的著作，他的政治活动）的简介寄给度申老头，即最近要写传记的韦梅希。

上一封信几乎错寄到俄国使我大为惊讶。德国的“文化”程度令人忧虑。且不说在信封正中写有普鲁士几个字，令人费解的是，邮政人员竟然会不知道**汉诺威**位于世界的什么地方。

至于《人民国家报》的启事，我想一定是李卜克内西的丰富想象力的产物：其他任何人都不会想到把利沙加勒、贝热瑞和泰斯的名字联在一起。我们猜想贝热瑞出版了一种周报¹。一旦在伦敦找到它，我就把它寄给您。

有名的杜朗²在旅游巴黎之后返回英国。幸亏摩尔已获得通知，保持了警惕，并为阻止杜朗参加“会议”作了安排。

如果欧洲诸政府有国际警察机构，那么“国际”同样有它的反警察机构！

请原谅此信既简短又仓促。我心急如火，因为我得赶火车返回伦敦郊区。

向亲爱的特鲁特亨致以真挚的问候，摩尔、妈妈和杜西一并向您全家致以亲切的问候。

我永远忠实于您

燕妮·马克思

注 释

- 1 《3月18日》，巴黎公社中央委员会前委员茹尔·贝热瑞所办的周报，伦敦和布鲁塞尔出版。1871年8月21日第1期——1871年9月6日第3期。
- 2 古斯塔夫·杜朗，巴黎首饰匠，国际成员，他指挥过国民自卫军的一个营，据揭发是警察。1871年10月6日，国际总委员会通过了一项与他有关

的决议。

六

燕妮·龙格致库格曼

1872年12月23日于
伦敦梅特兰公园路1号

亲爱的朋友们：

祝圣诞和新年快乐！家中人人，包括我在内无不怀着这个衷心的祝愿。我所以说**家中人人**，那是因为犹如上面地址已经向你们所表明了的一样，我又重新同我双亲一起居住在我那可爱而古老的家里了。我的丈夫和我在牛津白白住了六个星期，在此期间，没有一个学生上门。国际代表大会代表名单中的龙格先生的名字，竟使曾在夏季听过课的狡滑的纨绔子弟如此不堪入目，以致决心再也不同他们从前的老师打交道了。这当然一开始就使我大失所望，因为我深知要在如此充满竞争的领域里寻找工作是何等的困难：这个国家挤满了各种法语教师，所有法国流亡者——新闻记者、医生、律师、锅匠或裁缝，都拥进了这个领域。但是我渐渐地容忍了我们在牛津的不幸。我觉得住在伦敦比住在拘泥正统的和冒充高雅的牛津更幸福。伦敦有莫丹那住宅，在莫丹那住宅二楼的正房里，我永远能见到我亲爱的摩尔。我无法向您表述离开摩尔使我感到的孤独；他对我说，他也十分想念我，我不在时他总是深居简出。如果我的丈夫和我一旦得以在伦敦找到某种工作，那么我将为把我们从以伪科学闻名的中心赶出来的厄运祝福。

拉法格一家正巧也在汉普斯泰特；他们计划在那里住几年。¹妈妈让我告诉你们劳拉气色比她在海牙时好多了；她现在高兴得多了，我们希望她逐渐从因她亲爱的小儿子之死²而遭到的可怕的打击下完全康复。我们家其他人都是很健康。亲爱的朋友们，我

盼望你们也能告诉我关于你们自己的好消息。请尽快给我复信。你们要知道我对有关你们的一切都很感兴趣，亲爱的特鲁特亨，如果您肯给您的朋友田格夫人写六封信，而给我只写一封信，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您瞧，我不是非常苛刻，而且一点也不嫉妒吧！

《资本论》法译本进展缓慢。下一分册将是出色的。爸爸把它全部重写过。译者并不高明，译得太糟糕。不幸的是，这样的校对工作对于摩尔来说，甚至比他自己全部写作的工作还要繁重。他彻夜工作，直至凌晨二、三点钟。你们读过刚发表在布鲁塞尔《自由报》³上的评论第一分册的一些文章吗？这些文章表明，这些(……)⁴比利时人发现马克思和蒲鲁东同时解决了“价值构成”的问题。这就是比利时精神，纯而又纯的布鲁塞尔啤酒，没有任何杂质。如果说这些比利时人是笨伯，那么这并不妨碍他们继续对国际施展卑鄙的阴谋诡计。他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密切地同他们的汝拉兄弟携手合作，而最近则同黑尔斯⁵这个模范英国工人和莫特斯赫德⁶这个酒徒勾结在一起。他们的党由于相格⁷的人伙而得到加强，而后者的可耻背叛乃是可笑的虚荣心的结果。这个无耻之徒不肯接受把总委员会迁到纽约的意见，因为这对他说来将失去他的全部重要性。几个星期来，他强压怒火，默不作声，现在他终于公然为著名的黑尔斯效劳了。但是所有这些卑鄙的阴谋家即将演完他们卑鄙的角色，总的说来，这是件好事，使协会得以摆脱诸如著名的相格、黑尔斯等等的同路人。总之，这些人暴露了他们的真面目不是件坏事。我的纸已写完了，所以该是我再次向你们两位和亲爱的弗兰契斯卡表示我们美好祝愿的时候了。

请相信我永远是你们的忠实朋友

燕妮

注 释

1 在海牙代表大会后，拉法格一家定居伦敦，直至1882年，在此期间保尔从事照相制版业。

- 2 年轻的施纳普斯大概于1872年3月和9月之间死于西班牙，因前一年感染霍乱症，至今尚未康复。
- 3 《卡尔·马克思及其对价值的分析》，载于《自由报》1872年12月8日—22日第48期至第51期。
- 4 原稿被撕。
- 5 约翰·黑尔斯，国际总委员会秘书，1872年12月退出。
- 6 托马斯·莫特斯赫德，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在海牙代表大会后变成反对派。
- 7 赫曼·根各(1833—1901年)，国际总委员会委员，也在1872年(原文系1772年，显然错误——中译者)12月退出。

七

1873年5月12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们：

一想到你们近来会认为我是个不忠实的朋友，我就深感遗憾。不，你们应当对我有足够的了解，能够考虑到我之所以未曾复信完全是由于其它的原因，而不是缺乏友谊。真的，除了这一点，一切都是我推迟复信的原因。自圣诞节以来，我完全被卷进人们称为生命而斗争这场愉快的战斗中去了。如果我要诉说我在伦敦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徒劳地)寻找法语、德语、唱歌和朗诵的学生的全部经过，很快你们就会厌倦了。这场战斗的结果就是我终于获得了丰富的经验，而且我初步认识了那些广告商、中间人和学校校长的无耻的骗人的伎俩。象莎士比亚的罗萨林德那样，我宁可被小丑嘲弄，也不为经验悲伤。既然如此，我不后悔我所作的这次艰难的探索，因为我希望有朝一日向公众揭穿这些居间吸血鬼的诡计，使别人不再陷入我落进的陷阱。在这块自由的和自由竞争的土地上，我的丈夫并不比我有更多的机会。当然，如果我们愿意在外省某个偏僻的地方混日子，那我们早就找到工作了，只是虽然我已结

婚，我的心仍然被拴在我爸爸所在的地方，在别处生活对我说来简直不可想象。然而，要是所有我们的计划都落空，我想我就得离开他…… 不过，每天的忧愁已经够了；我不愿事先去想它。

亲爱的朋友们，我还要再一次感谢你们最近的来信。³我亲爱的医生，对于您所提出的关于代表大会汝拉代表的意见，还需要予以最简单的答复吗？时间已经替我做出了答复，而且时间比我所做的任何答复更有效力。那些卑鄙的阴谋家，其唯一的目的是在协会内部挑拨离间，从中渔利，他们的反对者始终是极端仁慈地对待他们的。您看过《自由报》上相格这个满脑子虚荣心的无耻之徒所精心炮制的新作吗？谎言关系到我的丈夫，相格和一个老革命者共同捏造了这番谎言，后者如今在一家英国贵族家庭里当奴才，满足于发挥软弱无力的作用。这就是著名相格的可尊敬的伙伴！

您所暗示的消息不是真的，照此消息爸爸现在已去了美国。

《资本论》第二卷毫无进展，几乎必须全部重译的法译本占去了摩尔的全部时间。对此您是怎样想的？对《资本论》第二版的后记您有什么想法？

亲爱的特鲁特亨，我不必要对您说，我非常非常地想念您，渴望能再见到你们，您和亲爱的弗兰契斯卡。这位少女还记得从前的一位给她摇摇篮的女人吗？请向她转致我最美好的祝愿。摩尔、我的丈夫和妈妈一起向你们和温采尔问好。摩尔不久就会给你们写信。我永远非常忠实于你们

燕妮

原载法国《思想》杂志1957年
9、10月号总第75期
(金嗣焜译 白钢校)

《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评介

〔美〕劳·克拉德^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五卷出版之后，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引起了我国学术界的广泛重视。不久前，来自全国各地的理论工作者在福州举办了关于马克思晚年这些重要遗著的第一次学术研讨会，就应该如何联系这些笔记研究马克思晚年思想发展等问题初步交换了心得。研究还将深入下去。

本刊为配合对马克思晚年这些重要遗著的研究，在1985年第一和第二辑曾发表美国学者劳伦斯·克拉德、意大利学者卡尔拉·帕斯奎内利和苏联学者伊·列·安德烈也夫等人的论著，今年第一辑发表了我局研究人员徐若木和杜章智的介绍文章，这里再发表三篇国外学者的研究资料。——编者

在读书时做大量摘要和笔记，并且顺便加些评注，这是马克思的习惯。马克思于1868年即《资本论》出版的第二年，在给女儿劳拉的信中写道：“我只不过是一架机器，注定要吞食这些书籍，然后以改变了的形式把它们抛进历史的垃圾箱。”^②他就这样记了好几百本笔记，为撰写著作准备材料，这些著作中有的他完成了，有的则没有完成，但并不因此就不重要。我想在这里介绍两个

① 作者是美国著名民族学家，他在1972年编辑出版了《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一书，其中包括马克思对摩尔根《古代社会》、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和菲尔《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等四本著作的摘要笔记。本文是他提交给“人类学和民族学第九次国际大会”的论文。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33页。

这样的笔记本，它们现在收藏在阿姆斯特丹的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编号为B146和B150。头一本最为重要。这些笔记本都是八开版面，纸张是优质的，因此甚至一个世纪以后仍完好无损；它们都用黑色硬纸板装订成册。每一本包括有几部著作的摘要，并由马克思编了索引。^③

尽管笔记本保存完好，但是读起来还是很困难，因为马克思的字写得很潦草；他在英国生活困难时曾为谋取铁路办事员的职务参加了一次考试，但因为字写得不好没有考上。此外，他记笔记时喜用缩写法，并且多种语文并用。有些词他用标准方式缩写，如用u代替und（“和”），但另一些词则用独出心裁的、意想不到的方式缩写，如“wahrscheinlich”（“大概”）有时被缩写成“whselich”、“whrselich”、“wrslich”等等。有些句子采取意译方式，动词常被省去。同一句话里英德两种文字掺用。每页都写得密密麻麻。这些笔记除了给自己看以外，他是不打算给任何人看的。

1883年3月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着手准备马克思遗著的出版工作，把那些完整的手稿清理出来，其中最完整的是《资本论》第二和第三卷以及简明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多卷本《剩余价值理论》的手稿，马克思没有最后完成。恩格斯要卡尔·考茨基去准备出版，考茨基出了个暂行的版本，近年来由莫斯科出版了比较定型的版本。民族学笔记比上面那些手稿更不完整，更不成形。这些手稿的编者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把它们按马克思留下的原样复制出来。之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它们过去曾被用于各种不同的目的：俄文版舍掉梅恩和菲尔著作的摘要，单出摩尔根著作的摘要，企图通过恩格斯的眼睛来看它们，即按照恩格斯的观点而不是马克思的观点来解释它们。一本西德研究著作已利用这个版本来诋毁恩格斯。因此，重要的是把手稿归还给马克思，并照原来的样

^③ 笔记本上还有另一人编的索引，核对笔迹表明，这人是弗·恩格斯。这一点很重要，我们以后还要回过头来谈。

子出版,保持其真正价值。

马克思摘记的所有这些民族学资料,都是取自论述人类社会进化问题的著作。这些作者并不构成一个统一的学派,事实上,他们在许多问题上彼此对立,但他们都是乐观主义者,都相信人类的进步,并且都带有思辨倾向。他们所相信的进步是直线式和单线式的,中间有若干阶段。他们之间对阶段的划分法而不是对发展路线本身有一些分歧。只有摩尔根对这种发展所导致的文明现状表示不满。梅恩、菲尔和拉伯克对他们所理解的文明状况非常满意,并期望这种文明能向世界所有民族传播。摩尔根、梅恩和菲尔对不同于西方的某些别的文明具有接近的认识。摩尔根是一位熟悉纽约州北部地区易洛魁人情况的民族志学者,他的职业是代表铁路利益的律师。梅恩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研究历史法学的主要人物,曾在英属印度当过法官。菲尔是梅恩的追随者,本来是自然科学家,后来转习法律,也在英属印度和锡兰工作过。梅恩和菲尔都很熟悉英属印度,特别是它的法律。拉伯克是一位不出书斋的民族学家,达尔文的朋友和门徒,他出身于银行家家庭,后来成为爵士。

马克思论进化和文明的起源

马克思曾长期深入研究人类的社会进化问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他和恩格斯曾写到家庭发展为氏族的问题。二十年后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写道,在家庭内部的分工,在氏族内部进一步发展了。^④这里与前一部著作中所表述的内容有所不同,因为这里说的不是整个制度从一个发展为另一个,而是一种经济上的作法在它们内部的发展。恩格斯在准备付印《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逝世后的那一版时,还是按先前的表述来理解马克思后来的观点,因为他得出结论说,马克思所指的是家庭发展为氏

^④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89—390页。

族。^⑤撇开恩格斯对问题的解释不谈，马克思后来对家庭和氏族社会的更一般的问题也有过不同的说法，但恩格斯在1883年11月还没有弄清楚这种不同是什么。两个月后，即在1884年年初，恩格斯看到了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他在1884年2月写给卡尔·考茨基的信中推荐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并说他本人找这本书已找了五个星期，但还没有找到。恩格斯当时显然看到了那个主要的民族学笔记本，并且至少读了摩尔根著作的摘要。他根据马克思的笔记整理了一份摩尔根观点的提要，在5月底给爱德华·伯恩斯坦看过。在3月份恩格斯找到了一本摩尔根的书，着手写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并于同年5月份完成，在这本小书中从马克思那里采用了十几段话。恩格斯的这整本书是在马克思的鼓舞下写成的，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执行遗言”；这本书忠实于马克思观点的程度，可以根据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来判断。

马克思从摩尔根著作中得到这样一个思想，即在社会从原始的无划分状态向政治社会或市民社会过渡中，氏族起着中心作用（政治社会或市民社会在国家统治下划分成相互对立的经济阶级）。氏族（gens）是一个拉丁名词，原来指古罗马的这样一种制度，它由出自一个共同祖先（不管是真实的、虚构的还是神话的）的男性世系后代所组成。罗马人禁止本氏族内部的通婚，因此，这种婚姻所构成的家庭包括出自不同氏族的人，因为至少有一个成员（妻子和母亲）必须来自别的氏族。按照摩尔根的记述，在古希腊人当中可以看到类似的制度和相同的惯例，而在古希伯来人当中，家庭由更加疏远的氏族所组成。马克思得出结论说，氏族并不是简单地从家庭发展而来，家庭也不是由氏族发展而来。部落是由一些氏族组成的社会单元，但是正如氏族不是从家庭发展而来一样，部落也不是从氏族发展而来。

氏族至少在观念上是按照继嗣的严格规章组成的。家庭是根

^⑤ 参看上书，第394页注（50A）。恩格斯编的这一版注明日期为1883年11月7日。

据完全不同的规章组成的，因此不能同其他家庭合并起来组成氏族。部落是比无论氏族或家庭都更加含糊的概念，今天有些人类学家承认这个名词难以理解。近来有些人类学家用“克兰”(clan)来取代“氏族”(gens)，而意义没有什么实质的变化。

这里的发展概念引起了一些混乱。恩格斯把家庭发展为氏族理解为经过一定时期的结果。有些作者，特别是目前的结构主义者，把家庭和氏族或部落的关系理解为一种逻辑的发展，即一方是另一方的必然条件。一种东西经过时间发展为另一种东西这一对任何进化理论都极为重要的概念，在马克思对摩尔根和梅恩的研究中被用于政治社会产生于原始氏族社会的问题；这是马克思阅读摩尔根的著作所发现的结论。

马克思根据摩尔根著作做的摘要笔记整个说来是明白易懂的，虽然对摩尔根所记述的某些细节进行了批评，但大部分都是同意的。在少数几处地方，马克思加批了表明他对一般方法所持立场的按语。例如，摩尔根描写家庭与亲属制度的关系，说家庭是一个能动的要素，而亲属制度是被动的，它把家庭由较低级形式发展到较高级形式的进步纪录下来。对此马克思评论道：“同样，政治的、宗教的、法律的以至一般哲学的体系，都是如此。”^⑥这些都是和亲属制度一样的东西，是被动的要素。能动的要素是经济。马克思对摩尔根持肯定态度，摩尔根的著作为马克思提供了用以判断梅恩和拉伯克著作的准绳。可是，马克思绝没有象恩格斯那样深受摩尔根著作的影响。

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东方社会

在同一个笔记本中可以看到马克思对菲尔和梅恩著作的笔记和评论。我在前面已经提到，恩格斯为所有三人的著作摘要都编了索引，但他只对摩尔根的著作摘要进行了研究。菲尔的书是对

^⑥ 同上书，第15卷第354页。

他最熟悉的今天孟加拉国地区农村生活的记述，虽然是概括性的，然而却非常详尽。他的方法是描写一个乡村的“模式标本”，这个乡村在哪里都不存在，然而它的生活条件在当时这个地区的许多地方都可普遍看到。“模式标本”这个词可能不合适，因为他并没有拿出“标本”，只是提供了一个“模式”。把活着的民族看成博物馆的展品，同样不合适。这个方法虽然提供丰富的细节，但是不能和实地考察相比，由于没有在特定时间和地点存在的任何具体乡村作参照而缺乏具体性；他的研究对象事实上哪里也不存在，他的结论只能听信，无法验证。

马克思深入研究了亚细亚生产方式，把它同以奴隶为基础的欧洲古典古代生产方式和中世纪欧洲封建时代的奴隶生产方式区别开来。他尖锐地批评了菲尔和马克西姆·柯瓦列夫斯基未能对此加以区别的不恰当提法。

马克思在对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的摘要中研究了同样的问题。马克思把东方社会同欧洲社会区分开来。他认为很重要的是，东方的乡村是一个集体，在那里，公社的所有制和经济活动在人们生活中起根本作用，这种集体生活并没有因为在东方国家统治下把农民公社联合起来而被消灭。东方乡村的集体生活是原始社会集体生活的直接延续。恩格斯则没有考虑这些问题，认为古代亚洲文明具有以奴隶为基础的形式，因此是更一般的生产方式的一种形式，古希腊罗马的经济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另一种形式。马克思在1857和1858年也持这种论点，但是后来改变了看法。

梅恩认为，在古代著作和现代民间习俗中保留下来的爱尔兰人、斯拉夫人、罗马人、希腊人、印度人和日耳曼人的古代法残余，不仅说明了雅利安人种族的生活方式（马克思在一处地方批道：“让这种‘雅利安人的’伪善言词见鬼去吧！”^⑦），而且还说明了原始社会的一般情况。虽然梅恩的观点在方法论上有弱点并且也过时了，但他提供的事实证据值得注意。在《讲演录》第十三章里，他

^⑦ 同上书，第636页。

简短地描述了东方的帝国统治，他以十八世纪印度锡克教徒统治者郎吉特·辛格为例。这个君主虽然暴虐，但并不干预农村公社生活的古代遗俗，而只要求向他们征税（实物）和征用人力服兵役。梅恩接着说道，古代米底、波斯、亚述、巴比伦等东方国家的法律也是这样的。只有在后来的罗马帝国，国家才首次运用法律手段比较直接地操纵乡村中的人民生活。

马克思摘录了梅恩书中关于东方帝国统治的资料。他虽然对某些地方过于夸张表示惊讶，但一般说来他以肯定态度对待梅恩根据亲身经历对印度当时及稍前一个时期情况的描写。此外，马克思对梅恩在较早期的《古代法》一书中提出的法律和社会从身份到契约的发展理论也给予好评。另一方面，马克思不仅批评了梅恩对爱尔兰人在当时和在伊丽莎白和詹姆士二世征服时期的政治问题和苦难无动于衷，同时还批评了他未能跟上民族学理论和民族志资料收集的发展。在这后面一点上，拉伯克也对梅恩提出了批评。马克思不同意菲尔和梅恩试图恢复印度古代生活原貌的设想，理由是认为他们的做法过于思辨，而且是预先就存心要证明法律和社会是向着从较原始的起点建立梅恩那个时代的英国制度发展，并且是把英国人在征服印度时所遇到的法律习俗看作这种原始起点。这些习俗不仅包括农村公社对土地的集体所有制，而且还包括梅恩用来同一种古代英国习俗和撒提即寡妇自焚殉夫习俗相比的关押习俗。马克思在读托马斯·斯特兰奇爵士论印度法的书时得出结论说，把寡妇活活烧死符合僧侣阶层和丈夫家庭的利益。梅恩曾经指出，婆罗门对撒提的兴趣是“纯粹职业上的”，即反对违反遗孀在享有丈夫的财产时所要奉行的古代习俗。根据斯特兰奇的说法，僧侣阶层和她的丈夫的家庭成员一样，之所以渴望举行这种仪式，“实际上是出于最鄙俗的动机”。^⑤

梅恩著作摘要中包含的马克思批语比摩尔根著作摘要中更多。马克思不但摘录了梅恩写的东西，而且无情地抨击了他无动

^⑤ 参看上书，第641—642页。

于衷的政治态度。此外，马克思在这个笔记里比在别的几个笔记里更加明确地表述了他的国家形成理论，特别是关于国家形成以前的原始公社组织瓦解情况。马克思在阐述这些问题时，明确地反对了功利主义者耶利米·边沁和他在法学界的同伙约翰·奥斯丁的学说。马克思也批判了让·雅各·卢梭关于人原来自由自在而后来受到束缚的学说。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类在原始状况下也和文明条件下一样受到束缚。但原始人的束缚是愉快的和令人满意的。根本没有人类完全自由的生活条件。原始人是受到束缚的，尽管这是一种令人满意的束缚。文明人享有正式的、受到法律保障的自由，但是在生活的实质和内容上同样是受到束缚的。应该把这些考虑同《资本论》第三卷中关于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的论述、以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有关论述结合起来。它们彼此之间有联系，并且和《德意志意识形态》、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有关人的发展的论述有联系。把它们放在一起考虑，就可以对马克思关于人的本性的观点得到一个全面的印象。

必须把包含在马克思民族学笔记中的晚期著作同他在四十年代的早期著作联系起来考虑。这样一来，多卷本《马克思恩格斯传》作者奥古斯特·科尔纽和《阅读〈资本论〉》一书作者路易·阿尔都塞关于马克思生平和著作的估计就会成为问题。他们两人都坚持这样一个论点，即马克思在1846年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他在那以前所写的一切都与马克思主义无关，应抛在一边。这个观点同马克思本人在他1859年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写的简短序言中的提法有矛盾。马克思的著作从开始到最后，既有连续性也有间断性。他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成熟时期的著作中的有力论点，应该根据他在此之前和之后所写的东西来加以理解。如果考虑到这些论点在民族学领域的延伸，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它们。赫伯特·马尔库塞、埃里希·弗罗姆、莱塞克·柯拉科夫斯基强调了马克思与积极革命者对立的人道主义者的一面，对马克思的著作

同样是作了片面的解释。

作为民族学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

分析这些摘要笔记,比较容易看清马克思的观点,并把它们与恩格斯的观点区别开来,因为在摩尔根的著作上,他们研究的是同样的课题。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任务,因为这个问题已被从不同方面弄得模糊不清。以奥古斯特·科尔纽为代表的正统派和以C·赖特·米尔斯为代表的非正统派,都把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看成同一个人。但是他们没有提到,他们所谈的究竟是政治行动、科学研究、历史人物、还是他们的历史地位,而这些并不是一码事。那些在他们生前认识他们的人,如爱德华·伯恩斯坦,倾向于同意恩格斯关于他们关系的估价;麦克斯·阿德勒也步伯恩斯坦的后尘。直到本世纪二十年代,在卡尔·科尔施和卢卡奇·捷尔吉的著作中,才提出了把他们两人以及他们的著作分开的任务。科尔施嘲笑那些利用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教条主义者,说设想他们完全一致是宗教教义的需要。卢卡奇则抨击恩格斯对历史造诣不深。我们可以说,这个问题是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的问题:在他们的实践中,例如在合写《共产党宣言》(这是欧洲1848年革命的一部分)和六十年代的组织工作中,两人是一致的。而在理论和各自的科研工作方面,他们显然是完全不同的人物。我们不能同意卢卡奇的评价,因为他只考虑理论方面,带有片面性。科尔施认为他们在实践方面是一致的。教条主义者一味强调他们在理论方面完全一致,另一些人则忘记他们在实践上的统一,都同样是错误的。

民族学笔记与马克思的实践完全无关,但是却有助于对这一实践的理解。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研究了这些笔记所涉及同样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怎样在实践上表现一致的同时,在理论上各有所异。例如,他们两人都研究了国家形成的主客观条件。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一章里提到客观方

面,即财产的积聚,而在另一章里提到主观方面,即贪欲。他没有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也没有谈两者的相互作用或一者对另一者的作用。国家形成中的主客观条件和因素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把它们结合起来不止是一种文体或审美手法,而是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在摩尔根著作摘要中就是这样做的,在梅恩著作摘要中也这样做了。在梅恩著作摘要中,他写到了国家中个人利益和阶级利益的发展和冲突。个人有其个人的利益,但这种利益可能和他的阶级利益相对立。例如,一个资本家可能把武器卖给一个旨在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组织。这个资本家可能由此获得眼前的利益。但显然这样做有背于他的阶级谋求永世长存的利益。国家的职能之一是设法遏制那些违反阶级利益的个人利益。同时,那些使国家和对立阶级利益产生的因素和条件,也使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和谋求一己私利的个人抬头。国家不仅是有产阶级控制所有其他社会阶级的机构,而且同样是有产阶级控制本阶级成员活动的机构。从原始状态过渡到文明状态,换一个说法就是国家的形成,是从个人身上去掉(马克思的原话是 *Losreissung*,即撕下)对群体的集体束缚。在这种过渡的过程中出现的小规模的地主和高利贷者在主观上是受到贪欲的推动;财产集聚的客观因素支持这种私人活动,加强它,反过来又受到它的加强。

这时,在公共的和私人的社会生活之间、在公共的和私人的利益之间、在社会的官方组织和非官方组织之间,同样发生了分裂。摩尔根曾谈道,母亲和子女之间的关系在任何形式的家庭中均有保障,而父亲和子女之间的关系只有在专偶制家庭中有保障。按照摩尔根的方案(它在这一点上与《共产党宣言》和沙尔·傅立叶的方案颇为一致),专偶制家庭只有在文明时期才发展起来。马克思在摘录摩尔根关于父亲与子女的关系有保障的情况时插进了一个小问题:“至少在形式上?”^②认出一种形式上的(正式的)关系或者承认这种关系,是社会生活分裂为正式和非正式领域并相互对

^② 同上书,第341页。

立、公私利益分裂开来并相互对立的产物。这是在文明时期产生出来的，正象我们刚才指出的，在这个时期，家庭生活的专偶制形式是按照摩尔根的方案发展起来的。在乡村中的人们还管理自己事务的时候，公和私就不是分开的，或者说就还不是分开的。只有出现了正式的公共生活，出现了政治社会的官员的时候，才完成了这种分裂。这同人类历史上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之间的关系不是一回事，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是到处都可以看得到的。前者是社会生活中公私领域的对立，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中已把这两个领域清楚地划分开了。这两个领域的对立只有在文明社会中才可以看到，在原始社会中没有这种对立，除非是处在向文明社会过渡的过程中。

马克思在他们两人中更加训练有素、更加深刻和渊博，这不是秘密。恩格斯对此已经很清楚。重要的是弄清楚他们如何不同。他们对辩证法持有不同态度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恩格斯看来，辩证法是象从量变到质变这样的一系列规律；恩格斯曾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对此作了很好的概括。但这是纯粹外在的和抽象的公式。黑格尔和马克思都很少提到辩证法；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只偶尔明确地使用这个术语，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这种情况甚至更少。在他们看来，辩证法是一种在特定的过程中展开的内在的具体东西。它并不是飘浮在空中，在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把它取下来。它不是一种独立于内容之外的方法，它寓于事物的具体发展之中。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中研究资本主义时期的社会和经济，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中开始研究更早的时代，在这部著作中，他除了原始人类的生活之外，还研究了欧洲的古典古代和封建主义时期以及亚洲的不同社会。这就是他对民族学和进化进行研究的一般背景。

马克思论自然和人的自然本质

正如我们看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认为，男人和女人生儿育女的生物学关系是一种分工。四十年之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重复了这句话，但马克思已经放弃了这种一般的立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谈到“文化的起源”，这里的上下文表明，他不是指农业的起源（这是这个词在他那个时候的正常用法），而是指人类的起源和人类祖先纯自然史的终结，也就是原人发展成为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写到人同自然界的第一次分离。这是人类的最初的异化。劳动是人类所特有的人类社会的劳动，而类的繁衍是一切有生命之物的活动。劳动的含义是：它是一种社会劳动，是同自然的物质交换。

按照马克思的看法，人同时既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又是同自然界分离的；人的社会同时既是感性的又是超感性的；马克思把所有的人，不分原始人和文明人，统统包括在这个公式之中。可是恩格斯却持有这样一种观点，即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其中包括经济因素在历史中占首位的规律在内，只适用于文明社会。他还反对关于这些规律适用于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的时期的看法。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他很早就受到社会民主党人亨利希·库诺夫的批评，后来又受到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1956年）的编者的批评。在这方面除了肯定人类在文化和精神方面的一致之外，别的任何提法都是不能接受的。所有其他不同意这一点的提法都只会有利于推行种族主义和把人类划分为一成不变的几个固定部分的政策。这从经验事实的观点看是站不住脚的，在政治上是有害的，在道德上是令人反感的。

人类的繁衍肯定是男人和女人的事；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部分。繁衍后代通常是夫妻间的事，人们按照社会认可的制度结合在一

起构成家庭生活的基础,不管是一夫一妻制、一夫多妻制还是一妻多夫制。在约·雅·巴霍芬和拉伯克的书讨论原始家庭状况时,使用了“淫婚制”(hetairism)一词,他们把男女之间非传种接代的关系、古希腊史中的“淫婚”看作是一种原始现象;这是一种混淆时代的错误。不同性别、成熟和健康是类的繁衍的必要前提,但这些被人类社会生活变成为文化条件。使用“社会认可”一词是想要把这些发生变化的条件大部分包括进来;使用“通常”一词是想要把最常见的事情和受到社会认可的事情都包括进来。巴霍芬在他的著名的《母权论》中提出,人类生活中最初状况是既没有婚姻制也没有家庭;人类象动物那样群居,实行杂交。虽然他认为这种想法是必然的,然而它却使他感到厌恶,他认为我们是一种 Sumpfzeugung (“污泥生殖”)的后代。摩尔根和恩格斯在这个问题上接过了巴霍芬的观点。马克思则批评了这种观点,他认为“污泥生殖”的说法是一种民族中心主义。齐格蒙德·弗洛伊德后来也接受了关于这样一种群居杂交的说法,但是却没有任何经验事实的支持。在巴霍芬、拉伯克、摩尔根和丁·麦克伦南提出这一论点后不久,查理·达尔文就使它成为疑问。达尔文的理由是以他对野生动物的考察为基础的,至于人们根据道德理由对他的怀疑表示欢迎,则与本题无关。共产制生活是社会人们之间的关系问题,在社会中,人们的文化条件使得他们的自然欲求被掩盖起来或者发生变化。一个共同体中的女人也和男人一样,同样是人,她们同男人、同后代的关系是人的关系。纯粹生物的、性的欲求被变成了文化的要求和关系,虽然其中包含有强弱不等的性的成分。例如,如果在某种情况下女人被当作财产,那也并不就象野兽一样当真实行杂交。因为经济意义上的财产无论在哪里都带有社会问题的性质,并受到一定权利义务和内外有别的限制,因人而异。关于把妇女作为共同财产和实行杂交的问题,很早就有争议,但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这两者并不是一样的。达尔文对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灵长动物有过毫无约束、社会秩序完全混乱的状态持怀疑

态度。这是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是，是不是人按其本性是社会存在物，作为共同财产的女人是和社会存在物发生关系。如果这是我们要证明的，那么说原始人毫无约束地实行杂交，对一个共同体的女人在性方面可以任意占有，则不能证明这一点。人的社会生活，那种社会生活的最初共同性、群居关系和集体所有制，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说明。人是属于自然界的序列的，自然界被人所改造，人本身也受到改造。作为人，我们并不是直接地，而是通过我们的工艺技术和社会关系间接地与自然联接在一起。最后，把女人看作共同财产也是个混淆不清的问题，这同群居关系和原始集体性并无内在联系；其基础事实上是可疑的。就语义来说，占有和财产并不是一码事。

马克思过去曾经批判过法的历史学派，特别是古斯塔夫·胡果，他把人的原始状态即“自然”人看成中心前提。胡果从这种状态中推出文明民族中间各种现存的法的状况。马克思嘲笑了这种令人想起卢梭的自然人、荷兰的原始状态画家、达·蓬特和莫扎特笔下的原始状态学舌人、穿着羽毛装束的巴巴盖诺的东西。他并不是指真正的易洛魁人，而是指在十八世纪欧洲人的幻想中对他们的再创造。政治经济学家们同样采用了这种概念，希望通过虚构即鲁滨逊·克鲁梭得到纯粹的人性或自然人。当时在欧洲有一种对文明的批判认为，我们同原始人并没有多大不同，透过我们的制度的掩盖向外窥视的是野蛮人。但是一个裂缝有两头：野蛮人窥视我们，我们也窥视他，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自己。

有人可能把这种批评调过头来，从这样一个想法中得到安慰：我们毕竟不是这样坏。但这个裂缝是一面哈哈镜，我们是原来的我们，只是被变形了。差别在于我们有自己的问题要解决，单是注意到这些问题是全人类的普遍问题，并不会使它们成为永恒的、必然的、不能解决的问题；是不可能就这样宿命论地耸耸肩膀，把它们甩开不管的。此外，问题的普遍性是一种虚假情况，因为，虽然人类同自然界的最初异化分离的确是一种人类的共相，文明社会

中人的异化却不是同一回事，然而同时又有点相同，以歪曲方式存在的相同。由于工艺技术的进步，由于社会分工越来越复杂化，文明人类同自然界就更加疏远了。社会的剩余产品同它的直接生产者的异化，并不是同上述两种一样的异化，而是与它们两者有直接联系，是它们两者的必然前提，而且也是社会分工越来越复杂化和技术日益进步的一定后果。人类同自然界的异化和人们彼此之间的异化正在汇合，因为这两种异化相互发生影响。但这些关系尚有待详细研究。

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

马克思所确立的、并且在他做过摘要的人类学著作中找到了支持的一个伟大思想，就是人类最初过的是群居生活，集体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形式。马克思在柏林大学学习时常去的黑格尔小组之一的成员麦克斯·施蒂纳，曾对无拘无束的个人主义作了歪曲解释。施蒂纳的纯利己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的一幅讽刺画。摩尔根在他的著作的结束语中提到人类的智慧在财产这种无法控制的力量面前感到迷惘而不知所措。他接着写道，社会利益绝对高于个人利益；个人在征服他的力量的作用下蒙受苦难。此外，追求财富是近来的事，因为文明是近来的事。那不是人类的最终命运。^⑩

在这个时候，俄国社会主义者维拉·查苏利奇就俄国集体农村即“村社”问题写了一封信给马克思。在马克思写的未寄出的复信草稿中^⑪，马克思提到摩尔根的著作，把他作为对立阵营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位证人，然而就是这位摩尔根指出了人类生活是在古代氏族中形成的，曾受到文明、财富和个人主义的歪曲。但是马克

^⑩ 参看上书，第174—175页。

^⑪ 见上书，第19卷第430—452页。

思补充说,与人类在地球上繁衍发展的漫长地质时代比起来,这些歪曲只不过是短暂的偏离。摩尔根曾经提到过体现在氏族中的民主、平等和博爱的理想;他预见到社会将发展到没有财产束缚的更高阶段。这些是在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中也同样可以找到的对社会的批评;马克思在他的笔记中提到了沙尔·傅立叶。摩尔根和马克思之间的差别在于,摩尔根只是提出了他所理解的人类发展的有机运动;摩尔根所要求做的任何事情都无助于达到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更高形式,无论是加速过渡的过程,还是保证它的实现。马克思则提出了具体的批判和一套使社会从目前阶段向更高阶段过渡的积极行动计划,从而使运动的速度和方向都受到我们的支配。

人 创 造 自 己

我们已经读到马克思在他的民族学笔记中所涉及的人类发展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人是由生物的及其他自然的因素构成的:人在和这些因素的交互作用中创造自己。汉娜·阿伦特反对这个关于人的自然本质的概念,她写道:“人无论是作为类的一员还是作为一个个人,其存在都不归因于自己,没有比这更明显不过的了……。”但这是关于人类发展的极度简化的、片面的观念。阿伦特为讨论人赖以存在的因素采用了两个参照系:类和个人。一系列交互作用被排除在外,一方面是类和个人之间,另一方面是这两者同自然环境之间。而且,自然既存在于内部,即人的机体中,也存在于外部,即我们周围的土壤、空气和水中。这样一来,还排除了第三个参照系:那就是个人同他被养育并生活于其中的特定社会的关系。正是由于这些关系的结合(在这些关系中,人类个体有时是积极因素,有时是消极因素),人创造出自己,或者用阿伦特的说法,使自己的存在归因于自己。就人类个体而论,人的“类”,除非作为一种抽象,否则并不存在。我们可以对此表示惋惜,或者

表示希望有朝一日这种抽象将变成具体现实。直接的社会、邻里、共同体及其机构、政府的更大机构、法律、国家等等，只作为具体的东西存在。这一切塑造个人，个人则给它们以物质内容。没有社会，个人不会存在，没有个人，社会也不会存在。

亚当·弗格森在两个世纪以前就说过，人是缔造他自己的名声和命运的工匠。我们并不同自然直接接触，而是让我们的技能在我们自己和自然界之间起中介作用。根据不同人类社会的不同习俗，技能是多种多样的，因此我们的自然界是多种多样的。人类学家们试图用“文化”一词来概括这个关于人和自然界的非直接关系的概念。因此文化是人的产物，而且只是人的产物。而且，我们创造文化，不是一般地创造，而是特殊地创造。我们在每一个人类社会中创造我们自己的文化。这个文化反转过来又塑造生活于其中的个人；我们所创造出的东西反转过来既塑造我们的物质生存方式，也塑造我们的精神生存方式。就这个意义来说，我们创造我们自己，不是一般地，而是特殊地，按我们的类型创造。的确，我们的类型就是这样形成的。

我们是由重力、阳光、土地和空气这些物质的自然力量形成的。我们不能塑造这些力量，就象我们不能塑造使人类与其他哺乳动物和其他灵长动物有不同发展的进化力量一样。但是当我们探索人类产生的时代时，我们就看到，原人、早期人和现代人自己的技能通过他对环境越来越多的控制，在塑造他和自然环境的关系中起着越来越大的干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存在应归因于我们自己。对这种自我创造的因素进行了说明之后，我们现在要把它放回到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去看。事实上，之所以出现实业界中那种靠自己努力成功的人的滑稽形象，正是由于这种相互作用被忽视了。我们应把自己的存在归因于自然界即我们周围的自然界，没有这个自然界我们就不能存在，但是这个自然界，我们已使之成为我们自己的，按照我们的被部分地和无效地控制着的力量，使之被占有、被支配、被控制、被统治和被毁损。我们已用我们的

只应归因于我们自己的文化手段，去进行自我毁灭和毁灭我们周围的环境。确实，我们的存在，或者我们使自己成为的样子，我们应该归因于我们自己，而不是任何其他的东西。

人类的群居生活是我们的原始状态，这是奥托·切克、亨利·梅恩、马克西姆·柯瓦列夫斯基、路·亨·摩尔根、埃米尔·杜尔克姆以及后来的亨利·柏格森和约瑟夫·库利舍尔的论点。反对这个论点的有甫斯特尔·德·库郎日、弗里德里希·拉采尔，后来的亨利希·舒尔茨、阿尔封斯·多普施，离今更近的卡尔·斯蒂芬逊。奥古斯特·孔德和赫伯特·斯宾塞两人在争论中采取模棱两可的立场。马克思发现了人类最初的集体生活，而这个概念的科学方面和政治方面是分不开的。此外，关于社会的集体生活不但是人类生活开始时的必要条件，而且是今天人类生活的必要条件的思想，是进一步争论的一部分。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和社会是相互作用的，各自为对方的必要条件。可是在较早期的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学派思想家们——格劳修斯、托马斯·霍布斯、约翰·洛克、卢梭——看来，人的存在先于社会，人为了他自己的目的而组成社会。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类从社会生活的集体状态发展为个人主义状态，是古代集体制度瓦解、政治社会及对立社会阶级形成的产物。马克思积极反对社会的文明状态，他研究了表明这种对立和个性状态只是对人的更基本的平等博爱状态的暂时歪曲的科学资料。同时，马克思明确说明了，个人主义的学说是从一种社会过程中产生出来的，这是在政治社会中发展起来的一种政治学说，其基础是个人已摆脱了集体的束缚。个人主义、托马斯·霍布斯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自由市场、自由放任、利己主义的学说是后来产生的，它把这个问题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作为一小群从中获利者的利益来表达。这个学说起初是和个人摆脱集体束缚分开的，然后又和它合在一起，目的是为摆脱束缚的行为辩护。这种辩护曾是赫伯特·斯宾塞和亨利·梅恩的使命。马克思揭示了意识形态和事实之间的联系，同时指明了这种方法的空

洞性：政治意识形态和科学事实是分不开的，并没有任何关于社会的纯客观的科学。

人是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社会是人类个体的一部分；并没有脱离一切社会关系的抽象的个人。相反，涉及到人的每件事都是在一定社会中进行的，没有任何事情是在社会之外进行的。这一点特别重要，就其本身而言和对理解马克思的活动来说都是一样。在政治上，马克思从事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他同时极力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特别是米哈伊尔·巴枯宁。大家都认为，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产生于十九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工人阶级运动内部的冲突。这是问题的实践方面。理论方面则是，无政府主义者只看到一种简单的对立，即个人和国家；而在马克思看来，这种想法不仅过于简单，而且是危险的。在马克思的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一书摘要笔记中，他写的是“社会及其国家”。国家是各种活动的一个重要中心，但它并不是占领全部领域，在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中或在研究资本主义时期的社会和经济状况时，它也并不总是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国家是它所在的社会的一个产物。在这一点上，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观点是很肤浅和幼稚的。他们既不了解资本主义时期的社会与其国家形式之间的关系，又不了解那个社会与其个人的形成之间的关系。斯宾塞决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然而他的纲领性思想在直接把人同国家对立起来这一点上与无政府主义的纲领相去不远。斯宾塞思想中的社会学成分在这一点上是很弱的。关于资本主义时期的个人主义和个人对社会的关系的无政府主义学说和资本主义学说在维护自由上是一致的。但是由于没有一种社会理论和改变社会中各种关系的纲领，那种自由是一种纯粹形式的概念。马克思既反对资本主义学说也反对无政府主义学说。在实践方面，人们知道有《共产党宣言》中所概述的他的社会变革纲领，而《民族学笔记》将勾画出他的与实践相应的人类发展和社会进化理论的轮廓。这里将找不到解决当代实际社会问题的指针，这只能靠我们自己去

探求。

原载斯坦利·戴蒙德编《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学——问题和观点》
1979年海牙—巴黎—纽约穆顿出版社版

(马学林译)

马克思的“新人道主义”、“民族学笔记” 和妇女解放

[美]拉·杜娜耶夫斯卡娅^①

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终于能够集中注意力来研究从手稿速记文字转译成正常文字的原本马克思最后著作——《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劳伦斯·克拉德译录、编辑并作序，1972年版）。这些著作使我们能够把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并且亲眼看到把马克思关于男女基本概念（不管是在马克思最初和资产阶级社会决裂时还是在他最后著作中表现出来的看法）同恩格斯关于他所谓的“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的观点分隔开来的巨大鸿沟，而恩格斯在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把他的这一观点，无论是在“妇女问题”上还是在“原始共产主义”方面，似乎都看作是马克思的观点。

直到今天，那种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看作一个人的错误的、异想天开的观点^②（这是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一贯坚持的观点），决不仅仅在关于妇女解放的恩格斯主义观点上占优势。俄国理论家们的目的看来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学者以及非马克思主义学者都看不到马克思一生的最后十年。在这十年中，马克思由于研究了摩尔

^① 作者是美国学者，写过大量关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文章，主要著作是《罗莎·卢森堡、妇女解放和马克思的革命哲学》。——译者注

^② 马克思在1856年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曾评论过一个报道过他们的新闻记者的态度：“非常奇怪的是，他把我们两人当一个人看待，‘马克思和恩格斯说’，等等。”

根、柯瓦列夫斯基、菲尔、梅恩、拉伯克等人著作中有关资本主义以前社会的新经验材料，在他的理论认识中体验到了一些新的要素。在马克思对这些著作的摘要和评论中以及在他这个时期的通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不是象近来某些社会学论著^③所想要我们相信的那样，他不是通过放弃他自己毕生对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更不是通过取消他对他称之为“新人道主义”的思想和革命的整个新大陆的发现，来探寻新的革命道路。相反，马克思是在进一步完成他四十年来对他称之为“历史及其过程”、“不断革命”^④的人类发展及其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斗争的思考。

在他一生的最后十年中，马克思的普罗米修斯式的想象力中出现的新东西是，男人和女人们在资本主义以前社会中塑造他们历史的方式不断变化、多种多样，人类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多维性。马克思在这十年中经历了一次认识上的冲击，因为他研究了新的以经验为依据的人类学论著，看到了一些积极的特点，这些特点——无论是易洛魁族女人的作用，还是农业公社和对资本主义征服的反抗——都和他最初与资本主义决裂并号召进行“人类的革命”时曾经阐明的东西有某种相似之处。

结果，在那十年中，他同时对他的最伟大理论著作《资本论》做了新的补充，并且设想不是不可能在象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比工艺先进的西方国家更早发生革命。马克思不够长寿，未能充分设计好他所设想的革命道路，但是我们从他那个时期的通信中可以看出他的行动方向。例如，我们读到他对俄国民粹派米海洛夫

③ 见米哈伊尔·维特金，《东方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哲学概念中》（1972年莫斯科版）。不懂俄文的人可以从几篇用英文发表的论文中了解到他的观点的本质，如，《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关于社会关系的普遍性问题》，载于《苏联思想研究》第20期（1979）；《亚细亚生产方式》，载于《哲学和社会批判》第8卷第1期（1981）；和《西方和东方之间的马克思》，载于《苏联思想研究》第23期（1982）。

④ 不能把马克思的“不断革命”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混同起来，后者一向轻视农民，不把他们看作任何先锋革命力量，甚至不认为他们有“民族意识”。

斯基的尖锐批评,因为这个人企图证明马克思把他的“原始积累的历史趋势”看作普遍趋势。马克思坚持认为,这是对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历史研究,如果俄国继续走那条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⑤

这封批评米海洛夫斯基的信没有付邮,但是他关于同一个主题写给维拉·查苏利奇的信的四稿中有一稿是寄出了的。他关于这个主题所写的东西中最重要的是《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

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切所做的事情,我们的时代能够对之提出挑战,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更精明”,而是因为我们现在有作为整体的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因为我们的时代成熟了,已出现了偌大一个新的第三世界,妇女解放已从观念发展成为运动。对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挑战,不在于要求对梁赞诺夫在1923年就已找到的东西不可饶恕地耽搁了五十年才发表作出解释,也不限于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民族学笔记》没有做什么工作。关键在于,甚至当马克思的象《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类未发表著作被梁赞诺夫从第二国际的储藏室中救出之后不久就在俄国革命的激励下发表出来的时候,甚至当这些著作引起长时期的国际争论的时候,发表关于这部著作的评论的那个历史时期的某些局限性也表明我们的时代更加成熟了。

拿赫伯特·马尔库塞对那部著作的分析^⑥为例。它肯定是最早的和最深刻的“一般分析”之一,但是他设法跳过了关于男女关系的关键的一页。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修养不及马尔库塞。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存在主义者的西蒙娜·德·布瓦尔,在她的《第二性》中从马克思那里正好挑出了男女关系的观点:“人和人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9页。

^⑥ 马尔库塞的文章《关于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新材料》第一次发表在《社会·关于社会主义和政治的国际评论》杂志1932年第2卷,中译文见中央编译局马恩室编译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1983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版。

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⑦，她在最后一页上援引了这句话，并且说“没有比这说得更好的话了”，以此来强调它的重要性。

遗憾的是，在这句话之后，作为她最后一段结尾的话是与马克思的旨意背道而驰的：“要由男人来建立自由的统治……第一，必须由男人和女人通过他们的区分明确肯定他们的兄弟情谊。”总之，德·布瓦尔尽管高度赞扬马克思，但她从马克思的文章中得出的结论以及她的800多页的整部著作都未能抓住马克思把男女关系挑出来作为不仅在资本主义下而且在他所谓的“粗陋的共产主义”下异化的主要方面的原因。马克思的“新人道主义”强调指出：“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个人是社会存在物。”^⑧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在这一节的结尾说：“这样的共产主义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形式。”^⑨

让我们再来读一遍德·布瓦尔所援引的那句话：“拿妇女……（这样）对待，表现了人在对待自身方面的无限的退化……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⑩妇女解放在西蒙娜·德·布瓦尔或赫伯特·马尔库塞认识到需要弄清马克思关于男女关系的普罗米修斯式的想象力之前，从观念发展成了实际的运动。

马克思关于男女关系的概念是和他在与资产阶级社会决裂时发现思想和革命的新大陆同时产生的。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结束之前，马克思就以《共产党宣言》打出了一面新的革命旗帜，他在那里说明了必须如何彻底地铲除资本主义、取消私有财产、取消国家和资产阶级家庭，实际上就是取消整个“阶级文化”。紧接着他就参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19页。

⑧ 同上书，第122页。

⑨ 同上书，第131页。

⑩ 同上书，第119页。

加了1848年的革命。在这些革命遭到失败的时候，马克思远没有后退，而是用号召进行“不断革命”来迎接新来临的五十年代。在这个十年里，他开始考察其他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并且分析了一种新的人类发展，由于把这种发展具体化为“绝对的发生运动”，他又一次进一步深化了他的各种概念和目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是中介，它一方面既导致马克思最伟大的理论著作《资本论》，又导致他围绕着巴黎公社所进行的活动和关于巴黎公社的著作，另一方面又导致《民族学笔记》。我们可以看到，在后者中埋藏着一条通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小道。至少这是我所看到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选择了马克思的哲学在他整整四十年的理论发展中同妇女解放的关系作为我的主题。我把重点放在他一生的最后十年——这十年至今为止还被认为几乎不过是“慢性死亡”——是因为正是在这十年里他体验到了一些新的要素，在我们现在所说的第三世界和妇女解放运动中看到了新的革命和思想的力量。象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那样重新回到黑格尔辩证法上来并对它进行重新创造，是决定他的全部著作的方法论。

从来没有改变的是他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批判的概念和实践，即他所说的：“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①正是因为如此，马克思从来没有把批判与革命和对现存一切的彻底铲除分割开来，既不宽恕生产中的官僚机构，也不宽恕教育中的官僚机构；正是因为如此，他用他的“不断革命”的概念与旧的概念相对立。

他早年对教育中的官僚机构的抨击在今天还显得异常现实：“官僚机构认为它自己是国家的最终目的。……国家的任务成了例行公事，或者例行公事成了国家的任务。官僚政治是一个谁也跳不出的圈子。它的等级制是知识的等级制。上层在各种细小问题的

^① 同上书，第1卷第416页。

知识方面依靠下层，下层则在有关普遍物的理解方面信赖上层，结果彼此都使对方陷入迷途。”^⑫

对资本主义制度下教育中的官僚机构的这种尖锐批判，同挑出异化的男女关系来谈一样，只不过是他对现存的剥削的、歧视女性的、种族主义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进行批判的开端。不管我们所关心的是第三世界还是我们现有文化的生存，这对我们的核时代说来仍然最为重要。

由于要集中注意马克思的最后十年，对上世纪四十年代以后的两个十年我必须大大从简。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要少谈马克思的最伟大著作之一《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因为我将把那部著作与马克思最后十年的《民族学笔记》放在一起考察。我在这里提到《大纲》只是为了指出，马克思正是在1857年写这部著作时得出结论说，人类的发展不止经过三个时期——奴隶制、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他看到了人类发展的整整一个新的时代，他当时把它叫做“亚细亚生产方式”。“亚细亚”的意思不仅是指“东方”。他不仅谈到了东方的，而且谈到了西方的原始公社发展形式，不管它是发生在克尔特人当中还是发生在俄国。对我们时代的人类学家说来，不考虑马克思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太平天国革命开始时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关注，仿佛他那时完全是以欧洲为中心，就同不考虑他在1844年关于男女关系的概念一样肤浅。

二

我想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挑出来谈的是两件事情，它们都和妇女有关。第一件是英国普雷斯頓1853—1854年的罢工，不下一万五千人罢工反对暴虐的劳动条件。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极其详细地写了关于这次罢工的报道，对女工的条件赋予特别的注意。第二件是他对布尔韦尔-利顿夫人的支持。布尔韦尔-利顿夫

^⑫ 同上书，第301—302页。

人是小说《谢弗利，或光荣的人》的作者，她在1858年不仅敢于和她那保守的贵族政治家庭持不同的观点，而且要把她的观点公之于众。由于她胆敢离开选民会，打算租一个演讲厅来说明她的观点，她的丈夫和儿子竟把她关进了精神病院！马克思在《布尔韦尔-利顿夫人的囚禁》一文中为她作了辩护，不仅抨击了托利党报纸的性别歧视，而且抨击了“多少受到曼彻斯特学派精神熏陶的激进派报纸”。^⑬

至于关于普雷斯顿罢工的那几篇文章，马克思不仅详细叙述了妇女所受到的特殊剥削，而且详细叙述了甚至这些恶劣的条件也没有使妇女局限于反对这些剥削的劳动条件而是向教育制度提出了挑战这个事实。马克思的宪章派活动和他的研究论著，不仅是他的书，而且还有鼓动文章，从来都不单单谈到男性工人。完全相反。例如在写到“工厂的工人们似乎决心要从曼彻斯特骗子们的手中把教育运动夺过来”时，马克思猛烈抨击了童工制度和资本家所采取的极端措施。他举的例子是：“一个只有9岁的女孩，在60个小时的工作中由于疲劳过度摔倒在地上就睡着了；当别人把她叫醒的时候，她哭了，但还是强迫她继续干活！”^⑭

马克思从来不把他的理论工作同他的实际活动割裂开来，在工厂视察员的“蓝皮书”中和报纸上登出的正在发生的事情中，他最注意的是工人的活动。1856年4月，他在宪章派报纸的创刊纪念会上这样概括了资本主义及其工艺发展的整个问题：“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⑮

马克思所从事的思想斗争既同阶级斗争又同一切争取自由的斗争（马克思所说的“历史及其过程”）都密不可分，因此他欢呼1860年约翰·布朗进攻哈帕尔渡口不仅标志着奴隶制度末日的开

^⑬ 同上书，第12卷第562页。

^⑭ 同上书，第9卷第528页。

^⑮ 同上书，第2卷第79页。

始，而且标志着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始。在这个时代不可能否认这些事实。第二年的确在美国爆发了内战；英国阶级斗争的激化发展到争取国际劳工支援，从而以一种革命的方式影响了美国内战的结局；1863年在波兰发生了反对沙皇俄国的起义，紧接着是法国的阶级斗争激化，法国的劳工领袖来到伦敦，终于建立了以马克思为精神领袖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

现在意识形态家们所否认的，甚至某些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提出疑问的，是这些客观事件（以及马克思的与之有关的活动）使得马克思与理论概念决裂。不然如何解释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进行彻底改造，使之成为《资本论》呢？毕竟，《大纲》（以及围绕它的来往通信）表明了，马克思对他与黑格尔的辩证法重逢是多么高兴，竟认为是这种辩证法帮助他找到了所有这些卷帙浩繁的经济学论著的“表述方式”。然而，当马克思在1859年决定把《大纲》的一部分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发表的时候，变化也是很大的。他不是以货币或价值开头，而是重新写了论商品的整个第一章。这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它被保留下来作为《资本论》所有的草稿和定稿的开端。然而，那不是决定《资本论》的内容和结构的一切。对整个改造工作起决定作用的，是马克思决心把《大纲》和《政治经济学批判》都抛开，又“重新”开始。

使得他和理论概念决裂的，是他在动荡的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重新创造。这一点不单是从他1877年的“自白”，而且从《资本论》的实际情况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而这是他的自白：“实际上，我开始写《资本论》的顺序同读者将要看到的顺序恰恰是相反的（即从第三部分——历史部分开始写），只不过是我最最后着手写的第一卷当即做好了付印的准备，而其他两卷仍然处于一切研究工作最初阶段所具有的那种初稿形式。”^{①⑥}

马克思和资产阶级理论家之间的思想斗争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就已经如此广泛，以致他的手稿有将近一千页之多。这部“理论

^{①⑥} 同上书，第34卷第285页。

的历史”有三册，即我们所知道的《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四卷）。但是对于这些出色的、深刻的论著说来最具有历史意义和最关键的东西，是马克思把它们放在他的三卷《资本论》之后。马克思不是继续进行他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本身”的批判，而是把注意力转向工人们在生产的时候做什么和说什么。

在马克思准备第一卷付印时，他进行的第一个重大创新是在第一章《商品》中增加了一节《商品的拜物教》。至今为止，没有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者——怀疑马克思关于人类发展经过不同时代和不同类型社会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现实性以及独一无二的马克思式的理论和实践的统一。那么，那些批评家们怎么还能够坚持说马克思是完全“以欧洲为中心的”，说这的确就是所谓“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说“经济学家”马克思未能理解“亚细亚生产方式”完全不同于被他说成为普遍现象的西欧经济发展呢？认真注意一下马克思就在那《资本论》第一章中关于资本主义以前社会的简要概述（甚至当这些批评家还不知道有《大纲》，更不要说《民族学笔记》的时候），岂不更为恰当？马克思不仅说明原始公社的形式存在于“罗马人、日耳曼人、凯尔特人那里”，而且认为，“仔细研究一下亚细亚的……公社所有制形式，就会得到证明，从原始的公社所有制的不同形式中，怎样产生出它的解体的各种形式。”^①显然，这正是马克思本人所做的；然而，仍然很少有人认真地研究他的《民族学笔记》。

有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对马克思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深刻程度极为钦佩，坦率承认经济学家们大大得益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分析，然而他对哲学却非常反感，以致认为不可能和马克思进行真正经济学方面的争论，因为马克思作为哲学家，总是“把历史的叙述变成历史的推论”。这就是马克思的辩证法，他不仅看到他所收集到的统计资料，而且看到重新塑造历史的活生生的男人和女人。在涉及到“妇女问题”时更

^① 同上书，第23卷第94—95页注30。

是如此。马克思不再和理论家们进一步争论，而是注意生产中所发生的事件以及这些事件在历史舞台上的政治后果，他在《资本论》中作出了第二个重大创新——写了论“工作日”的一章。

这一章以前在马克思的理论著作中从未出现过——不管是《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还是《理论的历史》。虽然马克思作为革命活动家，一直参加争取缩短工作日的斗争，但是只是在他如此详细地（确切地说是用76页篇幅）分析这个问题时，才用这么多篇幅谈到生产过程中的妇女，并且得到了关于新的反抗形式的很新的结论。资产阶级理论家们认为，马克思在详细叙述繁重的劳动条件（特别是妇女劳动的屈辱形式）时不是在阐述理论，而是在讲“感伤故事”，但是马克思在深入研究意识形态家们不予考虑的那些工厂视察员的“蓝皮书”，写下“在英国有时还用妇女代替马拉运河船”这种语句时，他不仅仅是指出对妇女的不人道态度。马克思现在得出结论，工人提出的这种简单问题“我的一天从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候结束？”是比资产阶级的人权宣言更伟大的自由哲学。马克思现在把资产阶级的人权宣言叫作“‘不可剥夺的人权’这种冠冕堂皇的条目”。^⑮

即使我们反对马克思对资本家追逐尽可能更多无偿劳动的“象狼一样的贪欲”的描写，而只看机器，只看马克思如何描写有“魔力”的“机械怪物”，说它是“通过传动机由一个中央自动机推动的工作机的有组织的体系”。^⑯——难道这种描写的现实性不会使我们机器人时代的人们吃惊吗？它肯定会使1950年参加反对最初使用自动化的总罢工的矿工们吃惊。他们会认为那段描写的作者不是一个十九世纪中叶的人，而肯定是某个当时就和他们以及被他们称作“杀人犯”的连续采矿机一起呆在矿井里的人。

马克思并不使他《资本论》中的“经济学”脱离其社会和政治的后果，因此他看到了一种而且只有“一种积极的特点”——让妇女

^⑮ 同上书，第335页。

^⑯ 同上书，第419页。

走出“家庭范围之外”。然而，他立即警告说，“残酷的资本主义形式的”工厂劳动正是“腐败和奴役的邪恶渊源”。但是男人和女人的集体劳动，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更高级的形式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

马克思接着说：“当然，把基督教日耳曼家庭形式看成绝对的东西，就象把古罗马家庭形式、古希腊家庭形式和东方家庭形式看成绝对的东西一样，都是荒谬的。”他最后指出，两性集体劳动的其他历史条件可能“变成人类发展的源泉”。^⑩

马克思这位革命的行动哲学家是在积极参加第一国际活动的同时完成《资本论》第一卷的：

(1)那个组织的档案记载，1867年7月19日，马克思建议总委员会在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上讨论“用什么实际手段把国际协会变成工人阶级（女工和男工）摆脱资本压迫的斗争的总的中心”。^⑪

(2)1868年12月12日，马克思写信给库格曼：“美国‘劳工同盟’最近一次代表大会有很大进步，别的不说，这也表现在它对待女工完全平等……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⑫

(3)马克思还要求库格曼博士注意这个事实，即第一国际不仅平等对待妇女，而且已经把哈里特·劳夫人选入了总委员会。

马克思无论在组织关系中还是在私人关系中都认为妇女既是革命的力量，又是革命的原因。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妇女在抵抗运动中的革命活动才终于促使一位妇女马克思主义者去研究巴黎公社中的妇女。艾迪丝·托马斯的著作《妇女鼓动者们》第一次给我们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时代最伟大的革命——巴黎公社——中的妇女。我们正是从这部著作中知道了马克思所起的作用：正是他建议伊丽莎白·德米特里耶娃在内战爆发之前去

^⑩ 同上书，第536—537页。

^⑪ 同上书，第16卷第608页。

^⑫ 同上书，第32卷第571页。

巴黎，正是她组织了“妇女保卫巴黎和护理伤员联合会”这个第一国际的独立的妇女支部。此外，马克思和德米特里耶娃之间在以前就建立了关系，她曾把她自己也关心的俄国农业材料送给马克思。

三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唯心主义观念中立刻显露出来。”^②我们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在他一生的最后十年中转而研究以经验为依据的人类学，并不幻想会在那里发现另外一些对关于资本主义以前社会的新发现进行辩证分析的历史唯物主义者。这是他在写作《大纲》和考虑资本主义以前的情况时曾向自己提出的一个问题，他根据自己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人类的发展是一种“绝对的生成运动”。马克思同“历史及其过程”的不断对抗以及他的普罗米修斯式的判断力表明了，不仅他的观点与资产阶级理论家是多么不同，而且他关于人类学的观点与他的最亲密合作者恩格斯是多么不同。

事后稍加反思就不难看出，恩格斯并没有严格地执行马克思对他的要求，即保证以后出版《资本论》第一卷和译本时都以法文版为准。恩格斯过分强调唯物主义的方面，不管他是否要负一定的责任，问题在于不仅是民粹主义者米海洛夫斯基企图把“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说成人类发展的一种普遍现象归因于马克思。正如我们已经表明的，马克思曾对米海洛夫斯基的文章写过一篇非常尖锐的批评。然而，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继续表达类似米海洛夫斯基的观点，并且以恩格斯编辑的《资本论》第一卷作为自己的根据。

这里我们主要关心的是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

^② 参看上书，第23卷第410页注89。

一生最后十年的肤浅的(如果不是彻底沙文主义的)态度。特别令人吃惊的是梁赞诺夫的态度,他第一个发现《民族学笔记》,但是没有读就宣布这些笔记是“不可饶恕的学究气”。然而,对未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更有害的是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写的第一本书《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把它说成是执行马克思的“遗言”。但是事实是恰恰相反。诚然,马克思曾经要求恩格斯一定读一读《古代社会》,因为这本书刚刚出版,曾使他感到极大的兴趣。然而,我们知道恩格斯说过,他别的事情太多,没有时间读它,只是在马克思逝世后发现马克思关于这本书的笔记时才弄到这本书。现在不清楚的是,恩格斯当时在马克思那些没有发表的手稿中发现的,除了关于摩尔根、也许还有柯瓦列夫斯基的笔记以外,是否还有《大纲》或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民族学笔记》中的许多东西。因为他把这说成是马克思的“遗言”,我们都是按照这种妇女解放的概念培养起来的,仿佛这真的是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共同看法。现在,我们既然终于有了《民族学笔记》的手稿——也有了马克思对柯瓦列夫斯基的评论和关于毛勒的通信以及《大纲》——就不难把马克思关于妇女和辩证法的观点与恩格斯的观点区分开来了。

的确,恩格斯是马克思的最亲密的合作者,马克思曾经委托他用他为《资本论》第二和第三卷所积累而生前未能编辑出版的大量资料“弄出点东西来”。马克思也曾经委托他确保《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马克思亲自校阅过的唯一定本)成为所有其他版本所依据的版本。^②现在,对我们最重要的是恩格斯对此到底做了些什么,因为马克思在那里作的最重要的改动涉及资本的积累。自从出现了一个第三世界,这些改动就变得十分重要了。

第八篇^③(“所谓原始积累”)中所用的“所谓”这样一个不显眼的词很少有人注意,由它可明显看出,马克思感到,为了既强调资

^② 关于这点的批判讨论,参看凯温·安德逊提交给美国费城1982年3月19日举行的东方社会学协会讨论会的论文《〈资本论〉法文版一百年以后》。

^③ 中文版《资本论》中为第二十四和第二十五两章。——译者注

本的积聚和集中,又强调第七篇(《资本的积累过程》)的辩证发展,他应该使第八篇从属于第七篇,从而表明所谓原始积累决不局限于资本的早期阶段。资本积聚和集中的结果以及资本扩展到我们现在所说的帝国主义,是法文版最重要的段落之一。遗憾的是,这正是恩格斯在编辑英文版时所略去的段落。这个段落强调了资本主义达到最高技术阶段时世界市场的形成。马克思说,正是在这个时候,资本主义“相继兼并了新世界、亚洲和澳洲等广大地区”。^②

必须记住,这不仅仅是恩格斯从马克思的“摘录”中引用的东西(只有很少几页)与马克思实际做的摘要和评论(有98页之多)之间的数量差别。更重要得多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摩尔根的态度,一个批判,一个不批判,全然不同,他们从摩尔根著作中得出的结论也不相同。以一个时期向另一个时期过渡的问题为例。马克思指出,在一个过渡时期当中,人们看到有两重性出现,就表明开始有对抗,而恩格斯却似乎始终认为只有在一个过渡的末尾才有对抗,好象阶级社会是在公社形式被摧毁、私有制建立起来以后以差不多全盛的状态开始的。恩格斯认为是单线的发展,马克思则认为是辩证地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并把这种发展同革命的高潮联系起来,所以经济危机被看成是“社会革命的时代”。

关键是,一般压迫的因素,特别是对妇女的压迫,是在原始共产主义本身内部就产生了的,而不是仅仅和脱离“母权制”有联系。

在探索历史的发展和了解人类的其他各种关系时,更重要得多的是要使人们能够看到新的革命道路和人类发展的多维性。例如,早在《大纲》中(那时恩格斯还不知道有《大纲》),马克思就已经提醒人们注意行会的“地位”,他评论说:“在这里,劳动本身一半还是技艺,一半则是目的本身等等。劳动还是劳动者自己的

^② 关于恩格斯略去的这整个段落,参看我的《罗莎·卢森堡、妇女解放和马克思的革命哲学》(1982年新泽西版)第148页。还可参看对平原印第安妇女进行左派女权运动分析的《隐藏的一半》(1983年美国大学出版社版)。

劳动。”^⑲

马克思在发现易洛魁妇女享有极大的自由时，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表明在美国的文明摧毁印第安人以前妇女享有多大的自由。的确，首先全世界都是“文明的”民族剥夺了妇女的自由，就象英帝国主义在征服爱尔兰时剥夺了妇女的许多自由一样。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痛恨随着研究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而变得更加强烈。但是，他远没有象恩格斯那样得出结论说，脱离“母权制”标志着“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而是说明在原始公社内部就已经出现了这种地位的差别，很清楚，妇女在原始公社中所享有的自由远不是全面的。马克思指出，尽管妇女被允许“通过她们自己选择的发言人”表达她们的意见，但是“决定却是由氏族会议作出的”。

其次一点，这是和前一点分不开的，就是妇女的反抗，即马克思在每一次革命中所看到的“妇女的酵素”。例如，马克思批评了摩尔根关于古希腊和妇女地位低落的某些说法。马克思认为，奥林帕斯山的希腊女神并不仅仅是雕像，而是表现昔日光荣的神话，这些神话实际上可能反映了过去的一个阶段，也可能表达了对一个颇为相同的未来的期望。

马克思承认摩尔根在关于氏族及其早期平均主义社会的理论方面所作出的伟大贡献，但是他的态度和恩格斯不加批判地为摩尔根叫好毫无共同之处：恩格斯竟然认为摩尔根“在美国……重新发现了四十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⑳ 马克思非但不认为摩尔根是一个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者，而且拒绝了他的生物学主义和进化主义。

马克思所描绘的事实是，在原始公社解体以前很久，在平均主义的公社内部就已经出现等级问题。马克思嘲笑在父权制氏族中人们为保证以父权代替母权而开始改变子女的名字的作法：“借更改名称以改变事物，乃是人类天赋的诡辩法，当实际的利益十分冲

^⑲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99页。

^⑳ 同上书，第4卷第1页。

动时,就寻找一个缝隙以便在传统的范围以内打破传统!”^②

恩格斯确实引用了马克思的这一段话,而且也引用了一段关于家庭本身“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阶级对抗的话。但是他满脑子是私有制问题,由于把注意力过分集中在私有制和一夫一妻制家庭上,公社内部的一切对抗似乎都看不到。虽然马克思肯定把一夫一妻制家庭与私有制联系在一起,但他认为关键的还是家长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对抗关系。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强调,原始公社的没落不仅是由于外部的因素,也不仅是由于“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这是恩格斯的话,决不是马克思的话)。相反,甚至当马克思不仅高度赞扬原始公社,而且看到有将原始公社转为现代集体社会的可能性时,他还警告说:“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③

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最大差别之一是,马克思不象恩格斯那样在原始和文明之间划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马克思认为,关键始终是“事情发生时的历史环境”。马克思不是把人类的发展看成是单线的,而是指出有各种不同道路从原始公社通向一个各不相同的世界——但是决不会不经过革命。例如,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去阿尔及尔旅行,看到阿拉伯人是那样兴高采烈,不仅赞扬他们对权威的反抗,甚至赞扬他们的“服装优美极了”,但是他在结束他的描述时说:“然而没有革命运动,他们什么也得不到。”^④ 保尔·拉法格在报道马克思这次旅行的情况时说:“这次马克思归来,满脑子装的是非洲和阿拉伯人。”^⑤

马克思在加强对资本主义以前社会、妇女、原始公社和农民的研究时所感受到的新的要素,说明他的著作是一个整体。因此,这不是一个仅仅回到他在1844年手稿中第一次提出的妇女概念上

^② 同上书,第45卷第467页。

^③ 同上书,第19卷第441页。

^④ 同上书,第35卷第302页。

^⑤ 《恩格斯和保尔·拉法格、劳拉·拉法格通信集》197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144页。

来的问题，也不是象某些人类学家所说的只是从一种哲学的人类学转向一种经验的人类学。相反，作为一位革命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殖民主义的敌意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以致他所强调的是在清除其根原时应该挖得多深。他的最后的研究使得他能够看到建立新的人类关系的可能性，不是因为这种新关系可以通过使象易洛魁人当中的那种原始公社的男女平等“现代化”而产生，而是因为他感到这种关系可以从一次新型的革命中突然出现。

经济学家熊彼特不是唯一的一个认为马克思把历史的叙述变为历史的推论的人。伟大人类学家雷蒙·弗斯爵士肯定不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但他认为《资本论》与其说是一部经济学著作，不如说是“一部立意要使读者参加到所描写的事件中来的动人的历史书”。^③我衷心赞同斯坦利·戴蒙德 1975 年为《辩证人类学》杂志创刊号写的社论：“马克思主义传统可以被看作一种流产了的人类学，使它流产的原因是包括学院派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学院派社会科学的兴起，以及在确定文明学术结构中的愚弄人的精神劳动分工。”当然，马克思并不把他的批判局限于“愚弄人的精神劳动分工”，而是局限于脑力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不过，他从未低估当知识分子将自己与劳工运动联系在一起时艰苦的精神劳动的创造性。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未能在他的遗产范围内做的以及他们对他的《民族学笔记》的几乎全不理睬，都不是我们不去艰苦努力体会马克思的思想的理由。

马克思在消化新材料方面的历史独创性肯定是恩格斯所望尘莫及的。在每一次，他都把经济危机看成是“社会革命的时代”。太平天国革命使他对资本主义以前社会产生了兴趣。他写作《大纲》的动力一向被认为是 1857 年的英国经济危机，不仅《大纲》中包含有论述资本主义以前社会的出色部分；而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想到了太平天国革命。

^③ 参看雷蒙·弗斯：《怀疑论的人类学家？社会人类学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观》，载于《马克思主义分析和社会人类学》（1975 年伦敦版）。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不仅美国内战结束了奴隶制,为发展敞开了新的大门,而且妇女的所有实际斗争在马克思那时最伟大的革命——巴黎公社——中达到了最高峰。马克思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直至他逝世前为止所进行的新的研究,意味着回到这样一种人类学上来,这种人类学既不仅仅是概念,也不是孤立的经验研究,而是他的“不断革命”哲学进行的一种“绝对生成”的运动。

原载《实践》杂志国际版

1984年第3卷第4期

(都 梁译)

关于“原生形态”概念的历史

(马克思著作中的原始社会概念)

[苏]H.Б.特尔-阿科皮扬

原生形态或古代形态的概念,是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①中提出的。除了原生的形态,这里还提出了次生形态,它的特征被认为是私有制。这样,这种形态按照马克思的定义就包括资产阶级社会,以及“建立在奴隶制上和农奴制上的一系列社会”。^②马克思同时还考虑到再次生形态,用以指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③

只要把在1881年2月末3月初由于俄国革命运动女活动家查苏利奇写信向马克思求教而写的这些草稿同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④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到这些草稿中包含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崭新因素和世界历史分期的新方法。在《序言》中被看作历史过程的个别独立阶段的所有一连串依次更迭的对立社会,在新的分期法中被说成是单一的次生形态。然而,如果说在以前的分期法中就已经有这样合并的前提,那么采用“原生形态”(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这一概念的前提,我们却不能直接在《序言》中找到。因为那里提到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马克思整个说来也是把它算作阶级的形态的。但是“原生形态”这一概念的根源可上溯到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早阶段,甚至上溯到它的形成时期。这些问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0—452页。

② 同上书,第450页;与第444页比较。

③ 见上书,第43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1—85页。

题看起来离现实似乎非常遥远，然而马克思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在他整个一生中都没有间断过。原始历史的概念是总的历史过程理论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这个概念的发展和整个理论的演变一样，经历了同样的阶段，所以可以按照列宁对十九世纪马克思主义全部历史的分期来进行考察。

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发展中划分三个主要时期。^⑤第一个时期到1848年为止，马克思主义形成，主要是哲学方面的发展。第二个时期从1848年到1871年，经济方面被提到重要地位。在这个时期写成了《资本论》，制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心范畴——“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在第三个时期，对科学共产主义问题的研究获得特别重要的意义。还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提出了一些崭新的思想，特别是研究了上层建筑对基础的能动作用。在列宁的这种分期中，特别清楚地看得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同实践、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直接联系。三个时期用1848年欧洲革命和巴黎公社这两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分隔开来。正是社会状况的变化和工人运动向更高发展阶段的过渡成了进一步深化和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推动因素。

至于原始社会史的概念，那么它的某些重要组成部分还在马克思主义形成阶段就产生了。马克思的观点最充分地反映在他1845—1846年和恩格斯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⑥、后来的《1857—1859年经济学手稿》^⑦以及上面已提到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当然，揭示原始社会某些特点和方面的意见和评论也包括在马克思的其他著作中，但是每个时期的综合论述正是包含在上述著作中。

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当马克思开始自己的创作道路时，关于原始社会的科学认识还带有极为模糊的性质。在德国，德国人的日

^⑤ 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437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⑦ 见上书，第46卷上下册。

常意识中占统治地位的还是宗教观念和造化思想，但是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们对圣经神话展开了广泛的批判。启蒙思想家们提出的关于人和自然有密切联系、关于历史和进化的观点，在先进阶层中得到了传播。按照教会的学说，蒙昧和野蛮部落似乎是由于离开了真正的基督教信仰而产生的，与这种学说相对立提出了关于“善良的野人”、关于没有被文明败坏的“自然人”、最后关于社会的“自然状态”的观念——这些概念实质上表明了哲学对原始社会思想的态度。与政权神授的教条相对立提出了源于契约的思想，从这些思想中推出了在人类历史中存在有先于国家的时代的结论。在更完备的分期中，原始社会的历史包括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

在最接近于看出原始社会问题的十八世纪的思想家们当中，应该提到英国政治经济学的代表苏格兰人亚当·弗格森与德国的哲学家和作家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前者指出了公有制是原始社会关系的基础。后者强调全人类的统一，描绘了人类从原始状态到现时代的广泛发展图景。这两位作者的著作在上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都受到欢迎，对马克思观点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除了对原始历史的这种一般解释之外，还存在有对它的更具体的解释。“远古”有时被体现为荷马时代的希腊，有时被体现为古罗马时代的德国。反动浪漫派关于古代日耳曼人的理想化观念广泛流行，它对德国民族主义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反对反动造化学说的斗争中，当时的哲学思想能够越来越多地依靠具体科学的成就。康德-拉普拉斯的天体进化理论、查理·赖尔的地质学研究成了证明人的自然起源的直接前提。考古学在研究原始人的实物遗迹方面，民族学在研究原始社会的结构和习俗方面已跨出了最初的几步。然而，还要花好几十年功夫顽强地积累事实，对事实逐步进行概括，将各种不同知识领域加以综合，才有可能把布歇·德·佩尔特对头批石制工具的发现、克里斯提安·汤姆森（几乎是按卢克莱修·卡鲁斯）在人类史上区分石

器、铜器和铁器三个时代的分期法、摩尔根在四十年代末对易洛魁人氏族的描述(他本人还未意识到是发现)结合成为一门关于原始社会的独立科学。可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他们关于历史过程的一般唯物主义理论时,不制定关于原始社会史的概念是不行的。他们试图在现有材料的基础上一般地解决这个问题。

唯物史观的中心问题,一方面是揭示社会的结构,它的各种不同环节(生产力、生产关系、其他社会关系、政治上层建筑、各种形式的社会意识)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另一方面是研究这一结构在历史过程中的规律性变化,即社会历史形态的依次更迭。弄清社会结构的各种环节和建立按社会形态的历史分期的工作是不平衡的,逐步地进行的,虽然创立新世界观的过程带有激烈的、甚至突发的性质。它占了三年多一点时间——从1842年秋马克思的文章在《莱茵报》上发表到1846年春完成《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为止。克服宗教观念还在这个时候以前就完成了。马克思在1842年11月写道:“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⑧新学说形成过程的第一阶段是马克思在1843年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的批判,这使得他得出结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马克思所理解的市民社会,不是原子化的个人的总和,而是物质生活关系的领域。

下一个阶段是研究市民社会本身,结果马克思得出结论,生产决定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在研究这个问题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包含有一系列对原始社会史概念也有重要意义的一般原理。人类史在这里被看作自然史的一部分;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和社会是由于和自然相互作用的过程、由于劳动过程而产生出来的。“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⑨因此,劳动在人的形成中的作用问题在1844年就已经以一般形式提出来了。四十年之后,恩格

^⑧ 同上书,第27卷第436页。

^⑨ 同上书,第42卷第131页。

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⑩一文中把这一马克思主义原理加以具体化。

劳动也是马克思把历史过程分为三个时代的基础。他所在的时代是由于劳动异化、即形成私有制的结果而产生的。劳动和资本即私有制的最后形式之间的矛盾，只有通过废除私有制和建立共产主义才能消除。共产主义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人的复归”。^⑪由此得出的结论是，马克思在思想中把人类史上的第一个时代也看作共产主义，在那个时候，自然界和人之间的和谐还没有被破坏。这是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关于私有制永恒不变的论点进行科学批驳的第一个形式。

把上面描述的对历史过程的划分与几乎四十年后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所提出的历史分期法加以比较，它们的相似十分明显。在两处都是把人类的发展分为三个时代。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次生形态相当于劳动异化时代。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在两种分期法中都有共同点，在一个场合是没有异化，在另一个场合则是没有私有制。

两种分期法之间也有重大的差别。在第一种分期法中，历史过程的主体是人，在第二种分期法中是社会。在前一个场合分期的标准是劳动过程，在后一个场合则是作为社会关系的私有制。最后，如果说早年的分期法主要是建立在哲学的和一部分经济的分析之上，那么晚年的分期法则是建立在对大量历史材料的研究之上。对晚年的分期法说来，早年的分期法是一个前提，而晚年的分期法本身是一个结论。这再一次证明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连贯性和完整性。

然而，1844年的分期法难道不带纯粹思辨的性质吗？在这里特别重要的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的接近难道不仅仅是运用否定之否定规律的结果、黑格尔三段式的独特重复吗？自然，马克思从未拒

^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08—520页。

^⑪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120页。

绝过辩证的研究方法，但是他的结论总是从对材料的具体研究中得到的。这里的情况也是如此。在上面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这时在揭示社会的结构联系方面已经做了许多工作。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在不仅认识社会的结构，而且认识社会的运动方面又向前跨进了一步。“异化”范畴再好不过地表达了剥削社会发展的趋势，而马克思已经知道哪一个能够改变这个趋势。^⑫

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方向成了马克思做出关于未来社会的共产主义性质的结论的根据。然而马克思同时也依据了对他至少从1842年起^⑬就开始研究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空想理论的批判分析。有一切理由认为，在1844年，马克思已经把这种理论（不管它们有多么大的缺点）的产生本身看作改造现代社会的客观必要性正在成熟的证据。后来他在上面已经提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明确地表达了这一思想：“……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⑭

对现代社会发展趋势的分析也是马克思做出关于在社会发展的有阶级以前的阶段上没有劳动异化以及其他异化的一般结论的根据。这个回溯过去的结论被那些关于人类的“幸福”、“自然状态”的理论所加强了，显然，马克思就是依据这些理论得出了关于发展的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相似的结论的。

然而，这个一般结论要求进一步的、更具体的检验和证实。所以，对原始史问题的态度必须与前几个阶段大大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更广泛得多地运用属于各种不同时代的历史事实。而且他们大大发展了他们的历史过程概念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论原

^⑫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写于4—8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43页），可是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结论不迟于这一年1月就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中做出了。见上书，第1卷第467页。

^⑬ 见上书，第1卷第130—134页。

^⑭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

则。对社会结构进行了更深刻和更全面的理解。社会结构的第一个环节是生产力,其次是交往关系(即社会关系),再其次是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的各种形式。已经制定了“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概念,但是它们在范畴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和其他范畴的相互联系还没有完全被确定。这一套概念被用于说明社会一连串发展阶段中的每一个阶段。社会的分期中包括部落的、古代的、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形式,以及未来的社会——共产主义。

对原始史问题的考察是从对人类历史的自然基础的分析开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⑭“用纯粹经验的方法”确定了任何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以及制约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的相应肉体组织。^⑮人和动物的区别被从历史的角度进行考察,实质上,这种区别是作为漫长过程的人的起源的特征。“一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⑯区分出社会活动的五个主要方面,或最初的历史的关系。随着生活资料的生产,产生出新的需要。“一开始”就有第三种关系“纳入历史发展过程”,这就是家庭,它“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⑰家庭实现最初的分工,它保证和调节人本身的生产——这是一个和生活资料的生产意义相等的因素。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口的增长既是需要又是生产的基础,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交往关系被分出来作为最初的历史关系的又一个方面。“生活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生活的生产(通过劳动)或他人生活的生产(通过生育)——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换句话说就是“共同活动”。^⑱交往关系按生产力

^⑭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3页。

^⑮ 同上。

^⑯ 同上书,第24页。

^⑰ 同上书,第32页。

^⑱ 同上书,第33页。

的发展而获得各种不同的形式。一定的生产方式与一定的交往形式相适应,而且这种交往形式或共同活动方式本身是生产力。

意识也是最初的历史关系之一。起初它“和这个阶段上的社会生活本身一样,带有同样的动物性质”。“畜群的”、“绵羊的”、“部落的”意识实质上是“被意识到了的本能”。对自然界的纯粹动物式的神化是和意识到“与其他人和物的联系”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就是“开始意识到人一般地是生活在社会中的”。意识不是孤立地产生的,而是和语言密切联系在一起产生的。“语言是一种实践的……现实的意识”,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出来的。²⁰

最初的历史关系既被看作使人和社会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起点,同时又被看作社会较后期和较发达的阶段或形式的基础。部落所有制形式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位于一连串历史进步阶段之首的第一个社会形式。它是把原始社会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中一个单独时代或阶段的第一次、比以前更详细和具体的描写。“最初的历史关系”这个概念是一种深刻科学的抽象,它构成对原始社会理解的理论基础,对说明社会发展的较高级阶段也具有意义。部落制度的具体特点,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掌握的历史材料的概括(这些历史材料是关于古希腊罗马和日耳曼部落在公社瓦解阶段的报道,公社瓦解阶段在这些民族那里是直接在国家产生之前的时期)。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行文中还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当时广泛流行的关于一夫一妻制家庭是社会发展的唯一自古存在的形式的观念还没有表示怀疑。

原始时代的开始属于“自然界几乎还没有被历史的进程所改变”²¹的时代。逐渐地,随着人口的增长,劳动生产率以及最初带有自然性质的分工开始发展。但是在部落所有制阶段,生产只达到微弱的发展程度,人们还是“靠狩猎、捕鱼、牧畜、或者最多是靠

²⁰ 见上书,第31、35页。

²¹ 同上书,第35页。

务农”生活。与这种对自然的受限制的关系相适应,交往关系也是受限制的,在这个场合就是部落制度。但是,这种交往关系也发生变化:家庭扩大,从简单变为“复杂”,以前在家庭中以隐蔽形式存在的奴隶制发展起来。扩大了的家庭或部落的结构是这样:“父权制的酋长、他们所管辖的部落成员以及奴隶”。^②虽然部落所有制是集体的所有制,然而在“蒙昧人”那里已经有单独的经济和住处。因此,“部落所有制”和“部落制度”的概念反映了原始时代的晚期、完成阶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提出的原始史的最初概念就是如此。尽管在后来,随着事实的积累,对这个概念做了重大的修正,它的核心还是保存下来了,科学共产主义奠基人的较后期观点是这一最初理论的有机发展。

马克思在五十一—七十年代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特别是在这一研究过程中制订出的、后来用于研究包括原始社会在内的其他时代的一般方法论原理,在进一步完善原始史概念方面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1858—1859年提出的“经济社会形态”概念被当作对世界史重新分期的基础。这个标准使得有可能更准确和更深刻地确定每个时代即人类发展的每个阶段的共同和特殊特征。马克思所制定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体系使得有可能对以前较不发展的经济制度进行回溯的分析。马克思写道:“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③

然而,由于早期社会形态的局限性和较不发展,不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所有范畴都能用于早期社会形态的经济制度。马克思从这个观点来看初期原始社会的经济,指出那时还没有“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因此用“价值”概念不适用于它。马克思写道,例如在制

^② 同上书,第25页。

^③ 同上书,第46卷上册第43页。

作工具时，“野蛮人由于对时间的浪费漠不关心，还犯了一个严重的经济上的罪行”。只有当原始公社过渡到畜牧业和农业，当开始“真正的发展”时，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才变得适用于原始社会的研究，^② 尽管还不是充分适用。那些属于私有制的范畴，对研究公有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形态不是恰当的手段。从经济观点看问题，使得马克思能够找出原始社会史分期的主要阶段：萌发生产性经济、产生交换、先是公社之间的交换，然后是公社内部的交换，最后，产生单独的经济，在公社中出现财产上的分化，这就是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前提。

《资本论》中提供的对劳动过程的分析也对构拟原始经济具有重大方法论意义。马克思把劳动看成在人和自然界之间进行的过程，就把人类劳动和具有本能性质的动物劳动形式明确地区分开来。马克思把富兰克林提出的标准——制造工具——作为人类劳动的特点，自己又提出关于劳动资料是区别各种经济时代的更广泛标准的论点。为此他也指出各种工具的考古发现的重大意义。马克思写道：“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迹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③ 马克思的这个结论是一方面从他的经济研究中、另一方面从对当时还不多的考古材料的研究中得出的，它后来成了建立考古学理论和关于原始社会的科学的方法论基础。

马克思在他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还得出了一个对构拟原始史在方法论上很重要的结论。他在《1857—1859年经济学手稿》的导言中写道：“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④ 从这段话可

^② 见上书，第25卷第117页；第21卷第489—490页；第13卷上册第41—45页。

^③ 同上书，第23卷第204页。

^④ 同上书，第46卷上册第21页。

以看出，一夫一妻制家庭不可能是原始时代这种较大的整体；从这里也可以得出结论，个人之间联系的性质、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在那时可能是完全另一种样子。^⑲

在五十年代，马克思开始用许多时间研究农村公社。马克思在了解了这种制度的各种类型——苏格兰的盖尔人的克兰、俄国和印度的公社——以后，得出结论说，与流行的看法相反，公社不是某个国家的特点，而是世界各国人民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经历过的社会形式。这种制度不是在封建制度下产生的，而是更早得多，属于社会生活的宗法形式。^⑳ 马克思把印度公社甚至说成是“原始的”和“共产主义的”^㉑，强调说：“它们存在的条件是：劳动生产力处于低级发展阶段，与此相应，人们在物质生活生产过程内部的关系，即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很狭隘的。”^㉒

马克思在五十年代在研究公社的基础上所做出的主要理论结论，对原始社会的概念具有直接的关系。他在《导言》中说道：“历史却表明，公有财产……是原始形式，这种形式还以公社财产形式长期起着显著的作用。”^㉓

马克思采用所有制的标准，把农业公社的基本形式按历史顺序分为：亚细亚的、古代的和日耳曼的。他指出，在第一种形式中保存着“直接的公有制（东方形式，这种形式在斯拉夫人那里有所变形；直到发展成对立物，但在古代的和日耳曼的所有制中仍然是隐蔽的——尽管是对立的——基础）”。马克思后来看到的格奥尔格·毛勒的材料，证实了他关于古代日耳曼公社性质的理论观点。^㉔ 公社发展的各历史阶段与社会形态的顺序相符。同时，划分

^⑲ 这种看法也可由马克思 1858 年的一段话证实，他说：“家庭的原初形式本身是氏族，私人家庭只是从氏族在历史上的解体中才发展起来的”（同上书，第 13 卷第 39 页脚注）。

^⑳ 见上书，第 8 卷第 571、572 页；比较第 13 卷第 22 页脚注。

^㉑ 见上书，第 23 卷第 395 页；第 25 卷第 910 页。

^㉒ 同上书，第 96 页。

^㉓ 同上书，第 46 卷上册第 25 页。

^㉔ 同上书，第 19 卷第 326 页。

这些阶段使得有可能建立公社的类型学。

从六十年代末起，公社问题获得实际意义。俄国的革命的民粹派认为，这种制度为俄国避免资本主义发展的灾难创造了可能性。多年的研究使得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了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俄译本序言中所表述的稍有不同的结论。那个文献中这样说道：“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所有制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所有制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③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事情这样发展的理论可能性规定了一定的历史条件。大家知道，这种可能性并没有实现，历史走了别的道路。

在马克思关于原始社会的研究中，关于原始集体内部的最初联系的性质、关于原始公社的结构的问题是一个空白。这个问题在历史科学中当时还没有解决。当时没有可信的和系统化的材料，而终究握有的那些片断不全的信息又由于社会主义者固有的资产阶级偏见而遭到不正确的解释。只有到美国学者路易斯·亨利·摩尔根的巨著《古代社会》在1877年问世以后，情况才发生了变化。

马克思在1879年年底了解了这本书，在1880—1881年冬天作了它的详细摘要。摩尔根的研究揭示了原始社会的内部社会机制，使得有可能仔细研究氏族制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它瓦解和产生阶级及国家的原因。所以马克思认为摩尔根是关于原始社会的科学的奠基人。在他对某些著名学者的著作写的评注中，他将摩尔根所做的发现与它们对立起来。马克思写道：“可见，拉伯克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1页。

同麦克伦南一样对基础，即存在于部落之内的民族一点也不了解。”^{②4}

马克思的批判意见在某种程度上涉及摩尔根本人。他读到摩尔根写到“财产观念”时，以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惊叹号表示了对摩尔根用词矛盾的态度。^{②5}在摘要中把材料调换地方也是批判的间接结果：第二编（《管理观念的发展》）被调到第四编（《财产观念的发展》）之后，从而揭示了这两种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马克思也指出了摩尔根对与取火有关的发明估计不足，对于似乎古代社会就已在谋取食物等方面达到“绝对控制地步”表示了怀疑。^{②6}

在马克思的笔记中包含有许多从方法论以及原始社会史研究方法的角度很值得注意的意见。他揭露了英国资产阶级法学家把国家描绘成超阶级制度的企图，指出国家的独立性只是“表面的”，它是社会身上的赘瘤，由于经济条件“它只是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才出现”，以后应该消失。马克思在这里广泛利用了历史比较法和考察遗迹的方法，在当时的历史学家看来，遗迹似乎只是社会生活的“反常现象”。^{②7}

虽然马克思没有完成自己的研究，他已来得及提出一系列对研究原始史极其重要的结论。这里要再一次提醒，马克思划分原生形态和次生形态，而且还考虑到了再次生形态即共产主义形态，关于他的这种设想可以根据马克思援引摩尔根的这一说法来判断：“新制度”将是“古代类型社会”在一种更完善的形式下的复活。^{②8}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这个“古代类型”社会是什么样子的呢？他写道，“古代社会形态……表现为一系列不同的、标志着依次更迭

^{②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662页。

^{②5} 见上书，第278页。

^{②6} 同上书，第332页。

^{②7} 见上书，第637—638页。

^{②8} 见上书，第19卷第432页。

的时代的阶段”，他把这些阶段比作地壳的最初的地质层。这些成层是一系列公社，“好多种社会结构，这些结构的类型、存在时间的长短彼此都不相同，标志着依次进化的各个阶段”。^⑨建立在血统亲属关系上的公社在地域性的公社之前。原生形态和次生形态之间的分水岭是农业公社。它摆脱了狭窄的血统亲属关系的束缚，“以上地公社所有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为自己的坚实基础；同时，各个家庭单独占有房屋和园地，小土地经济和私人占有产品，促进了个人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同较古的公社机体是不相容的”。^⑩

在公社的这种二重性中蕴藏着各种不同社会采取不同发展道路的可能性。马克思对农业公社二重性的发现对还有待进行的从原生形态向次生形态过渡过程的研究提供了指针。马克思指出：“各种原始公社……的解体的历史，还有待于撰述。到现在为止，我们只有一些粗糙的描绘。”^⑪

这个方面的第一步，是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不久迈出的。列宁把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称作现代社会主义的主要著作之一。^⑫

在过去的一百年当中，关于原始社会的科学已走过了漫长的道路。极其仔细地研究了公社在许多国家的命运，撰写了关于公社制度史的基本著作。确定了关于某些类型公社产生时间不久的事实、公社制度在阶级社会一定发展时期得到加强的事实。现在特别大量地进行对公社的类型学研究。这个研究方向总的说来富有成果，但是远没有充分利用马克思所留下的丰富方法论遗产。这一遗产的意义还有待于加深认识。只有在这个条件下，才有可能解决马克思所提出的对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原生形态和阶级产生进

^⑨ 同上书，第441、448页。

^⑩ 同上书，第450页。

^⑪ 同上书，第432页。

^⑫ 《列宁选集》第4卷第13页。

行研究的任务。

原载T·T·季摩菲也夫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进步问题》1986年莫斯科《科学》出版社版
(南山译)

马克思体系中的价值计算 和价格计算(二)

[德]拉·冯·鲍尔特凯维茨

由于价值具有“标准的性质”，或者也可以说是“调节原则”，是“同物本身的特性相异已的”，^① 而价格则“不是作为问题，而是（？）作为具体表现，不是作为词句，而是作为实际现象”出现的，并因此构成政治经济学的直接对象，^② 所以，马克思可以“心安理得地承认价值同价格的一切偏离”。科佩尔自负地教训他的读者说，迄今为止的所有马克思的阐释者都和他们一样目光短浅，他们在实际上存在着必然性——没有这个必然性，整个马克思体系就失去了意义——的地方看到的却是一个谜。也就是说，恰好价值和价格的矛盾是必然的。价值问题和价格问题是完全不同的问题。^③ 科佩尔认为，“对于马克思体系来说，它的更为重要的意义不在于价值规律是有效的，而在于价值规律是无效的。在人们看到它的不足的地方，正是它的力量之所在。”^④

对此，现在必须指出，在马克思本人那里，价格同价值的关系决不象科佩尔描述的那样漠不相干。马克思的确是从价值中引伸出价格的，因此批判的任务应该是检验这种引伸的可靠程度。科佩尔却完全忽视了这一点。当然，对于马克思来说，他的价值概念和价值规律的意义并非仅仅限于它们与价格形成问题的关系的范围

① 《赞成和反对马克思。一部传记的前言》第67、30、44页。

② 同上书，第68、56、42页。

③ 同上书，第30—31页。

④ 同上书，第31页。

内，^⑤而是向他提供了阐明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联系的产品量的分配具有何种性质的手段。科佩尔本人提到了这一点。^⑥但是，如果价值规律象科佩尔公开认为的那样，应该根据它能否说明收入分配，而不是能否说明价格形成来评判的，那么，为什么科佩尔又说重要的问题恰恰在于价值和价格的不一致呢？这就非常令人费解了。按照马克思的看法，如果撇开一些次要的因素不谈，价值与价格的不一致就正是产生于各个生产领域中资本有机构成的不同，也就是说，产生于一种现象，关于这种现象马克思曾不厌其烦地指出：它对于以生产和占有剩余价值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无足轻重的。因此，在马克思看来，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是不起作用的这样一个事实，取决于一个或者一系列不是揭示而是掩盖资本主义实质的因素。假设所有生产领域中的资本有机构成都是一样的，那么，在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没有被消灭以前除了资本家的利润欲之外的其他考虑对生产的规模、方向和技术都不起决定作用的情况下，价值规律对于商品交换就是直接起决定作用的。

鉴于这一明显的事实，科佩尔关于恰恰是价值规律不适用于表述马克思所理解的资本主义本质的说法，证明是一种从效果考虑而未经深思熟虑的说法。这种说法不是证明它的创造者有独创性，而是证明它对于马克思的理论缺乏理解。

科佩尔对这个看法补充道，马克思为价值规律发挥作用提出的前提条件，对于一种可能的经济制度是适用的，“但是，这种经济制度不是所要求的，而是由于从价值和价格的矛盾中得出的结论缺乏根据而必然产生的”。紧接着又说：“剩余价值被少数人获取，可是这些人不能消费掉这些提高了的生产力的成果，因此出现了生产过剩，奢侈品生产，消费不足。”^⑦

^⑤ 与科佩尔(见上书,第33页)相反,我敢断定,价格形成同时是一种“具体的表现”,和一个“问题”。

^⑥ 同上书,第29页。

从前面的说法看来，对于科佩尔在这里采取的把价值规律移向未来社会的做法与马克思理论的意义和趋势不仅不相符而且直接相违背这一点，无需再多费口舌。科佩尔所列举的破坏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生存的那些现象，依照马克思的理论，不表现为偏离价值规律的结果，而是相反地表现为这种经济制度中发生的把价值规律运用于劳动力商品的结果。^⑦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的使命是打破价值规律的这种统治，而不是首先建立这种统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所得不再决定于为维持其生活（和繁衍）所必要的标准。因此，在这里价值规律对劳动力是不适用的。

但是，至于产品，严格说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已经谈不上它们服从于价值规律，因为在这种制度下不存在“个人交换”。^⑧当然，官方规定价格，正如这个规定对于确保消费自由是不可避免地应该做到的那样，显然首先要考虑生产产品所花费的劳动时间。是否还有其他考虑也必然同样起决定性作用，本身就是一个几乎不可能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不管怎么说，马克思对这个问题就象他一般地对待未来国家中官方规定价格的基本原则一样，是不关心的。

另一个问题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各个个人付出的劳动时间是不是社会产品中用于消费的那部分产品借以分配给各个个人的唯一标准。弄清楚这一点，对于社会主义将更加重要，可是马克思正是把这一点看作是一个留待以后加以研究的问题。^⑨

因此，象科佩尔所作的那样，把自己杜撰的东西强加于《资本论》的作者，说他认为社会主义的任务是促进价值规律胜利实现，就大错特错了。^⑩因为，就劳动力而言，与此相反的情况才是真

⑦ 同上书，第31页。参看第33和38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10—111页。

⑨ 同上书，第119—122页。

⑩ 参看上书，第23卷第96页。参看奥托·格拉赫：《论经济活动的条件》1890年耶拿版第22页。

⑪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12—113页。科佩尔似乎对马克思同蒲鲁东的论战毫无所知，而这场论战对写《马克思传》恰恰是比较重要的。

实的；而就产品而言，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价值规律不是直接表现出来，而是通过生产价格的中介表现出来，这一点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之间的对立恰恰是次要的。^⑫

可见，被他的老师齐美尔及其对新奇的、推翻前人观点的叙述的追求弄糊涂了的科佩尔，在马克思的价值和价格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没有采取正确的态度。科佩尔的与这个特殊问题相联系的旨在批判马克思价值概念——他把马克思的价值概念当作“实体的”、为马克思的“本体论”观点所决定的概念加以摒弃，并想用劳动生产力的概念代替它^⑬——的论述，以及他的交织在政治经济学叙述中的关于一元论、相对论和客观主义的研究，关于自在之物的研究，关于回到赫拉克利特和“在理论上遁入彼岸世界”的研究，所有这些意在深入细致的考虑和推论，对这项研究来说，都不是起决定作用的。它们是否另外通过某种方式起决定作用，暂且不论。

关于避免这种从哲学方面躐入政治经济学领域（这种躐入有时表现出兼并欲望，这在我看来是与事物的自然进程，即与为了各种特殊学科^⑭而逐渐把哲学排挤出去，有着罕见的对立）就说到这

⑫ 当然，马克思把生产的无规则性看作资本主义制度的特点，另一方面又把它列入妨碍实际上实现了的价格符合价值规律的因素。但是，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有效价格同价值的偏离，同时也就是这个有效价格同生产价格的偏离。当科佩尔谈马克思那里价值同价格相矛盾时，显然是指生产价格偏离价值这个事实。

⑬ 科佩尔毫无根据地说《资本论》的作者具有一种独立的哲学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社会生产力”应该同叔本华那里的意志起类似的作用。（见《赞成和反对马克思。一部传记的前言》第7页，参看第10—11页）而从齐美尔的一般哲学观点来看（这种观点被表述为马克思观点的对立面）“在这个概念中事实是地毯，其中的各条线时而杂乱时而对称地交织在一起，按照线的数量和粗细组成大大小小的质与强度各不同的结。”科佩尔轻信地认为：“所有其他的概念都是自己出现的”（见第19页）。因此，我们就有了，“世界是意志”，“世界是社会生产力”，“世界是地毯”的概念。还缺一个“世界是空话”。

⑭ 例如利鲍尔在他的《英国当代心理学》（1881年巴黎版）的前言中明确地、形象化地描绘了这个历史的过程。

里。政治经济学家中，这样一种人的人数令人忧虑地不断增加，他们乐于承认靠不住的哲学主权，然而在这件事上，他们留给自己去做的事是，用认识论检验国民经济理论本身。相比于这种情况，那种避免从哲学方面闯入政治经济学领域倒是更应该加以强调。于是，作为政治经济学对哲学的一知半解的对立面，哲学对政治经济学的一知半解便产生了。这种现象存在的理由，当然不可能由人们误认为以此可以为之服务的特殊学科的需要中引伸出来。^⑮当然必须承认，就马克思的理论特别成为哲学思辨的对象而言，那么，马克思本人尤其要对这种令人不快的现象承担责任。他在讨论纯粹经济关系的时候的确是大量使用了从形而上学的词典中摘引出来的话^⑯。但是，这种情况至多不过是作为减轻罪责的理由，可以使受他的哲学习气所蒙蔽的人得到原谅。^⑰

在这(第一)篇论文中，我的任务是：把各个科学流派的代表者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价格形成和收入分配所发表的各种意见的情况作一个批判的概括。因此，正如有经验的读者可以看到的那样，我这里只是比较深入地研究这样一些作者，他们把上述理论体系作为研究对象，或者进行特别详细的考察，或者进行某种独特的

⑮ 只有在政治经济学家徜徉于形而上学和认识论领域中时，他们才能作出这种否定的评价。有一点是不需要特别强调的，即他们和哲学家们在国民经济理论的方法论和体系学问题上的合作是完全合乎理想的。

⑯ 社会民主党的报刊至今仍忠于它的首领的这个坏习惯，《前进报》的一些社论中大量堆砌了诸如“基础”，“内在的”等等术语。

⑰ 文中提到的那些力图从“哲学方面”论述马克思的价值和价格理论的作者中，人们发现没有提及什塔姆列尔，这可能会使一些读者感到意外。原因在于：他肯定已经遭到一位政治经济学家的基本评定，从这位政治经济学家那里，人们至少可以期待对什塔姆列尔的严肃评价。迪耳说得恰到好处（《李嘉图评注》第1卷第140页）：“什塔姆列尔这里（也就是在“真正的右派理论”的关键之处）使之作为马克思理论的墓基的那些东西，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根本不存在。”人们只能对什塔姆列尔被自己的思想解释和运用马克思的论述的勇气表示赞叹。例如，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意思应该是指真正有秩序的社会中的必要劳动时间！

考察。同时我力求在重述和批判各种不同观点时尽可能避免重复。这些指导思想决定了我在本文的最后一部分——这部分可说是专门针对马克思的追随者写的——联系到希法亭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

在希法亭的名为《庞巴维克的马克思批判》^⑮的著作中，马克思体系中的价值和价格之间的关系得到深入的论述。希法亭认为，价值规律（按照价值规律，唯有生产商品所花费的劳动量对商品的交换比例起决定作用）不仅仅是价格理论的必然出发点，而一般说来也是政治经济学的必然出发点。^⑯在希法亭这部著作的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对这种主张作出的如下论证。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因此，它根本不涉及例如“体现为使用价值的某物对某人的个人的关系”，勿宁说，只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适于构成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而“只有通过社会成员互相为对方劳动，他们才能在经济上互相发生关系。”^⑰因此，如果劳动表现为人类社会的“基础和链环”，^⑱那么，根据希法亭的看法，这还不足以建立价值规律。只有在一定限制条件下，才会产生“劳动——价值——价值规律”的联想。

这些条件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可以归纳为：“商品生产”必须占统治地位。只要商品生产还没有占统治地位以及已经不再占统治地位^⑲，价值规律都不能应用。尽管如此，价值规律仍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普遍真理，这是因为，按照希法亭的认识，“经济学”作

⑮ 阿德勒和希法亭编：《马克思研究·1901年维也纳版第1卷》。

⑯ 在希法亭《庞巴维克的马克思批判》第11页上说：“由于社会形式的劳动成为价值的尺度，所以经济学便作为历史科学和社会科学被建立起来”。他的特点在于：把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看作与生物史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同上），而当今马克思在文坛圈内普遍存在一种倾向，即认为它们之间没有联系。在这个问题上，希法亭同文论家特恩是并立的。见《远瞻与年鉴》（1898年）第22期第269—271页。

⑰ 《庞巴维克的马克思批判》第40页。

⑱ 同上书，第5、6页。

⑲ 这里指的是未来社会主义的社会。参看上书，第57页。

为一门科学,本身也是同历史发展的特定时期联系在一起的。这个时期的特征恰恰在于产品是商品,或者换句话说,“劳动及对劳动的支配权没有被自觉地提高为社会物质变换和社会实力地位的调节原则”,而是“这个原则作为物的客观属性”并在产品交换过程中盲目地和自发地为自己开避道路。

因此,对于以商品生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为前提的政治经济学来说,商品交换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社会的各个成员——劳动的或支配劳动的成员——互相发生关系的形式。在这里,劳动本身在交换价值中得到了表现。价值规律不外乎是决定交换价值的量的标准。在一定情况下,除了这种量的含意外,任何其他含意都被排除了。因此,一般说来,如果在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国民经济传动机构中存在着揭示某种规律性的前景,那么,只有价值规律才能承担此等任务。²³

显然,希法亭是想用这个完整的论证弥补《资本论》第一卷开始部分中暴露出来的外部缺陷。事实上,为什么恰恰联系商品交换的现象,这个问题在应该作为整个体系的基础部分的篇章中是不明确的;所以,在马克思本人的阐述中价值规律采用的方式方法,给人造成价值规律是偶然的和虚假的印象。希法亭的论证同时也是针对那些人的——他们勉强同意劳动是最重要的生产因素,甚或同意在某种程度上强调这一点,从而恶意地或善意地承认,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大体接近于现实。从这种观点出发,有人认为,在《资本论》的开头部分,运用的是一种撇开劳动的生产因素和舍象自然因素(或者舍象自然和资本的因素)的考察方法。与此相反,在希法亭的阐述中,劳动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不加考虑的因素”存在的,因为在他看来,劳动是“社会纽带,它把被分裂为各个原子的社会联结在一起”。²⁴

²³ 同上书,第9—12页。

²⁴ 同上书,第12页。劳动是价值的原则,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而不是因为劳动是“技术上极其重要的事实”(桑巴特)。

可是,唯有劳动具有这种联结能力的说法,是无根据的。由于这个原因,整个上述的论证——顺便说一下,这个论证有时使人联想到什塔姆列尔——都是站不住脚的。

此外,这个论证仅仅涉及这样一个问题,即在政治经济学体系中,价值规律,就它是有效的而言,为什么必须被放在所有其他问题的前面。根据希法亭的从劳动到价值规律的思路,不可能直接得出价值规律的内容即交换价值和劳动消耗的均衡一致。这种思路至多只能说明,必须有某种把交换价值同劳动联系在一起的标准。

同时我们也看到,当重要的问题在于证明价值规律的内容是真实的时候,希法亭还有与上述不同的其他考虑。他虽然非常坚决地反对庞巴维克的攻击,维护《资本论》中出现的对价值规律的证明,但是看来,又确实感到,要证实价值规律的内容符合真实,靠这种证明,或者更确切地说,靠这种表面的证明,是做不到的。因为,假定这种证明是无懈可击的,那么,每两个被当作商品互相交换的产品总是必须包含等量的劳动。可是希法亭认为,这个规定,严格说来,只在“简单商品生产”的情况下是有效的,而正如他明确承认的那样,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情况下,这个规定已经有了改变。因此,迫切需要对价值规律作这样的论证,这种论证应该考虑简单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之间特有的区别。事实上,在希法亭那里已经出现了做这种论证的一些苗头。

首先,就简单商品生产来说,它的特点在于:“平等的、独立的、占有自己生产资料的劳动者相互对立。”占有土地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就是这样的劳动者。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产品必须按照自身的价值进行交换,因为否则就不能说是“简单商品生产”。希法亭说:“在这个社会中,劳动产品属于劳动者;但是如果价格长期偏离价值——只是偶然地得到补偿——使他丧失一部分劳动产品,而使另一个人得到它,那么,这就会使该社会的基础发生变化,前者将成为雇佣工人(家庭工业的),后者将成为资本家。”^②

^② 同上书,第55页。

这种使人感到有学究气的论证显然是不令人满意的。说“简单”商品生产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必定是由价值规律不起作用造成的，未免有些轻率。设问，为什么由于同价值规律的长期背离而受益的那一类人，例如因为过豪华生活而不能不断创造出归他们自己所有的剩余价值呢？^{②③}撇开这一点不谈，正是一再指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没有能力认识事物是生成和发展着的希法亭，为证明价值规律的实际存在，而不惜在一定的情况下求助于一定社会形态的固定不变，这肯定是令人惊奇的。

但是，由于希法亭想不惜一切代价，即使破坏逻辑也要坚持他的“客观主义”的立场，于是便阻挡了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并同时提供方便以说明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限制条件的唯一可行之路。他真正愤怒地驳斥了庸俗经济学的观点——其中也包括庞巴维克所持的观点——，即交换价值和劳动消耗的均衡一致只要表现出来，就只能以生产者的竞争为基础。把劳动和“辛苦”当作一回事是这个观点的特点，这种观点同马克思的劳动概念是截然对立的。^{②④}

马克思把创造价值的劳动说成是“人的脑、神经、肌肉、感官等等的耗费”，^{②⑤}力图以此驳斥那种只是由劳动所产生的心理上的厌恶而在价值形成和价值衡量方面考察劳动的想法，这实际上是正确的。但是，马克思自己未能摆脱这个唯一适当的想法的束缚，这也并非不是事实。^{②⑥}他即使做到这一点，也丝毫不能改变这种情况：如果不假定为交换而生产的劳动者力求以最小的努力取得尽可能大的收获并同时能够变换自己的活动，那么，价值规律就没有确凿的根据。在希法亭为回避这种极其简单明了的事实所作的绝

^{②③} 关于工人的劳动长度和强度相等的假定，其合理程度如何，我这里暂且不谈。同上书，第35页。

^{②④} 同上书，第28—29和61页。

^{②⑤} 同上书，第52—53页。

^{②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8页。在这一页上，用“感官”代替了“手”。

^{②⑦} 参看上书，第93页上有这样的说法：当鲁滨逊祈祷时，他没有劳动，因为他“从中得到快乐”，他“把这类活动当作休息”。

望的努力中，清楚地暴露出他的顽固的教条主义。关于他试图用来证明价值规律直接适用于“简单商品生产”的情况的方式方法，就谈到这里。

现在，价值规律在以“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中采取一种改变了的形态，价格代替了价值。尽管如此，人们这里也仍然不得不把（原有的）价值规律作为唯一可行的认识方法加以坚持，因为资本主义的交换关系只能理解为前资本主义的交换关系的变形，^{③①}并且是由一种特殊的、与（原有的）价值规律没有关系的力量即竞争引起的变形。^{③②}希法亭感到，竞争是一个完全根植于为他唾弃的“行为动机”之中的因素，^{③③}对于他来说，也就是对于“客观主义”来说，不愿象庸俗经济学那样立即把竞争这个主观因素用在价格理论的开头部分，而只愿用在较晚的研究阶段上，马克思体系的优点正在于此。但是，按照这种方式，由于最后求助于竞争，“客观主义立场”也就无法维持了。这一点是很清楚的。^{③④}

马克思的体系比庸俗经济学的考察方法的优越性还在于，它反映历史的过程。于是，辩证方法的要求便得到满足：概念的发展处处同历史的发展并行不悖。这种并行不悖是理论正确性的最准

③① 《庞巴维克的马克思批判》第29、56页。

③② 希法亭有时（见上书，第37、55和57页）谈“前资本主义的竞争”，但这种竞争只能使“各种不同的个别价值与市场价值平衡”，可见他没有考虑不同商品按什么比例进行交换的问题。

③③ 希法亭说：“在庞巴维克看来，竞争只不过是所有心理欲望和动机的集合名词，这些欲望和动机支配市场当事人并通过这种方式影响价格的形成”（第58页）。我们看到，希法亭本人不同意这种竞争观点，因为在他看来，这种观点是过于“主观主义”了。但是他没有说怎样才能把竞争概念解释为“客观主义的”，就象通常那样无矛盾地使相同庞巴维克的观点根本不应该有什么不同的马克思的竞争观点。

③④ 在《庞巴维克的马克思批判》第56页上已经预示有不通过竞争，也就是从资本占有者的平等来说明利润率相等的可能。因此，正如“价值”是从简单商品生产体系中的工人的平等产生的那样，“价格”（生产价格）同样十分必然（与行为动机无关）地产生于资本占有者的平等。但是，这里谈的仅仅是预示，并且希法亭不再对这种思想加以论述，原因在于害怕背离马克思。

确的证明。^⑤ 这里被作为马克思体系的特殊优点提出来的事实本身会使一个非黑格尔主义者感到乏味。撇开这一点不谈，希法亭对“价值”与“价格”相反实际上表现为主要的东西^⑥ 这一问题的论述，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关于在马克思那里以理论中的演算出现的价值转变为价格是否可靠的问题，希法亭只是就这种演算在庞巴维克的批判中遭到攻击的范围内，发表了比较深刻的看法。^⑦ 此外，以为在这一方面需要对《资本论》的阐述作某些补充的想法，在希法亭看来是多余的。希法亭不加批判地接受这种理论：为所有商品形成的价格总额同它们的总价值相等，同时总利润同总剩余价值相等。^⑧ 从下文可以看出，这种理论是多么荒谬。

希法亭想把他对马克思的辩护变成同对手的“卓有成效的争论”。^⑨ 事实上，人们普遍的兴趣在于他同庞巴维克论战。希法亭在这一论战过程中，总是竭力突出作为国民经济的“无产阶级”“科学”创始人的马克思和“庸俗经济学”之间的（所谓）原则对立，把马克思的（非现实的）“客观主义”推到首要地位，把马克思的体系不仅说成是允许的和在某种条件下是有效的体系，而且说成是必然的和唯一可行的体系。正因为如此，他（希法亭）——只有他——便促进了对马克思体系的不足之处的揭露并特别地把那些没有偏见的人们的注意力引向马克思的价值和价格关系的专断和歪曲。

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希法亭相反，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持修正主义的——差不多可以说是极端修正主义的——立场。的确，在某些方面，他对马克思理论的价值还不如某个“庸俗经济学家”。他不惜援用所谓科学社会主义的死敌很早以来反对马克思的论据。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援引格·阿德勒的观点指出，在按资本

^⑤ 《庞巴维克的马克思批判》第60页。

^⑥ 同上书，第34—42页。

^⑦ 试比较上面关于庞巴维克的一节，其中在脚注中提到了希法亭。

^⑧ 《庞巴维克的马克思批判》第31—33页和第50页。

^⑨ 同上书，第2页。

主义方式组织起来的国民经济中，价格的形成从来不取决于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而总是取决于相应的资本支出。^⑩与此相连，他把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或者说成是“彻底崩溃”，或者说成是“失去与商品交换的真正事实的任何关系并成为空洞的理论”。^⑪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把价值理论所由出发的基本概念，即“绝对劳动价值的概念”，解释为具有某种内在矛盾的概念，试图以此为自己反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提供一种独特的说法。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价值就是物化劳动。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指出：“劳动物化在它的产品中的原因显然在于，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直接比较为生产不同劳动产品所使用的劳动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经济方式下的社会经济是由独立的和自主的个体经济组成的，需要进行交换的物即商品是这些个体经济之间的唯一的链环。因此，劳动的物化表现为商品价格。商品除了它的价格之外，再也没有任何其他属性能使之其中包含的劳动量物化了。”^⑫可是，价格和劳动价值不是一回事。因此，价值不是物化劳动。

不难看出，这一似乎被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本人赋予重要意义的整个论证的基础是，他按照一种与马克思不同的意义理解马克思有时使用的“物化”这个术语。马克思认为，当他说到劳动在产品中物化或物质化时，无非是说产品是劳动的唯一看得见的物质结果。在马克思那里，劳动被当作某种非物质的东西，当作“劳动力耗费”，同作为物质的东西的产品或商品相对立。^⑬如果象杜冈·巴拉诺夫斯基那样，说劳动物化在价格中，因为价格——无论把它理解为交换比例还是交换中提供的物或者货币——只有在人们使两个产品互相发生关系时才能得以实现，那么，这种说法便与马克思的表述方法相矛盾。然而，在马克思那里，凡是提到劳动物化的地方，都应是用以标明生产一种产品所使用的（抽象的人类）

⑩ 《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1905年莱比锡版第140页。

⑪ 同上书，第141页。

⑫ 同上书，第140页。

⑬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1—52页。

劳动与这个产品本身之间的关系。此外，这里不应该为马克思的术语辩护。重要的问题只是在于，反对那种只抓住某些词句而从不注意它们的确切含义的批判。^④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从边际效用理论中吸取了反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另一个论据。这里，他还企图通过强调劳动不象马克思所说的是价值的“单一的实体”，而是“绝对费用”的“单一的实体”，把由他的前辈们为反对马克思而提出的异议以一种新的形式表达出来。^⑤

绝对费用的概念是与这样一种对生产过程的理解相一致的：人作为经济的主体直接与自然对立，相应的社会中间环节被排除了。如果持这种观点，那么，显而易见，产品只花费人的劳动。这也许是正确的，但绝非新观点。不过，据我所知，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没有使用过“绝对”费用和“相对”费用（相对费用是传统学说中的“生产费用”）的说法。实际上，这两种说法的区别首先在阿道夫·瓦格纳那里得到了透彻的论述，而且比在杜冈·巴拉诺夫斯基那里表述得更精确。^⑥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认为，绝对费用的范畴应该成为“当代经济科学的枢纽”。他这里指的是他所代表的“绝对劳动费用论”^⑦。遗憾的是，关于这个新理论的内容没有确切的报道。但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它与价格形成的理论毫无关系。^⑧

^④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把马克思体系特有的价值概念说成是“绝对劳动价值概念”。这种说法与他对“绝对的”和“相对的”劳动价值论的区分是一致的。前者把劳动看作唯一价值因素，而后者只是把它看作是最重要的价值因素（《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第136页）。因此，正如价值根据绝对劳动价值论确定的那样，“绝对劳动价值”可以叫作价值。我要人们注意这一点，不然的话往往会把“绝对价值”理解为交换价值的对立面。试比较S·弗兰克的透彻的分析，《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及其意义》1900年彼得堡版第183—193页。

^⑤ 《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第145页。

^⑥ 《奠定基础》第1册第400—405页。

^⑦ 《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第151、145页。

^⑧ 同上书，第149页。

对于这个理论来说,倒是应该研究“相对费用”;除此之外,效用或者说边际效用应作为同等的价格因素来研究。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既不具有思想的独立性,又没有出色的表达,因此在这里可以不予考虑。^⑩

然而,他在更详细地研究马克思的“价值公式”和“价格公式”之间的关系时,却从一个更具优势的方面表现为马克思的批判者。一个数例便证明了,象马克思那样,为求得平均利润率,而简单地使总剩余价值与总资本联系起来,是不允许的。在这个问题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与马克思相反,他不是从某个价值量和剩余价值量出发以达到相应的价格比例和利润比例,而是恰恰相反,他列出某些关于价格和利润的方程式,以便从中确定相应的价值数式和剩余价值率。

这里区分了社会生产的三个部类:生产资料归入第Ⅰ部类;工人的消费资料归入第Ⅱ部类;资本家的消费资料归入第Ⅲ部类。除了这两个社会阶级外,不考虑其他社会阶级。然后还假定,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都是一年周转一次,并且没有资本积累。在此前提下,生产和社会收入的分配被列入如下图式,在这个图式中, p 、 a 和 r 分别代表以货币价格、并且以百万马克为单位表现出来的年生产资料(不变资本)量、年工资(可变资本)量和年资本利润(利润)量。出现在下述图式中的数字满足于这样一种条件,即所有三个部类的利润率都相等(即25%)。

	p	a	r	$p+a+r$
Ⅰ	180	60	60	300
Ⅱ	80	80	40	200
Ⅲ	40	60	25	125

^⑩ 此外,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想从边际效用论的观点出发说明工会对工资的影响的打算(同上书,第161—164页),是同维塞尔一致的(《论经济价值的起源和主要规律》1884年维也纳版第205—206页)。

正如人们看到的那样，根据这个图表，不变资本在生产资料的生产中起最大的作用，但在资本家阶级的消费资料的生产中则起最小的作用。

现在，需要把货币价格转变为劳动价值，或者简要地说，使价格转变为价值。为了这个目的，这里假定在第一生产部类中全年雇用十五万工人，他们借助价格为一亿八千万马克的生产资料创造出价格为三亿马克的产品量。如果这些产品量的价值（以千劳动年来表示）是X，那么，在生产这些产品量时所使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等于 $\frac{180}{300}X$ 。因此，我们得到如下等式：

$$\frac{180}{300}X + 150 = X,$$

由此得出 $X = 375$ 。它们的比例，换句话说，生产资料上的价值与价格的比例就是375比300，或者5比4。如果考虑到这种关系，考虑到下面这种情况，即每个工人每年的工资（依照所列的图式）值

$$\frac{60\,000\,000\text{马克}}{150\,000} = 400\text{马克}$$

那么，人们从第Ⅰ、Ⅱ和Ⅲ部类得到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分别表现为225、100和50千劳动年，后两个部类的工人人数各表现为200和150千劳动年；最后，这两个部类所生产的产品价值各表现为300和200千劳动年^⑤。而 $\frac{200}{300}$ 的商显然表示剩余价值率。这些结果可以用图表概括如下：

	p'	a'	r'	$p' + a' + r'$
Ⅰ	225	90	60	375
Ⅱ	100	120	80	300
Ⅲ	50	90	60	200

⑤ 人们看到（参看解X的方程式），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用以把价格换算为价值的方法，以这一前提为基础：在三个部类中使用的三组生产资料的生产中，资本的有机构成都是同一的。

p' 、 a' 和 r' 的数值是与价格表现 p 、 a 和 r 相应的价值表现。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指出，“两个图式的比较表明，一切分配关系都按照它们是以货币价格或是以劳动价值表现而改变。如在第一个图式中，社会的可变资本是全部社会产品价格的 $\frac{200}{625}$ ，或者说 32%；而它作为劳动价值则是全部社会产品的劳动价值的 $\frac{300}{875}$ ，或者说 34%（更准确地说，是 34.3%）。利润率，按照货币价格计算等于 25%，而按照劳动价值计算则达到 $\frac{200}{675}$ ，或者说接近 30%（更准确地说，是 29.6%）。”^⑤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就此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两种利润率中哪一种是“实际有效的”。他回答说：只能是第一种，也就是在价格图式中出现的那一种，因为，“利润的形成实际上是以商品的价格为基础的”。因此，马克思提出的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不仅如马克思本人所承认的那样不能运用于各个个别生产部门，而且甚至不能确定落入整个资本家阶级手中的社会产品的份额。^⑥

在这一方面，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与马克思相对立无疑是有道理的^⑦。这里涉及的决不是一个次要的问题。由这个问题同“利润率下降的规律”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事实，最好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

马克思把这个规律说成是“一个秘密，亚当·斯密以来的全部政治经济学一直围绕着这个秘密的解决兜圈子”，并把从这个理论可以轻而易举地说明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恰恰看作他的理论的优越性的令人信服的证明。利润率，作为剩余价值(m)与总资本即

^⑤ 《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第 173 页。

^⑥ 同上书，第 174 页。

^⑦ 康拉德·施米特对马克思的理论思想并不是象考茨基那样不加批判，就连他也明确坚持这个命题，即平均利润率同剩余价值总额与预付资本的比例是一致的（见《社会政治中央报》1895 年第 22 期第 258 页）。

与不变资本(c)和可变资本(v)的总和的比率,必然会越来越小,理由很简单:不变资本占总资本的份额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加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规律。利润率,如果用马克思的作法以 $\frac{m}{c+v}$ 来表示,实际上便可以表现为 $\frac{m}{v}$ 和 $\frac{v}{v+c}$ 的商。如果第一个因数即 $\frac{m}{v}$,也就是剩余价值率,保持不变,而另一个因数即 $\frac{v}{v+c}$ (它表示可变资本占总资本的份额)减少,那么,这里所考察的商,即利润率,明显会因此而变小。

但是,一旦证实 $\frac{m}{c+v}$ 的商不是这种利润率——马克思以前的一切政治经济学家都研究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利润率实际上是唯一使人感兴趣的问题——的正确表现,那么这个推论也就站不住脚了。借助上面在复述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图式时所使用的数式,便可以更确切地指出马克思所犯的 错误:他把 $\frac{r}{p+a}$ 和 $\frac{r'}{p'+a'}$ 两个数值彼此混为一谈了。

因此,人们肯定会在这一点上无条件地赞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按照马克思所提出的论证,利润率下降的规律只不过是“一种假象”。

在杜冈·巴拉诺夫斯基那里,伴随这一批判成果的是一种“确立利润率运动的正确规律”的独立尝试。利润率运动的正确规律是,不变资本占总资本份额的增加,按照它是由于社会劳动生产率降低还是提高造成的而产生相反的结果。在第一种情况下利润率降低,在第二种情况下利润率提高。

对得出这种结论所进行的论证,当然可以进行各种指责。^④然

^④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在论证时没有区分价值量和价格量。但是,这里并没有因此而产生错误。因为他假定在生产三个部类中,资本的有机构成都是相同的。

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论述，只是因为它能够为澄清或驳斥马克思的理论提供某种帮助，才作为这篇论文的对象加以考察的。

从这个角度出发下述情况值得强调：事实证明，在杜冈·巴拉诺夫斯基那里，尽管不变资本的份额不断增加，利润率却提高了；利润率的提高与剩余价值率的提高是同时发生的。^⑤可是，马克思本人却强调，剩余价值率的提高是那些阻碍利润率下降的因素之一。^⑥

可是，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根据他的公式（它最初只能用来表述利润率的变化）达到否定马克思关于资本利润起源的学说的方式方法，却引起了比之重要得多的疑问。他认为，可以证明：一般利润率并不取决于社会资本的构成即社会资本在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分配。但是，如果事情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可变资本就不可能被看作利润的唯一源泉。这样一来，就考察利润的形成来说，把物质生产资料与活劳动区别开来就毫无理由了。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认为，“被马克思说成是不变资本的那部分资本，和可变资本一样，也是利润的源泉。于是，马克思的全部利润理论便彻底崩溃了。把整个资本同样看作利润源泉的‘庸俗经济学’倒是正确的”。^⑦

很清楚，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论证是错误的。因为事实上他根本没有证明利润率不受资本构成的影响。他至多不过指出，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构成和利润率之间的关系是不存在的。^⑧然而，由此产生的看法，长期以来还没有使人失望到这种地步，以致必须运用“生产率理论”来阐明资本利润的起源。

我认为，与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相反，“生产率理论”遭到了庞

^⑤ 《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第180—181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58—261页。

^⑦ 《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第188页。

^⑧ 实际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不过是证明，马克思做的对他所说的关系有利的论证是不可信的。

巴维克的明确的驳斥。^⑨一切想使它复活的企图都将是徒劳的。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本人所持的资本利润理论,或者更精确地说,这个理论的纯粹经济的方面(这特别表现在他关于资本增殖过程不依赖于“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存在的论述中)^⑩,无非就是这样一种企图。

此外,这些论述还表明:放弃劳动或“剩余劳动”是资本利润的唯一创造者的观点,会堕入怎样的迷途之中。在第二篇论文中,我们试图证明:马克思(同样也是李嘉图)体系中有用的东西和真正重要的东西,恰恰是这种观点。剩余价值理论的意义,决不象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乐于以他的关于剩余价值理论包含着“健康的社会内核”的一套言辞所描写的那样,仅仅限于发现一种不劳而获的现象存在。^⑪

原载:《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文献》1908年
蒂宾根版第23卷第1册第29—50页

(卢晓萍译 王福民校)

⑨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认为,庞巴维克的反驳是不成功的,因为他自己是以生产率理论为根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第197页)。而庞巴维克主要是使资本利息理论获得一个新的生产率理论的说法,他的这一做法是对的(参看我的文章:《庞巴维克利息理论的基本错误》,载于《施穆勒年鉴》1906年卷第3册)。但是,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并且使人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这种无意地 and 不自愿地以生产率理论为根据,会使他为反对这一理论而提出的异议失效。

⑩ 见《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第223—239页,尤其是第230页:“工人阶级将会消失,这丝毫妨碍资本的使用过程。”

⑪ 同上书,第8章第189—206页。在这一章(它的特点不直接是其中阐述的思想新颖)中,作者试图为他的社会主义的读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为他自己提出一个安慰人的信念,他基本上没有背离马克思。因此,有人再三把任何一种占有,同一个社会阶级“剥削”和“压迫”另一个社会阶级说成是一回事。

七十年代以来国外关于 “转形问题”的研究情况

[日]高须贺义博^①

进入七十年代以来，转形问题（价值转化问题）再次成为争论的课题，它发展得极快，达到了极高水平。由于运用了近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这一问题具有以下三个特征：第一，确认了价格体系和数量体系之间的对应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将利润率的决定性的关系严密地公式化了；第二，阐明了剩余价值和利润的关系；第三，与此同时，出现了多种新型的转形理论或对转形理论的批判。下面我们就各个问题分别介绍一下。

1 价值体系和生产价格体系

理论展开的前提

为了说明问题的所在，首先应把价值体系和生产价格体系公式化。

在下面的说明中，我们考虑到了以下几种简单情况。

第一，生产是按照“投入产出”型进行的。

第二，生产资料的周转期间等于再生产期间，即流动资本模式。流动资本的生产期间是一个再生产期间。根据这种假定，我们排除了以下两个问题——一个是从生产期间跨越几个再生产期间所产生的对资本价值的测定问题，另一个是围绕把固定资本看成是某一结合物，按照冯·诺伊曼的处理方式所提出的问题。

^① 高须贺义博是日本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译者注

第三，假定技术系数是既定的和固定的。本题所用的技术系数有二：

$$\text{生产品投入系数 } a = \frac{k}{x}$$

$$\text{劳动投入系数 } l = \frac{l}{x}$$

(K为不变资本(表示物品)的数量, L为雇佣工人的劳动时间的总和, X为生产数量)

第四，假定劳动全部是简单劳动，实际工资是已知的，每一时间单位的实际工资为 w ，由于工资是在劳动以后支付的，如果持有这笔工资的资本家考虑到要购买工资品，而这些工资品在再生产的初期可作为资本加以利用，那么他就有可能把这些工资品看成是一种投入品（关于这一问题的详细情况，请看高须贺义博的《价值价格和生产价格》（1974年）一文）。我们在论述这一问题时就是采取这种立场的。根据这一立场，虽然也有可能把工资分为生存工资和剩余工资，但是按照“传统的工资理论”，就会同斯拉法的立场不同，因为他把全部工资都当成了剩余工资。

如果按照上述的简单化的假设，经济的再生产结构可作如下规定：I、II、III部门分别是生产产品的部门、生产工资品的部门和生产奢侈品的部门，部门间的区别用放在后面的1、2、3表示。各部门投入K和L，产出量为X。如果用生产函数的形式表示，则是

$$F(K, L) = X \quad (1)$$

在这种场合，价值体系和生产价格体系便如下节所述。

价值决定体系

价值体系可以规定为一种交换比例，而这种交换比例是由下面的联立方式决定的。如果某一商品的单位使用价值用 λ_i 来表示，那么，

$$\text{I } K_1\lambda_1 + L_1 = X_1\lambda_1$$

$$\text{II } K_2\lambda_1 + L_2 = X_2\lambda_2$$

$$\text{II} \quad K_3\lambda_1 + L_3 = X_3\lambda_3 \quad (2)$$

如用该部门的产出量(X_i)除以技术系数,改写(2)的各方程式,就可得以下方程式:

$$\begin{aligned} \text{I} \quad & a_{11}\lambda_1 + l_1 = \lambda_1 \\ \text{II} \quad & a_{12}\lambda_1 + l_2 = \lambda_2 \\ \text{III} \quad & a_{13}\lambda_1 + l_3 = \lambda_3 \end{aligned} \quad (3)$$

这就是价值决定体系。价值体系的特征在于同分配关系无关,因此,用价值概念规定分配关系可能不会遇到什么困难。马克思采用价值概念,把成为分析资本主义的基础的剩余价值率即剥削率规定如下:

一个工人的一天的劳动时间为 T , 他和他的家属每天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即工资品的总和为 B , 劳动的价值为 $B\lambda_2$ 。马克思把 T 时间中的补偿工人的 $B\lambda_2$ 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称作必要劳动时间 (T^*), 把剩余部分称作剩余劳动时间 ($T - T^*$), 两者之比决定剩余价值率 (e), 即

$$e = \frac{T - T^*}{T^*} = \frac{T - B\lambda_2}{B\lambda_2} = \frac{1 - w\lambda_2}{w\lambda_2} \quad (4)$$

($w = \frac{B}{T}$, 根据定义, 它等于实际工资率)

我们根据方程式(4)可以知道

$$w\lambda_2(1 + e) = 1 \quad (5)$$

如采用这一方程式,那么,价值体系作为使剩余价值平均化的单一的标准价格,可公式化为

$$\begin{aligned} a_{11}\lambda_1 + wl_1(1 + e) &= \lambda_1 \\ a_{12}\lambda_1 + wl_2(1 + e) &= \lambda_2 \\ a_{13}\lambda_1 + wl_3(1 + e) &= \lambda_3 \end{aligned} \quad (6)$$

生产价格决定体系

生产价格体系是使利润率平均化的价格体系。在使利润率平均化的经济中,必然形成如下一些关系:

$$\begin{aligned} \text{I} \quad & (K_1P_1 + wL_1P_2)(1 + e) = X_1P_1 \\ \text{II} \quad & (K_2P_1 + wL_2P_2)(1 + e) = X_2P_2 \end{aligned}$$

$$\text{II} \quad (K_3P_1 + wL_3P_2)(1 + e) = X_3P_3 \quad (7)$$

如用各部门的产出量(X_i)除以技术系数,改写(7)的各方程式,就可得出以下方程式:

$$\begin{aligned} \text{I} \quad & (a_{11}P_1 + wl_1P_2)(1 + e) = P_1 \\ \text{II} \quad & (a_{12}P_1 + wl_2P_2)(1 + e) = P_2 \\ \text{III} \quad & (a_{13}P_1 + wl_3P_2)(1 + e) = P_3 \end{aligned} \quad (8)$$

这就是生产价格决定体系。它们的特点是,价值体系或者生产价格体系,在技术系数既定的场合,同数量体系(各个部门的产出量的构成)无关,有可能被规定为有关单位产品价格的联立方程式体系。

简言之,转形问题明确了价值体系和生产价格体系之间的关系,从既定的价值体系中得出了生产价格体系。

2 利润率的决定

鲍尔特凯维茨

鲍尔特凯维茨论述了成本价格的生产价格化,正式地提出了转形问题,为后来阐明转形问题开辟了道路,在这一点上他作出了很大贡献,而不次于这一点的另一大贡献是,他阐明了利润率只是由基础品(各部应投入的资料)的生产部门决定的,同非基础品(奢侈品)的生产部门无关。而且不仅如此,在鲍尔特凯维茨的解法中,他断言,无论在总价值等于总生产价格中,或是在总剩余价值等于总利润中,尽管偏离率不同,但是利润率却是相同的。这一点说明,利润率被决定是同相对价格无关的,不过明确这一点的是在森岛通夫和塞顿发表的《利昂扬夫的总结和劳动价值论》(1961年)以及斯拉法发表的《用商品生产商品》(1960年)以后的事。

斯拉法的展开

重要的是,斯拉法的《用商品生产商品》以最严密的形式规定了利润率和劳动分配率之间的背离关系,为被称之为斯拉法革命

的多种不同议论提供了基础,而且在同转形问题的关系上,还明确了无论在何种相对价格下,都存在着有可能决定利润率的各部门的资料构成。要说明这一点,就决定利润率的两个基本品部门(I和II)而言,可根据信田强在《斯拉法体系说明(再考察)》一文中的观点加以说明。

如在方程式(5)中,改成 $K_i = a_{1i}X_i$, $L_i = l_iX_i$, 把 I、II 两部门合在一起计算,相对价格为 $m = \frac{P_2}{P_1}$, 那么就成为

$$\frac{(a_{11}X_1 + a_{12}X_2) + mw(l_1X_1 + l_2X_2)}{X_1 + mX_2} = \gamma \quad (9)$$

$$\left(\text{不过, } \gamma = \frac{1}{1+e}\right)$$

在这一方程式中,不管相对价格(m)如何,由于 γ 是一定的,所以如果在产出量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也就便于调整了。因此,不论

$$[\gamma X_1 - (a_{11}X_1 + a_{12}X_2)] + m[\gamma X_2 - w(l_1X_1 + l_2X_2)] = 0$$

同m是否有关,所形成的条件这一点是明确的;因此,上面的两个方括号可以是零。也就是说

$$\frac{a_{11}X_1 + a_{12}X_2}{X_1} = \frac{w(l_1X_1 + l_2X_2)}{X_2} = \gamma \quad (10)$$

这一方程式中的第一项的分子是两部门中的生产产品的投入总量,分母是 I 部门的产出量。同样,这一公式中的第二项的分子是两部门中的工资品的投入总量,分母是其供给部门即 II 部门的产出量。方程式(10)说明,在各种基础品的投入总量和其供给部门的产出量之间如果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那么,不管相对价格(m)如何,利润率都是一定的。这表明,斯拉法标准体系是具有满足这些条件的资料构成的经济,而这种经济总是从现实体系中引出来的。

问题由森岛明确了

把这一论点作为冯·诺伊曼的“黄金时代”的产出量加以明确的,是森岛通夫(《马克思经济学》1973年)。森岛理论是以价格体系和数量体系之间存在着相互对应的关系为起点的。如果用行列表

示 I 和 II 的价格决定公式——因为这一公式决定了方程式 (8) 的价格决定方程式中的利润率——那么,

$$\begin{bmatrix} a_{12} & wl_1 \\ a_{11} & wl_2 \end{bmatrix} \begin{bmatrix} p_1 \\ p_2 \end{bmatrix} = \gamma \begin{bmatrix} p_1 \\ p_2 \end{bmatrix} \quad (11)$$

这一方程式中的 γ 是投入行列中的固有值, 价格 (P_1, P_2) 是固有矢量。虽然把固有值和固有矢量中最大数值称为弗罗宾尼斯根和弗罗宾尼斯矢量, 但由于利润率经常选择最大数值, 所以方程式 (11) 中的 γ 和价值就是弗罗宾尼斯根和矢量。

另一方面, 很明显, 投入行列的转置行列的弗罗宾尼斯根是同一的东西。于是, 形成下列方程式:

$$\begin{bmatrix} a_{11} & a_{12} \\ wl_1 & wl_2 \end{bmatrix} \begin{bmatrix} x_1 \\ x_2 \end{bmatrix} = \gamma \begin{bmatrix} x_1 \\ x_2 \end{bmatrix} \quad (12)$$

如把这一方程式改成一般方程式, 则成为

$$\begin{aligned} a_{11}x_1 + a_{12}x_2 &= \gamma x_1 \\ w(l_1x_1 + l_2x_2) &= \gamma x_2 \end{aligned} \quad (13)$$

该方程式中的 x_1 和 x_2 , 可看作两个部门的产出量。这样一来, 价格体系和数量体系就是带来相同的 γ 的两个体系, 在这种情况下, 可以说两个体系是成双的。

从方程式 (13) 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frac{a_{11}x_1 + a_{12}x_2}{x_1} = \frac{w(l_1x_1 + l_2x_2)}{x_2} = \gamma \quad (14)$$

以及看到满足方程式 (10) 的条件。

但是, 方程式 (12) 中的 x_1 和 x_2 指的是什么呢? 不用说就知道, 它们不同于现实的产出量 (X_1 和 X_2)。在这里, 如果我们想起我们讨论中的固定资本是不存在的, 实际工资率是固定不变的, 那么, 目前的投入物就等于前期各供给部门的产出量, 即

$$\begin{aligned} a_{11}x_1(t) + a_{12}x_2(t) &= x_1(t-1) \\ w(l_1x_1(t) + l_2x_2(t)) &= x_2(t-1) \end{aligned}$$

由此可见, 方程式 (13) 就成为

$$x_1(t-1) = \gamma x_1(t)$$

$$x_2(t-1) = \gamma x_2(t)$$

显然， γ 成为各部门资料的成长率。因此，如果

$$\gamma = \frac{1}{1+g^*} \quad (15)$$

(不过， g^* 是最高成长率)

那么，从价格决定方程式中的 γ 的定义中便得出

$$e = g^* \quad (16)$$

这一重要结论。产出量矢量(x_1 和 x_2)无非就是两部门在利润率相等，并以最大成长率平均成长的情况下的两部门的产出量(正确地说，由于弗罗宾尼斯矢量所具有的比例是既定的，所以是平均成长率 g^* 下的部门构成)。这一点被称为冯·诺伊曼的“黄金路”上的产出量。具体地说，工人没有储蓄，资本家把全部利润用于投资，就是说，在奢侈品为零的情况下，经济总会通向冯·诺伊曼所说的“黄金路”的。

以上的讨论，对转形问题来说，在以下两点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第一，利润率在既定的技术系数和实际工资率下作为最大的成长率，是从数量体系中求出的。

第二，冯·诺伊曼的“黄金路”上的产出量同相对价格无关，保持着同利润率一致这种美好关系。

以上两点在解决转形问题时起了什么作用呢？关于这一问题，请看下一节。

3 剩余价值率转化为利润率

森岛和塞顿把马克思理论公式化了

马克思指出：“应当从剩余价值率到利润率的转化引出剩余价值到利润的转化，而不是相反。”^②马克思的这一见解没有被重视，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1页。

长期以来，这一见解的严密的公式化未被采纳。但是森岛通夫和塞顿在《利昂惕夫的总结和劳动价值论》(1961年)以及森岛通夫在《马克思经济学》(1973年)中，把方程式(12)当成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并取得了成功，从而为转形问题开辟了一个新领域。

如果用方程式(12)的 x_1 和 x_2 分别乘以方程式(6)的 I、II 部门的价值决定方程式，然后相加，就成为以下各方程式：

$$\begin{cases} a_{12}\lambda_1 x_1 + w l_1 \lambda_2 (1+e) x_1 = \lambda_1 x_1 \\ a_{11}\lambda_1 x_2 + w l_2 \lambda_2 (1+e) x_2 = \lambda_2 x_2 \end{cases}$$

$$\lambda_1 (a_{11} x_1 + a_{12} x_2) + w \lambda_2 (l_1 x_1 + l_2 x_2) (1+e) = \lambda_1 x_1 + \lambda_2 x_2 \quad (17)$$

另一方面，如把 λ_1 和 λ_2 分别加在方程式(13)的各方程式上，并考虑到 $g^* = e$ (方程式(16))，那么就得出以下各方程式：

$$\begin{cases} (1+e)(a_{11}\lambda_1 x_1 + w l_1 \lambda_2 x_1) = \lambda_1 x_1 \\ (1+e)(a_{12}\lambda_1 x_1 + w l_2 \lambda_2 x_2) = \lambda_2 x_2 \end{cases}$$

$$(1+e) \{ (a_{11}\lambda_1 x_1 + a_{12}\lambda_2 x_2) + w \lambda_2 (l_1 x_1 + l_2 x_2) \} = \lambda_1 x_1 + \lambda_2 x_2 \quad (18)$$

因为两式的右边都是总价值，所以如将两式等置起来加以研究，便可得出森岛和塞顿的如下方程式：

$$e = e \frac{V^*}{C^* + V^*} = e \frac{V_1 x_1 + V_2 x_2}{(C_1 + V_1) x_1 + (C_2 + V_2) x_2} \quad (19)$$

(不过, $V^* = w \lambda_2 (l_1 x_1 + l_2 x_2)$, $C^* = \lambda_1 (a_{11} x_1 + a_{12} x_2)$,
 $C_i = a_{1i} \lambda_i$, $V_i = w \lambda_2 l_i$)

大家知道，由于森岛和塞顿的方程式把各种资料的每一单元中所包含的不变资本部分(C_i)和可变资本部分(V_i)分别加上冯·诺伊曼所说的“黄金时代”的产出量 x_1 和 x_2 ，通过价值体系的范畴，成功地给利润率下了定义。这样，便论证了剩余价值率向利润率的转化。

梅迪欧对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研究

梅迪欧在《利润和剩余价值 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出现和存在》(1972年)一文中，通过另一种方式再一次确认了森岛和塞顿的方程式，说明了总价值等于总生产价格一致的命题也是有可能成

立的。

第一,他把冯·诺伊曼所说的“黄金时代”的产出量作了如下特殊规定:

$$l_1 + l_2 = l_1 x_1 + l_2 x_2 = 1 \quad (20)$$

第二,他对比了各部门的价值和生产价格之间的偏离率,而如果把这种对比称为 m ,那么

$$m = \frac{P_2/\lambda_2}{P_1/\lambda_1} \quad (21)$$

(P_i 是 i 部门的生产价格)

如果首先用方程式(21)表示生产价格体系,那么就可得出

$$\begin{aligned} (1+e)(a_{11}\lambda_1 + w l_1 \lambda_2 m) &= \lambda_1 \\ (1+e)(a_{12}\lambda_1 + w l_2 \lambda_2 m) &= \lambda_2 m \end{aligned} \quad (22)$$

如果分别用 x_1 和 x_2 乘以这两个方程式,然后相加,便得出

$$\begin{aligned} (1+e) \{ \lambda_1 (a_{11}x_1 + a_{12}x_2) + w \lambda_2 m (l_1 x_1 + l_2 x_2) \} \\ = \lambda_1 x_1 + \lambda_2 x_2 \end{aligned} \quad (23)$$

如果考虑到方程式(20),从这一方程中便得出

$$e = \frac{\lambda_1 x_1 + \lambda_2 x_2}{\lambda_1 (a_{11}x_1 + a_{12}x_2) + w \lambda_2 m} - 1 \quad (24)$$

在冯·诺伊曼的“黄金时代”的产出量(x_1 和 x_2)的条件下,梅迪欧利用了相对价格(m)是任意值、利润率是同一的这种上述论述过的性质,通过 $m = 1$,便得出如下方程式:

$$e = \frac{(\lambda_1 - a_{11}\lambda_1)x_1 + (\lambda_2 - a_{12}\lambda_1)x_2 - w\lambda_2}{\lambda_1(a_{11}x_1 + a_{12}x_2) + w\lambda_2} \quad (25)$$

在这一方程式中, $l_1 = \lambda_1 - a_{11}\lambda_1$, $l_2 = \lambda_2 - a_{12}\lambda_1$ (根据方程式(3)),但是,如果考虑到方程式(20),通过 $a_{11}\lambda_1 = c_1$, $a_{12}\lambda_1 = c_2$ 用 $w\lambda_2$ 除以子分母,便可得出

$$\begin{aligned} e &= e \frac{1}{\lambda^* + 1} \\ (\text{不过, } e &= \frac{1 - w\lambda_2}{w\lambda_2}, \lambda^* = \frac{c_1 x_1 + c_2 x_2}{w\lambda_2}) \end{aligned} \quad (26)$$

这一点就内容来说,同森岛和塞顿的方程式是一样的。

接着，梅迪欧在他的模式中证明了相对价格(m)通过任意值都能成立的这一性质，正如总价值等于总生产价格的命题一样，研究了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问题，并把这一问题看成是有可能再增加一个使相对价值(m)特定化的方程式，而这个方程式就是

$$\lambda_1 x + \lambda_2 m x_2 = \lambda_1 x_1 + \lambda_2 x_2 \quad (27)$$

而这一点之所以可能，当然是根据这样一点——把通过冯·诺伊曼的“黄金时代”的平均或最大成长率所形成的产出量的构成比例(部门构成)，当成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梅迪欧的贡献在于，他说明了即使没有把各部门的技术构成和“内部构成”特定化，如果采用现实中不存在的冯·诺伊曼的“黄金时代”的产出量，换句话说，在虚构的经济中，转形问题也会得到解决。的确，为了在现实中形成这种经济，资本家必须将全部利润用于投资，工人也必须储蓄，虽然人们对在这种虚构的经济中解决转形问题深表怀疑，但是，冯·诺伊曼的“黄金时代”在现实的价格关系中是潜在地存在的，通过分析将这一点抽出，就会说明价值同生产价格的关系，而要深化经济理论，这样做是不可避免的。

4 马克思转形理论的复活

在引进成本价格生产价格化的情况下，马克思的转形理论只有在所有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是均等的这种极为有限的场合下才成立，这一点已成为近代经济学批判马克思的转形理论的常识。但是，也出现了在其他情况下讨论马克思的转形理论的情况，而这是七十年代的一个特点。

有关讨论资本的 averages 的内在构成的情况

这种情况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埃马奴埃尔在《不平等交换》一书、萨缪尔逊在《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到竞争价格的转变——排斥和取代的过程》一文以及莱布曼在《价值和生产价格——政治经济学中的转形问题》一文中所主张的“资本的 averages 的内在构成”。这种

理论是从以下两个前提出发的：第一，在只有由基础品组成的经济中，生产品和消费品一起，具有同一的资料构成；第二，这些资料的构成同产出量的构成（部门构成）相同。不用说，前提二会满足方程式（10）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前提一的存在，尽管在生产品和生活品之比的意义上资本有机构成是不同的，但是，在两者相加的情况下资料构成之比同所有部门的产出量的构成之比都是相同的。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化之所以能够顺利完成，原因就在这里。甲贺光秀在《关于萨缪尔逊等人对马克思的批判》一文中根据这种转化的简单数值作了通俗说明，而莱布曼的说明则是根据两种资料的模式图解。

有关讨论一次从属的情况

森岛通夫在《马克思经济学》中否认这样一种假定，这种假定认为，在“资本的平均的内在构成”理论中，生产品和消费品具有同一构成，同属一种资料。他指出，如果各部门的投入系数只存在“一次从属”的关系，那么马克思的转形理论也就成立了。所谓投入系数的“一次从属”是指这样一种特殊情况，即投入系数虽然不同，但在总和的情况下却成为同一资本的有机构成，在存在两种资料的模式的情况下，等于假定存在着资本的平均有机构成。两者相互制约，而这是不可改变的。

上述种种论点是探索，在马克思的转形理论中的一次转化上，也存在价值有可能转化为生产价格这种特殊情况，说明在相互制约的极其特殊的条件下，马克思的转形理论依然是成立的。

与此相反，置盐信雄在《马克思生产价格的结束》和 A·夏库在《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和所谓转形问题》、《马克思对转形问题的辩解》中认为，即使在成本价格生产价格化的情况下，马克思的转形理论也存有不足之处，但是如果在总价值等于总生产价格这种限制条件下，按照马克思的方法不断反复计算，也会收到鲍尔特凯维茨的解法在总价值等于总生产价格这种标准化情况下所取得的结果。其次，森岛指出，按照同样的反复计算，逐渐修正产出量，最后

会得出冯·诺伊曼的“黄金时代”的产出量，从而在数学上严密地说明了森岛和塞顿方程式的形成。可见，认为马克思所采用的方法是简单的错误的那种批判显然是不妥当的。不过，这些议论在数学上还是有意义的，尽管置盐停留在鲍尔特凯维茨的解法上，森岛停留在再认识森岛和塞顿的方程式上。

另一方面，萨缪尔逊和魏茨泽克提出了“被同时化了的劳动成本”，认为应当把扩大再生产所必需追加的工人工资的部分当作“成本”，从而提出了否定剩余价值理论的一个新问题。

遗留下来的问题

如上所述，转形问题经过了长时间的争论，我们至少可以认为，这个问题在本题中最初提出的前提下得到了解决。留给今后的课题是引进固定资本和技术以及复杂劳动等一些比较次要的前提，通过比较具体的非制约性的研究解决转形问题，不过，这种课题所能作出贡献的领域是相当有限的。转形理论在过去之所以重要，在于对生产价格来说价值具有根源性，以此证明剩余价值率的作用，而这一点经过迄今为止的争论，大体上已经明确了。实际上，转形理论是为了用严密的方法论证剩余价值所必经的媒介领域。因此，遗留下来的第一个问题是进一步展开剩余价值理论，而关于这一问题，已有一些人进行过研究。人们正在讨论，在结合生产的情况下，虽然发生了利润率为正数、剩余价值率为负数这种情况，但是对剩余价值理论来说，这种情况具有何种意义呢？关于这一问题，请看斯蒂德曼的《肯定利润，否定剩余价值》（1975年）、置盐信雄的《投出的劳动量和固定设备》（1973年）、盐泽由美的《耐久资本品及其价值》（1974年）和甲贺光秀的《结合生产、价值、剩余价值》（1976年）等人的著作。

在转形理论固有的领域内所遗留下来的课题是在方法上反省转形理论本身。在这一点上，正如鲍莫尔所尝试的那样，给予作为物化理论一环的转化理论以一定位置的课题，就是如何在政治经济学体系中展开价值、生产价格和市场价格等立体结构的问题。可

以说,目前正在向着转形理论本身的新的领域飞跃发展。

原载《学习〈资本论〉》1978年有斐阁版

(刘 焱摘编)

第一次全国“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学术研讨会”在榕城召开

由中共中央编译局、福建省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和商务印书馆共同发起，1986年12月3日至9日在福州市举行了“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学术研讨会”。出席研讨会的有来自全国许多地方的包括哲学、科学社会主义、史学、民族学、人类学、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社会科学情报研究等专业的专家学者近五十人。

马克思晚年的大量笔记中，被称为“人类学笔记”或“民族学笔记”或“古代史笔记”的，主要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中收入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一书摘要》、《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一书摘要》和未收入《全集》的《菲尔〈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一书摘要》等五个笔记。这些笔记除1932年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达·彼·梁赞诺夫曾有所提及外，一直鲜为人知。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苏联的一些刊物发表过这些文献，但也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注意。直到1972年美国学者劳伦斯·克拉德《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一书发表后，国外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者才开始重视，并陆续发表了不少专著和专论。近年来，中国学者也开始重视马克思的这些笔记，关心西方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学者的研究情况。《马恩全集》第45卷的出版，为我国学者研究马克思的晚年思想提供了良好条件。这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了大家交流研究成果的要求。

在会议上，几位专家介绍了五个笔记的情况和其中值得研究的重大问题，介绍了西方学者的研究情况及成果，介绍了苏联和东欧学者的研究情况及成果，介绍了我国某些少数民族的原始资料和研究情况。这些介绍引起了与会专家学者的极大兴趣。经过六天交换意见，大家提出和初步探讨了一些问题，归纳起来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大家对笔记的性质发表了不同意见，有“人类学笔记”、“民族学笔记”、“古代史笔记”、“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笔记”等等说法，而同意称为“人类学笔记”的学者，理解也不完全一致。大家认为，确定笔记的性质是今后的课题之一。

二、笔记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地位、意义如何？给了我们什么新的启发？笔记对评价作为革命家和学者的马克思有什么意义？如何恰如其分地估计笔记？

三、笔记是否丰富和完善了历史唯物主义？笔记是否存在不足之处和时代局限性？

四、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两种生产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多年来没有得到正确评价的问题之一，如何才能正确、全面地加以阐发？不少与会学者认为“人自身的生产”，从而“血缘关系”不仅对原始的、古代的社会起作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有现实意义，很值得深入研究。

五、笔记的发表对解决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有什么意义？如何把二者联系起来研究？

六、笔记中关于“人”的问题的论述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其他重要著作中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同哲学人本主义有什么关系？

七、对西方学者提出的“两个马克思”（或“三个马克思”），社会发展的“多线论”和“单线论”问题，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断裂”、“重大突破”和“复归”等等，应如何认真地、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八、如何从方法论上来开拓对马克思笔记研究的途径？等等。

这次会议是开得成功的，初步交流了研究成果和国内外信息，明确了今后研究的重点，对这些笔记的研究起了推动作用。但由于这些笔记刚刚全部发表，我国的研究工作也刚刚起步，因此讨论的深度和广度还不够。希望这方面的研究能继续深入进行下去。为加强大家的联系和协作，交流心得和信息，大家同意在北京设立一个比较固定的通讯联系小组，由中央编译局、福建社会科学院、中国社科院马列所和商务印书馆哲学室的同志组成。工作小组的任务是联系各地学者、组织交流成果、提供信息和资料、编辑文集，在时机成熟时筹办下一次全国性学术讨论会。通讯地点设在中央编译局马恩室，联系人张奇方。

本刊征得会议论文作者同意，将摘登一部分论文，以飨读者。

(闻 文)

轰动一时的发现

——二十余件马克思、恩格斯珍贵
文献的传奇式经历

王 栋 华

1982年,巴黎附近的蒙特勒伊历史博物馆因清理内部的文献、书籍和刊物而暂时闭馆,但这里很快就成了引人注目的中心。因为在清理这些东西时,意外地发现楼房阁楼上有一个木箱。木箱里装有二十多件绝大多数不为人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手稿、书信和马克思的亲属亲笔写的东西。而在这之前的几十年中,这个木箱似乎一直无人问津,里面保存的这些东西从未启封,完好无损。

在这批珍贵的文献中,有字迹很难辨认的马克思的信件和笔记。其中有马克思1874年5月写给《资本论》法文版的出版者莫里斯·拉沙特尔的一封信。从这封用地道的法文写成的信中,我们可以获知,当时马克思健康状况不佳,以及《资本论》手稿写作的进展情况;此外,还可以了解到关于俾斯麦在圣塞瓦斯田的阴谋,伦敦国际工人协会的领导者们的详细情况等。三十年来,从事马克思研究的学者们一直认为,这封没有标上日期的信是马克思写给他在伦敦的法国战友勒·穆修的,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人看到过。还有一封信是恩格斯1889年6月11日写给法国共产党领袖茹尔·盖得的。除信件外,有一篇马克思写于1852年,发表在盖得负责的报纸《社会主义者报》上的文章《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一直不为人知的还有:1848年4月马克思和恩格斯离开巴黎

前往德国参加革命的文献。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战友沙佩尔、鲍威尔、莫尔和沃尔弗拒绝参与海尔维格和伯恩施太德的武装“军团”冒险计划的文献；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一文的法译文，译文附有为法国读者所作的一系列注解。马克思领导下的德国革命者曾打算把这些文献刊登在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埃蒂耶纳·卡贝的《1841年人民报》上，但此事未能办成。

文献中夹有一张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寄给自己女儿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的汇款条，上面写道：“汇去一百塔勒作为亲爱的燕妮过生日时赴巴黎或瑞士旅行之用。”1832年2月2日，燕妮·冯·威斯特华伦刚好满十八周岁。

此外，两封小劳拉和小燕妮的信是写给她们的父亲的，马克思当时离开了伦敦。信的原文是英文，字里行间流露出女儿们对父亲的深切感情。小劳拉的信写得挺简洁。信中写道：“我亲爱的摩尔，我们的饭菜好极了，有煎牛排，豌豆和新鲜土豆。真的，好吃极了！一遍又一遍地亲吻你，我的好爸爸！你的劳拉。”

比劳拉大一岁零四个月的小燕妮用了马克思的另一个外号“恰理”给自己的父亲写信。他告诉马克思：“妈妈和劳拉刚才去给房东付了房租。我想，明天我们又要去我们的隐蔽所了。劳拉过生日时，妈妈非常慷慨地花钱买了葡萄、蛋糕、一块烤肉和许多棒棒糖。小杜西真可爱，总是爬来爬去，爬上爬下。那个矮个子粮食商人一来，她简直高兴得不得了。我想，这个小矮个儿是她最喜欢的人。我们发现一个有好多架秋千的地方，我们在那儿玩得真开心，我们刚把衣服穿好要去那儿玩。再见，我亲爱的恰理，你不在家，我们觉得冷冷清清。我们希望你快点回来，希望你在医院里过得快活。你的燕妮。”小燕妮在信上写的日期是12月28日，她没有写年代，但当时正好是劳拉过生日后不久。因此，可以推断，这封信写于1857年。当时，劳拉刚好十一岁，燕妮十二岁半。

这批珍贵的材料是如何被装进箱子里的呢？据博物馆馆长、青年历史学家让-吕克·巴雷说，1939年战争初期，历史协会主席、博物馆前馆长雅克·杜克洛让人把文献全部装箱，并把这批箱子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这些颇有价值的历史材料据说是抢在警方采取行动，即查禁法国共产党的前夕就转移走了。战后，这批箱子又被送回博物馆。谁也说不清楚这只装有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的箱子为什么在此之前一直未被打开过。

已故的工人运动领袖、前博物馆馆长雅克·杜克洛的遗孀吉尔贝特·杜克洛对文献疏散转移一事知道得多一些。她说：“我的丈夫当时委托他的私人秘书莫里斯·肖梅隆保护好博物馆的这批文献。一切都是在非常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只有肖梅隆同志能提供这方面的详细情况。”

八十七岁的肖梅隆至今依然健在。他回忆了当时的情况，说：“党被查禁前夕，杜克洛同志委托我把这批珍贵材料从博物馆里抢救出去。”

莫里斯·肖梅隆在蒙特伊勒市政府找到了这四十口箱子。箱子非常结实，里边装了不少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保存下来的市民们使用的防毒面具，全部文献用防水纸包着。两部载重卡车将这些箱子运走，但是，卡车的行驶方向却与约好要去的地方方向不同。半路上，这些箱子又被卸下来装到另外两部卡车上。前两部卡车的两位司机都不知道这些箱子应该运往何处，后两部卡车的两位司机对这批箱子的来路也不闻不问。目的地终于到了，原来是一个靠近尚帕涅森林的偏僻村落。

农民莱昂·布歇从建党开始就是法国共产党党员。肖梅隆说：“我知道，我完全可以信赖布歇同志和他的妻子。他们把四十个箱子很好地隐蔽在棚屋里的柴禾堆里。”

杜克洛在全国被占领期间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对布歇下了严肃的命令，要他在参加抵抗活动中不要出任何差错，而肖梅隆当时却另有重任。

肖梅隆从前是一个木刻工人,在被占领的四年期间,他经历了艰苦的地下斗争生活。他在塞纳-马恩省领导党的活动,曾于1942年被捕,被判处监禁三年。他在党的帮助下越狱,隐藏在一位德籍妇女家里。这位妇女的丈夫是一位法国人,过去一直是巴黎党的负责人之一。

那么,藏在柴禾堆里的箱子当时怎么样呢?肖梅隆另有重任顾不上这批箱子,而他的母亲正好住在离布歇居住的村子不远的地方,她常常去尚帕涅森林采蘑菇,于是肖梅隆便委托自己的母亲定期去布歇家看看。找到布歇时,老太太只提一个事先约定好的问题:“小猪崽们怎么样啊?”,布歇则回答:“小猪崽们好着呢!”这是两句经过一番周折才传达给雅克·杜克洛的暗语。战后,博物馆再度开放时,布歇夫人曾被雅克·杜克洛作为贵宾请到蒙特勒伊。当时,报纸上曾作过报道。而莱昂·布歇本人则因病势严重未与夫人一同前往。这两位曾经冒着生命危险保护这些珍贵文献的同志已于五十年代去世。

这就是这批文献在战争期间艰难曲折的经历。但是,仍有一点令人不解: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遗物最初是通过什么途径到了蒙特勒伊博物馆的?

据现馆长让-吕克·巴雷说,他们对此也一无所知。但是,可以肯定,当时填写博物馆捐赠人员表格时十分马虎,这主要是为了应付警察以及后来的盖世太保。

据马克思的曾外孙罗贝尔-让·龙格回忆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手稿一直在马克思的女儿燕妮和她的丈夫沙尔·龙格手中,1903年,龙格去世后分别由他们的四个孩子:沙尔、亨利、埃德加尔和让(罗贝尔-让·龙格的父亲)掌管。埃德加尔对社会党深感失望,1938年让去世后便加入了共产党。当时,他把马克思和恩格斯遗物中的文献全部交给了雅克·杜克洛,赠给了新的博物馆。

这段历史和事件使得这批珍贵手稿公开的时间延缓了四十

余年。

根据 1984 年 1 月 7/8 日《新德意志报》第 11 版，
驻巴黎记者格尔哈德·莱奥的一篇报导改写。

苏联发表列宁新文献一百余篇

——《列宁文集》第40卷简介

韩 江

1985年苏联马列主义研究院出版了《列宁文集》第40卷。该书收载新的列宁文献115篇。文献分两部分，一是文章、书信、电报、文件、札记等类，一是在书刊摘录和批注等资料。两部分分别按编年体排列。

在第一部分中有十月革命前的文献14篇，其中两篇是曾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余为书信和其他文稿。属十月革命后的52篇都是国务活动文献，包括函电、批示、命令、决议草案等等，内容涉及保卫苏维埃国家、改善管理机关工作、加强革命法制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诸多方面的问题。这些新文献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列宁1894—1922年间在理论、政治、经济、组织工作等方面的一些活动和思想观点。下面仅提一提十月革命前的三篇文献。

排在卷首的《问题单》是1894—1895年为研究俄国工人阶级的劳动和生活条件而写的。当年曾在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会员和其他马克思主义小组的宣传员中散发。后来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曾谈到他进行这种调查访问的情况（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360页）。新发表的这个《问题单》长达三千多字，包括五十七个问题。从中可以看到，列宁对俄国工人阶级状况哪些方面感兴趣，他的调查研究工作多么深入而具体。《选举为期不远了，大家行动起来吧！》一文最初载于1912年6月30日《真理报》，发表时没有署名。根据对文章内容和风格以及有关资料的考证，确认为列宁手笔。这篇文章写于布尔什维克党开展第四届国家杜马竞选运动期间。列宁在文中号召彼得堡工人民主派和一切同情社会民主派的分子积极参加即将举行的第四届国家杜马城市第二选民团的

选举。他认为，首都的城市第二选民团的选举是杜马选举“整个竞选运动的中心”。另一篇文章《关于粮食价格问题（致编辑部的信）》原载1897年3月13日《萨马拉新闻》报，署名C.T.A.。曾收入《列宁全集》俄文第2、3版。后来苏联列宁研究院怀疑此文非列宁所作，于是《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和第五版都不收这篇文章。不久前经过对全部资料包括近几年掌握的新材料进行详细的综合研究，苏联马列主义研究院得出结论，肯定该文是列宁文献。因此重新发表。

第二部分文献主要是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时留下的资料。其中有：1888、1893和1894年在马克思《资本论》第1、2、3卷上作的批注和记号；在1906年圣彼得堡出版的马克思《历史著作集》和恩格斯《1871—1875年文集》中、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中所作的批注和记号。此处还有《哥达纲领批判》一书摘录和列宁译恩格斯《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的俄译文。在列宁作了批注的上述马恩著作中，大量的是列宁画上着重线和标出“注意”的记号，批语极少。尽管如此，这些文献对于读者加深理解著作本身的内容和了解列宁在其创作活动中如何研究和使用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还是极有帮助的。

此外，第二部分文献中还收入了列宁对潘涅库克、李卜克内西、鲍威尔、马斯洛夫、马尔托夫、贝拉·库恩、欣丘克等人一些著作的批注。《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的评论》1929年曾收入《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1卷中，由于印数极少，现在已成为图书馆的珍本书，广大读者难以借到。为便于党的宣传干部使用，在《列宁文集》第40卷中再次刊印。

《列宁文集》第40卷的问世，为研究列宁的思想和生平活动、探讨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提供了大量很有价值的新材料。目前中文第二版《列宁全集》正在陆续出版，除已见书的卷次外，以后各卷都将把《列宁文集》第40卷中相应时期的新文献补编进去。

苏联新著《马克思列宁主义史》 开始出版

晓 戈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正在集体撰写《马克思列宁主义史》(多卷本)。该书是按时期编写的。第一卷和第二卷包括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史,第三卷包括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列宁阶段的十月革命以前时期,第四卷和第五卷包括十月革命至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建立时期,第六卷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建立到目前为止。此外还编了一卷历史文献专卷。

该书第一卷1986年问世。第一卷除前言和结束语外,共分九章,书后附有人名索引、期刊索引、组织机构索引等。该卷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开始从事理论著述和革命活动到巴黎公社前这段时期的情况,揭示了作为科学的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产生的规律性。马克思主义史被视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科学共产主义的统一和相互制约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思维发展的完整过程。同时,该书说明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的相互联系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规律性,并叙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各国的传播、在工人运动中的确立和它对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影响。

该书是综合性的学术著作,涉及到许多学科。参加该书编写工作的不仅有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的科研人员,而且还有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苏联科学院、莫斯科大学和列宁格勒大学一些人文科学研究所的专家和学者。他们在编写过程中,不仅利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以及他们同时代人的历史材料,而且还吸收了苏联、东欧和其他国家的马列主义史著作以及有关学

科专著的优秀成果。因此，苏联学术界认为，该书是当前马克思列宁主义史专著的最新成就。该书现由中共中央编译局组织力量翻译。

《〈资本论〉的第一个俄译者》

林 东

《〈资本论〉的第一个俄译者》（1983年思想出版社版）的作者O·A·萨伊金，以丰富的材料叙述了马克思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格·亚·洛帕廷的充满戏剧性冲突的革命生活。全书共分十一章：第一章是《踏上革命道路》，第二章是《在流亡中。参加第一国际》，第三章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四章是《〈资本论〉第一卷在俄国出版》，第五章是《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第六章是《英勇胜于理智的洛帕廷》，第七章是《再渡流亡国外。和马克思恩格斯在一起》，第八章是《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第九章是《同恩格斯的最后相见》，第十章是《领导“民意党”》，第十一章是《逮捕和审讯。被囚在要塞。最后的年代》。此外还有引言和结束语，书末附有资料索引。

苏联学术界认为，该书是一本资料丰富、叙述生动的传记。但有人指出，作者说“洛帕廷不认为自己是民粹派”，“在他的世界观中，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是突出的”等提法，是值得商榷的。持异议者列举了洛帕廷的战友苏霍姆林的评语：“洛帕廷是马克思的朋友和崇拜者，没有抛弃我们民粹派的信念”。证明洛帕廷并不理解马克思主义，临终前一直是民粹主义思想的俘虏。

《国际共运史研究》出版

《国际共运史研究》是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主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专业学术丛刊。原为《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自1980年创刊后共出十八辑及卢森堡专辑、布哈林专辑。从1987年起改名为《国际共运史研究》，向国内外公开发行人。

《国际共运史研究》是供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工作、国际共运史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的同志交流成果、互通信息、共同探讨国际共运史上有关问题的学术刊物。

《国际共运史研究》辟有共运笔谈、专题论文、人物传记、研究动态、书刊评介、国外学术会议和研究机构介绍等栏目。丛刊力求反映我国共运史学界研究的最新水平，提供国外研究的重要信息和珍贵资料，是理论工作者、国际共运史研究和教学工作者的理想读物。

《国际共运史研究》每年2月、6月、10月出版，每辑二十万字，附有英文要目，大32开本，每辑定价1.80元。

欢迎到各地新华书店预订或向人民出版社邮购部办理邮购（地址：北京朝内大街人民出版社）。

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
《国际共运史研究》编委会

1986年8月